傅斯年全集



第四卷



▼

傅斯年全集

第四卷

▲

傅斯年全集

第四卷

欧阳哲生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斯年全集．第4卷/傅斯年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Ⅰ．傅…　Ⅱ．傅…　Ⅲ．傅斯年-全集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3619号

傅斯年全集

第四卷

*

责任编辑：邹树德　周志平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64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邵阳）印刷

*

787×1092　16开　印张：22.75　字数：300000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5—4000—7/G·3995

本套定价：408元　本册定价：44.3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1935年，傅斯年先生在北平时摄。

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书于四川南溪李庄遗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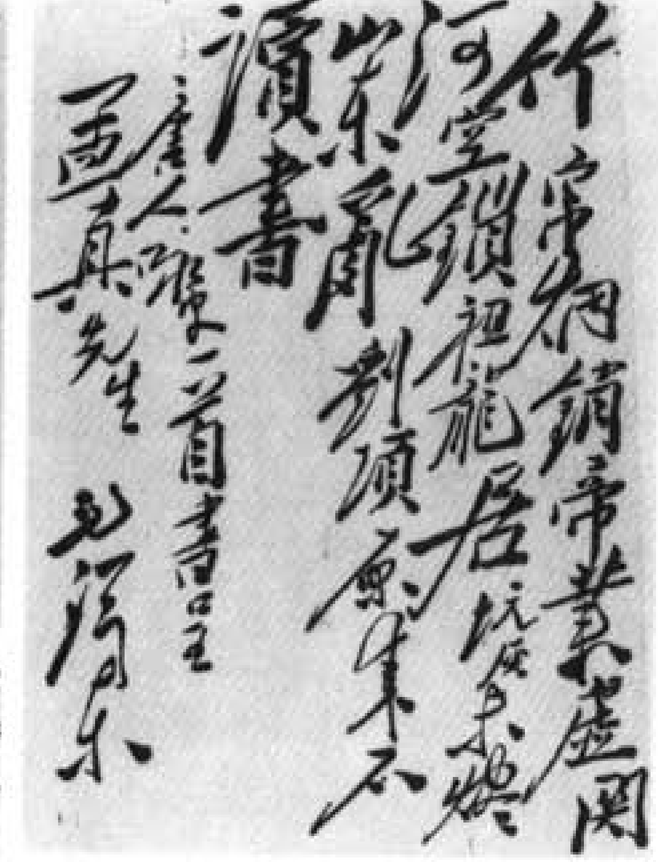


1943 年，傅斯年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演讲时摄。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六位参政政员由重庆飞抵延安，商量促成国共和谈。图为参政员抵达延安机场时留影。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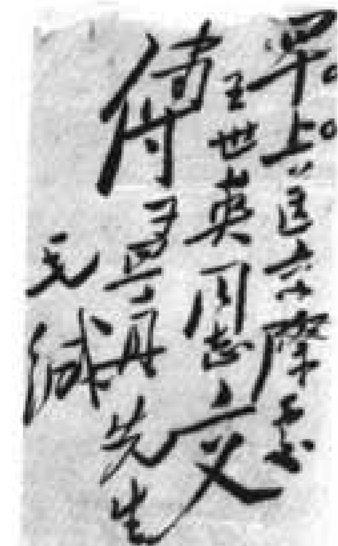
竹帛烟銷帝業虛 关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 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咏史一首書呈

孟真先生

毛澤東

毛泽东赠傅斯年的条幅，书写的是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的诗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傅斯年访问延安时，中共领导人宴请六位参政员时留影。左一为毛泽东，背对镜头者为傅斯年。



傅斯年、周恩来摄于延安。



傅斯年与蒋介石在北平同游文天祥祠时合影。



觀察

第二卷 第一期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教師與進步

從政治、經濟、法理分析金潮之因果與處理

從黃金風潮論經濟對策

零下三十度的人心



世紀評論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文明往那裏走（上）

衛生事業在困難中

關於「兩個世界」的種種



專論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世纪评论》、《观察》刊登傅斯年抨击宋子文的政论文章。

目　录

1935 年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3 年

194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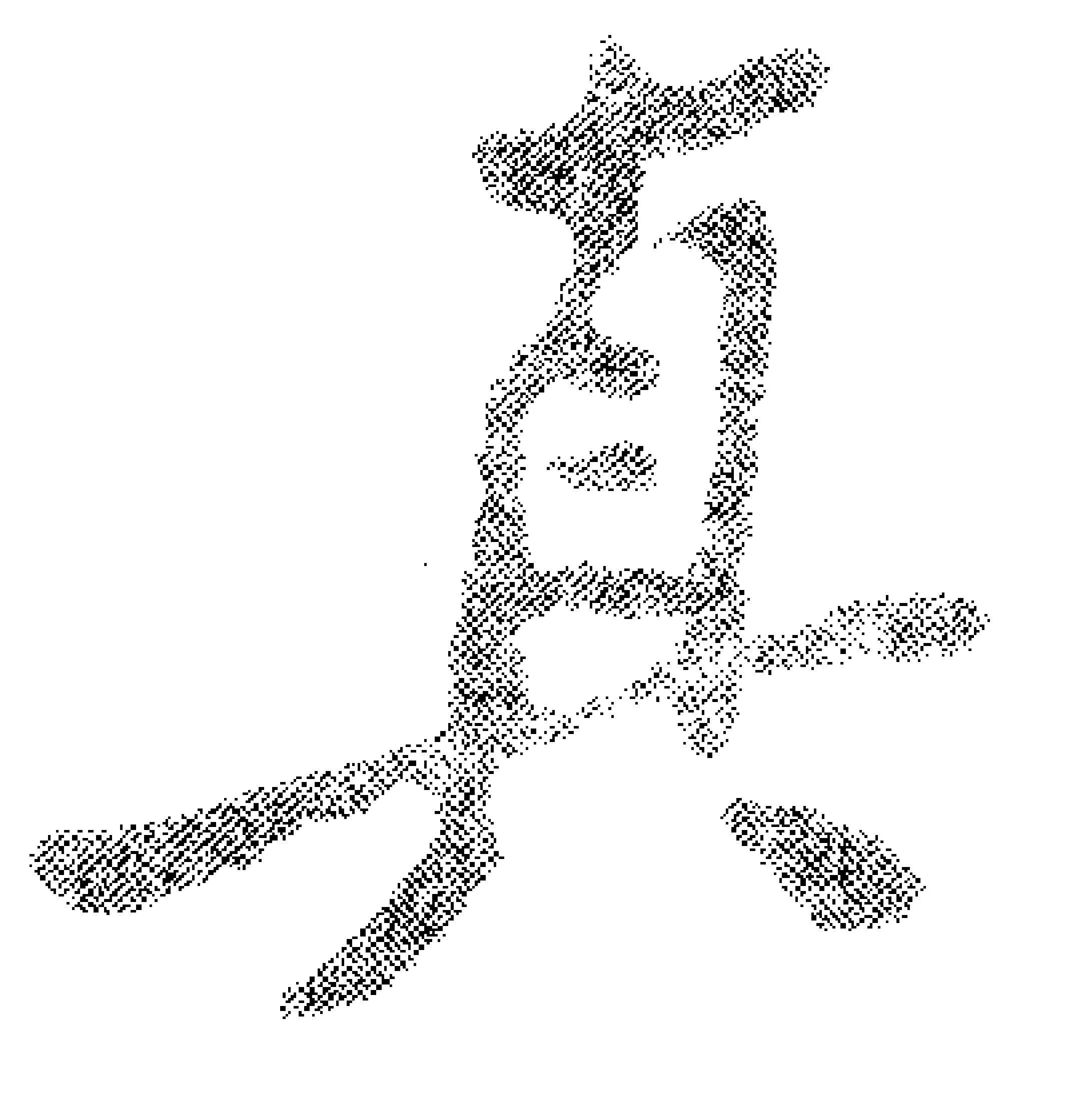
1945 年

1946 年

1947 年

1932年





邮政罢工感言

这次邮政大罢工，突然发动，骤然停止，除去给社会一个几天的大不便大损失以外，更使人惊异，何以这样大事起得这样急骤，不有作用，焉能这样倏然动作呢？于是“背景”之疑是人人心上有的，不待政府这样表示，并且扣留了交通部邮务司长邮政总局局长，人民已经免不了想，这事的里面不简单了。然而这事政府处置得总算不大差，事情一发，陈公博等便飞到上海，三五天内便成立了一个公式而复工。我们希望这次事件能出一个好结果，而不希望它树一个恶榜样，不妨从局外人的皮毛观察上，论论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我们以为求政事之进步，每每不可推求“背景”。凡事总有一个背景，这背景每每复杂到大圣人不能分解的地步。若处理一事，就背景推阐下去，可以引起无限的枝节和感情，愈弄愈不得要领，若但就表面处理，是是非非，应当不应当，就可以看得清楚，处分得干脆。求政治上轨道，非略去枝节不可，即非以公开的立场为注视之对象不可，即非忽视背景不可。这话诚然不是对历史政治哲学家说的，然确是“实际政治”的一个要律。

第二，我以为就“民国”的立场论，凡是政府与人民的一部分冲突，只有“民国”的胜利或失败可言，并无政府或其反抗人之胜利或失败可说。凡一事斗争之结果，有益于国的结果，两方皆无丧失面子之可言。反之，若有有害于国的结果，两方皆无志得意满的权利。

所以我们恳切盼望这事将来之根本解决，在政府不必苦苦追求背景，在邮工不必斤斤计较胜利。这话具体说来如下：

一、我们虽非熟知邮务的人，然年来感觉，深虑邮务的情形是江河日下了！若干年来非经考试不得入邮界的，近年颇有不走这一道的了！若干年前邮政是盈余的，现在年复一年的亏短了！当年邮务的效率是差强人意的，现在是不能保持的了！总而言之，官场的腐化侵入邮政了！谁负这事的责任呢？或者不应归罪于一方面，然历年的交通部长是不能辞其咎的。截至五个月前，四五年来交通部未换长官，故王伯群等尤不能不负责任。即如所谓储金汇业局者，邮界及报界早已对之议论纷纷，说交通部曾以个人或眷属的关系，引用了些并无资格与能力与经验的人。此事真实到如何地步，我们诚然不能揣想，然交通部并不曾对此事拿出事实的辩证来以息流言，则亦徒召纲纪之陵迟而已。凡是一事之腐化，每每发端于主事者自己之不振作，管理者徇其自己之私，即不能不迁就被管理者扩张其自己之利益，于是双扇的日就败坏。然则纵使邮工年年加俸为邮政亏累之一主要原因，而交通部及邮务管理人之不振作，即须负此事之全部责任。现在交通部既不在王伯群手，且交通部长又是一位爱国而勇于负责的人，大可借此机会痛痛快快把邮务情形和盘托出，断然整理。只能先做到这一步才可以取信于国人，然后可以强力制裁出轨的举动。若高谈纲纪，而将自身之健全问题掩着，政府的威信是维持不下去的。且邮政腐败积年已久，现在的交通部负责者任职不到半年，何必代北京的交通部王伯群的交通部受过？所以我以为交次陈孚木所打的官话，颇像是专对自己过不去的。

二、邮政罢工确是一件不可为训的事。邮政罢工之危迫人民生活，至轻也仅仅下于自来水电灯罢工一等，国家社会愈有组织，愈担当这事不起。这样获罪人民的事，是于邮工最不利的。纵以罢工有所得，而最后结果所得的不偿所失。此次罢工虽在国难期中，而所以未曾激动人民公愤者，一因罢工恰在政府加邮资

以后，人民正恨政府之谬举，二因罢工的文章不曾全做在邮工利益上。然而这样的环境凑合，后来是难得再有的。敬告邮务工友，这样举动，一之为甚，不可以再。

三、所谓“以邮养邮”者，固是一个很合道理的标语，然而断不能解作以邮资养邮工。邮政是一个有机体，它应该有有机体的发展性。邮政盈余固应分一部分为邮工的利益，然而添邮路——航空邮在内——增邮局，确是必要的事情。航空邮是近代国家的必备品，在辽阔而交通不便的中国尤其是绝对的必要，否则新疆甘肃俨如外国。此时航空邮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至于交通部以及铁道部管的航空公司是否腐败，用人是否得当，乃是关于局务精良或腐败的问题，不关航路之应否存在。至于开辟普通的邮路，增加偏远的邮局，都是邮政发展的径程上必要的事业。邮工待遇固应合于社会主义的要求——我们相信一切职工应享此权利——我们同时也要顾全中国人的一般经济状况和邮政的事业。

然则当前的所谓“邮基”问题只是一句话，即是“把邮政建设在一个‘健康的商业基础’之上”；所有除积弊，去冗员，维持并增加邮工的效率，保障员工，以考试登庸，以甄别加薪，以卖买的便利定汇业局之独立与否，不再做奢侈的建筑等等，都是这个主义下的实际方案。邮工所提出的事件，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不特此中大可研究，此外亦不少可以研究者，邮务效率其一也。政府必须有诚意，有胆量，有方法，彻底的整顿邮务，然后可以维持其威信，然后可以弥补其邮政加价之失人心；若特别注意背景，必弄得一团糟。邮工必须站在邮政进步的立场上，然后可得国人之同情；若以私人之利益，每每危害及人民的生活，中国人虽愚钝，也免不了有起来自卫之一日。

（原载 1932 年 6 月 5 日《独立评论》第三号）

监察院与汪精卫

监察院委员高友唐四人弹劾汪精卫违法成立上海停战协定。高友唐等四人的提案通过于监察院，故成了监察院的弹劾。弹章一上，便送各报发表，被南京警备部扣了，监察院又于次日通知各报照发。我们知道他所弹劾的是指责汪精卫等未经立法院通过便签字，不是说他“丧权误国”等等，换言之，乃是以法律的立点弹劾，不是以政治的立点弹劾。

法律的立点，应求法律的解决。关于此节，汪精卫的答辩如下（录自5月30日北平《晨报》所载南京特约通信）：

……主席，兄弟自闻悉监察院长于右任同志以上海停战协定未经立法院通过为理由，对于兄弟提出弹劾的消息，即决定两个意思，其一是上海协定不能推翻，其二是兄弟个人愿意接受弹劾。何以上海停战协定不能推翻呢？四月三十日，行政院曾派外交次长徐谟同志，出席立法院，报告此次协定内容与经过。五月三日，兄弟向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报告此次协定内容与其经过之后，并曾声明，此案曾经报立法院，惟应否先提交立法院通过，然后批准，敬候指示。随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如下：此次协定既非构和条约，应照外交部所拟办法，交行政院，俟办理完竣，再向行政院报告”。依此决议，则于右任同志的弹劾案，实无从成立，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

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则行政院遵照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办理此案，自属当然，兄弟所谓上海停战协定，不能推翻者以此。

我以为这个回答是中肯的。监察院既以法律的立点弹劾，则应认清负此事法律之责任者为中政会，那么若再弹劾，只能弹劾中政会。不过中政会是不能弹劾的，因为中政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而“……监察……各院各自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监察院不能弹劾它自己所对之负责之机关。此事中央的处置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个决议注销。我以为在法律的立点上论，这办法是不错的，因为此事责任既在中政会，而以中政会与中常会的关系，即不啻责任在中常会，然则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权平衡此事了。

此事经过之最应使人不满意者，是它颇有掀动政潮的形迹，而监察权之行使，若有了政治作用，是极其不幸的事。

何以说这事有掀动政潮的形迹呢？监察院一上弹章，便送到报上发表，警备部扣了，它又设法达到发表的目的。警备部本不应该扣，然监察院的确不应该在中央决定之前，送报发表。我曾经碰到一个监察院委员，问他何以监察院参的官那样少，他说，实在参了不少，只是在中央决定之前，多不发表，若发表了，也很够惊动人们的了。我后来又问一个监察院委员，他也如此说。我想这办法是颇对的，因为政府中一事之解决，先在报上混一阵，每每生枝节。监察院的作用，应受清政之实，不应博敢言之名，所以大体上应以先在中央解决后再发表为是。这个办法，正所以增进监察的功能，避免无谓的枝节。这个办法，诚然是不应没有例外的，凡是一切不致成为政治斗争的弹劾，大可早早给我们老百姓知道。不过此次弹劾汪精卫事，却恰恰应当在先解决后送报的范围内，因为这事在这个时候，最容易引出无限的政治纠纷来。上海停战协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是其非正待详密的考量：汪精卫违法不违法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其真其否亦待中央的

解释。且上海事件本是极复杂的事，其法律的政治的方面均应计较得到，而此时正有一堆人在上海，专待机而闹，又有一般人在广州，专待机而闹，所闹皆是政争的闹，换言之，即是在上海协定政治的法律的意义以外的斗争，即是将上海协定作为政争工具的斗争。果然萧佛成先生响应于广州，大大的恭维了监察院作风一阵，而请他扩大弹劾，弹劾不已。若使我们以小人之心度人，我们可说这是“求仁得仁”，若以君子之心待人，这可说是“出于意外”。如果然这事哄动全国，大多以为大规模的政争与政变已爆发了。监察院能将若干受贿索赃的事件待政府解决后再发表，何独对此一件煤油上楷火柴的事独不能先待中央之处理？此事接二联三，送报，辞职，远引，再弹劾，大像一个爱国的宣示(Demonstration)。这样，在监察院是失态的！这样失态，在政治上是极危险的！因为在未能达到维持风纪的目的以前，先可弄出一场大紊乱来。

何以说监察权之行使，一有政争的作用是极不幸呢？监察的作用，有浅有深，浅是清仕途，振纲纪，深是平衡政事，弼辅国体。所有清风亮节，直言敢谏之臣，史籍相传以为美谈，这诚然是美谈了，然而明朝很多清风亮节直言敢谏之臣，何以愈闹愈糟，直闹到亡国？明之亡国，那些给事中老爷们负不少的责任，因为他们分党分派，有门有类，吵的政局永不能稳定，政治永不能进行，任辽事者，一筹莫展，战也不是，守也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这缘故很容易解释：他们的不肖之徒，借弹章作政争，他们的贤者，又不知政治的大体，事无大小，一齐付之感情，政治失其安定，失其重心，国家安得不乱且亡？欧阳永叔说，谏臣与宰相等，因为凡百有司，各有专职，只有宰相与谏官可以论列一切的。唯其如此，谏官应与宰相同有认识政治大体的必要，所以清风亮节的谏官，固是美谈，体大扶危的谏官，尤合大道。唐朝韩退之责备阳城，做了五年谏议大夫，不发一言，以为不足以振谏官直言之风气。过了两年，阳城遇奸臣裴延龄害陆宣公事，

大谏特谏，谏得裴贼不登相位，宣公不致被害，自己失了谏官。欧阳永叔说他“一谏而罢，以塞其责”，这真是诬枉阳夫子的话。阳城是一位认识政治的人，可以他的化行中条，政成道州为证。他初征为谏议大夫时，直是喝酒，不谈小事，直到陆贽有见杀之虑，然后大谏。推阳城的行事，当是以为有宣公等在朝，谏官不必谈琐碎，一旦天昏地暗，谏议大夫义应扶危定倾。韩退之、欧阳永叔都是文人，虽有才气却不大了解实际政治，以为谏官只在敢言，这真把事情看小了。只有司马君实的话最对，认识最深，他说，“居是官（谏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温公是实际政治家，不是文人，故能说出这样最彻底的话来。把温公的话参合着明季的政治一看，我们尤其不能不佩服温公之见识卓越，且欧阳永叔所要求的范谏议，只是一个七品小官，韩退之所议的阳城，也不过居下大夫之秩。今之五权制度。监察与行政立法齐尊，为监察院长者，其他位远非唐宋谏官之比，实是一个平章宰相，则对于国家政事，尤应有大体的认识，不便拿出明代给事中的态度来，自是不待说的。监察权用作政争，必不能收监察之效，必致乱政之实，而以今日监察院之地位论，若不从最大处着想，势必流成政争，至少也要被人借作政争的。

两年来于右任先生所领导的监察院成绩如何，我们虽不能断言，然而确不是不说话的。比理想不足，比事实差可，在五院中，他算是作些事的。虽然不曾办了何人（办人不是监察院的事）却也参了（多是间接的）几个贵胄显宦，较之司法考试，高明得多了。然而大体上能满载我们的意吗？曰，不能。去年二月，当时于公偶逢其乡先贤阳公所逢之大关头，似乎应有所主张了，然而不然！将彼时于公静默的态度和此时动气的态度一比，我们诚不免于惶惑。我们深知于先生革命二十余年，自有其独立的立场，则去年之默然，今日之昌言，他必然对两件事都有他的

见地。不过，我们总应希望他老先生还是在大事上细心想想，权卫轻重，认清政事之前因后果，然后可以合于监察院之最大的责任。

今日之局，恐怕已经谈不到好政府坏政府的问题了，政府一倒，我们实在想不起更能生产一个政府，然而此时外交内患，断断不许无政府的。明朝的谏官把明朝吵得无政府，希望今之谏官不要弄得现在无政府。现在亡国的条件几乎应有尽有，比起明朝亡国的局势来，都是变本加厉的，所以大可不必再添给事中哗众的一出戏！

（载 1932 年 6 月 12 日《独立评论》第四号）

中国现在要有政府

中国现在所处的危机，“国难”二字不足以尽之，国难是一个国家虽不常有而总当有过的事情。中国现在的危机却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从内说，是文化的崩溃，社会的分裂，从外说，是若干倍危险于一九一四年的局面。何以说现在是社会与文化的崩溃呢？有史以来，一国立国之本，最大者有三事，一、政治重心，二、国民经济，三、技术程度。中国现在政治没有有力而稳定的重心，国民经济整个分崩，而技术程度不及世界潮流者数百年（下略）。又请看中国的学潮，何尝是所谓牛津运动，与十九世纪之德国学潮，乃是政府不是政府，校长不是校长，教员不是教员，所以学生不是学生而成之教育总崩溃现象。又请看所谓军阀，何尝成阀？只是叫化子头儿，国民总失业，然后军阀要有多少叫化子便有多少叫化子。中国本无皇室贵族，而士大夫阶级整个失其重心作用，故流氓苦力平分南北政府（此一隽语是我的一位朋友说的。）社会组织与文化效用整个崩溃，今又以天灾外患，加速度进行。何以说现在局面的危险若干倍于 1914 年呢？1914 年仅是几个帝国主义以膨胀之故不能相容，故出于拚命，彼此各国国民潜蓄的实力甚大，而社会危局不如今日之深刻化。现在则四海凋零，列国疲敝，休息犹不能更始，而工业革命所种下的种子，民族主义所种下的种子，大战所种下的种子，都是愈酝酿愈深刻的，以疲敝的根基，运不制的感情，一旦爆发，其凶烈十倍于大战，其紊乱百倍于大战。而且上次大战是奥拓曼（土耳其）帝国之形势直接演成的，今后大乱之必是中华民国之形势直接演

成的，现在已可推知，则中国万不能再以对上次大战的态度对后之大乱。

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人家正以其经济的政治的军备的一切最有组织之能力对付我，我若全然表示出原形质的状态出来，焉有生路？

所以好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了不得的。最可怕者，是中国此时大有没有政府的可能，因为在此时中国形势之下，能组织政府的花样是很少的。

第一，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国民党施政之成败另是一问题，然国民党在此时的中国中是比较上差有组织的一个政团，此外除共产党有一种潜势力以外，中国并没有第二个有组织的政团。请国民党交出政权，固不易，而接受政权为尤难。一切残馀的政治组织，如安福系、研究系、政学系、江苏省教育会系等等，和一切的残余军阀，如所谓皖系、直系、奉系、陈炯明系等等，虽高官地盘至今犹有占据者，然比比他们过去的成绩，看看他们今日之力量，那一个能站起接受政权？两三月前演所谓“国难会议”一出戏时，有些人要以国难会议产新政府，要以国难会议与国民党算账，此事之是非居心都不论，这想头真正再幼稚也没有了！天下那有以做官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的！且责国民党交出政权，给谁何人？给安福系？给研究系？给北洋系？给青红帮？给所谓“全民”？纵使国民党甘心禅代，其结果只是演一出子哙子之的故事，燕国亡得更快些。今日之局，国民党一经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

第二，此时国民党之中心人物，能负国家之责任者，已经很少了。国民党以历年的“家争”，中国人民出了一个死亡数十万、财产丧失数十万万的代价，而国民党自身之损失，亦不在少处。丧失它的信用，堕落它的领袖，紊乱它的组织。国民党今日之站得住者，不是它自身充分的有站得住的力量，乃是其他结合没有

站得起来的力量。这不是国民党应该自喜，而是国民党应该自警的。我们至今犹同情国民党的人，尤其盼望国民党领袖认清这个危机，而深自策励。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曰汪、曰蒋。他们三人之有领袖地位，自然不是无因的。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这是反对他们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然而如说汪先生的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之事务所应必有的。事实如此，这不能说不是今日中国的一大困难之一。现在胡先生是不会到南京的，汪蒋合作而以汪负政治责任正面的政府，似乎远不是在此日局势下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尤可顾虑者，是汪之行政院若塌台，我们颇想不出能更有一个政府出来，能够真有政府的效用，好坏且不论。这个意思，且分几层去说。

甲，汪精卫自做行政院长以来，颇负责任，而大体不误。上海事件之结局自不能很满我们的意思，然比起不负责任的拖延，国人损失尚小。且此事结局似乎是今日情况下的最多可得到者，此事之未附有政治条件，现在事实已足证明。汪之对付此事，事实上指出来他未存沽名避责之心。至于其他事件，都不见得有滑头的态度，不曾说大话做小事。目前外交问题，俄交，国联，等等，看来他是在有计划的进行中。综合起自有行政院以来的四个院长，谭组庵、蒋介石、孙哲生、汪精卫，汪尚是差强的。

乙，若干批评汪精卫的话，每不足为大病。我听人说，汪精卫上台两个月，只是位置分配忙，一切旧有同派人索求地位，闹得他头大，而出了无数的笑话。我以为这诚然是不幸的事，然而这是国民党的普通现象，且此现象不足为国民党的深病。国民党，或改组派，以在野革命的地位，自有它的部队，一旦上台，这现象是免不了的。这现象诚然不可以鼓励，而南京若以建设出一个“文官服务”(Civil Service)的系统出来，这办法是万做不得的。不过今日南京还不曾建设出此事来，而汪派此举尚不至使政

务大不得了。且所新用之人，比其当年王正延王伯群孔祥熙辈所用者，算是高明得多。又有人说，汪之处理事务异常紊乱。这却不是等闲的事，然若施政之方策有计划，此事可以在各部分的组织上得点救济。

丙，我们诚不能说汪的政府是如何值得赞美的，然代替他者，正无其人。汪之行政院如塌台，则继承者当不出两个方式，一，出来一个居政府虚名而毫无政府效用的。这样是万万不得了的。二，蒋之复政。这是行不通的。前年去年蒋确曾有过把政治建设起来的机会，然而他把那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放弃了。今日长江流域地方秩序之丧失，外交布置之忽略，极多用非其才之大官，国家实力之消耗，他负的责任至少不比任何一人小，所以他现在是不能单身出马的，他出来便是一阵大紊乱。《水浒》所说“一条棍棒等身齐，打得出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方式，在中国的其他时候未必不是一个可用的政治实策，然而现在的中国此法是行不来了。愈顺民之欲者，愈能以强力专政，而求专政必先顺民之欲。我们姑且卑之无甚高论，亦应知道人民安居乐业然后天下归心。现在国人对蒋公之感想又何如？

在如此的一个局面之下，所以我以为一有政潮，便有无政府之危险，而今日之局，岂是容许中国无政府的？即是法国式的“内阁危机”也是要不得的。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不过汪的政府实在无多根基，而使汪精卫的行政院不倒，中国不至无政府者，负最大之责者仍是汪氏，他若不好生干，瓦解是不能很迟的。因此，我们希望他抖起精神来，应付此日之局面，第一要积极的布置外交形势，第二要建设社会的安宁秩序，第三要计算实力，并布置着，以备国际上的剧烈变化。

（载 1932 年 6 月 19 日《独立评论》第五号）

法德问题一勺

这个世界真正太不成事了，若干民族正在努力自掘坟墓！我们大中华民国一面拼命着自掘坟墓，一面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准备着做倭人自掘坟墓的殉葬品。并且将间接的做欧洲若干国家自掘坟墓的殉葬品。法德问题恰是世界最大的墓地，"美的法兰西"用其数百年来优越的兵力，经营世界的山陵，而远在九重海外的我们，恐亦不免以我们之生趣像个艺术的作品，有陪葬昭陵之幸事。然则我们前星期看到洛桑会议之开门，本星期听到胡佛总统之壮议，理当看做自己的事。

法德问题之扰攘，因此而生无数问题，以至世界萧条，万方多难者，原是古往今来的历史中最大事件之一，不可徒以为是欧战前数十年欧战后数十年一件大事或第一大事。我们放远一看，欧洲历史在若干意义之下，犹之中华历史。中国历史在甚早的时期中已有南北相争之趋向，所谓五胡乱华，所谓突厥、回鹘、沙陀，所谓宋、辽、金、元、明、清的故事，一句话说来，都是黄河流域之政治重心，挟其文化及文化所付给之组织，与漠南北的牧族，挟其风炼冰熔的原力，比比这世界到底是文胜武胜。所谓欧洲历史，自罗马拓土以来，无论是罗马帝国时代，或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即日耳曼帝国），或拿破仑卑斯麦时代，虽若干封建的战事，或民族的移动，使得我们觉得乱七八糟，而大意是在决斗着，以求到底是南胜北胜。对法兰西诚然不能一句话说她是南，因为她的民族最本一层是凯尔提，是西，而政治的组织反是

承袭日耳曼之一部的，或者竟可说是日耳曼之正支的。德意志又不是北，因为它又有不可忽略的北人斯拉夫在后，而普鲁士并非纯粹的日耳曼。然若从政治的意义以看民族，则法承罗马之统，德接日耳曼帝国之绪，是皎然明白的。然则我们若这么一看岂不觉得一朝之开会与壮议，焉能解决两千年的历史趋势呢？

不过，事实并不若此悲观。近代的新经济局势一面予民族主义之发达一个最大的助力，同时予民族主义过分的发达一个最大的打击。所谓“胡越一家”者，在近代经济状况下是平实的事实，不是感情的诗句。诚然，在古世中世与近世的初年也有很大的国际贸易，也因贸易屡起战争，也因贸易权之消长成民族的废兴。不过当时的贸易究竟大多数是次要品的贸易，历史的民族总是以农业或畜牧立国的，且当时的平民地位大多比近世为低，故平民生活所需，虽取自外国，而因统治者之不高兴，也可取消。近代的国民经济全然另是一个样子，全世界成一个大分工，这个分工虽因殖民地制成最不人道的现象，又因资本制本身之缺陷使得这分工未能全合理性的发展，然而大部分已全然成就了列国相依的经济制度，所谓农业立国的国家，如澳洲，如加拿大，他们的农业正是他们的商品，所谓商业立国的国家，如英如德，他们的商品正是他们的农产物，因为他们吃这个为生。这个现象，以后更要深刻化的，因为19世纪的工业占国际上最重要位置者，还是所谓基本工业，例如英国之煤、布、机器，最近则若干次等工业都成国际的贸易重心，例如德国美国之若干科学作品，日本之贱货。专靠基本工业之英国尚且一落千丈（看 Siegfried: *England's Crisis*）而自食其谷之农业国家尤无闭关之可能。照这形势，国际分工是必然的事实，而更科学更经济的分工尤为“范畴的命令”。在此义支配之下，我们的富由于别人的富，别人的穷造成了我们的穷。一有国际战争，只有败者，没有胜者，只有败得较不显著者，没有不败者。法国正是所谓战胜之国。大战后我在战区外的法国旅行，看见一切退步的样子，和法郎的落价，

为之心惊。当时庞加赉不曾被法国人看做民族英雄，他的政党和与党遭一大失败（庞加赉后来的复兴，另是一种反潮流，非欧战后之直接现象）。上次的大战已如此，以后的大战将更甚。大战前诺曼安琪儿做了一本书，叫做《大错觉》（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1] 以为依国际经济的关系，大战是不可能的。大战竟来了，似乎安琪儿自己成了一个"大错觉"，然而试看战后的结局，他的论断何事不然？假如战前的执政者，有安氏之见解，焉有今日之"大困境"。进一步说，20世纪开头以来，愈演愈深刻的困难，大体可由于一点看去，就是社会组织的文明之进步远赶不上科学成就的文明之进步。因科学的成就，传说的生活技术扫荡落地，而社会组织的文明仍是史前时代、古代、罗马法皇时代、封建时代、开殖民地以及资本时代，层层叠叠的混合。于是好比孺子持刀，猛虎缚翼，其技术的聪明赛过上帝，其政治的蠢笨等于猪狗。然则今日世界的大摩擦，只是传统的部族主义，与新兴的经济观念之不并立。如从传统的部族主义，则世界的摩擦亦只是变本加厉的干下去，而法德斗争其一也，如认清经济的立点，则历史剧大可只在剧场中演演而已。

法德问题正是此一意义下之最深切的例子！法德在历史的意义上已是世仇，在经济的意义上应是兄弟。法德的若干工业品是相依相成的，人耳之煤和阿尔撒斯之铁更是相依为命的，法德的合作尤是欧洲平康的基础，欧洲平康更是法德富盛的基础。清清楚楚的数目字指示两国国人，奈何两国的政治家盲然不看！凡尔塞以后的各种会议，都是这两个趋势的斗争，其结果都是经济的观点不能战胜对敌的立场。不过，现在的世界真不得了，英国也不得了了，美国都不得了了，远东更不得了了，这极其严重的形势，或者使欧洲之执政者清醒些。我们热烈希望洛桑会议之结果，是经济立点的战胜！

---

[1] 编者注：*The Great Illusion*，现通译为《大幻觉》。

洛桑会议是讨论赔款的，自然德国人的话是“赔完了”或“赔不了了”，“道德上不能更负赔款之责任”。法国人的话是“能赔，非赔不可，延期也要有限度”，“非赔款欧洲不能复兴”。诚然，一个不要出钱，结果有赖债的嫌疑；一个坐索款项，表面拥借老克的徽号；其诚心不要出钱，和诚心非要不可，都是至诚无欺的。不过，这究竟还不是最深的文章，最深的文章另是一回事。若不直接了解这最深的文章，恐怕赔款问题是解决不了罢。

最深的文章，在法国一面者是安全的问题（Security），这是法国人心中最大的纠结，也正是德法关系最大的病源。这问题确不是简单的，我们先说这问题的无聊的一面。法国人想着，德国是一个有大力气的民族，有超于法国人本部的人口，有比法国大的富源，有同种的与国，有超于法国的地形，有不甘失败的心理，尤其可虑的是前进的猛力。国际之风云变化莫测，而对俄之明争，对英之暗斗，正在眼前，一有山高水低，可怎么办？于是越想越殆哉，仿佛贾谊治安之策，“厝火于积薪之下，而处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然则最好是灭了他，办不到是占着莱茵河，使他四分五裂，办不到是四方八面设置些国家和他扰着，更挤他的油，使他最好不喘气。于是法国非行霸业于欧洲不可，虽社会党出身的白里安，确有爱好和平之诚心，与建设国联之伟功者，晚节竟谈起欧洲联盟来了。赔款问题有这样一个根子，焉能痛快解决呢？不过，这想头真正是不可为训的！立国在己之强，不在人之弱，在己之能随时应付，不在消灭假想的患害，假想的患害是永远有的。“唐太宗为何不杀武则天”一类的想头，只有患狂郁症的妇人才可以有的。推这样的“安全”心理而广之，每一大国要“安全”，非尽灭其他大国不可，不然，一步一步总是不“安全”的。日本人也高唱满蒙与他的安全，诚不免使人齿冷。我们再说，这问题的有赖的一面。第一，法国确在若干立国重要条件下，不如德国，一旦德国振起，法国难免又在欧洲居第二位。第二，德国人确曾严重的表示其对现状不满，不谈西部界

限（即是不要回阿萨二州），虽是德国政府的表示，而不忘东部界线（即是不满所谓“波兰过道”与赛尔西边界），确是德国政府所一再言之的。第三，虽今日之经济困局为德国政府所不满，然当年纸币跌价中固明白表示有赖债的意思，此外如以体育代征兵，建设可以变为兵工厂的工厂于苏俄，在最艰苦中造它那与现在国防毫无意义的袖珍战舰等等，都使法国人更深刻的想“安全”。然则“安全”一部，固不当如法国之放量的想入非非，其具体的事实，亦有未可抹杀者。此事如不能得一满意解决，德法关系总要七上八下。

最深刻的文章在德国一面者，是东边的问题。这里头藏着忿怒与报复的炸弹。中欧与东欧接连的一堆地，本来在民族上是一团乱糟糟，极端的以语言分国界是很困难的。自《凡尔赛条约》决定德波疆界，历次所谓“大使会议”者又决定上赛里西之边界，及“丹次希自由城”之机用以来，德国人诚有不少陷在文化较落后的异族中，而为其“少数国民”。这个现象之适用于奥匈帝国分崩后之形势者犹多，奥国人民在民族语言文化的意义上，固是德意志人也。又，东普鲁士与普鲁士本土不联，而中间有了一个波兰过道，丹次希真纯正是德国的，而强迫其为“自由城”。凡这些困难纠纷，而处分不尽妥当的事，皆是埋伏的地雷。如以波兰人复国后之疯狂的部族主义，一变而为一种侵略的帝国主义，捷克人之不妥协的办法，都正对着本来自大的德意志人的，而此形势又有法国的背景，其结果也，在一个最需要民族间合作的场所上，只见到民族的互恨与互防。德国人最痛心的是他们的东疆外同胞受制于异族，且受制于实际上文化落后心理上看不起的异族。波兰之耀武扬威，俨然是法国的爪牙，尤其使人难堪而不安，法国的“环抱德意志”的政策，实在是欧洲今日最大的病源之一，亦即是“欧罗巴之巴尔干化”之一个主因。

如上文所说不误，则赔款问题自身固已极难解决，而自身以外更有困难的关键，此个关键，在法国的“安全”一面，非严整

的执行《凡尔赛条约》不可，在德国的东边一面，非推翻《凡尔赛条约》不可，如此岂不是僵局呢？不过，困难也不是简单干脆的，今日之局似乎法国有进于理智的可能，而德国犹有不失其理智之可能，现分叙如下。

德国人战败之后，虽然懊丧与怀恨，然其初步反应转在对内，左派大起，旧帝与其徒党为大多数国人所痛恨。协约国不于此时安慰之，而再接再厉的挤压，法国尤其行使其所谓条约特许权（Sanctions），明显的为拆散德意志联邦的图谋。自然的，左派颇难自解，右派渐渐恢复。然欧战后十三年多之间，只最近两年中所谓极右派者才得势，也是因为国族的运命水尽山穷，然后折而右倾。最近希特勒派大扩张以前，将及十年中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贯的以司脱累斯曼为联邦外交部长，其国会中最大党为社会民主党，其与之对抗之右派最大党，所谓德意志国民党者，对国事并不走极端。德国十年之不变初衷，皆足证明德国国民深有以大战为教训之认识。现在简略的说明希特勒派猛进前之德国国会中政党形势，以自右至左为序。最右之党为民族党，以前以路登道夫为魁，今变化为希特勒派。其次为德意志国民党，右派之最大党，地主与农民多在其中。其次为德意志人民党，虽是右派而较温和，大城市中人家之不右倾者每在其中，前外长司脱累斯曼即其首领之一。其次为中央党，即天主教党，以南部诸邦为基本，左倾右倾随时不定，故专收政治上举足重轻之利。因其是一宗教的党，故能稳固，否则其无定见的政治必为国人所弃的。其次则是最温和的左派之民主党，此党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犹太人多在其中。此党中很有些财政专家，又有不少的大实业家，然而其语调有些气味，令人肉麻。其次为社会民主党，这本是社会党，欧战起时赞成战争，遂与后来之共产党分裂，这是左派中的最大党。此党与共产党之不同者，社会民主党谋工人利益为前提，共产党号召世界革命。其次为共产党，这是属于第三国际的。此外的小组织，如所谓经济党，巴延（南德最大之王国）

人民党者，或无政见，或偏地方，故无多大关系，可以不论。至于各党的人数，则社会民主党最多，稍次为德意志国民党，虽不及社会民主党，然所差不到十分之一。第二等的党是中央党、人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更比这些较小些。所谓民族党者，以前大家颇拿他当笑话看，以为路登多夫与希特勒皆是妙不可言的幻想人物，右派之国民党员每如此想。这是在联邦国会中的分野，在普鲁士国会中社会民主党尤占优势，故共和宣布以后，直到最近的改换以前，普鲁士未尝换社会党的政府。照这样的形势看来，——这形势是最近两三年内德国人民大困以前之十年中政治的分野，经过七灾八难而大体不变的分野，——德意志人民实不曾走到那"反动"的路上，实在愿意内安外和，故左右两极端党不得优势。诚然，最近三二年中这形势是渐变了，而今春之两个选举，一、总统竞选，二、普鲁士国会改选，希特勒派得到世界吃惊的进步。不过，这改变是谁造成的？是不是法国负最大的责任呢？逼得德国的国民经济水尽山穷，忍苦负重者十年而国命的危机更甚，则趋于极端是必然的！我们一看十年的旧事，与其怪希特勒派得势之猛，毋宁怪希特勒派得势何其迟迟，而共产党犹不能代社会民主党也。且希特勒派并非单纯的右倾，乃是一个以历史为感情，以经济为对象之民族主义的社会党。希特勒本人和他的党纲都是很有趣味的，其混合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尤使我们有很多的同情。希特勒派对外当然要硬，然决不是一登台就对法开战的。恰恰相反，恐怕他一登台便要先与法国得一谅解而后东向努他以为然的力，远则苏俄，近则波兰。果然，他在数月前自己到巴黎一次。他目下最对之奋斗的敌人是共产党而非法国，所以他同法国有成立谅解之可能。然则自法国人之立点言，虽希特勒派出来，亦不至即刻陷于斗争之局，不过赔款是稳稳当当不付的了。总而言之，看看十几年的德国政情，可以相信，她是正在忍苦负重中的，虽希特勒得势，不致陷德法关系于不可收拾，而有老英雄兴登堡在位，政局是走不到轨道外的——除非经济情

形更紊乱下去。

再就法国一面看，现在新选的国会中左派占多数，这是最可喜的。左派的大部分虽也有所谓“安全”问题在心中，究不如庞加赉一派以困难德国为“安全”，且左派深知求所谓安全，自己拿出的代价也太不得了，而德国负重十多年，现在大有变面孔的样子。如果希特勒上台，停付了赔款，今日还能再行占据莱茵河人耳河一类的“特许权”么？法国今日外交的孤立，已甚可观，日本在欧洲的舞台上，是帮不了她的忙的，而英美意德若一致，她大是难办。与其终于下不了台，何如领导一个小康之局？自战后庞加赉复任总理以后，法国政局似无今日之比较可以乐观者。法国人欲在欧洲居领导的地位，我们自然也很同情，大革命的法兰西，即人道主义的法兰西，本居领导的地位，若舍人道而行霸道，拿破仑的事业，今天哪能再见呢？

且法国虽屡屡陷于所谓嚣文主义的姿势（Chauvinism），其为大革命领导民族之意义终不以武功与霸业而全然消失，世界上没有一国，对平等自由之遗训深固保持在思想中如法兰西的。大革命之余响，并未沉沦，所有左派，在政纲上颇有国际合作的理想主义。即如现在的国务总理阿日欧氏，虽在法国的国会中不能不今日与左联，明日与右联，然却曾在欧战后历次想与德国得到一个合作之局面，只是机会总不巧罢了。阿氏在庞加赉的复任总理时，曾担任了教育部长，是左派对之大失信赖的，然而事过境迁，我们也觉得当时法国为救济内部之经济崩溃，有组织全国政府之必要。此次再起，适值世界的大凋敝，有急于救济之必要，而远东形势，有使得虽在温室谈风凉话的人亦不得不戒惧的。我们热烈希望阿氏能报答世界上不“反动”的人们对他的清望。

十余年来，欧洲大陆上之不得基本解决，英国的态度颇有关系。英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是一件怪事，既靠天，又随人，虽努力，而鬼混。其经济的组织，使她有一个世界的眼光，而其岛国的形势，使他持一种自了的态度。别处的光明的趋势，若与他无

目前的明显利益，他的态度是半就半推的；别处的不了之局，若与他无目前的切肤危险，他的态度是半推半就的：于是危机当前，不能挽救，大道当前，不能奔赴。英国一部分有远识的人，以为他们国家在1914年夏无断然的表示，是造成大战的直接原因，此论事实或不尽然，然若持以观察英国的外交政策，颇得理解。欧战后大陆上的困局，英国虽极其不赞成，然并未积极抵抗。不过现在情形有些不同了，1929年以来，英国之经济危机，使他不能再鬼混（Muddling through）了。

所以我以为虽在无限的困难之下，洛桑会议的成功——至少是一部分的——甚可能，因为各国皆有“燃眉之急”。大家若认清世界关系中之经济的观点，则应知全世界共存共荣的。诚然，欧洲若干基本问题，如上文所举者，不可一蹴而就，然而洛桑会议如作一个初步的成功，以经济的观点为国际合作的形势，以后更可逐渐解决其他问题了。

胡佛总统的提议若果实行，或其稍有变更的计划之实行，大可使得各国皆无侵略报复之可能。德国此时兵力已全无进攻的力量，若再缩三分之一，而一切进攻的武器皆在废止之列，德国焉能更报复？意大利焉能打法国？这不是法国“安全”问题之基本解决吗？

我们希望洛桑会议能使世人走到经济立点上的第一步，我们深信胡佛的办法是列国安全与国际合作的基本办法。

再略谈几句法德关系在远东之影响。自倭人暴占辽宁省城时起，法国的态度颇暧昧。最初，法国的报纸是攻击日本的，以后忽然沉寂，且有的变论调了。人们说——有道理的人们说——这是日本的钱有效用，参看苏俄及其他地方能发布帝俄时代在法国所用的报馆津贴费（皆是骇人的数目），使我们不能搁弃这种话。然而这究竟是第二因，必更有其他的主因。以日本的地位论，关于欧陆的事，日本的话是不值钱的，若就辽东说，除非日英开战，英法又开战，所谓日本保障法国利益，及安南领土者，全是

空话。那么法国何故与日本有了解呢？这一定是对俄问题了。法国对俄有几层不结之局：一、帝俄时代之法国大债，特别投资在西伯利亚的；二、东欧各小国之位置，法国最怕俄德夹击他们。再加以法国兵器工业资本家的活动——这在法国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团体——法国的右派对俄很作攻击的准备。于是日本国才有市场之价值：果然日本在东方闹起来，法国——至少其指使之波兰等——可在西方闹起来，或者西方有变时，日本响应于东方。因为有这个形势，所以日本能以对俄的立场向欧洲宣传，尤其是向法国宣传。不过，法国右派的对俄政策不是全国的政策，左派并不这样癫狂。几个月前，法国对东三省问题之态度忽转暧昧，当是法国的兵工实业资本家为日本运动的有效了。本年五月初法国大选揭晓，左派大得势，日本外部对俄的态度，忽然语调平和，这是很可注意的。法国不走拿破仑对俄的一条路，日本是拍卖不出去的了。

附　记

一　我有五年不大看欧洲的日报了，这篇文章所以只能讨论其历史背景，谈不出洛桑会议的详细问题来，这是很抱歉的。

二　本文中显然反对欧洲列国民族主义之过量发达，因为我们明明白白看到，过量民族主义是使欧洲成巴尔干的原因。不过，天地间的道理都有他的时代性，十九世纪欧洲之大进步，正靠其民族主义，中国此时尤非民族主义不足以锻炼国民，这是要声明的。

（原载 1932 年 7 月 10 日《独立评论》第八号）

日寇与热河平津

在倭人宣传热河边界事态紧张之声浪中，日本东京及中国沈阳的日本军阀扬言吞并热河，胁迫平津。国人既迟迟并忧虑政府及地方当局有没有抵抗之决心及办法，而倭军阀又把张学良画成一个爱国志士一般，说他如何将军队改作义勇军，向东北输送。我们在这个愤慨与优疑之心绪中，不能不认清几件根本的事。我以为有下列几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中日间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而在今日希望与日本和平解决者，直是做梦。“理性的”先生们说，日本的行为是日本军阀的行为，并非日本国民如此。这是全无意义的话。一个民族之行为，全以其如何组织而定，现在日本军阀既统治了日本，而日本之行为由其军阀指挥之，则日本军阀之行为即日本民族之行为，犹之专制时代帝王之行为即其民族之行为，一般老百姓对他们执政者之所为，虽莫名其妙，然既自动的或被迫的助成一个事业，则对此事业不能说是没有分的，日本人既不能站起来以纠正其军阀，而反跳起来喊着向满蒙去，则日本今日之狂谬绝伦之举动，焉能用“日本军阀”一句话把日本人开脱出去？惟其如此，这事是断不能看轻的。若要中日和平，非日本人能满意不可，而日本军阀之满意，其最大限度是中华民国取消其独立，而为所谓“大日本帝国”之顺民，其最小限度也是要：（一）承认伪满之“独立”并奉送热河及滦东，（二）在北方弄出一个政府来，这个政府对日本能受指挥的，（三）全国不得有任何公私排

倭之举，并须力助其推销倭货，以便压倒西洋各国，（四）取消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个最小限度也还是奉送中华民国，只是手续上有简繁，时日上有迟速而已。试问我们能做到这一步吗？试问最丧心病狂的政府能这样办吗？不这样办，日本决不满意，日本必向中国不断的闹。这不是我们悬揣之谈，这是这十个月来事实上使我们不能不如此信的。这话本来不像近代史，然而日本并非一个近代国家，其民族亦非一个近代民族，所以若干受些近代教育的中国人，最初是不能了解日本的。这几个月的事，可使我们恍然觉悟了罢！中国今日对此倭寇，只有降战两策，所谓承认日本合法利益云云，在东北事变未起滨口内阁时代，或者可以延缓东北之变局三五年，在东北事变既起若槻内阁时代，还可同币原谈谈，总也无济于事的，因为倭军阀是非要消灭中国在东北的统治不可的。倭军阀几个月中，在东北行动的一时成功，更使他的气焰高涨，于是高谈起东亚门罗政策。这样不伦不类的名词，倭人做出，真正毫无廉耻！门罗主义者，乃美国使欧洲列强在南美中美的野心策略断迹的政策，此政策实行后，果然若拿破仑第三立一个墨西哥皇帝的事不再有了，而日本的“门罗政策”，乃是向世界要求吞并中国西伯利亚之自由权而已。日本军人的行动，及其外交口号，既已如此明明白白表示对中国取宰割的政策，中国人还要做“和平解决”的甜梦吗？

第二，倭人必不放松热河，而平津是必不能免的。倭人之不放松热河，是和太阳一样明白的事实，只是抓去用何手段，不无考量而已。若必出于用兵之一途，则热河地形殊不便于用兵，非捣平津之后背不易速收军事之效。且热河一失，长城为界，平津必不能保，则虽不爱全国江山而爱平津地盘者，也不得不出于一战。故热河问题势必扰到平津，这是决无幸免的。日本扰平津，在其政府自也有些小顾虑，但其军人是决不管的，东京的倭军部大唱胁迫张学良的语调，沈阳的倭军人更明言要扰乱平津，这话虽也有恫吓的作用，但热河军事积极时，是必然实现的。热河最

便于义勇军的战法，倭军岂肯舍轻而易举之平津，徒然在热河山中比武呢？且倭军部为改变中国北方政局计，扰平津也有意义，平津是断免不了一场扰乱的。

第三，平津扰乱，比起东北失地来，实在是一件小事。天津至多不过是个上海，上海既可牺牲，何以天津不可以？至于北平，有些斯文先生们，以所谓文化事业及国宝为虑。然而国宝也者，在太平盛世果然是宝，在这年头儿，直是石呆子的扇子，乱时能拿着走，仿佛像“抱祭器而去之”，固然很好，有管理国宝之责任者，固也应早准备，若不得不蒙损失，则亦只好付之无可奈何，比起东北失地来，真不值得什么。好在这些国宝皆是人造的，我们总要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更为世界贡献文化的凭借，这即是国民的人格。至于北平的所谓“文化”与社会，若倭人真来放几个炸弹，小试则有警钟之用，大试则“倾者覆之”，后来的历史学家或者以为是“替天行道”的呢。这话不是我快意之谈，我们且看看所谓北平社会：一群群军阀官僚、学阀学棍、土棍地痞、无赖青年男女摩登，花他们抢来摸来要来的钱住着。一个个的根本没有办法徒耗国家钱财的大学设着。一排排的开扎彩铺主义的学术机关放着。一户户的与掘坟的土匪外国的奸商合作的古董铺子开着。一队队的醉生梦死的人们在享乐着，无限的穷苦人在大杂院中坐地待死着。试看自北海公园到先农坛，哪里有国难的气味？走遍五城的大街小巷，哪里有忧国的声息？听听人们的谈吐，哪一个想到东北的失地？自上至下，在领袖地位者，离不了灯红酒绿的生活，脱不了醉生梦死的人生。青年人只有一事，便是“爱”，老年人只有一事，便是钱，学生们照样弄他那闹学式的学潮，教员照样防范他自身地位的利益，商人照着买卖他的日货，时髦的少爷小姐姨太乃至大人们还是非日货不用，土货看不上眼（以上一些话，自然不是全北平皆如此，然而不如此者，分数上显不出来，代表北平者正是上文的人们）。更有一般摩登女士，以与在北平的外国人交际为荣，若能“交”上一个使

馆武官，尤其非常荣幸。这真使我们想到颜之推批评“琵琶鲜卑语”的话，不过当北齐的时代尚不过以子弟取容，今则以少女献媚而已。这样的“文化中心点”，比起东北来，真正九牛之一毛。所谓投鼠忌器之谈，第一须所投者为鼠，今则是虎，第二须持之以投者是器，今则是破瓦釜而已。为中华民国的整个前途计，北平的存毁是不值半秒钟犹疑的！我也是一个住在北平的人，打起仗来，扶老携幼，匍匐星奔，有何好处？然而我的理智，是使我不能不如此想的！

第四，中国的军人，特别是北方的军人，若无抵抗而放弃江山之后，在中国，在外国，在租界，都没有立足之地。先说他们在中国何以没有立足之地。中国的军人各有其地盘，因为地盘主义，势不容许他人来占地盘分地盘。其不抵抗而求入境者，被款关之人更理直气壮不许他入境。败军之将，俯仰之间，无以为人，又焉有夺人地盘而有之之勇气？试如平津不抵抗，退山西，雁门娘子开关吗？青济不抵抗，退汴郑，汴郑许他停留吗？怨怒所积，非解散其军队，即须自己取三十六计之上计，而走此上计之后，中国虽大，何处人容他安居？至于外国，如欧美者，之风土去封建时代不远，一般社会崇尚勇敢，贱视怕死，听说有了不抵抗的军人，真要毛骨悚然，各个神经颤动。所以不死在职守的中国军人，逃到西洋，不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欢乐场中无现身之余地，即大街上也走不来，一见人面，嘘之以气，投之以石，满路童叟男女，皆敌国也。到一城则一城之报纸刊他的相片，如我们之标榜秦桧一样；到一地则一地之新闻访员来伺候起居，如我们之好看报上所载花案官司一样。而且欧美各国，皆有中国学生与工人，外国政府是没有机枪手炮来保护中国军阀的，到那时节，一死已晚。读者若不信我这话，请问问他人之久住欧美者。至于租界，更兼中国两地之劣点，虽然多数的中外人多不是东西，然外人之贱看此等，中国人之欲得而甘心焉，并无二致。若当今之局，一死报国，过去纵有愆尤，国人每能相谅，所谓“死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者，今日军人当前之问题也。

如以上四节所说，今日为北方大局，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若是后边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处，若是前面不止一条路，也还有选择之余地，今则后面是大海，两边有高墙，前面纵是猛虎，也只有拼上去。人生百年，总是一死，凡人皆然，而穿军服的尤其不能忘此。

不过对倭人不是抵抗一下便了事的。中国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我们越有利，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在上海之战绩所以能得世界同情者，非以 1 月 28 日放了几枪，乃以支持了一个多月，东北义勇军之所以能得国人同情者，非以一朝之勇气，乃以多半年中再接再厉也。因此，中国上下现在有将华北的军财情形彻底布置一下子之必要，以便成立长久的有效的抵抗。北方居民有彻底觉悟之必要，在大事临头时，自己如何服务，如何将自己的余财捐给死在战场上的军人。

且这话不仅是“鹿死不择阴”的腔调，中华民族之复兴实系于此。以今日中国上下一切社会之腐败，不经一番彻底的缔造，是没有办法的。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我们，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我们，倭人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今日之局，正是小鬼不自量力，代司杀之天公以自伤其身耳。反正疯狗咬混蛋，是无不可的。我们一旦被咬得不混沌了，然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原载 1932 年 8 月 14 日《独立评论》第十三号）

“九一八”一年了！

今天是中华民国廿一年九月十八日，正是“九一八”事件一周年了！

“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两件自然一个是世界大战，一个是俄国革命。我们生在其中，自然有些主观的情感，我们以这一年的经验，免不了有些事实的认识。我们纵观近代史，瞻前顾后，免不了有些思虑。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统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看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繫于此。

先说浅看中的失望。

第一失望是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国民党在民国十六年以来，以历史的及领袖人格的品质的关系，在表面的成功之下，自身破裂其组织，以至于建国固谈不到，而碰到空前的国难，国民革命军打到山海关的时候，真是朱洪武打跑胡元以来中国民族的第一个好机会，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有知识与人品，中国又何至出数十万万的资财，数万的性命，以供其“家争”。“家争”的结果，国民党所存之革命性尚存几何，及国民党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天下共知。其最

惨酷的滑稽事，如冯玉祥"势逼处此"的走了"叛逆"之一途，而打出去的奉系被请进来做党国柱石！"九一八"事件一出，我们以为大家总要革面洗心，人尽其能，共赴国难，党时未尝不引"敌国外患所以安国"之谈以自慰。然而不然！起初是和会的一阵文章，党国领袖人物曾表示其"诚意"于天下，其继是仓皇辞庙，税驾东周，及南北军阀对沪战反应之百分冷淡，最近是以所谓抵抗计划引其来的汪精卫辞职，到了今天，不特抵抗的工作不曾办，并如此这般的一个政府也亦弄到不上不下，若有若无了。今天若想广州不做撤腿的文章，南京肯做积极的工作，汉口不谋局面的开展，北平有个振作的精神，恐怕没有多人相信罢？这样的渔阳鼙鼓惊不破北平的羽衣曲、引不出汉口的轮台诏，振不起广州的勤王意气，碎不了南京的六朝风度，则中华民国更有何希望呢？

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政府与统治集团之使人失望绝望，人民犹可望到别处，若一般国民都如此醉生梦死，尚有何说？元兵未渡江，临安已经给他预备好了；清兵未入关，燕京南都已经给他预备好了。所谓预备者是些甚么呢？靠天活着的心理，毫不振作的生活，做顺民或逃之夭夭的幻想，知命的哲学！所以人民虽众，如一群羊，社会虽繁杂，如一堆沙，以今日之局面比宋明亡时真正再像也没有了！自己先已准备好了亡国，做成一碗现成饭，人家为什么不来吃？俗语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殃"。试看今日南北人民对此局势如何反应？日本货是照旧买的，尤其以华北为甚。明明摆着，买他二角钱的东西便给他一个打我们的枪子，买他两块钱的东西便给他一个打我们的炮弹，存他一批五万元的货便给他一个炸我们的飞机。然而还是买的。劳苦的大众国家本不曾给他以生活保障，他们莫名其妙是可恕的，至于所谓中等阶级，真是与国休戚的，仍是专心致志的图谋他的小小安舒生活，尤其这个阶级中的太太小姐们，全不想到"国破家亡身又辱"！看看上海租界，以为亡国

不过如此而已!

第三失望是世界上对此事件反应之麻木，中国人自己的事，而想到别人反应的态度，诚然是可耻的。不过，这篇文章不过叙述我自己的意见，我们在这一年中自然免不了想到些世界问题之牵连，我们如果知道依赖别人是最大之耻，而奉行此义，则亦无妨替人想想。倭人之暴举，不特给美国的太平洋政策一个正面打击，并且是积极胁迫大英帝国在海上存在之第一要着，且国际联盟从此失其效能，大战结局中之唯一可以值得保持发展的创设丧失了，于是大强国支配小国之一种调协的工具拆台了，英法皆感其困难，而尤以法国为甚。且日俄局面从此尖锐化，倭人在东北之横行迟早必引起对俄之纠纷。以如此凋零之世界，如此巴尔干化之欧洲，群策群力，以图经济恢复现状安定之不暇，则日俄一战所引起之波澜，真要将世界大战遗留之疮毒一齐溃烂。俄国在地势上是不可破的，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之往事可证，然则虽反俄者若有意识亦不能希望以此得利。凡此形势，似甚明显，而列国舆论多昧于此，只以目前之自了为眼光视线所及，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英国，统治日本领导日本国民之日本军阀已明明表示其要建设大帝国于亚澳各洲，而英国多数舆论似乎以为满洲问题不关自己，眼光如豆者，必有祸事临头之一日。英国此日对远东之态度颇像大战前之态度。诚然，大战前英国的地位是与今日不同性质的，大战前英德暗斗已见，此日日本统治者虽明言吞并澳洲，统治印度，然而形势不如彼时之迫切，不过，大战前德国，虽也把英国来打的一笔账算在心中，却并不曾觉得英国在德法战时必战。英国人自己也有时在事后责备爱斯葵知的政府，说，假如那时英国的态度表示鲜明些，或者可以使德国自觉而免于一战。英人总是以自侍的手段行混过去的步骤的，因而救火每每救在燎原之后。今日英国，如欲放弃其苏彝士运河以东之势力则已，否则坐看日本攫到东北之金穴，用其天然供给，一步一步的在亚澳两洲扩充势力，先是扫荡英国的商场，次一步便是政治统治了。若

谓此事尚远，则远而忽之，正是舆论麻木之象征，世界多事之缘由也。

第四失望是中国的政治似乎竟没有出路。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也"。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不曾自己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有一天一个人就所谓"国难会议"发议论，说国民党如何不好，非交出政权来不可。我便老实说，国民党对不起国民，事诚有之，然而以往失败的南北军阀及政客团体尤其对不起国民，国民党要交出政权来，容或有之，然而残余势力如北洋系、安福系、研究系、政学系等，都没有这个资格起来接受。这话说来，我们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人最伤心，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我们其将如唐明宗祷天，愿天生圣人于国民党中乎？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说到这里有人要想到，"然则共产党是出路吗"？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明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运命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所以我们是不应以个人之前提论这事的。不过，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俄国大不同者至少有三。一、地理上截然不同。俄国是难打破的江山，背后靠着北冰洋，冰山便是他的泰山，又有冰雪及辽阔的地势做天然

的保卫。中国有个大肚子伸在海中，真是一切帝国主义的最自由的战场。二、国民经济上截然不同。俄国在天然上，富力只下于美国，欧战前社会有相当的富庶，且地太广人较稀，而统治及地主阶级尤是大富，所以有田可分，有产可共，分田共产之后，国家仍能有大资本，国民以五年计划之故，不得不忍痛以输将，到底还有输将之余地。中国人至于今日，小小的些资本几乎皆在租界及经济上受租界支配之大城中，如北平受天津租界之支配，广州受香港之支配等。这地方的资本，不用转地方便"出国"，而中国乃成全无资本吃菜根嚼秕糠之乞丐国矣。以如此之经济形势，任何政治做不到，遑论经济发展？然而经济不发展是建不了国，所以俄国如此勤劳于其五年计划。第三是革命人材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的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

如此说来，失望至此，真正绝望，然而我们怎样？因此不免想到：一、自杀，免得活着难过。二、暗杀，暗杀国贼巨丑，乃下至污吏奸商，或者自己的仇人也可以。三、穷极享乐，只顾今朝，快乐反正赚到，因而死了尤妙。这样办法以外，还有别的办法没有呢？

不过看深一步，以上的失望都不够使我们绝望的。中华民族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而且没有今日天造艸昧之形势，民族是复兴不来的。这不是自己安慰的话，有事实为证。

第一，东北是亡不了的，所谓东北者，在历史上本非一个单

纯的层次，狭义的辽东永是中国人居住地，其北部则多是荒地，最近百年中山东河北的健儿冒风雪，辟草莱，吃人类吃不了的苦，然后此地在民族上永为中国人。一朝日本人来，自然要对这些人加以排挤，然而三千万人岂能赶得许多？我们这三千万同胞中大多数是如何去的呢？我记得小时，常走由天津向南的一条大路，每每遇到成群结队的山东人“下关东”。他们背着一袋乾食，即是干得比铁差不多的杂粮饼子，和几百文钱，以便路上买点水吃，一直走到黑龙江，或西伯利亚。有火车是坐不起的，而且京奉路上洋人管的火车，每每把他们闷死。这样远征，自然死许多，然而他们很多竟到了，后起者只以到者为劝，不以死者为戒。尤其可恨的是东北的军阀变成了大地主，要耕地者须先拿出一些大租金，而他们的生活乃真如农奴一般了。在这样情形之下，他们为中华民族开辟了若干万里的疆土！日本人可以攘取而势不能驱走，日本人虽能得其大利，而势不能夺其小利，则他们之存在依然，若以教育同化，则现有台湾之榜样在，试问台湾多数人民之汉人近于日本人乎，近于福建人乎？燕云十六州沦于北族者数百年，黄河流域各省沦于金元者数百年，一旦大明朝起来，这些地方是谁的呢？今日中国民族之有东北，乃是山东河北劳苦农民的功劳，今日中国政权之失东北，乃是东北军阀作恶误国的成绩，则将来关内的政治一有办法，暴虐的倭人一遭艰难，我们自可恢复故物。虽说，今日东北之卖国贼如许多，日本的教育又必不放松，然而日本之小器，适足以促成反感，卖国贼的子弟每有不少革命党。日本人不能使关东的中国人另成一种生活，则一朝小水银球碰到大水银球，是分不了的。

第二，中国的事情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只要军队稍有纪律，地方便可以平安，只要政府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人民便可以猛烈的进步。即以山东论，张宗昌几乎把山东全省的社会组织拆散，而今日以韩复榘之治法，竟能成一小康之局，若在外国，岂非怪事？但使中国的政权有少许的安定，中国政府有三分

的清明，便可有开国的景象，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骤看中国此时的情势，真像社会的总崩溃，然而转移也是有望的。前人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这话像是极不通，不过，二千年的帝制训练，人众如羊群，一般风气转移决不是封建时代之固执了。今日之所以暮气沉沉者，正是二十多年政治失望之结局，人民向上之心，一摘，再摘，无数摘，焉得不如今日？这是虽可悲伤，然而总是一种变态，是可以改得过来的。记得二十一条交涉之后，北京中央公园开救国储金大会，数万人去了捐款，老婆子小孩子都多得不可数。然而不过半年，筹安会出来了，救国储金便为梁士诒等用作帝制费了。似此的摧残无数次出现，焉得不有今日之死气。不过这死气究是长期摧残之结果，非本性则然。一旦国人对社会略有半分希望，对大局略有半分期求，这个死气是可以改的。譬如我们住在北平的多数人眼看此间的“政治”，还去希望什么？眼看见有政权人物之公私行为，还计较什么抵抗排货？但这种死气并非本性，死气之内，包着热烈的怨气。一旦局势稍有一缕的出路，天良是泯灭不了的！二十年中，与论清议每况愈下，以至于无，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春风一来，死气告退。从长看去，中国人不是惯坐在墓口中的。

第三，国际上的形势今日虽然混沌，除美国以外几没有说句公道话的，然而东北之大变关系世界大局者过于巴尔干，日本既以作鲸吞亚澳的发动，迟早必横生纠纷，且决是迟不了很多的，今日大家之所以踌躇犹豫者，一是没有准备，大家都不曾料到日本如此之突然大闹；二是怕苏俄，日本势力之消落是苏俄骤升的大机会，而苏俄之上升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绝不愿见的。然而这样形势虽是使目下沉闷之背景，久而久之局面总要开展的。英国决不能放弃其辽东市场，美国之日本开关，合并檀香山群岛，合并菲律滨群岛，宣布中国领土保全门户开放主义，调停日俄战，开华府会议，数十年中一步一步的一贯政策，决无因日本在沈阳之

一击而一朝放弃的。至于俄国，尤其不能割贝加尔湖以东以与人。假如中国真能自己稍稍振作，以后不患没有利于我们的机会，即如二十一条时代，我们是何等的困难，欧战罢了乃有华盛顿会议。历史自然是不能保其重现的，然而只要自己有办法，环境上免不了出有利于我们的机会。

第四，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历史上与中国打来往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国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这或者就是中国人不能特放异彩，如希腊人如犹太人的原故，然而这确是中国人万古长存的原故。论到智慧，虽不十分优越，却也是上等中的中等，固曾以工商业及美术文学及大帝国之组织力昭示于历史；论到政治力量，今天固然惭愧的很，不过今日之患，在乎没有政治重心，一有政治重心，中国是能有大组织的。诚然，以早早脱离了封建社会，在二千年帝制下的训练之故，社会如散沙一般，然而南北东西各有万里直径的方土中，人文齐一，不分异类，也不是没有有益的方面。东北在备极昏暴的军阀治下能骤进人口，南洋及新大陆能以猪仔式的进身开拓生财，在这样最平庸的形式中，包含着超人的精神，比起娇贵的西洋人，器浅的倭人，我们也自有我们的优越处。今日中国各事，从深里看出，皆不足悲观。说科学不发达呢？然而以如此之环境，有如此之科学已经是难能了；说实业不发达呢？然而政治摧残之下这里那里尚有几个飘萍，也是大不容易了。所没有办法者，只是政治、而政治之所以没有办法是没有政治的重心。只要这一层能以一种方式演出来，无论是国民党或其他乃至于一种能拿得起政治来的阶级统治，一切事都可望进步。在中国做事业说难固难，说易也易。

若说我这些话不免自己安慰自己，则试看在如此死气的一年国难中，何尝没有使人精神奋发的事？例如上海之抗日，真是

"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如东北的义勇军，以那样的情势，做那样超人的奋斗。又如铁血除奸团，极少人不顾性命的组织竟有如许大的效力。然则中国的事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我们若以民族的希望为宗教的信仰，以自身之勤勉工作各尽其职业为这信仰之行事，则大难当前，尽可处之泰然，民族再造，将贡一份助力。宋明的道学先生尚能以四书五经养其浩然之气，我们不能以近代知识养我们的浩然之气吗？

我们的知识不使我们有失望之余地，我们的环境不许我们有懈惰的权利！

（载1932年9月18日《独立评论》第十八号）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称赞它的说它可以代表世界公论，不同情于它而不至于站在日本的立场者，也有甚至说它是件“含糊之杰作”（A masterpiece of ambiguity）者。我以为称它为“含糊之杰作”未必即是不公道的菲薄它，而其所以成为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缘故。作这报告的衮衮诸公，其中至少如李顿伯爵、麦骙将军实在是善人，以公道及世界和平为意者。不过，他们在国际联盟的纸老虎破掉之后到东亚，一面要顾到现在的事实，一面要顾到国联立场之面子及下台问题，而因现在的事实即日本人一手造成的事实，原与国联立场绝对矛盾，诸公徘徊于矛盾之间，欲求出一个公式，将矛与盾都对付过去，焉得不“含糊”呢？惟其如此，故此大著本身先有一基础的矛盾，即叙说事实之经过与其结论并不是一个精神所支配：叙说事实，如论“九一八”之责任及满洲国之两事，与我们所见并无不同，而其结论乃与此等事实全不相涉了。

这个大著似乎专向深处寻求，作些探本“追源”之论，而求“基础解决”之法，于是乎议论到中国二十年的政情，以为中国之不上轨道是世界的患害，而为此满洲事件之一个主因。真可惜，李顿诸公何不写一专章以叙述日本对于中国统一与近代化之贡献？袁世凯将有统一的样子了，日本把他打一大下子。我们恨袁世凯，因其背叛国家，日本怕袁世凯，怕他能统一中国，这并不同的。安福贼徒上台了，日本大大帮助一下子，于是乎种下这

些纠纷，而中华民国几几乎断送。国民党打到北平了，张作霖被他杀了，他劝张学良不归南京。国民党将要成事了，便是这东北之一击，此外如分化南北各种浪人之行动，奉直战中之日本将官，石友三叛乱中之土肥原，等等一切，一部《十七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日本人真有大造于中华民国之统一哉！自徐世昌锡良时代算起，中国人要在东三省办些新事业，日本人总给以打击，无数的案子在那里，而最近几年之铁路建设竟为日本人趁早动手之动机与借口。日本人真有大造于中国之近代化哉！这些事，至少李顿、麦骙两公当然知道的，且当然知道他的重要。若谓，说了这些话徒动感情，无补实际，则中国不统一之局势，舍此重大的一个方面，而但看到地方观念及家族主义以为议论，又安能得其实在？一个大民族之统一与近代化，一面需要自身的努力，一面也要适宜的环境。若日本人专以分割中国为心，破坏中国统一为志，中国之统一大是困难的。我们诚然要自己努力，不过同时也要指明别人的责任。今此报告既以探本追源为号，而本源责任说不明白，对知道东北事件不多的中立国读者，似是危险的。我以为我们政府大可正面应付日本人訾骂中国非统一的近代化的国家之说，而直率的宣布日本在二十年中对这一层之贡献，看他算个什么东西，反正华盛顿《九国公约》久已假定我们贵国有些特别的。

这个报告中的解决办法，或者于中国不算无益吧，假如我们承认“辱者贱之常”的话！于日本真是大有利益了，造一个新约，承认以前一切日本的“条约”权利，法律的承认日本在东北之“特别利益”，法律的大大限制中国在东北主权之行使，东北用外国顾问其中又是日本人最多，日本人治外法权之推广，东北中国铁路实际上在南满路支配，且日本并以改订商约之故，在东北以外之中国地方又有了经济特别地位，而抵货永远取消，以后中国如派兵到东北，便成侵略，而其他方面便可为所欲为。如此种种，只换得满洲国名义之取消，谁说西洋人之讲面子在中国人

下？傻哉荒木，送这么大一块宝藏到嘴里，又注明是全世界公送的，反要喷回去，大骂一顿！老成帝国主义之精妙如此，新进帝国主义之鲁莽如此，孺子之不可教如此！读者以我这解释为过火吗？则请细细推求九、十两章中各项原则及办法之可能的各种结果如何，恐怕正不止此罢！

这篇大作中把日本中国的意见几乎都分别轻重容纳了，例如对“九一八”事件，既已说了“是晚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之自卫办法”而接着又说一句微妙的话，“惟当地官佐或以为彼等之行为系出于自卫，调查团于说明前话时（此处外交部译文有小误，故改之）不将此假定予以摈除”。这真敷衍到了好笑的程度了。其对于日本人强词夺理的话，并无正面之回答，只代他设想些困难，而委婉劝告之。以这样一个兼容的态度，遂有这样子的含糊。其含糊普及于一切语气中。世界的人对东北事件已经够不清楚的了，而读此一部有深心的含糊著作，恐怕不能减少其原来之不清楚罢？世人愈以为东北问题复杂，愈于中国为不利，因为东北问题本是领土侵略，法律上事实上何复杂之有？复杂之谈，正是日本宣传军之烟幕而已。

嗟乎，国联在去年的几次决议案是如何的，而今也到了这个田地，给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换得一个独立名义之取消，并完全超过日本民政党内阁所要求五条之上了。去年之累次决议，以《盟约》为前提，今年以既成事实为前提，并不高谈《盟约》了。看到这篇之文，真不能无今昔之感！

至于提议之办法，在精神上将中日共管及国联委治之意义皆容纳了，而其名固是“自治”也。中国以条约为宣言，日本以其顾问为中国文官，于是何是内国，何是外事，一切纠缠不清，而中国人若进兵东北，不管以何理由，便是“侵略”，日本得自由行动焉。此外特种宪兵之头目是一国人，财政之头目是一国人，即多头政治，保护多种国民，白俄也要受一个金牛宪章了。如此的一大组织，似乎非真的世界大同不能工作，非如上海一切国人

整个以榨取中国人利益为前提，亦不能工作。国联管奥国，奥国本身有个政治的底子，今东北之政治的底子在那里？

至于自治之说，胡适之先生以李顿、麦骙、施茵三君所属之英美德三国皆是联邦制，故易于有此想法，这话是对的。不过，中国东北决非不列颠帝国之加拿大之比而是德意志民国之莱茵各省之比，更变本加厉者也。若美国日日在图谋吞并加拿大，加拿大恐怕不能以骑警为国防，而与母国轻其关系如今之状况罢？法国数年前之希望于莱茵河者，何尝不即是一个“自治的莱茵”，由法国军队驻防之？

反正这个办法是实行不了的，反正日本人要奋勇当前担负破坏这个计划书的责任的，则中国政府不可不取对此报告书有相当好意的态度。不过，同时也要步步有着，句句慎重，以免将来成为口实。其应特别保留者，一时想到有下列几件：

一、拟议之东北地方政府不得有对于普遍于全国之事项之立法权，例如刑法民法之制定等。

二、拟议之东北地方政府不得限制关内人向东北移民之任何立法及行政措施。若没有这一项，则日本人能以我们的东北发展其经济而我们反无之。

三、拟议之东北地方政府不得对于关内中国居民往关东者有特别之待遇，如服务官署之限制，税率之不同等。

四、报告书中固明言使用外国顾问是过渡的办法，则应明定其年限，以免过渡永远不得过。且一独立国尚有革命之权，东北新制也总该在将来有个改变的可能，宜明白规定其条件。

五、中央保留在东北设置最高监察官之权，以监察东北行政是否有悖于中央职权之处，有违于中央允准东北自治宣言之处。查英国各自治领土之“总督”是母国政府即名曰英王之代表，而国务总理是地方自治政府之首领。今地方自治之首领既由中央以一种方式任命，自不适用此法，但此首领恐是对于地方议会负责者，故中央政权在东北者必有适宜之代表人，不列颠帝国之此制

度，应变通而采用之。且中国历史上每将地方之行政监察分而为二；汉之刺史，明之巡按，最初皆监察官也。此制在其他各省行宪政时亦宜采用，依《建国大纲》所定省长由民选后，中央政权必有相当之代表在地方者，即以此项高等监察官为适宜；汉之刺史，明之巡按，初设之意大可为法。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既不可抹杀此报告，以分日本之谤，也不便绝无说明不附条件的欣然承认，以陷自己之地位，只好加之以严重之保留，副之以详尽之宣言，而接受之。好在此路反正是不通的，无非做一种应有尽有的外交姿势而已。

国联报告书之弄到如此不上不下之地位者，其小因是调查团中或者有简直莫名其妙的人，故他人不得不迁就之，于是文章愈复杂了。其大因是国联碰到一个极明显极暴烈的破坏盟约以及《巴黎公约》华府《九国公约》之事件，而又无力支持其地位。报告书未出之前，我们问各种公约与所谓既成事实谁得上风？既出之后，我们得到答案了，公约是个影子，阴天还不见，事实是一切的！这不是《国联盟约》之死刑宣告书，国联去年决议案的取消令吗？至于李顿诸君，其心可佩，其劳可感，徘徊于没有办法之中是可谅的，我们不应该责备！责备自己，另求出路罢！

（原载1932年10月16日《独立评论》第二十二号）

陈独秀案

最近陈独秀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捕去，移交中国官厅，又解到南京，押在军政部军法司候审。这事件引起南北舆论重大的注意，平津的几个重要日报都有社论，论这件事，而其结论皆不外乎政府处置此案应分别陈氏之功罪，给他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不可徒然用一个“反动”的公式率然处分。舆论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是很可以佩服的。我们绝不能要求执政者法外徇情，同时也绝不能同意当官者之主观用事。我们对一切司法案件皆应如此主张，对陈案何独不然？

陈独秀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假如陈氏是在江西或湖北共产党巢穴中捕去，他是一个现行犯，这事情简单得多了，然而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中捕去，而其身与其同派的人又早已为苏俄背后之第三国际开除了党籍，且对于他们这些人的态度是拔刀相见的。假如陈氏在江西共党区域被共党捉了去，他登时便要明正了苏俄的典刑了，现在是国民党之政府捉到手，于是处置此事完全有考虑陈氏一生行迹，及近二十年中国革命历史之必要。

我们为要去论这件事，应该把陈氏行迹分作三段去看。

第一段是考虑国民党清共以前十年中陈氏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这里所论革命者，不只政治革命，应该概括一切社会的、文艺的、思想的改革而言。本来近代的革命不单是一种政治改变，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文艺的相互改革，否则革命只等于中国史上之换朝代，试问有何近代意义呢？且就中山

先生的《三民主义》看，其中含有无限的社会改造，何曾是“你去我来”的公式呢？所以我这一段中把革命用做广义的，必为读者所同意罢！

清末陈氏在日本时，加入革命团体，而与当时长江革命人士一派较亲密，与粤浙各部分较疏，又以他在学问上及著文的兴趣，与国粹学报民报诸人同声之来往最多，然而因为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是最透辟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东南革命时，他先在南京，后到安徽都督府中做柏文蔚先生之秘书长。民国二年，反袁举义，失败逃亡，在日本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袁世凯死了，他回来，在上海开始办《新青年》。要知道陈独秀对于革命的贡献，《新青年》便是最重要的证据。

《新青年》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看，一是自民国四年九月创刊时至民国六年夏，这时候他独力编著的，二是自民国六年夏至九年初，这是他与当时主张改革中国一切的几个同志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志共办的，不过他在这个刊物中的贡献比其他人都多，且他除甚短时期以外，永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三是自民国十年初算起。这个刊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正式宣传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适之先生等便和这个刊物脱离了关系。现在从《新青年》中看陈氏之贡献与变迁是很明了的。

独秀是在反袁的立场上最努力的人，文字的和实际政治皆然。袁氏代表什么呢？若把袁氏看做代表帝制，真正太把事情看浅了。蔡孑民先生的见解最彻底，他说：

袁氏之为人，盖棺论定，似可无事苛求。虽然，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武庙宣誓，教会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

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旅欧杂志》第三号）

袁氏之死，虽不曾将这三种社会带了去，而反应之下却给反对这三种社会的分子一个阳春。《新青年》便应运而生于民国四年之秋。那时候的志士虽也知道中国的问题并不简单，然而总看见希望在前面，希望且寄托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给之体力智力为基础，西洋近代文明之贡献为工具，以刷洗这千年的瑕秽。独秀把这个意思透辟的扼要的，写在他的《新青年》发刊词中，他说：

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利刃断铁，快刀断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幸乎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发轫于这个立点上，则后来之伦理革命论、文学革命论、民治论以及社会主义，都是自然的趋势，必然的产物。

而陈氏之发挥这个立点，尤有一个基本精神，即是他的猛烈的透辟的自由主义。我们可于他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新青年》一卷一号）看出他自己造成之来源，他的精神到底是法兰西革命的产品，并不是一个普罗的产品，这或者是他终究受不了第三国际的部勒，而做它的异端之缘故罢？

他在这个立点上发轫，自然要着眼到教育问题，他于教育问题上标出四个纲领：（一）现实主义，（二）唯民主义，（三）职业主义，（四）兽性主义（《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这样的一个教育纲领现在还不是过时的，而兽性主义尤其需要。他于“兽

性主义”一节下说：

人间道德之活动，乃无道德的冲动之继续。良以人类为他种动物之进化，其本能与他种动物初无异致，所不同者，吾人独有自动的发展力耳。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专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

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生活也；曰：顺性率直，不饰伪自文也。

其《抵抗力》一篇（同书一卷三号）痛论我国人“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正和他的兽性主义相发明，在今天举国不振作之情况下看来，尤觉亲切。他的思想中这个“尼采层”是使他最不能对中国固有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协的，也正是他的文学革命伦理改造两运动中之原动力。

文学改良之论创于胡适之先生，他在这个运动中第一篇是《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二卷五号）。他在这篇文章中标举入手法八件：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照这个方案做下去，只有做白话之一路。他在这篇文字的末段中也露出这个意思，而未曾作绝对的主张。独秀接着在次一号中（二卷六号）发表了一篇响应的文章，叫做《文学革命论》，他说：

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人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我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

> 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个讲台不仅注意在新文学之寄托物，白话，且高标新文学应有之风气，而说出新文学应有之风气是和中国政治与社会之改革不可分离的。这真是一个最积极的新文学主义，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及革命史一个不磨的文件！以后文学改革的趋势多集中在白话问题，诚然，这是初步中最基本的问题，然而白话终不过是个寄托物。用白话来做写实主义的文学固然方便，用他来做古典主义也未尝不可，用他来写人道主义固然方便，用他来写萨胧生活也一样方便。当时有个学衡杂志，专攻击白话文，我有一次对朋友说他们真把这事看得浅了，他们接受了白话文主义，还可以固守他的古典主义呢！当时对于外国文学又每每没有别择，我有一次对一个谈王尔德的朋友说，你要打倒李义山，这是很有道德的了，然而要引进王尔德这是多么矛盾呢？我这里说上这些不相干，无非要形容当时在文学改革的运动若干混乱的现象。独秀开头便看得透辟，以为文学革命之凭借第一是用白话以代古文，第二是借欧洲新文艺之真实，以代中国传统文学之虚伪，所以当年文学改革运动不仅是个形式主义，且是一个质料问题。

独秀当年最受人攻击者是他的伦理改革论，在南在北都受了无数的攻击、诽谤、及诬讥。我觉得独秀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正在这里，因为新的政治决不能建设在旧的伦理之上，支持封建时代社会组织之道德决不适用于民权时代，爱宗亲过于爱国者决不是现代的国民，而复辟与拜孔，家族主义与专制政治之相为因果，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独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头蛇尾的，所以才有这样探本的主张。

独秀在《新青年》八卷以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全没有具体

化，但《新青年》自第六卷起渐注重社会问题，到第七卷的下半便显然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了。自国民党清共以来的立场论，共产党是罪犯了。然清共以前，十三年改组以后，国民党自身对于民众运动之注意，特别在劳工运动上，不在共产党之下，则独秀当年之创此路径，只可看做前驱，不得视为反动。

凡以上三事——文学革命伦理改革社会主义——是民国五年至十一二年中最大的动荡力，没有这个动荡力，青年的趋向是不会改变的，青年的趋向不改变，则国民党之改组与国民革命军运动之成事皆不得其前提。这个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陈独秀现在缧绁之中而抹杀之！

至于国民党清共以后，陈在法律上是罪犯了，那时节他若被捉到，这问题到也简单了。然而他于清共以后，不久为正统派的共产党者开除，弄得中国既不能容，苏俄又不能容，姑且利用上海之多国政治潜藏于一时。在这几年中，我们一面偶然看到中国正统派共产党……对他之猛烈攻击，其重要口号之一便是打倒陈独秀主义，一面又偶然在朋友处看见他求卖一部中国语音学的稿子，辗转听到他的穷困颠连。他现在是不是现行犯自有法律决定，但他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色的和赤色的，是无疑的！

在记载他被捕事件之新闻中，颇有怪话。例如第一次北平各报登载他在工部局的口供，说：因反动被捕三次，第一次在北京，为警察厅捕去。这正是五四运动后一个月他在北平大世界散传单被捕，这算是"反动"，真正是工部局的话了。自工部局之基本立场看去，国民党全是反动，现在不得已而与之妥协罢了。然而我们中国人看去，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只是因为反对北洋安福之卖国行动，而捕他者恰是国民党所要打倒之军阀！今天又有一个报上说，"缘陈独秀前与李大钊同为中国共产党起初之重要人员，嗣李在北平被获就刑，而陈遂销声匿迹"。嗟乎，李在北京之死，是就刑呢，是被害呢？李虽是共产党员，然他是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之人，他死在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国民

党清共之前，然则他虽是为共产党而死，也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是被害，不是就刑！否则今之国家岂不承袭了张作霖的正朔呢？

考虑陈独秀与中国改造运动的关系，与国民革命之关系，与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关系，我希望政府处置此事，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四）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立场。我希望政府将此事付法院，公开审判，我并不要求政府非法宽纵。我希社会上非守旧的人士对此君加以充分之考量，在法庭中判决有罪时，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政府以其担负执法及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决无随便放人之理，同时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

（载 1932 年 10 月 30 日《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

多言的政府

西汉文景时，鲁人申公以《诗》学负一时的盛名。汉武帝在初即位时，正是年少气壮，好侈务大，又是走儒家的一条路的，所以请了申公来，很想他能为朝廷做几个宣言，献几个计划，制几套标语。谁知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大大与一般好说话的儒家不同。他对武帝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武帝听了真扫兴，只好稍迟送他回家了。本来文景两代都是儒家与黄老明争暗斗的时候，儒家总受些压迫。武帝初即位，真个是儒家扬眉吐气的时候，真可以大大花俏一下子，然而申公偏偏这么老实。今之修庙救国论，长安王业论之柱国大儒，真要笑这老头子太不会做文章了!

汉武帝还不是一位说空话的呢！他要雪国耻，便和匈奴混战了几十年，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设度辽将军以断匈奴左臂，到底把匈奴“抵抗”得筋疲力尽，几十年后便降中国。黄河在瓠子决了口，他便自己截堵去。他的一生虽也有不少过失，但竟然造成了中国不亡于匈奴的局面，竟把现在汉人所居的地方都给汉人站住定了。他没有空言长期抵抗，他没有空言努力救灾。申公对他还说这样话，如申公生到现在，不知更要作何样感想呢?

中国统治阶级之喉舌——即文人——向来是好说空话的，因而中国的政治无论在如何昏乱的时候，总有一篇好听的空话。近年来开会宣言贴标语的风气更盛，所以说空话更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真所谓“颜之厚矣”。在“九一八”事件以前，我们最大

的典礼时发宣言，简直要以全世界之前途自任，现在稽颡于国联之门，不用“一切帝国主义”一类的名词，而用“友邦”“公道”了。这样在固有文化论者，犹可说君子居安而安，履危而危，真个是国粹的大道，然而凡百庶事，又何必都大吹特吹，吹时全不想到实行，吹完登时忘记了呢？这样的把戏，出之于口，等于念咒，写之于纸，等于画符，作之不已，等于发狂。这真是一个民族智力德力堕落的象征。

现在姑举两件事为例，以论为政不在多言的道理。

第一件是所谓行都，所谓陪都。原来一国有好几个都，似乎是帝王家的风度。若在民国，只有政府所在可以称都。其时帝王时代一国数都的风气，到明清已经改了。明有南京应天府，同时便在那里虚设六部各衙门，清有盛京奉天府，同时便在那里虚设五部。即在更远各朝，也每在它的所谓陪都所谓方京置留守，可见对于没有政府的都，虽皇帝对之，也颇歉然。我想现在决不会因陪都行都而设政治分会，以数次大战而取消的东西决不会再如此容易出来。然则所谓陪都，所谓行都，当不过是“开发西府”，“恢复中原昔日文化”，若干口号下的一个藻饰一种盛典。我们何幸生此盛圣明世，稽古右文，猗欤盛哉！就是在这样的藻饰盛典上，我们也还希望付力行一下子，不必多言。行都陪都都不是一个委员会一篇计划书便能出来的，也不是修庙修陵便可将西北繁荣了的。姑无论破产的东南决无余财倾于西北的荒漠中，即令有之，而不自然的发展，如所谓沙漠种田也者，也决无维持、继续、发展之理。总要先使西北有可以发展的环境，然后人民自己可向发展的路上走。使得人民自己向发展的路上走，政府所负第一步的责任是：一、维持社会的秩序，二、澄清政治的腐恶，三、给与人民以一种苏息，四、便利交通。这个人民自行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各处皆适用，而在活地狱的西北为尤甚。我们试问，西北军人对人民之榨取如何，鸦片烟之强迫耕种如何，西北人在这样贫困生活中所供给之赋税如何，人民生产事项之被军、

政、匪兵毁坏者如何，共产思想及组织在民间乃至军中潜伏之状况如何，这样问题当局者正不容易回答罢。据自西北来的人说，西安数十里外简直是地狱的世界。有一个旅行者，住在一个县署里，亲身听见受拷人民的夜间苦楚，少交一元便是几十板子，迟交一天便是几百板子；而所交者非赋非税，而是迫派种植的烟苗捐。在这样的现象之下，而拜佛者梦游想乐游原上的清秋佳节，装点以杨家姊妹，好古者幻造咸阳府库，金柜石室，充实以周汉彝器，明清簿录，我诚不知我们贵国大人物痴脑筋是世界上古往今来何种痴麻药浸过的！在这个问题之下，政府还是少说几句空计划，在最低范围之内，先做出一二件事来给人看看，例如恢复秩序，稍纾民困之类。若一直的总是空话，说自己并没有意去实行的大话，将来纵是说真话时，也要没有人相信了。

第二件是所谓建设。虽在最富的国家如英美，若建设专靠政府便也有限了，总要靠人民自己去建设，政府不过立于从旁协助的地位而已。在穷困到极度的今日之中国政府哪有力量建设多种事业，而中国政府已往之成绩，并铁路航运都弄得这么糟，真不配再多量的去尝试国营事业。今日之政府，以人力，以财力，都不是能够“百废俱举”的。他若尽他的责任，他的建设事业第一项是建设出社会的秩序来，社会有秩序，则人民可以自己去建设，不待政府去做这个，做那个。第二项是建设出官署及公务员服务之秩序来，有了这一层，然后国营事业不致一举办便沦陷为腐化的结晶品，而旧有事业，亦可在这一层的大前提之下去整顿。这都是政府本分以内的事，都是可以做到的事，都是其他大事所凭借的事。几年前北伐到了北平时，全国统一，引起人民的很大希望。而侈谈建设者，更弄了好些文章出来。从今天算来，似乎在无线电以外成就的事项很少，这些固有一部是政局不安定负责任，然而其最大的弊病似在说话太多，计划太多，开会太多，宣传太多，而过于不问实际，过于不求步骤，到了今天，国家已堕入这无底深渊中，哪里还有再说大话的颜面？且把本分内

最浅近的事做出来，不必再高谈建设事项咯！

中国人真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群！我们中国人中，尝见有时有人受之扯谎的指摘时，似乎并不充分的生气，若在西洋，则Liar一个徽号一经加之于人，恐免不了受人之掌。所以官府文章，说时本不是预备实行的。今政府之多言少行，似乎本不违背我们国粹的道理。不过，立国于现在，而这样子做，既坠落官常，又败坏民德，还是择该做能做的事，切切实实做几件，不要“危不忘安”的总是说大话罢！

（原载1932年12月11日《独立评论》第三十号）

这次的国联大会

我们的东北事件在这次国联大会里不得解决，原来是毫无疑义的事情。这次的国联大会不作任何决断，并不承认“满洲国”一着也做不出，也许是对所谓调解一条路上有益的办法。这都不足使我们懊恼。且国联之解决东北事件，我们竟可以此次之大会断定其为绝不可能之事，则正以其一般空气之恶劣，问题之复化，注意点之转移，而看出。以前国联虽无帮助于中国，然而他的道德的同情正在我们这边，没有人公然以日本是的。这次除西捷瑞爱回国提案外，竟少原则的公论，而英法加拿大代表之谰言尤见日本宣传之成效。大会如此，十九国委员会之情形可以推想了。

平情而论，国联此时本解决不了这件事。国联既拿不出武器来，则日本无让步之理，所以只有拖延，而拖延正是日本人所最乐者。然而拖延也是要有原则有立场的，不但任在日内瓦取防卫态度的日本转取进攻的态度，而大国竟为其攻人。事情所以糟到这步田地者，一部分由于环境，一部分由于我们自己。现在随便分析一下：

甲，由于环境者。美国大选之结果，使现在的政府失其权威，而新政未出来，若干事件不得不取一个等待的态度。欧洲又以战债及裁兵问题闹得一塌糊涂，自顾不暇，国联也颇有因这些大题目而瓦解的象征。原来支持及对日本行为之立场者，以美国为首，而美国政府正在交代中，又以战债问题与英法等弄得七上

八下，大大不是今春夏法美日趋亲密，英美颇有走一路的趋势之环境了，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若希望英法等国舍了他们目下之绝大难关，先走上骑虎不下之一步，也是不近人情的。

乙，由于我们自己者。以如此的国难，我们的统治者固不必论，即人民又何尝有振作的景象。以重创未补之上海，以首当危险的平津，都是如此醉生梦死的景象，更何论其他。而况山东及四川的军阀尚以自家开火之一着记念“九一八”，这风气现在又传染到贵州去。这班人们似乎惟恐日本人在国际上诟詈中国的话不得一个最近最精的证据一般。自己如此，何所望，何所责于友邦？我想，最和中国讲交情的和最能主张正义的，也不觉心中要问，“帮助中国，中国自己可有办法吗？”日本人看破这一层，于是乎便在这一点上“大放厥辞”，而这个策略在这次国联大会中竟获到这样的效力了。

在日本承认了伪国之初，我们曾揣测过，日本对国联取如何一个态度呢？当时朋友中颇有人相信日本退出国联之成分甚大，而也有人以为日本决不下愚至此，盖必出于以胡闹为手段，以拖延为目的者。当日本方才派了松冈，他尚未赴欧时，我有一天与一位朋友谈，“看来日本人在这次会中必然横捣乱，将以‘中国不是近代国家’一口号移转世界在东北之视线于中国全部政治上。这却是可怕的。因为这样一弄，可以弄得假问题遮盖了真问题的地位，而东北问题便在左右出岔的局面上僵着。我们何不就在他这个讲台上与他相遇，老实不客气的把日本累次破坏中国统一，助长中国内乱的事迹，一齐托出。这样我们自然也有很丢脸处，不过或可迎头堵着他这邪说”。我的朋友说：“看来国联现在真正没有可以生效的办法。日本要取这个战略现在也是很明白了，不过中国原是怎样，全世界都知道，他这话也难得有过量的效力。”以这次国联大会经过及空气看，松冈所代表的这个邪说似乎收了一个过于常情的效果。其所以助成松冈等这一套人面兽语者，还有两个形势。一是我们贵国的内战重兴，二是国联中的

大国既无办法，恨不得借口拖延。此一邪说固可为若干国家去说“中国问题太复杂”一引子，而拖延从此便利了。若中国的军阀不这般的不争气，或者国联的大国不是在一个没有办法的场所，则这个邪说正无多人理会他，这是可以推想的。现在既已决了这一个大口子，我们非截堵不可了。我们必须将日本人二十多年来破坏中国统一，助长中国内乱的事迹，无保留的，有证据的，布之于世，如民国初年分头助革命党与宗社党，设尽方法去倒袁世凯（中国人反袁与日本人反袁全是两作用，这是不可混的），与鼠窃狗偷的安福贼徒勾结祸国，在东北之各种破坏中国中央与地方行政系统之企图，对北伐之打击，以及与各地军阀勾结之阴谋，如土肥原与石友三之关系等等，皆是不可不露布的材料。这个正面向内田松冈之诬蔑主义之反攻，与其出于我们的政府之口，毋宁出于我们的国人中之有国外名望者，尤其最好是出于友邦学人的著作。我希望政府对这件事切不可再忽略了，其实这件事早该做了！弄几个中国无名人士，办几个无名英文报，是毫无效果的。应该多找有能力有地位的外国人出来说话，而材料却是我们供给的。

国联大会推到十九国委员会，而又附以请美俄参加，这很可以看出国联中大国的情绪来，便是无办法时推给别人的把戏而已。中国推给国联，国联推给美俄，美俄坐看国联，同时日本人表示不可动摇，中国显露其毫无办法！恐怕最近几个月中，都要在这个循环推转之圈中。现在看来这次美俄参加十九国委员会的可能很小。美国既对国联有一个特别的情绪，又在政府不上不下中，又不能预得英法与他之一致，似乎参加之机会很小。苏俄尤其乐得作壁上观。盖苏俄新得到一个和法国同签之不侵犯条约，情形好转，然不可过恃这个好转。彼既不便在会中大放宣传式的辞调，亦决无分英法等国之谛之理，故不参加之机会绝大。如此说来，此十九国委员会之结果，仍是拖延与推诿而已。

东北问题之国际形势，必待战债问题与军缩问题转一方向时

方有转机，即必待英法美三国有相当的一致立场时方有开展。若美国民主党上台后早日承认苏俄，这问题自然开拓一步了，但民主党受政是明年三月的事，而民主党一经受政之后，不必即做这件事。

不过，"吞满洲是吞炸弹"一说，是长期总要证明的真理。日本既吞我们的东北，必扩张她的陆海军的实力，必早日促成她的财政的难关，这真是所谓骑虎不下的形势。她既然如此，则别国必然也要在军备上比着干，这不是重新抄一遍大战前的形势吗？大战的大原因固然是奥拓蛮帝国之瓦解，然其骨子仍在法德俄的陆军军备竞争，英德的海军军备竞争。东北问题必不能自了，而必有绝大影响及于军缩问题，或应该说"军扩问题"，而这军扩问题总要弄出祸事来的。自己骑虎不下，别人只好也骑上虎去。日本帝国早晚要瓦解在吞并东北之维持努力上。不过，我们若不自己站得起来，无论如何变化，都于我们没有好处，或有莫大的害处！

（原载1932年12月18日《独立评论》第三十一号）

1933年

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

张学良将军这次要尽他的军人的职任了！以这几天来东一枝西一节的事实看来，张将军的这个决心似是无问题了，“君子乐与人为善”，及今振作尽职补过，犹可得国人及后人不少的同情，他的晚节犹可以不负他的聪明和意气。他本来是个很聪明的人，并且是爱国的人，只以早岁的环境所养成的习惯，使他陷于现在中外人心中对他的地位，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痛心的事之一，就他自己说也是最可惋惜的事。现在来了这个可以雪国耻雪家耻雪自己之耻之机会，而他的反应似乎不是使人失望到盖棺的，他应该彻底的大振作，不特要表示决心，表示胆量，还要表示本领。他要打得好才算数，若以前不打，现在打而不好，照样是丑事。所在他在现在，要用尽能力要不顾一切牺牲。

这几天北平城内的怪现象真正要把中国人的恶根性全盘托出了。要人“得风气之先”先送家眷回去，市民不相信钞票，失势政客广泛的散布流言，尤奇怪者，是大学学生们的恐慌，纷纷出走，要求免考，否则请学校当局保证他们的安全。要求请假不扣分，否则学校当局是打官话。回想他们一年多以前的请愿、示威、军事训练、抗日工作等等，真正再滑稽也没有了。由今思昔，他们似乎是遵下列一个公式而行的——责任不在自己则请愿，祸害不及本身则示威，明知用不着上阵则军事训练，与日本人相离太远则抗日，一旦事情变了，自己可以陷在困难或危险中，则取三十六计之上计，然而还是罢考不忘分数，逃难不舍升

级的！这是中国的所谓“优秀分子”，这是受最多教育的成绩！这现象真比日寇的胁迫还严重，因为日寇只是外患，这是自己的根本没有办法。就这现象以测中国前途，真正一团漆黑。当这正当一鼓作气的时候，偏偏碰到这样丧气的事，我想现在张学良可以向他们请愿了罢！我们若深一步想去，所以到这地步者，也不由他们自己，也是环境使然。他们对执政者本无信赖，一也；他们的师长平日对他们毫无表率，二也；他们的师长在这时候毫无所表示，三也；教员先去，何怪学生。校长不到校，他人势必至于心慌。中国是无处安全的，青年的将来不是荣以奋斗便是辱以就毙的。大家此时在动腿之先，且请想想看，向哪里去呢？就地抵抗，又何尝专是军人的责任呢？

中国人之不抵抗，为世界诟病，北方人之不抵抗，为全国诟病。上月还有一位广东籍的中央委员，大大的骂北方人呢。我是一个北方人，年来为此生了无限的闷气。我有好几次对东北朋友语，你们不抵抗，连累及于我这山东人，向来以为“北方之强者”居之，而今萎靡至此。其实这样气话也很有不公平处，东北何尝不抵抗呢？义勇军在那样环境中之抵抗，真是可歌可泣的。丁、李、马、苏、冯、王诸英杰，真是我们应该焚香颂祷的。只以东北原来的军政权太不高明，太少组织，故不曾应机而作最有效最有组织的抵抗，以至为东北的民众留下恶名，这是最可恨的。我希望现在华北的军政组织不若“九一八”前东北的军政组织之紊乱，我希望北方的军队个个都是十九路军，我希望北方的健儿都是步丁、李、冯、王、马、苏的后步者，我希望北方的人大都如上海的市井大侠在去年淞沪抗日时节的义烈！这是北方人要恢复人的名誉的机会！

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

看目下的形势，这次骚动决非短时期的，所以这抵抗要是最有系统，较能持久，并且步步为营的，若只是胡乱抵抗，聊以塞

责，适以暴露中国军队之无能力、中国人民之无组织，其害是不可量的。惟最有组织的抵抗，方能赌一下子国运，方能争回已失的人气。所以我希望当局者应该趁情势尚未十分迫切的时候，一分钟不忽略地将华北局面全安置在作战的准备之下。此中工作包含下列各事：

一、铁路的运输，变作战争的布置。

二、食粮集中在军队可以应用，市民可得供给，而不以遗寇的场所。

三、大学学生应提来做后方辅助工作，或使其服粗工，不得任其作自援式的逃命。

四、严惩离职守的官吏，教育界人在内。

五、公物应由政府协助其迁移他去，而对私人搬家应作相当的限制。

六、通盘筹算抵抗中的各步骤，各线路，以免一处有失牵动全局。

七、社会上须立时组织起各种协助团体来。

八、各界捐输应由负社会信用的人办理，以使市民乐于输将，而免于上次“马将军捐款”之各种笑话。

大规模的抵抗便是中国受严格的国民训练之开始，中国之彻底腐败，非借机会锻炼一下子不可的。譬如打铁，钢是打出来的。以局势论，这是中国人挺起身子来做人的机会，以效力论，这是我们这老大国民再造的机会。打个落花流水，中国人才有翻身之一日！

（原载1933年1月15日《独立评论》第三十五号）

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

在这一星期中，国联的态度，在九国起草会中所表见者，及在十九国委员会中所表见者，突然转于强硬的态度。十九国委员会所通过的报告，在若干点上直比李顿报告书更合于事实，即是对日本的顽暴行为做了一个更深切认识，也即是对日本军阀及其附和的国民作了一个更严重的公义指摘，《盟约》十五条第四项下之草案能突然到这个地步，局外人诚然免不了惊愕，身受其痛的中国和全世界的些须相信正义者不能不感佩，而一般人亦不能不感觉何以在这几个星期中国联的"纸老虎"几乎拆穿完了后，突然出了这么一个路程。于是人人推测，其说不一。现在且将所闻及所可推想到者写下，随条约略讨论一下。

一、国联路穷命尽，且作困兽之斗。这一说是假定国联作此一转不过是不负责的上台，其结果自然是瓦解得更快。我绝不能相信这一说，因为：（一）小国语言及行动之强烈的趋重于维持《盟约》亦不可谓为全是高调，"捷克及瑞士的海军"虽然不能来镇压中国东海，但这些小国都不是日本，也都不是苏俄，大言与宣传的外交姿势究不能不有若干实在，也都不是中国，不是惯于专说空话的。小国的态度自也是他们本国在将来变化了可以相当实践的态度。（二）大国的态度，特别是英法两国是不会取不负责任的路径的，上台时总得先想到下一步。且法国报界久有为日寇麻醉的嫌疑，何以这次少听到法国报界对国联态度的严评？英国报界在保守党及接近保守党一派者，何以不多有责备国联卤莽

或过于理想者？且以今日所得伦敦路透电论，《泰晤士报》，即最可反应英国外交政策的报，大称赞国联对中日案之新趋向。何况起草会中提议对东北案应说明不承认“满洲国”者，正是英国外交次长伊顿？他这议论正可与月前西门外交部长之说不可决定不承认“满洲国”者遥遥相映。此一对比虽微妙而有趣，究不能说伊顿的话不是完全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的。（三）外交家说话，滑则有之，空则有之，诡诈则有之，伪善则有之，若像我们贵国的党八股大言不惭，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只论说，不论作的，可是断然无之。总而言之，国联走上这一条路，决不能看做轻易不负责任的冲动。国联固然久已陷于绝境了，国联固然实在不得了，然而他的积极的一转方向，总不能认为回光返照。日寇也知道是这样，所以久已说下的退国联，而今也踟蹰了，民政党显然不赞成即退国联，海军方面显然不与陆军同一感觉，虽然“势逼如此”的末后总是退出，而此一踟蹰——照他们以前的狂论不应该有的踟蹰——很可表现他们了解此事之严重性。

二、英法已与美俄有合作的谅解或约束。这也未免过于乐观。苏俄以其立国之根本论，断无与英法美取一种同盟式的结合之可能，而美国对欧洲之战债问题正在严重的危险中。战债问题正接不上时，美国的下次政府竟与英法政府默契，是事实上绝不可能者。且前些时英国财长张伯伦聂委尔正说了一个绝不合美国立场的演说，而谓同时英美对日已成默契，颇不近情理。日本人也看到这一层，所以也并未曾拿国联的这一倾向作为一个抗全世界的开端。

以上的两端论既非事实所能容许，然则国联之转方向究应如何解释呢？推测这事，自然要注意在英法两国上，所谓小国向来是坦白的维持正义者，原不待论。我们先说法国，法国的小政变即内阁变动，是常有的，然而大政变总是至少四年一次，即是以国会之选举为定。去年法国国会的选举中，左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胜利。所以这四年内内阁无论如何改换，总是左倾的政府，我

们或者想达拉捷内阁是在最近三个内阁中最左倾向，但法国不是一党执政的内阁，而永是群党联合的内阁，则在国会左派得势的四年中，大体上应无根本变化。厄日欧总是此时法国国会中第一颗明星，和俄总是法国政府的一贯策略。法国外交在左派右派有一最不同之点，这一点如下：左派右派都是希望俄国还债的，然而右派以抗俄为法国霸业之保障，左派以和俄为欧洲小康亦即法国荣盛的路径。左派右派都是怕德国起来危害自身的，然而右派以绕德国四围的国家之联合把德国压住，左派以条约有效，国联有威，为“安全问题”之保障。惟其如此，所以法国政治左倾之后，出来了洛桑会议的成功，出来了法俄互不侵犯的协定。法国本已走上了这一条较光明的路，而德国最近的政治变动更使法国不能不维持条约，维持国联。德国极右派之外交政策并不是上了台便与法国开战，乃是上了台求与法国联盟，向俄进攻。此计如售，便是宰割波兰，其结果是法国失其东欧凭借。此计不售，更有联意的花样，联英的梦想。总而言之，是要先弄得欧洲现局破坏，然后条约可改，局势可变。在这情形之下，法国单身对抗是名不正势不便的，莫妙于凭借国联的威权，作为条约之保障，然后欧洲若干小国多可站在法国方面。国际联盟本不是一个单纯意义，说他是大国的工具也可，说他是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合纵连横的机关也可，说他是大同思想国际合作之化身也可，说他是未来之希望也可，说他是第三国际的正面敌人也可，他本有一个复杂的来源与演进，所以批评他的话本不能同，全看是从何一观点着笔而已。且看一向及最近法意德三国对国联的舆论，这个情理正是明显，德国甚不爱国联，最近尤其轻视国联，意国对国联态度若即若离，法国则显然最热心。这岂不是他们三国自立立场之反映吗？日本必欲玩弄国联到底，以便消灭之，法国能不戒惧吗？

再说英国，英国有一个“待以观之”的传统态度，有一个“鬼混过”的名誉。伊顿既在起草会中说了列入不承认满洲国的话，这里边不能全无所谓。若说中国愤慨西门的表示可以使英国

转换态度，未免太把这中国人的感情看重了。在相当限度内，英国人决不愿中国人与他生恶感，然而冒的大危险以救济中国人对他的感情，是不会的。况且中国人此时绝没有与他翻脸至于排他的货的本领，他是看得明白的。况且他在中国的贸易究敌不上香港新加坡的陷落及澳洲的危险。若说，日本照这样子起来，实在给英国的亚洲威权与利益一个大打击，故不得不预防，未免看得英国人的智虑太远大了。这个打击的要出现自然是很清楚的，然而这是将来的话，一旦对日本起了大危机是现在的话，英国人的脾气决不会为将来且然的危险，先造出目前立现的危险来。且英国人所最顾虑者是俄国，纵然列国合起打下日本来，俄国在远东的力量，势必无形的大伸张，英国又将如何收拾？若无俄国，英国早不会如此怕日本了，若中国有成强国的目前可能，英国早要把均势的一端放在中国了。无如这两件事实皆明显，所以英国依日本为其远东防卫的心思，虽在荒木的吞并南洋澳锡主义下，究不曾完全断绝，至少在保守党之右派中这样。不过，远东的均势，欧战后已不存在，日本之《廿一条》要求便是这个均势因欧战而破坏的第一声。我们若想到华府会议之最初提议者是英国，用《海军协定》《九国公约》代替英日同盟者是英国，则可了然华府会议以来英国在远东的外交已进入一个新章，即安格鲁撒克逊合作的一章，犹之甲午战后英国取日本为与国之举为时势造成之一大转方向也。美国既早标不承认伪国之主义，而后任总统罗斯福在远东问题上原则继续司汀逊政策已明白之指示，则英国在远东局势不得道路之困难中，长久下来，不得不逼到与美同一道路上去，是事实之当然者。英国之变态度，恰与驻美之英国大使回国同时，又恰在英国战债代表团不久出发赴美之前，我们自不能不觉得美国新任总统对东北问题之立点已为英国所知，而英国为解决战债军缩等问题不得与美国立一个对远东异样的态度。况且俄国之决不会承认伪国，是人人所知道的，俄国之决不会与日本合作，也是不成问题的，则英国虽不能希望与俄国彻底合作，

也正用不着顾虑俄国之或有捣乱行为，然则英国之取此一个新态度，可以当做一种对俄的认识看，且可以当做对美的一种迎合看，也可以当做战债问题讨论之前奏点缀看。若以为英、美中间没有接洽，是绝不然的，若以为已有深切合作的默契，也未免言之过早。英美合作之趋向是大有了，此趋向之明显自"九一八"以来无过今日者，然此合作究竟能否坚确实现，还待后来若干事件之推移，例如战债问题之解决，中国之支持力，日本之步骤，欧洲大陆上之形势，等等。我们中国人今日虽可略高兴些，然还不能死心塌地，以为我们已有所恃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国联走这一条路，虽然已经指出来一个明显的方向，但是这一个方向的道路中岐路还是很多的，也许前面的荆棘闭塞着这条路，中国人是负斩伐这些荆棘的先锋责任者，我们不做我们应做的工作，而责备别人奈何不进一步，天下岂有此理？若问国联下一步能不能走上十六条，这应该完全问自己了。不抵抗没有结果，小抵抗有小结果，大抵抗有大结果，国联能不能用十六条，正待我们能不能做比利时了！现在"抵抗"固已成为众口一词的话语，然而放一枪，开一炮，尽民之膏泽以买飞机一类的抵抗，还不算数。既要抵抗，又要抵抗得好，否则昔日醉生梦死之无抵抗，今日醉生梦生之抵抗，其无济而有害于国家大事国民荣誉是一样的！我且问当此责任者一年中之准备如何？今天的努力如何？

（原载1933年2月26日《独立评论》第三十九号）

1934 年

"不懂得日本的情形"!?

今天——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是倭寇淞沪的第二个周岁，上海的萧条依然，闸北至吴淞的炮痕犹在，东北及热河在日本手中更牢固，十九路军已完全成个历史的名词了，想这两个整年中，国民的人格立场到个什么田地了？政府的对外态度到个什么主义了？真是要掉泪也不知道是为谁掉的！

东北有个"受命于天"的新帝国，华北有个"亲善和平"的新政权，蒙古向外归化，西域对内分崩，照道理说来，日本人应该最舒服了，然而何以日本人上下的那样顾虑最近的将来，而歌颂太平者反而是我们贵国的有官守者有言责者呢？这不是日本人看到将来，中国人只图鬼混现在？若是我们的政府明白的说，维持政府便是维持民族，我们这些傻百姓也用不着献疑了。不过衮衮诸公似乎也还有些"尽在不言中"的意思，浅来说是个不得已，深来说是别有见地。

若是不得已呢？则何以张学良之"不得已"而"暂不抵抗"是万分的罪孽，而今之彻底的不得已是真不得已？不知昔之恨张学良太不成样子而今对溥仪僭号也不敢说一个字者，与张学良相见之下，是否惟有惭德呢？

若是别有见地呢？吾侪小民本也仰体高深不了许多，他们既不肯明说，我们自无从详猜。不过展转传闻也颇有几条妙义，我们的愚蠢不敢不佩服——究竟也还不免于怀疑的。这些妙义且分条谈来。

其一曰，日本人长进，中国人不长进，且看日本这几十年来是做的什么，我们这老大国是做的什么，在“努力”上比日本不过，又如何不服输呢？我说：日本人在许多事上努力进步的可佩服，是不成问题，中国人之自暴自弃，是不可饶恕，这样天长地久下去，中国人在地球上没有位置，也是注定的运命。不过，这并不是向日本投降的充足理由。世界上民族的兴亡，固然大体上是赛跑，然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百码比赛。两者相争，“后死者胜”。这个比赛还要昏以继日，旦以继昏，上山下山，忽紧忽急。一气卖弄本领下去者也许会遇到个对头，而半路上曾经睡过几觉者如还能醒来，也未必准要输了。看看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比今日之日本如何，猛烈进取之不已，一败涂地。又看大战前之德意志，海军以质论赛过英国，陆军以质量论赛过法国，工业之进取精神赛过一切，国是之一定不疑赛过今日之日本，而今安在？世界的演进固然淘汰不进取者，同时也是淘汰进取得忘其所以者。我说这话不是说我们还要照样混沌下去，我只是说，这个斗争还不到太阳西落，离服输正远着呢！譬如我们是个破落了的大户人家，邻近有个暴发户，猛进而无赖，一经夺去我们的土田佃户四分之一，我们便当把男儿送之为奴女儿送之为妾吗？

其二曰，日本有巨大的陆海空军，我们自救无力，呼救无灵，可又有什么法子？我说，日本人之有巨大的陆海空军，不自今日始。若这话出自惯通日本者之口，犹可说，若出自初主张抵抗而今变了卦者，不是有点脸皮太厚了吗？且我要问，日本人既有此巨大精能的陆海空军，何不即来吞并中国？何以还有耐性走一条弧形的兼并之路？在日本以及亲日的人，必有一批的假话。然而我们试看自九一八以来，或者更前，日本人对中国人那样的野蛮兽性，若有可以做到的，还有什么不肯做到的，还有什么人类心肠，还有什么原始文化？其所以走此曲线的吞并者，当然不是不忍不肯，还是有些不敢不能。若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毫无犹疑的立刻派他的陆海空军前来吞灭。若华北问题不比

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无犹疑的占领。岂是如日本人语“南京政府改善其态度”，“华北新政权表示亲善”，便能使日本人避虚名，就实际，暂不在北平正阳门楼上挂太阳旗的。即东北之尚设一个傀儡孺子，沐猴称帝，不立即名实一齐郡县之者，也还不是因为国际的关系？然则日寇虽有其陆海空军，而究竟对中国如何使用法，在某一种情形之下用某一种力量之若干度，也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其所以要如此者，仍是国际的关系，国际关系使日寇无直来吞并之可能，而日寇三年来的狂谬举动，已引起国际上之大难关了。

其三曰，“这些乱嚷着对日本不退步者，不懂得日本的情形!”若一问其日本情形是什么，则直接说者当吞吞吐吐的，间接说者每神乎其神的，告你些有真有假、少真多假、真的变假，一切等等日本人如何威风的话。有些固然很当知道，有些则直是日本人的宣传而经过中国人口中，更说得谈虎色变而已。知识者，无论在学术上或事务上固患其无，有时更患其有而不真，真而忘了分寸，不辨轻重。无知识者，固永在昏天黑地中，然而有知识而不幸但偏于一隅者更容易误事。王正廷以无日本的知识(其欧美的知识也真可笑的很)，结果白白的错过一个在日本滨口币原当政的机会。现在的外交当局若自恃其日本的知识（其实他们的展转从日本浪人与中国的“日本通”听来的知识，价值何如，也是大问题。）更要交臂失去运用世界上四方八面酝酿着大事件的机会，而置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的运命于万劫不复之地位。难道办外交必须闭上一个眼睛，昔者闭上东眼（滨口时代），今也闭上西眼，然后能有权威吗？朱子有句话“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难道中国的外交当局必有醉人的八字然后合格吗？奉告自负“懂得日本情形”的人，先要考虑一下，他所知道的日本情形，比例上有多少重，所不知道的日本情形还有几多。更要自己问自己一下子，欧美的情形知道吗？合一切的情形而权衡轻重，能看到一个将来的眼前吗？

我也妄谈几件"情形"聊供"懂得日本情形"者之一哂！

第一件，华北之犹挂中国国旗，并不是日本的恩惠，而是日本的大便宜。用兵的上策是不战而胜，外交的上策是取实弃名，侵略的高计是出最少的代价而得最大的利益，谋国的妙算是捉到一切的形势，而避去一切的困难。如果日寇占领了华北，纵设一个傀儡政府，也要在国际的形势上比东北困难到无数倍。日本人何尝不自知他没有现在与世界作战的本领，"焦土政策"还不是骗人的话？所以他才一面在军事上经济上把华北握得牢牢的，一面却不即来玩直接的把戏，以避与他国之争斗。所以《塘沽协定》真是对于日本人再利益也没有了，比日本人公然占领了华北的利益大得多呢！游骑及于北平城外，占领及于唐山，割夺及于沽源，紊乱在平东滦河区域，在日本的立场上，真是最合理的步骤。看看前后的情景，真是预定的铁步骤。然则飞机在北平城上遨翔，漫作一切长驱直入之姿态者，还不是猫戏老鼠狗戏鸡，所谓"加侮辱于打击"也？然而"日本通"还说是和缓派的象征！

第二件，我们已经熬过半夜了，偏在这个时候投降吗？若说不是投降而说外交方策未变（所谓未变者，也不知是从何时算起），则如溥仪窃号、广田演说一类的大事，也何以一言不发？这样态度，只可以叫列国解释做默认。当东北事件初起时，国联的纸老虎未破，国联希望以文明国待遇日本，而以文明的方法制裁或节制之，其结果是毫不中用，而国联几为此丧其存在，军缩会议业已为此送入墓中。若只看到德国之继续退出国联，则日本之衣钵相传，真正威风矣。然而今日世界之大势又何如？法国一向与日接近，而今已经通盘逆转，意大利是法西斯派的祖师，对东北事向不过于指斥日本，而墨索里尼最近有惊人的演说。俄英美三国内情各绝自不同，然无一个不是愿安息者，而今竟整军经武，以备国防。东西比利亚之准备既成，而俄国之口调一硬，大海军派的主张在美国有不可思议的进展，英国又开他的帝国海军会议于星加坡。世界之心惊固不全为东北问题，日货倾销也是同

重要的原因，然而这两件事作用上非合为一不可。占领东北与日本财政是不可分的问题，日本财政与其对外贸易也是不可分的问题，将来之开发东北又与其对外贸易是不可分的问题。世界上都在积极准备"剑及屦及"的紧张态度中，究为何事呢？以为日本是能白白的吞并东北，白白的招来华北，真正是没有的事，只是世界的反应不能不慢些罢了！然而现在业已转紧起来了！记得我在国联调查团到中国时，我每向朋友们谈及日本恐不肯接受国联的制裁，然而东北问题的出路正不妨和欧战前的形势比一下。欧战之明显的原因固然大部分由于土耳其帝国之瓦解、分赃不均、与分赃后之祸患（奥皇太子之被刺即此祸之一），然直接刺激出大战的原因当然是欧洲列国陆军之比进，英德海军之比进，比之不已，情不自禁，必出于一战。吴稚晖先生好用的成语，"既有淫具必有淫心"者是也。今日中国之分崩的形势，固如大战前之土耳其，不过刺激出大战的直接因素，必然是军备的竞赛。日本既占据了我的东北，则不能不维持可以抗俄的陆军，可以抗美的海军，而俄美也不能不同样感觉，而英，而法，而意均不能不同样感觉，于是俨然成了上次大战开幕前之形势。"历史是不重复出现的，而人类之愚偏重复历史。"……当时说这话时，有的朋友以为过于做史论了，现在看来，这个史论也还做得有点意思。本来呢，料事于事之未现本难可靠，而看事于事之已露则容易明白。现在世界的局面已到紧急准备的进程中，我们的当局想也不至于把美之筑舰，俄之自恃，英之海军开会，都算做无意义的事，而把西向的线索一齐割断吧？

（原载 1934 年 2 月 4 日《独立评论》第八十八号）

今天和一九一四

"历史是不重现的，而人类之愚偏去重现历史。"

现在局势之逼似上次大战开幕前者，有两个方面。第一，上次大战的上层因是土耳其帝国之瓦解，因而巴尔干局面不能安定，俄奥的贪心冲突，欧洲之均衡以列国在巴尔干势力之有消长而动摇，于是因巴尔干而列国之关系冲突化，凭奥太子之被刺——这正在土耳其的旧地，而是一个巴尔干问题，即赛尔维之前途问题——而大战起。然而如仅是巴尔干问题，西欧大强国尚不至于拼命，所以土耳其帝国瓦解之外还须有个原因。第二，德国之进入帝国主义而成一强力，比英法俄后得多，然而一经进入，猛烈得很。占领则无空地，销货则无空的市场，于是不得不因商战而备兵战，因备兵战而更须商战，以裕财源，因维持东西的疆土而须建立可以压倒俄法的陆军，因扩充海外势力而须建立可以威胁英国的海军。于是海军则英德比赛，陆军则德法比赛，商场则英保守而德攻夺。军备愈比愈上劲，商战愈来愈深刻，"势逼处此"，终于一战。十九世纪留下两个不中式的大国，其中的一个已凭一次世界战争而结束已往，缔造将来，现在不又是一个大国到了结束旧账的时候了吗？日本之兴起，比普鲁士犹后，其凭借新兴之气以陵逼上国，比当年之普鲁士犹凶，当年英德之商战犹远不如现在日英商业冲突之甚，因德国之攫取市场每以新兴工业为资料，并未迫害英国之基础工业，如今日日本棉织物之迫害蓝克夏州者。又日本既积极的走上大陆政策，而俨然以亚洲之支

配者自负，其必须有绝对优越的陆海兵力本是逻辑的必然。东北事件未起之前，日本之较温和派不赞许积极的大陆政策者，岂真贪心差少，正由虑到既走上这条路，则军备与冲突直成顺流之势，不能自休。果然，日本既明示其侵略暴行不可挽回，而俄国之东防速成，西郊安定，美国迅速的补救其自华盛顿会议以来的海军缺陷，英国又开神秘的帝国海军会议。日俄之布防状态绝似大战前之德法，日美之海军建造竞争又类似当年之德英。若说，今日日俄美英之布置皆不过是防卫的，则须知今日有效的防卫必有决战之力然后可，上次大战前之陆海军建造及设防之竞争，什九也由防卫的心理而起。然则就大势的轮廓看，今天不即是一九一四秋天以前的二三年中情景吗?

不过"历史是不重现的"，今日之大势在好多点上究竟不是一九一四。其一，上次大战的炸药库在欧洲，矛盾之演进，时势之推移，在爆发前历历刺人心目，而此次之炸药库则在远东，其为世界将来之转移枢纽或比上次尤重大，然人类总是顾目前的，未免因其去已太远而忽略。比较上土地接连、纠纷深切者，是俄之与日，然俄国今日之重心固犹在东欧。英美在远东虽有重大利益，然远东局势终不是他们国内在目前的日常生活中所感觉到的。本来民治国家中的政治，关系于目前生活者，是国人所乐闻，关系于将来危害者，是国人所忽略。其二，一九一四的世界承袭19世纪末节之小康，20世纪初年之武装和平，相摩擦的国家都颇殷富，人民日习兵革而不一试，良家子磨刀张拳，不愿虚掷少壮之年。现在则各国之民生一齐凋敝，大家都集中心力于如何恢复繁荣，谁肯多事？而且欧战的结果历历在眼前，欧洲的纠纷愈来愈加多。前者列国以兵未解甲之形势强日本以华盛顿会议，而日本屈服，日本今又乘列国厌战惧战之心理对列国以狰狞面目，而列国不校。且俄国在组织上难得为任何资本主义国之同盟，而英国尤其怕他在远东势力之长进。英国则以印度爱尔兰南非三问题之故，若一步走错，帝国是可以瓦解的。所以欲今日

俄、美、英合以制日，如当年法俄英之合以制德，未免太涉想像了。

然则这世界便如此混沌，日本真碰不到对手吗？这又不然，有几件必然的趋势，现在约略说：第一，日本现在扩充其海外贸易，必出于争夺市场，而无从开辟市场，所以近来世界各国最感觉日本人之迫害处，将不免于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的世界上，协调商战本比协调兵战尤难。第二，当东北事件初起时，列国都顾虑将因此而损伤国联的威权，以致军缩无结果，已而果然。军缩会议既已完全无结果，将来海军会议之前途可知。日本既走上这条路，决不能不绝对的要求海军平等。英美也决不能放弃其比率优越，因为若放弃了，则菲岛檀岛马来加澳洲等等之安全皆不保。这个矛盾中间也少有妥协性：设若日本与美国订一条约，保障太平洋中美领土之安全，与英订一条约，保障远东大洋洲中英领土之安全，以换得海军同等，则英美无异授柄于人，而自持纸片之保障，日本人保障纸片之效果又是天下共知的。英美之在远东，就地理上本远不如日本，在十与七之比例上已是日本占实际的优势，若一旦"平等"了，乃真不平等之至。所以海军会议之没有结果是可以预断的。等到《海军条约》失其效力，所有华府会议以来之太平洋上协调作用一齐完了，其局面之严重而易出岔子可想。第三，把一上层进一步看，尤觉太平洋上之必不太平为必然，我们应该不忽略一件重要事实，美国一向对远东的兴趣比对欧洲为多，对欧洲则专作"不过问"的宣言，对东亚则从头方针一贯。从他打破日本关门起，合并檀香山群岛，合并菲律滨群岛，宣布中国领土保全，门户开放，调停日俄战，开华府会议，宣言不承认非法侵夺，直到最近的修海防建海军，一句话说，其一贯的趋势似迂阔而实沉着，似超然而实有谓。英国虽说内顾多忧，中国之市场不关头等重要，然而一消一长之间，岂特一个中国市场而已。能守马来加澳洲，便能守中国海，不能守中国海，也不能守马来加澳洲，若他的国防外线不在中国海，便要回到苏

夷士了。最近在星埠开的帝国海军会议，虽结果全无发表，而以出席之人物推测之，其必含有严重的计划沿太平洋英国领土在海战上之安全，毫无可疑。英伦敦报纸透出的消息，将修筑法克兰群岛之军港，尤可证明其计划之不属局部，而准备到在大战时英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犄角之联络。论到太平洋上之形势，更有几件事实不可忽者。一、英帝国政府不能不充分维持澳洲新西兰等地之安全。二、在太平洋上，英美不特无冲突，而以澳新加各领邦之故，遇混乱时必出于合作。即就一般言，英美虽有不少的矛盾，而在斗争分明的壁垒上，迟早总要走上一条路。三、英国的态度，遇事变之将起每每含糊，而内中的准备是一步不放松的。回忆一九一四夏天，英国最初表示并不明决（因此后来英国之自由主义者，每归咎于葛雷子爵缘此使德国敢于轻动），然而一旦事机发动，政府便宣告于国会曰，“一切都预备好了”，事实也证明他正是这样。以英国现在之立场论，固是情愿太平洋中得安且安，得了且了，然而如果不能，他是有办法的。

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所以这种张而不弛的局面总要时松时紧，时悲观时乐观。然而若略去小的起伏，看到大的纲领，用句统计学的术语，“对出曲线来”，大势所趋正是向着一个浩劫。看来总是日俄先发生问题，因为日本一面若完成他的准备，一面决不待俄国经济更稳固了，日本固希望借此一着充做资本主义的护法善神，以安定其宰割东北与蒙疆。至于海军会议之必无结果，其无结果便是至严重的结果，更是列国政府都看得清楚的，自然都是在着着准备中。只有我们的政府不知要做什么。在这关头，万一我们的政府只是一味得过且过，或者爽性倒在日本怀里，以为安富尊荣过得舒服些，乃真断送民族运命于十八层地狱下呢！

（原载 1934 年 2 月 18 日《大公报》星期论文）

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

3月1日，丑逆溥仪照傀儡戏的预定步骤登了他的所谓极。这事之关于溥仪及其从党者，本不值得一论，因为溥仪小子无论称号是“执政”，是“皇帝”，是“可汗”，是“溥王”（准备朝鲜亡后称李王之例），他和他的从党总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他做的事自为他的主人负责任，这事之关于倭寇者，也与以往的行径无分别，反正他们撕碎一切公约，破坏一切文明的原则，而求逞其暴力，这一段丑剧也不过是这大行动中之一步。所最可怪者，是我们的政府对此事业竟如此胆怯，发一个无益而有损的谈话便算完事！

这个谈话，据平津3月1日各报所登载，真是一篇胆怯含糊，责任推到欧美国家身上的大作品，这样宣言的效果，真正要损害我们国家的立场，因为这样宣言，在实质、态度及法律的观点上，不免被国人及外国人认作我们政府业已趋向于默认乃至于默认东北现状也。

这篇文字整个不成样子，而其内容之尤谬者有两点。第一点，“日本”两个字简直不敢提明，仿佛这两个字犯了祖宗的庙讳一个样子。须知没有被告的诉状，法庭是不受理的，没有主犯的名字，空论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若拿这样的文字给外国政府，真把我们政府“觳觫”的仪容表显充分了。在这个心理支配之下，谈话的字句中很有些极不妥处，详见下文。第二点，若干该说的并不去说，反而去责列国以“国家之人格”。夫责人者必先自责，试问现在北方的若干事实是否已有默认“满洲国”的嫌

疑？且宣传一时之进一步的解决华北外交悬案如果实现，是否已是实际的默认满洲国？如此，则试问我们政府的设施已把我们国家之人格维护到如何安全的地步了？日本的名字不敢明说，别国的人格却大是我们所关心者！

我以为这一段时机中，我们的文告必须是一件正式外交公文，通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各签字国，并正式的通知国联秘书处。这样子才有“备案”的法律效力，否则一件外交部长的谈话，算不得什么，即使偷偷的告给列国政府，也不够“备案”的价值。国联方面我们当然要有正式通告。日本虽然退出国联，我们却不曾。国联已因我们的不争气——热河战之不力及《塘沽协定》——被人看破了偶像权威，而我们今日还是依赖着国联的决议案，才能维持关于东北之法律地位。对国联的态度我们断无站在日本一面的道理。至于通告的内容，必直斥日本为东北事件自始以来之罪犯，而提明一切日本所撕破之国际和平公约及国联历次的决议案，以资继续肯定我们国家向来的立场。总而言之，公式必须郑重，语言必须明了，责任必须指明是谁；重的事情必须不轻说。我们之所以当有此一着者，无非继续肯定我们在国联中所昭示的立场，当此时机须再向列国备案。若办此事的手续和态度不足以完成备案的意义，反而明显的暴露害怕的了不得的样子，那算怎么一回事？使列国觉得我们对东北问题已经怕到不敢说犯人是谁了，则自然引得别人趋于默认东北“已成事实”的道路上。自己先做了一个含含糊糊的榜样，如何还能责求别人不浑浑沌沌？这样吞吐的举动，在作者纵不自觉惭愧，其有斫丧“国家的人格”（用原文语）之嫌疑否耶？

当这时机发表宣言，在作用上，第一件是备案，已如上节所说，第二件是信喻国人及别人，我们真不会改了对东北事件的态度。试就这篇文字的态度及实质看去所得印象不仅是个“缓和下去”而已，既怕日本神气，反而责求欧美各国之“国家人格”！全国国民所愤激者，实在在日本不在溥仪，因为愤激值不得对傀

儡而发，而谈话上说，“对于此种叛国行为，不胜愤激”，重言溥仪之叛国，即轻言日本之要猴子戏，把国人的愤激所向自日本人身上改在溥仪身上，这岂不是提高溥仪之重要？提高溥仪之重要岂不即是减轻日本之犯罪成分？下文又说，“惟自吾人观察”云云，这种观察是五十余国在国联中一致的决议案，也是美国苏俄历次所表示，何不提明，而缩小至“吾人”？明明是一个天下之公言而曰“吾人观察”，这算什么话？下文又说，“欧美各国之不承认伪组织，亦已成为国际道德之铁律”。这真小说了！美国有不承认的宣言若干次，始于司汀生，而民主党政府未上台时及一上台后宣言继续不变，国联五十余国更有决议案的约束，在国际法上，更无法承认满洲国。然则此事不仅是国际道德乃是法律！谈话的文章中这样改实为虚，自堕我国的法律凭借是何用心呢？岂不是因为提到那个法律的根据更牵到国联，牵到国联便触怒日本呢？以上等等误谬，若是推寻致此之由，总不外乎害怕，因为害怕到微妙的境界，于是日本二字与庙讳同避，而一切可以触犯日本忌讳的字句，例如不承认之法律案等，都是去之惟恐不尽的！受如此心理支配成之文字，能不十足暴露如此心理吗？谈话到这步田地，还说我们对东北事件的态度没有大软而特软下去，何以信喻国人及别人呢？

英国因为有一个对伪国邮政的困难，请求国联宣示如何方可免于事实承认满洲国之嫌疑。在他们关系辽远者，措置尚求如此谨慎，立场尚求如此严明，难道我们反而遇事含糊混下去。

据日本报纸所载，吉林的义勇军以扩大的举动纪念日伪的这一幕丑剧（这事是中国报不敢登的，想必有命令之者），而我们外交当局的态度如此！到底中国的希望当在民众的身上求之！

不过谈话既然谈到“国家的人格”了，还不免使我们寄一线的希望，便请他时时想到自己国家的人格！

（原载1934年3月11日《独立评论》第九十一号）

政府与对日外交

中日外交在最近三数星期内，仿佛又进人一种含蓄而迫切的局面。国人对于这事的冷静，看来似是有点不责备，至少不计较政府措施的样子，然若细细分析看，也并不如此。我想，真正知道政府要怎样做的，实在不多，因为政府似乎并不曾表示他究竟有如何一个确定的见解，更不曾喻人以他究竟要怎样做。用一句俗语形容，正是所谓“莫名其妙”。惟其莫名其妙，故不敢率然信赖，惟其在莫名其妙中已久，故不复有若干奢望。然则在此情形下之沉寂，在朝若有爱国者，对之当不特不以为方便，反当以为莫大之疾痛，这是不待说的。

竭我们对政府诸公的敬意，终不能使我们敢于相信，政府对此日之整个外交形势，是能够真有清透的了解，并能固持其了解的。请举几个例。第一，西藏事件、滇边事件，无知识的报大大议论英国人的帝国主义，新疆内乱事件又使他们高谈所谓英俄白赤二色帝国主义之向我们迫害，桂边事件又同样及于法国人。我以为但凡稍有当代国际形势的常识者，当明白俄英法此日皆无向中国侵略之意，俄英且均有向中国博取善意之姿势。这本是支配在他们整个的外交方策之下者，毫无须乎假定他们对中国有所怜惜。然而我们闻见所及，在朝者或对此等事之过分看重，使我们不能无疑他们似未正确的注意谁是敌人。目前局面下，威胁我们国家生存的，只是日本，并非其他欧洲国家。今日对欧美国家真该作活动多方的、宗旨一贯的积极工作，而所不应为伪辞所诱

惑，以至错乱了对救国目标的注意。第二，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狂吃谈话之后，各国立即驳斥，其最软弱者，转为中国外部之谈话。人家已不啻公然宣言中国是日本的保护国了，列国一齐起来说不然，而中国偏说的不着边际，试一想想，成何景象？其第二次谈话自然好得多了，然而也嫌太晚了。其三，日本为准备其明日之事变，除其经常外交机能外，又加上好些特殊使节，名士访问，其在拉拢、缓和、结联上做工夫，无所不用其极。试看我们的外交是如何活动，不特经常以外的不闻有何大动作，而经常的使馆建置，尽其功能否？外部能以政策表率否？驻外使节能以工作发扬否？我们局外人殊不能作一回答。以此日局势之迫切而复杂，聚最上的智力，做最大的努力，犹虞不济，奈何使人疑其或者不免"以荡荡之德临之哉"！

现在舍去泛谈，专说对日事件这个具体的要点，我犹不能舍我一向所持之论。第一，对日本交涉的途径，只能是日本的外交官，而决不能是关东军、台湾总督府以及浪人策士之类。第二，我们断不可再重看"日本通"了，因为他们通日本的效果已经愈弄愈糟了。第三，我们对日本必树一个不可再退让的界线，不然，虽退步到云桂山中，问桃源之津于苗大哥，也不能算是退步到止境。请分别解说一下子。夫日本人之多线外交，在其外交人员之外，更有军部，甚至假手浪人。就日本的内政言，已是一件至不幸的事，就对中国的效果言，不消说更是一件受苦不过的事。自对日本决取半跪的态度之前后（即是那个大错特错的《塘沽协定》），对日接洽，五头六路，而一群左欺右诈的中日中间人，真表现好兴腾的景象。这个趋势不特使我们的外交不上正轨，并且增加日本外交之不上正轨，既成立了如此习惯，中日关系将永远不上正轨。从此小事化大，大事化得天大。我们的政府应该抹杀外交官以外一切日本交涉接洽者，不如此，自己永无立场可守的。至于我们的日本通，固不可以一概而论，其中也或者不少爱国之士，然而胡乱来的真正太多了，如有作两面人的则真

正太危险了。我们的最危险处是，通来通去，无端通出许多问题来，传来传去，把对方的刁难深刻化，急切化。至于战区及其邻近小邑大城各地面上，中日问题之更难处置，这些日本通的贡献到如何一个地步，也是国人上下所熟闻的。政府若果然因某一事与日本之交涉不少而以所谓日本通者承其乏，乃真是自找麻烦哩！若说，不如此枝节对付着便不得了，则试问如此枝节对付着究竟到何处方能得了？苏明允论六国与秦之关系说："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今日之国防已谈不到长城，若再步步退下，则明日之国防将谈不到黄河。日本人的身躯虽小，其野欲是无限的，中国之疆虽大，每日割一块是有尽的。

然则局势至于今天，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对于事件之知识，固不可不详尽，然在决定方策上，则不可有过多的顾虑，尤其不便以政府的安全算做国家的安全。果然势在不可遏止之地，宁为占，勿自交割，宁可看他非法到北平车站，不可与伪国作联运妥协，因为非法强占终是不安定的。即如东北四省，日本占之将三年，犹不能不为之殷忧思危，若一旦交割了，乃真永久的断送。且交割由我们，日本之地位舒泰之至，若其强占，彼亦焉得自了。4 月 17 日日本外务省狂言后所发生之世界的影响，岂不清清楚楚的指示我们，列强是不能容许日本进行其亚洲大陆征服政策者，《九国公约》等，固非废纸也。以后日本之取消宣言，岂不更清楚的指示我们，日本岂真无所畏惧者。同时我们政府也该大大振作一下，对欧美之国交要处处着手，以备将来，充实外交之机能，增进外交之效率，而不取乎无动作的态度。若但以今日各使馆之机能，作自由式之动作或不动作，恐未必够应付这个风来雨来的形势。若论今日我们外交部之机能，则我更不愿多说。这一段话约为一句说，对日本要严定我们不可再退的防线，而准备着越此一线后之牺牲；对欧美要改进我们外交的机能，而努力于各项的联络与准备。混日

子的态度是最不得了的。

报纸上说，日本公使有吉到南京谈悬案，我希望政府要明白的告诉他：中日问题案之大者，无过于东北四省之占据，而问题性质之简单，也无过于这个事。还我们四省，一切的悬案都容易谈，不还我们四省，一切都谈不到。世人哪有占人一大块田园，还向人讨无名的债务，求交易之特惠者？我政府不能如此明白坚决的表示，而引起他觉得似乎“也可谈”，“慢慢谈”，乃又是为将来生事故也。

我们不敢放言高论，求政府取过分强硬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充分的认识，极度的努力，不在马马虎虎中过日子，认清自己不可更让的态度，策动将来事变中各方的准备。今日之政府，不比北洋军阀时代，想最后定可以走上慰藉国人之路罢！

（原载1934年6月10日《大公报》星期论文）

睡觉与外交

一个人料理自身的事，最怕是做梦的状态。若常年在做梦的状态中，虽一件坏事不做，也够倾家荡产的，至于一事无成，更不消说了。一人的事如此，一国的事又何尝不然。在环境安稳的情态中，昏睡的态度已经不了，若在四周波涛动荡的局势之下，昏睡的态度更要急速送命，这是毫无可疑的。中国人对事的最大毛病，糊涂的看着，昏昏的想着，漫汗的混着，敷衍的赖着。这样姿势，一方由于认识不清，一方由于工作不勤，一方更由于意向不健，于是治大国者若睡午觉一般，“厝火于积薪之下，而处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试看今日我们的执政者，对付此时世界将在大变化的局面，是不是有些像睡觉的样子？

中国在外交上花钱不算多，然以所花的钱比所出的工作，真觉惭愧。驻欧大使公使中有两人逍遥国内，更有一人在途中，又有出缺未补，补而不在任者。于是今年的国联大会中，中国代表团以罗忠诒、金问泗等充数。表面上尚如此零落，内容之效能可知。在如此最严重的国际时局之下，以如此“荡荡之德”应付之，负国家外交之责任者，是不是有亏职守？请看日本，常川之大使公使机能，皆能精益求精，更加上些专使临莅、名士访问，有组织的察探团体，半公半私的个人接洽，应有尽有，每作必十成努力。如此相形，不必决斗于疆场，外交上日本固已“战胜于朝廷”矣。自《塘沽协定》之大辱以来，军事上尽撤藩篱而东向乞怜之姿态，在巧言如簧的政客口中，固尚有几分强辩可以敷

说；独此外交上之极度松懈，一若“为长者折枝”而不为，真不知是何居心也。

犹记得王正廷掌外交部的时代，在昏聩糊涂、卤莽灭裂中铸成中东路上中俄冲突之大错误。如此一大教训还不能醒来，还在昏聩糊涂中，以当时中日关系之迫切，而不能有半分之认识，以当年滨口若槻内阁币原外交之情势，而未曾作半分之利用。驻外使节多付阙如，外交工作只有口号。沈阳事变，一发而不可收拾。以当年的政权组织论，他是负不起全部外交责任的，他不过是个外交大书办而已。然他既尸外交部长之位，他是不能自解其罪的。今日局面更比当时为复杂，未来事变之大更比当时为可虑，负外交责任者更不该鬼混目前，除对付着日本要求以外无所动作的。

今日之对欧美外交应作积极的活动；而作积极活动之大前提是将外交机能充实而健全之。第一件，不能在所在国动作之使节皆当更换。无论实力者及有政权者皆不当以私人关系用人，将公使馆员看做美缺，作为调剂，以致误了国家的事。第二件，留在国内之大使公使，皆当诚恳促其即回本任。代办的地位本难活动，在中国人的习惯之下，公使有人，代办尤不易办事。第三件，俄美英三国——至少——必须与之有深切的接洽，准备在将来事变中彼此应取之态度。这诚然是不容易办的事，然若彼此使节得人，在南京或在彼国都城总可办到相当的接洽。第四件，欧洲各国关系之演进，外交部要切实究察，这须凭借在欧洲的各使馆之消息功用，不能但凭报上消息，尤不可听凭日本人的传说与判断。第五件，对国联不可取忽略或减少热诚的态度，果如此，乃真是自误。

国联遭日本之一击，德国之再击，而威权大失，诚是事实，然这局面也不是一往不变的。以目前国社党德国之恶贯满盈，对内自相屠杀，对外鼓动奥乱，已把西欧各国的态度逼得大致上到一条路上了，他们鉴于国社党的德国之为危险分子，不得不于安

定欧洲关系之局面上相互让步，作相当之提携。或者此是国联机运之再兴，亦未可料。国联本身无尺土之守、一人之柄，本是一件空东西，然而他的组成分子并不是些空东西，而是些强大的国家，环以多数的小国。若是这些强大的国家能合作，国联自然有力量，不能合作，自然无力量，这是不用说的老实话。近数月中，国联之没落，虽由日本德国之一击再击，然其最后之暴露弱点，乃由意相墨索里尼亲德之态度而起。今以奥国事变之故，德意关系俨若对垒之敌人，德国并其最后一个可送秋波的国家也丧失友谊了，不能不说是欧洲局势之大进展。若俄国入盟之事再能实现，更可视为国联之大转机。这不是说抽象的国联有威灵，而是说国联之组成分子若能通力合作，可借国联之机能显其威权。国联不是别的，只是世间受了欧战之教训以后，想出来的一种以会议代秘密外交，以多元代替一个重心之新的国际政治合作机用。年来几次大变，使得一切关涉国际政治的会议几皆开不成，故国联工作毫无精彩。今幸元凶贯盈，转机在望，乃我国反于此时忽略他，轻视他，诚为不智。国联以中国之故，遭最大之打击，设若中国以为彼已遭打击，不妨加以轻视，则世上最鲜廉寡耻者，当为中国。此等国家能否存在于世上，实不能无疑也。今以本年所派出席国联之代表论及其他对国联之情形论，政府似对国联事不复多所措意，此诚梦梦之态度，而为日本人所大乐者也。

（原载1934年8月19日《独立评论》第一一四号）

日俄冲突之可能

最近若干天中，日俄形势之紧张，中国报纸虽普遍的轻量此事——无论此情形之由于感觉迟钝或不敢不感觉迟钝——此事之显然是在各方面的新闻中都能见到的。最近的发展，先之以在日本的中东铁路谈判之决裂，继之以大批逮捕中东路的苏联职员，同时俄日发表经过，更继之以苏联的强烈抗议，从此又是不断的逮捕苏联职员，两面的各种硬话，边疆上的紧张，国际间的惊慌。在此急转直下的空气之下，虽素抱乐观论者恐也要有不少的吃惊。当然人人心中要问，目下日俄冲突的可能有多大小？这事本不是系于一方面，故应将日俄的处境分别去看。

我以为此时日本对俄要实行侵略的斗争是很显然的，理由如下：

一、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地位已经巩固，义勇军等已不是一个重要值得顾虑的成分，伪国军队已经被加进许多日本教练官——实即指挥官——其“叛变”（应曰反正）的可能是不大的。而且对俄各铁路，规模略成，虽许多尚未能通车，其未铺轨者正可当做汽车路用。这等准备，虽未到十分完成，却也远比俄国在远东的布置为适用。

二、中国走上“上下泄气”的一条路已经一年，即令中国有志抗日，他也不重视中国的牵制力。

三、俄国虽外交的形势日见兴腾，不上一月便要入国联，又因国社党德国之胡为，取得协法协意兼协多脑河列国的地位，对

英关系也上了正轨，趋于好转，可以英国赞成他入国联为征象，然而这些好地位，可惜多是“道德的”。若此时与日本开火，这些日优的形势，都不足恃，都不是对俄有物质帮助的，至少在目前的局面之下。诚然这些形势都减少或至消除俄国西顾之忧，然而以俄国之对日的军事地理之不利，徒然减少西顾之忧是不行的。若再过些时，俄国日进佳境的国际关系比现在更进步了，对英的关系更好转了，对美的接洽更密切了，岂不是转于日本为不利或不便？日本何必等着看此转变？日本既看到俄国的内政外交只有日好，俄国在远东的准备只有日固，则与其晚打，何如早击呢？

四、美国的外交照例有些幼稚性，常有一种举动，在欧洲外交的习惯看来莫名其妙。然而美国更有其自负处，比了不列颠帝国来，绝不是肯轻易下台的，而且有他的太平洋的想象，有他的自尊的理想。前者罗斯福竟能急剧的承认苏联，不能不说是深切认识太平洋形势严重之高妙手段，目前之调侦察舰队根据地到太平洋上，又是显然表示其“未尝无备”的态度。照这样的趋势演进，加以日美关系之不能松缓（事实上有根本的矛盾不能松缓），海军会议之必无结果，我们实在看不出美日两国如何有根本协调之可能。美国人因其性情之比较的自恃自大，并其政治之为民主，在动作上不能不迟缓。为日本人设想，与其对俄作战，在海军会议失败以后，显然可为俄国增加与国之时，何如此时早施打击于俄国，因为此时只是美国开始缓缓准备的日子。

五、英国对日的关系最是自成矛盾的。以经济论，日本是他最大的敌人，日本若更得势，英国之必尽失远东及南洋贸易大权，只成时日的问题，而且目前已经逼得很紧了。然若以国际政治论，日本独霸亚东固是英国所深怕的，若俄国独霸亚东，英国岂不觉得更糟呢？即退一步言，美国独霸亚东又岂是英国人之所好？日本人看透这一层，所以拉拢英国是他最要紧的侵略世界之步骤。英国人自然决不会上日本的当，不过同时也决无帮俄打日

本之理。所以目下日本对俄开火，不必算英国为俄打帮架在账里，也许英国对日转能表示善意的中立哩。

综合以上所说的形势一看，日本不欲打俄国则已，若欲打俄国，此时不能算一个对日不利的时候，大约以后更无更利的时候。这还是就情理推测（单就目下的局面推测，不管将来因横生枝节而出之变化），若由日本军人之狂焰凶欲，更不必管到这许多。按以目前之情势，度以日本之暴欲，日本之对俄作狞状，不特不能算做只是为中东路的买卖之促成，并且大可看做是存心掀起大战来的初步。所有稍有和缓字句的外交辞令（对俄以外的）还不只是贻大恶的责任于人之把戏，哪里值得重视？况且就中东路的争执论，所差不过四千万元，而所谓中东路上苏俄职员之共产行为恰恰不早不晚的出现于中东路谈判决裂之后，更是不值一哂的笑话了。

至于俄国的态度如何，颇难料定。俄国吃亏处只是地理的形势，不然，日本人又焉敢如此欺侮他。不过这个地理的形势实在太不利了。俄国只能以运用不灵的一臂（孤悬在一条横穿两洲之西伯利亚铁路以外之远东领土）当日本的全身，这样子的对当是太不均称的。所以为俄国计，除非目下拉上一个强大有效的国家帮他，这仗是以不打为妙，而拉上一个强大有效的国家帮他在目前为不可能。俄国是最会认识实际政治的国家，又是最会说大话的国家，若他觉得不上算，大可立时退步，而高谈一阵维持世界和平的话。没有一个国家能有他这样的实惠，“不要脸”（这在国际新斗争上不是一个坏名词），所以俄国没有什么不能退步。

不过这话还是照经常的步骤论。若此时两军隔界而布防，炮火对演而相闻，果然碰到好事的指挥官之下，随时可以成一个局部的接触。准以日本军人在东北得志后火上加油的凶焰，这样专以自动惹事为天职的将校必不少，而防卫的红军一旦受迫害，平日是有严整的军事及政治训练之部队，又不曾学习过“无抵抗主义”，也不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势必出于应战。到那时节，

苏联不是“酷爱和平”的中国能一朝撤防一千里的，一切也就不由自主了。

所以我以为最近日俄冲突之可能扩大。

我这段小文中颇谓此时俄日若作战，俄国的形势颇差：但是这话并不能作为我以为日本要战胜。恰恰相反，我以为日本虽可小胜于前，还当终败于后。此意及我主张中国对此应如何自处的意思，留待下周讨论。

（原载1934年9月2日《独立评论》第一一六号）

青年失业问题

今年暑假中，有若干北平各大学的毕业生发起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在北平南京两地呼号奔走，很引起社会及政府之注意。于是教育部宣布将成立学术工作咨询处，而报纸上也看到有意义的建议。其实，青年失业问题之迫切，不自今年起，前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出路上已大显不景气，去年尤甚，今年自然更甚。这本是一个全中国政治的社会的组织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身并没有治本方法。不过这个问题实在是严重不过的，大家应该认识他的由来，并斟向治标治本上走的路径。

先说这个普遍事件之原因。一个国家，若不长在疆土的或经济的扩张进程之下，而人口是历年增加的，自然都有失业渐多的毛病。这是过分普遍的考量，姑且不论，单说说较切近的。

第一，世界的不景气，已经深入中国内地了。中国内地情形本是没法统计的，然大都市是内地的象征，若能分解大都市之萧条，内地没落的景象立刻见到。举一例：几年前，上海地皮之无理的涨价，是资本不能入内地的象征，一年半以来之极转跌价，且无市场，是内地不能销货出货，因而全部商业萧条，买地皮者锐减之明确表示。都会如此，内地如此，以前吸收之青年尚须步步退出，焉能够多量吸收新的？

第二，三年来“日蹙国百里”的事实大大减少青年出路的销场。东北四省向来是大量吸收平津各大学毕业生的，东北籍者不待说，即北方籍者也很多，南方籍者也不算少。现在辽疆万里，

一齐沦没，在异族统治之下，东北有志青年尚须向关内托身立命。

第三，几年来比较的政治安定也是使青年少出路的一个原因。这话听来好像不伦，其实很平常的。在政治不安定的状态中，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堆上台一堆下，这是北廷自凶袁死后的现象。这样紊乱，诚然增加政治之纠纷，社会之苦恼，然贫士失业却为此减少。我不是在这里提倡以政治不安定为解决青年出路之方法，政治不安定虽然能以换班的方式为青年找到短期的工作，但总账算来更是不了，这道理是人人皆知的。我只是在这里想提一件事实：几年来的政治安定，使得一堆人永远占着地盘，同时更有一大堆人永远不得地盘。在地盘中与在地盘外者，若不是截然能分优劣，岂不是相形之下而生不平，因不平而生紊乱，以至社会危机？

第四，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登庸人士：无论在立法上或人选上，都去妥善甚远，而失职之感，更觉亲切，不平之鸣，助以忿怒。政府抬举出此无聊人，则一切无聊人皆望抬举。所有之位置每为不称职者占据，则有才力者不得其位。以中央论，果真没有一个整个大衙门，全无作用的吗？若干技术的位置，不曾为非技术的人所占据吗？以地方论，假如有一个地方，表面上像是说部包文正的天下，实际上乃是护兵马弁的世界，还能多量容纳进步的青年吗？这样情形，就政府的作用而论自然是有亏职守，就在青年的影响论，简直是毁坏青年，因为这样真能增加他的欲望，激动他的牢骚，诱引他的不安。请看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得到四五十元的月薪便不屑为，得到百元左右的职业，便恒常不平，得到百五十元的事做，也还要以为过渡，他们看见饭桶滚滚登台省，废物滔滔满郎署，除非大圣人，那里还能隐身作政界的修道士？

第五，至于多年来教育之不济，诚然也为青年失业加一章，但这个实在是质的问题，而非量或类的问题。试一考查全国历年

来大学高中及专科毕业生人数，而与中国人口作一比较，便知吸收量不应已经饱和。即专就文法科而论，文科的销路当为教师及其他用文墨的人，然今日文科中绝缺少良好教师，法科之销路当为法官及律师（专就法律一科说），然今日够法官之训练者实在太少了，故不得不降格任用。果然今日将此一行杜绝，自今以后文法科之职业皆为今日已出世之文法科人占据，国家社会是要大大受累的。然今日教育之不幸，仍为质的问题。无论那一科，若都是办的乱糟糟的，自然都要再办，都要改向好处办。无论那一行，若不是办得不合社会需要的，自然都要改向切合社会需要上办。政府对此事之注意点，应该是废止不能自己占着的学校或学科，严切的改进差可占着的学校或学科，若理想的对科别有成见，则工农科虽多了，恐怕只是增加工农科的失业者而已。

总括以上青年失业之各原因，而求补救之路，则我要预先声明者，即此问题非一个独立的问题，故根本上非可独立解决者。国民经济是有总量的，在今天，求能不退步，便是好事，高谈增益恐是画饼。若国民经济不能为实质的增加，徒然增加职业，无异为奄奄一息之国增加些不生产的担负，更是不妥的。所以我的意见是：青年失业问题之根本解决，要待政治与社会问题之普泛解决，而此问题之相当解决可以政治力量行之。果能做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失业者可以向下一层而求安，然职业之总数一样，也足以减少乃至消灭此现象之严重结果。现在列举四项办法。

第一，要严格澄清公务人员。从最浅的一步说，假如说院部会自然科以上略加以严格的淘汰，地方官自县属的局长以上都以正途出身及资格用人，不特好的青年机会无限，即政治技能也要进步十倍了。更进一步说，国家的铨叙制度若能改得顾全实际，不作若干不可能的限制，一面对一切分门别类的职官，都索求本门本类的确实资格，而不用极普遍不着边的资格限制作铨选，则立时要有好些阔官的亲戚走出郎署，若干无一能而无不能之官僚

归于淘汰。请以德国论，自帝制至今，政府经过好几次大变了，但这不是政权之转移，政治技能之运用确永远在一辈“专家郎官”所谓 Geheimrathen 手里，所以才能够政变而事不变，近代式政府之作长久保持。若铨选制度能为国家造成此种技能，乃算是对国家尽职的，因此而有才力青年多有出路更其余事而已。

第二，要改变了考试政策。现在的考试政策似乎是是抄科举制度。在前朝，社会组织简单，政治之运用以消极为上，那样的科举制度，虽说考的科目不对，而由此一路登庸官吏，大致是不错的。近代的社会是分职而各求其精的社会，因而近代国家不是当年的原形质，因而当年以登庸官吏为考试惟一目的之制度绝不适用于现在。现在的国家，对社会负鉴定一切人员的责任，所以现代的考试最重要者，是为国家考医师，考工程师，考律师等等，若考得合法，即是为职业的社会作骨干的工作，也是为才力的青年找非官吏的出路。使青年眼巴巴的直看到做公务员一条路上，是为青年杜职业之路。

第三，自高中以上的学校，要训练并诱掖学生反乡间去的一条路。自清末办新教育，似乎都忽略了乡间的背景。中国之大都会虽然近年很发达，但中国之基础仍是在乡间，虽然政府之财政基础是在上海。教育若老是向这个方向走，实在无异于老是为国家制造外国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到内地者，不是做小官，便是做中学教员。本来中国内地没有多少职业，这情形也不足怪。然大学高中之都市生活习气，实足以杜绝向内地发展之路，但能政治少许安定，内地之可服务的机会要增加，这一条是要奋斗着开辟的。而这一条苦路的诱掖及训练，还是政府的责任。

第四，教育当局应该把大学及专科学校之量的方面相当缩小，而于其质的方面力求提高。就失业者一方面说，失业而有用之人固不得了，失业而无用之人尤不得了。失业而有用，犹可以寻得职业而补救之，失业而无用可怎么办？就社会一方面说，无用而得职者可恨，无用而失业者可怜，可怜可恨虽不同，其为国

家之无谓负担则一样。现在之大学毕业及非大学毕业青年及非青年之中，失业者固滔滔遍天下，有专门人才而失业者可占其几成？然则政府及社会纵能广设职业，犹不免多失业，这一点是这个问题的最严重的一点了。北廷的教育部对私立大学的设置是漫无约束的，南京的教育部有立案之办法，真是大进步了，然私立学校立案后之考察，国立学校上轨道之维护，都是要永远不断的。有些个所谓大学，尤其是在南方，以财力以人力论，每不够一个好好中学的凭借，若听其永远的制造毕业生，自是足以增加青年失业的。所以我希望教育部能把人力财力不及的学校，不论官私，改做别一阶级的学校，使其与人力财力相称，而国立大学也要集中力量于科门中，免得永远有个出产不易救济的青年之漏洞。

以上所说，都不是就为青年开出路说的，而只是在现有的情势之下，以分配之公平，作青年失业之调剂。这虽是浅肤的办法，然而做到已经大不容易了！

（原载1934年9月30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4年10月8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四十期）

政府与提倡道德

政府应该不应该利用他的特殊凭借，去提倡他所认为道德的，本是一件向来有争论的事。除去极端的自由论者和宗法主义的国家，大约都取一种中间之路。不过，在欧洲的这个争执是有一个明显的体态的，即是政治与宗教之关系，即二者之间之分合的程度，在中国则以本无所谓“建置的教会”及宗教义法之故，所以凡是政府所提倡的道德，每每不外下列两事：其一，宗法时代的仪文及其相关连物事；其二，法律所应当制裁而在中国则不能制裁的，转去乞灵于所谓道德。就前一项看，每似无知之表见，就后一项看，更觉无聊了。所以自民国成立以来，每次政府在那里制礼作乐，太息于世道人心之日下，而以一纸空文提倡道德，不特在正面所得结果直等于零，且在旁面适足以助成伪善与虚饰之增长而已。

政治责任与道德本是一个大题目，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我不能将纲领说得明白。现在但举出几点来讨论。

第一，近代国家决不能以宗法主义为建设国家组织社会之大原则。故凡宗法制度下所谓道德之崩溃，每是新时代之国家新时代之经济所形成，正不必过为忧虑。在这些地方，政府只好任时代之自然演进。例如女子的贞操，本可不必成为道德问题，其所以成为道德问题者，本是男权社会所造就。这件“道德”，要依女子的经济地位之变动逐渐改化的。又如子女对于父母之独立性，近二十年来在都市大大改变了，在乡村尚不会有实质的改

变。这个对应，明显的经济变动为道德变动之原因。道德变动之类乎此者，既非政府的力量所能左右，更非具有近代社会学知识者所应痛心。

第二，所谓公德与私德之分，本是一个绝对不通的流行观念。设如所谓德者，其作用不及于本人一身之外，这简直和一个人的饮食衣服居处的习惯一样，只要不扰乱到别人，便只是他个人的僻性，其中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设如所谓德者，其作用固及于本人一身之外，这便是与公众有关的事了，这便是公德了。以前的中国社会，本以家族为组织单位，所谓国家者，不过是运用征服权能之上层绳索，所以在家庭中之孝悌，在朋友间之忠信，是道德系统之重心，而为公忘私，为国忘己，虽为一般作道德论者所提倡，且为不少理想家所实践，终不成为民众心理上道德之重心。所以损己服公，在西方富有国民训练的民族中，行之甚易，而损公益己，在我们这样缺少家族以外之锻炼之社会中，改之甚难。我们所缺少者，是近代国民之必要的公德素养，包括着为国家送自己的性命在内。认清这一点，则政府与其费许多的唇舌，提倡些社会习俗中的道德，毋宁利用政治的及法律的权能，陶冶国民的公德。这话即等于去说，用政治摒斥一切危害公德的，用法律干涉一切破坏公德的。欧美先进国家之国民训练，本是经过一个长期的政治与法律的陶冶，陶冶既成，才能够以畏法为向义之门，以服公为克己之路。

即如"礼义廉耻"的口号，在上位者登高一呼，自然有无量在下位者四面一应。应自应，而无礼、不义，鲜廉，寡耻，未必不一一仍旧。尤其大的患害是，一般原来鲜廉寡耻者，作此等呼号不已，仿佛托庇在这呼号之下，仿佛他也不算真的鲜廉寡耻者，这真不啻为此辈添一层护符。所以在位者若真的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而摒弃之。古来有句格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教书匠的作用还是如此，何况运用

政治之权能者？政府若真的想提倡德义，只好先作一个澄清自己的榜样，也只须这么一个榜样，就够了。

第三，中国人所缺乏者，是国民训练，不是抽象道德名词。抽象道德名词有时自然也很有用处，抽象名词之训练，自然也可在千百个口头禅中得到什一之忠实信行者。但这个究竟不能普及于大众，且在训练有效时分意识上总带些意气性，在躬行上不易于有方法。即如宋明晚年之理学，正是一个抽象道德观念之训练，其效力固能使若干理想家为民族牺牲性命。然而究竟与大众差少相干，而且这些理想家在举动上又是乱来的。现在不需要过于凌空的东西，而绝对需要坚实的普遍的国民训练，不需要道德的口号，而需要以法律及政治“纳民于轨物”之劳作。

请先谈法律。古来所谓刑礼之不合，本是一种社会的畸形现象，而主张刑礼异趋者，又每是些懒用逻辑的竖儒。柳宗元见得透彻，他说：“其本则合，其用则异”。看他那篇驳复仇议之所论，真能一扫礼刑二元论者之误谬。然则政府若果在人民的道德上有兴趣，正应以法律陶冶民德。在立法上固应引进若干反宗法部落的、公民契约论的近代思想（这层颇能办到些），在执法上尤应养成服公从义的习惯，是是非非的良心（这层上却毫无成绩）。须知法律即是秩序，即是训练，这是自罗马以来一切有成的国家的标准。国民的训练者不是元首，不是辅相，不是大将军，而是公正的法官，这是英、美、法、德诸国的历史事实。若凭借法律的陶冶，将来的中国人公心发达，能做到“其子攘羊而父证之”，中国乃真的超越苏拉时代的罗马，而是一个十足的近代国家了。

请再谈政治在陶冶民德上的效能。孟子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这话在现在看来自然太简单些，然凭借居高临下的地位者，时机好，运用巧，有时真能移转风气。不过，若想行得通，必先自己做个榜样，即孟子所谓“帅天下”，决没有自己向东，劝人向西，而人肯听的。现在若以政治的力量提倡民德，真有好多事可以做，爱国心，服务

心，廉洁的行谊，忧勤的劳作，一切等等，数不尽的。只是这些好东西又都不是空口劝人便能做到的，必须自己立个榜样。以我所见，自北平至南京，是不是有开代的气象，我愧不敢说。我只见天下熙熙，天下攘攘，若不想到国难之深，民困之极，只见到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员应酬之繁，外宾招待之周，不相干的事计划的得意，也真够太平景象了。如此的政治的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如果一面如此"帅天下"，一面又以制礼作乐，昭显德化，我恐所增进者，只是伪善与乡愿，希意与承旨，所没落者，转是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耳。

（原载1934年11月25日《大公报》星期论文）

1935 年

“中日亲善”??!!

最近两个月真是“中日亲善”论最走运的时代。也许这个理论与行为在将来更时髦，更成国是，更不得了，本未可知，不过在现在走运到这个田地，已够使人忧心如煎的了。仿佛这番热闹恰是为纪念“一·二八”的第三周年！这真是历史上的最惨酷的幽默。

蒋委员长的两次对记者谈话，第一次之末了一笔及第二次之全旨都还使人满意，却还不忘国民党之革命立场。不过这些话或嫌空洞些，或者这也有不得已处，然而对外国人是不可虚与委蛇的，是要把明白的话说在头里的。中日国交之失常全在日本，全不在中国，欲更改局面，须得日本一反其自“九一八”以来之行动。在日本易如反掌，在中国无从为力，排日并无此事实，东北必须还中国。

汪精卫先生在中政会的演说词诚是一篇花团锦簇的文字，非善于辞令如汪先生者莫辩。至于其含义呢？则《大公报》有一段隽永的评语，以为此是中日通商以来数十年间最亲善的论调！并且假设汪先生若发此言于“九一八”以前，不愧为特识独见，而今言之恨晚！（原文不在手边，姑凭记忆。）外交官说空话，在相当范围内本亦无不可，与广田作竹枝词式之唱和，也未尝不可，不过汪先生在这段文章里有两个漏洞。第一，广田的空腔中有实件，汪先生的诚心上皆空谈。广田说些好听话，而归本于要求中国取消排日（这在今日本是见鬼的话，未免太看重中国人了）。

汪先生何不也说些好听话，而归本于要求日本退还东北？如此乃是虚对虚，实对实。今也徒作一篇颂圣论，只是为一鼓气尔。第二，中国的外交立场，应该建设在列邦平等、东西同仁的原则上，绝不容许偏亲日本。因为偏亲一个弱邻，固有不利之嫌，而偏亲一个强邻，尤有望风归顺之弊。而且远东又不止中日两国，美俄英有同样的利害关系，中国与英与俄也都是壤地相连的，与美国也只一水相隔，现在水是通道不是隔人的。自"九一八"以来，日本对世界之妄暴理论，皆以自居东亚主人翁为出发点，而要求其在东亚有特殊立地，对中国有特权威权。这是中国的绝不当承认一丝毫的，中国只能承认大家一样。今汪先生之议论，谓赞扬中国与日本之特别亲密关系，似乎已渐诱到日本理论之道路上。我不免害怕！汪先生之又聪又明，且亲且和之态度，诚是其不可及处，亦是其政治上有力量之一因，不过，国际间的情景与国内不同，说话还是自己防卫一下子才好。无须乎过量的客客气气。

至于王宠惠博士之东渡攀亲善，诚不免令人齿冷。最妙的是昨天日本电通社的消息，他在看了些沈阳事变的罪魁祸首之后，重光葵饯别他，请的陪客是"满洲帝国驻日大使丁士源"！丁士源与王宠惠，同是英国老留学生，同服官历家于北京政府，直到张作霖时代的，想来总有相当熟识。今日同席于重光之堂，论此时东向怀"德"之情景，并非申包胥、伍子胥之异趋而走秦吴，想当年北庭作宦之往迹，或有诸葛瑾、诸葛亮之同气而别吴蜀。岂非东庭服远之佳话欤？若有书呆子以为这是王公自己跑去取辱，乃真是浅人不足以话深！夫王公之生平，《大公报》"巧宦"之评可以不待盖棺便足论定。据中国传统的训诂学，宦者买卖也；巧宦者，善运虚无于买卖也。在当年王公能一面列位北庭，一面犹不失为国民党人，又何怪乎此日逢闲回国，第一着是说粤，第二着是和戎。登陇首而左右望，此日行情，盖无过于此两市者也。如此看去，此人此事正与中日关系不相干，且不去论此罢了。

言归正传。在高谈中日关系之前，有几件不可忽略的事实。

第一，除非日本人改变其对东北之态度，中日亲善绝不可能。按伪国之作用是使中日两国万万不能"尔无诈，我为虞"的，伪逆的组织存在一日，则中国受暴之创痕日日新，又日新，中国人既不应忘情于三千万亡国之同胞，尤不能放心此个丑极的危险分子。

第二，中国此时并无可注意的排日之事实，所以日本人之借口适足以显其不可测之心肝。此日中国之全国委靡，是中外共见的。在此情景之下，有志气的中国人，正当恨我们之不长进，具耳目之日本人，岂不见到这个普遍的事实。然而犹以此为言者，还不是明明坐人以罪，这算有诚意吗？在这种气焰态度之下，能有公平的来往么？《水浒》上记林冲被狱吏拷打，林冲问他自己犯了什么罪，狱吏说，你坐着也是罪，站着也是罪，醒着也是罪，睡着也是罪，一弯腰一挤眼都是罪。这岂不是此日现状的描写？伪国的事件姑不论，且看福建与河北非武装区的情景，治安之不易维持，社会之大成紊乱，谁实为之？谁令致之？此皆现实，乃舍而不谈，反说中国排日。难道中国政府能虚造几件排日的案件而惩办之，以应日本之要求吗？

第三，"中日经济提携"一路乃是中国灭亡之速路。凡是两国的经济提携，必须在实际上互惠，在原则上平等然后可，否则只是大并小，本邦对殖民地的关系。日本是一个近代化的工业国家，中国是一个生产落后、农村破产的国家。若中国不给日本以特惠，当然无所谓提携；若给以特惠，无非是使日本的工艺品进口得容易，使中国的原料品出口得便宜。关税已自主了，乃又反到受束缚的地域。这乃真使日本工业不致萧条，中国工业无从起手，不久之后，日本将多量吸收中国资本，将为"东亚之工场"，中国将见都市随农村以俱破，永为万世一系之苦力国民。这真不待征服，先已灭亡了。而且抽象之谈还不亲切，目下正有具体榜样在那里。所谓"日满经济合作"是怎样一回事，则"日华经济

提携”也就可想而见了。所以“中日经济提携”之口号，只是要求中国做第二个“满洲国”。军部既建功于白山黑水间，以炫其国人，文官见猎心喜，更思不战而克人之朝廷也。

第四，广田非币原之比，论其背景煞是可疑。币原之背景为财阀与立宪政治，其政治思想又较近英美式，故西向兼并如东北事变之行为，在彼以为非事其国家之正道，乃有与中国和善之诚心。当时之外交部长王正廷君昏然无知，致使机会错过。至于广田，本属于玄洋社一派，玄洋社之行动，及其对中国之存心，是留心日本事情的人所知道的（参看刘叔雅先生之《日本侵略中国之发动机》，载《独立评论》第十九、第二十两号，这是一篇值得国人永久注意的好文章）。中国若干革命志士被这一派人愚弄得不在少数了，即如头山满翁，他诚然帮助中国的革命党，然而最终目的总是为日本建业，为明治求归服者。此中故事我也听了不少，此地来不及说。总之，上当不是一次，不便再上大当了。去年春间，日本外务省官宣言，西洋各国不得问中国事，助中国政府，俨然封中国为日本保护国。于是惹起全世界的责难，日外务省只得取消。这样宣言，固是广田任内的事，而此番日议会开会，广田回答质问，固明明声称日本对华方针仍不改变那个宣言的道路。然则广田的空话尽管好听，广田所要求于中国者之实际条件，若拿出来，或者不免骇世界了。

第五，我们的政府不要忘我们此日不立即为日本人吞灭者，既不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也不由于日本人的“仁慈”，乃是由于中国之国际均势，虽动摇却并未扫地，虽在变化中却并未寿终正寝。果真在中国的国际均势扫地以尽，日本人会立刻来大规模的杀戮我们同胞，灭亡我们国家的。所有一切“共存共荣”、“东亚同种共济”欺人之谈，真是一套至无聊的口头禅，其行为早已证明此等口头禅全是其用心之反面。中国在国际均势之下生存了如此多年，华盛顿会议更给中国一个安息，果使我们善于利用那形势，不是没有图强的机会。不幸我们只是勇于内战，昏然无知，

屡次的警告不注意，直到"九一八"日本人攻陷沈阳，然后此华盛顿之一章转入另一章。不过，日本虽以暴力摧毁《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终不敢一举而全部否认之，列强亦始终未曾承认其举动为合法。所以占了沈阳长春之后，不敢立即用兵北满；用兵北满之后，不敢立即侵扰关内；侵扰关内之后，不敢立即入北京城。日军之屯兵于通州以外，岂是黄郛的《塘沽协定》所能停止的？日本人到底还是怕西洋人，所以才不长驱直入，黄郛的《塘沽协定》只是为日本人作个最荣誉的场面罢了。若是日本人无所畏惧于西洋各国，他定要立即请中国的驻外使节下旗回国；若是他们真的自觉着有力量抵抗英美，便没有广田的这一套把戏；若是他们真的自信再进扰华北仍不起世界的波澜，他们当然早就上下一心的把华北伪国组织成了。英美的接近越可能，广田的外交花样越翻新；美国的海军越增加，日本的和美议论越向上。果真日本真是敢于对世界作战的，内田的焦土外交何以不即成为国是，而易以广田之曲线外交？然则中国今日仍是存在于均势之下，只是此时之均势大不稳当，故此时中国之生存大感摇动耳。若以为均势真的已经全破了，乃真是荒谬糊涂之见。日本诚然向破坏此均势之道路上走，如其向中国之高谈亲善，便是他们这个工作之一，然而英美也正向维持此均势之道路上走，如其强化海军，谋互相接近，便是他们工作之二。

第六，"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此日中国外交路径之警告，当国之高贤与外交之当局都不便以十年来对付国内情事之态度应之临之。国内的事情，尽管今天翻雨，明日覆云，反共有先后，不抵抗有早迟，国家诚为此等无定河边之立场斫丧无量元气。究竟君子犹可豹变，看戏的国人本不计较的。然而在国际的事件上，全不能容许这样的随随便便，一言则铁案如山，回头则魔鬼在后。果真今日我国为日本所提携，提之于股上，携之于胯下，以后只能照此一路步步入地狱，想转身是再也不能的。所以随便应付的态度，敷衍客气的姿态，忘其所以之心理，应机则变的希

望，在此处是用不着的，一用则贻国家以莫大之害。

第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出代价便存在的，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不奋斗不牺牲便得自由的，设若我们的当局所努力只在政权之不移，那就不必谈下去了，如此用心，自然少一事好过多一事。设若他们未尝但为自己保全禄位计，而真的信他们自己之禄位不禄位正和国家之休戚为一事，也就不必谈下去了，如此设想，自然朕即国家。设若犹且觉得国家之存亡不即等于自身之升降——我深信今之当局在这一事上必能想得开的——则逢此生死关头，不必但做安闲的清梦，定要筹备爬山割股的工作。夫日本人之所以劫持我国者，岂不曰，“你若不从我，我便更闹，华北华南都可闹”。若骇于此语，怕有此事，不得不应承之，则其结果不做息夫人不止。看穿这一点，我们并不怕他闹，因为我们本是预备牺牲的，我们尤其欢迎他闹，因为他越多闹，世界上天明得越早些，则他不是技穷，便是自亡耳。若中国绝不准备牺牲，只有走朝鲜一条路，提携只是合邦之前一幕。若中国准备牺牲，看破他这一套，便得走比利时的一条路，生路是在死里出来的。

根据上列的认识，我希望政府当局在折冲此事上要取下列的立场：

一、绝不与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劈头告诉日本说：欲中日关系上常轨，必须先解决东北问题，其解决之法，便是中国最大限度所能承认的国联调查团建议，过此以往是不能办的。

二、日本必须立即停止其干涉“排日”之要求，因为中国此时并无排日之事实，而此口号大含干涉内政之嫌疑。

三、中国只能“一视同仁”，对列邦取一样之态度，绝不能加入任何地域关系的或经济的集团，这是独立国的尊严，也即是弱国的性命。

四、中国不要日本的任何帮助。若要外助时，当诉之于全世界。

至于秉政者之存心与行事，希望他们看破自己的隆杀与进

退，而努力于下列两路：

一、准备各种的变局，两国间的及世界的。

二、充实外交之机能，不使坐看驻甲国的使节不在任，驻乙国的使节不办事，驻丙国的使节不称职。自废其外交机用，是“九一八”前外交当局误国最大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原载1935年3月3、10日《独立评论》第一四〇、一四一号）

一夕杂感

现在中国的祸害又多又大，真个不得了到极度。外患之迫切，经济之崩溃，（下略）天灾之大，仿佛老天有意要一举而灭这个“文明古国”样的。这样情景，诚然不得了，然这些事还都是今日之处境，不是自内部组织出来的毛病。设若政治力强固，人众有向心力，还不失于有为。纵使奋斗终归无成到底还可以奋斗一下子。无奈危害愈大，而内部愈散，这真不像事了。

今天不谈这些处境上的大患，只谈自身的几件大患。

第一件是政府机能之由散到更散，由弱到更弱。记得汪精卫先生初负行政责任时，实“奉命于危难之际”，一部分国人很热心的期望他，他的初步设施也颇引起一部分无派别者或不以派别为见识者之同情。当时不算不是争气的政府。虽淞沪退兵，和约签定，国人很少责备他，很多谅解他，因为那不是无步骤的总退却。前年春天再起之后，外交上的成绩固已天下共见，而政府情形，似乎使人觉得敷衍到所以然。诚然，政府的领袖不是全能，而在复杂的中国，尤不可于苛然责人。然而确有好些事，似乎不在政府的能力之外者，姑举几例。其一曰失人。即以外交官一项论，近年来所进退，为国人称道者，有郭泰祺之使英，张乃燕之罢任两件事。此外则我们看报与风闻，每有笑话，甚至自称公使的领事、馆员索薪的妙闻，都不见有何处置。而驻德刘使之免任，闻其事者，每每废然长思。聚集好些这一类的事，使人不免觉得：仕而不优，则大使公使；学而不优，则领事参事。此虽绝

不能说是全部的公例，然而果无此等的实例吗？试问如此情景，外交之效能能得几何？夫军事以自堕长城，外交又将尽废亭障乎？其二曰废官，即就北平政务会委员长说，其职守，当北方内政外交之大任，偏偏北方如此紧急，总不能算是闲曹吧？又该委员长黄郛氏，兼有内政部长之任，这一部也不能算是骈枝机关罢？然而他总是在山上以“养病闻于世”。设若政府承认他是真病，不能从公，应该立即免其本职兼职，另派人以重官守。设若觉得这些官职都可空悬，即当裁撤此项官职，以节国用。设若不承认他的病状，应该促其即日到职。照目前的状态，北平保持着一个会，南京推荐着一个部，虽晋朝清谈时代，无如此之放逸！现在全世界都无这个榜样，这榜样我不知是能增加邻国的敬重呢？或者发扬国人的志气呢？此外如官职之不当冗滥，用钱之必生全分效力，有公心的政府，振作的政府，虽在危乱的时候，也能办到的，只要不推诿责任，克服自我的观点门户的立场，便可大有为。政府不走上这一路，自然上上下下，一天比一天更无精打采的。国家局面已如此，势不容许我们无精打采多时了。假如有一个评论者，说我们此时的政务情形，叫做百官俱备一事鲜功，我们能说他全不对吗？凡此等等，振作改善，似乎颇多在政府权能之中，大可当仁不让。汪院长之为爱国者，之为君子的政治家，世人皆知想休养之后，必有一番大振作，一复数年前初任艰难时之朝气，更扩而充之，一改变两年来，国事内外没落之颓气，以慰国民之不坐待亡国者。事固有不由一人者，然非尽不由一人也。

第二件是无止境的退让。四年中，外交上之退步，敌上三十年，而数倍之不止，这两个月，又敌过最近四年。这样的加速度进行，深恐国家无如许多土地与主权供退让之用。前两期《大公报》上的星期评论中，丁文江、胡适之先生说完一段苏俄教训，我们借鉴于那一段故事，当知我们为国家之不亡，总要有不可退让的防线。这防线在中国，当然不是云贵希马拉耶山，也不能是

长江，因为就经济及天然论，华北乃是我们的乌拉山里海。况且列宁虽下那样的大决心，还是无济于事，苏联政权之延续与安定，是靠后来四方八面对各地伪政权，对波兰，对协约国，战斗出来的。然则列宁此举，与其谓为可法，无宁谓为可鉴。这段故事，乃郑重的指示我们，虽满和平，行事极端退让，终有逼到墙角上的可能。到那时候，拱手送头颅吗？且中国之被侵略，以百年的习惯而论，不仅割地而已，尤在不割地而夺主权。在这一点与苏俄创业时的情形大不同。我们总不能和平退让到把中国变成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保护国！不幸的很，似乎我们的当国者，并没有想好哪些可让，哪些不可让，一旦张皇起来，几乎充分表现给对方看，我们是无不可让的！且有些四边跑跑的人，或者还要走到头里，希意承旨，以弄出节外的文章！本来国家大事，靠见识勇敢与决断，不是靠些通来通去的走徒。处置得宜，靠预先计算好，不能专用临时穷对付方法。中国的情形，内外兼迫，本不堪再不和平。对政府的不恕道责备，本不应该。然鬼混的生活，无可不可的立场，是灭亡中国的捷径。国民党如不愿失其四十年的革命的立场，应当严定不可再让的界线以对国家，而廓清一切不负责的“消息灵通”者以对国民。

第三件我要说的大祸害是，走了几十年革命的道路，忽然失却自信，以成败论是非，乃慕东邻，以徘徊代努力，乃演复古。记得袁世凯将窃国时，一切御用议员，及进步党大众，要把“宪法”中弄上个“中华民国以孔子之道为立国修身大本”。当时国民党对此事断然排击，以为既不合民国之国体，又妨碍信教之自由。不意国民党执政数年之后，忽然尊起孔来了。同时又听说一种议论，以为东邻祀圣，中国不可不尊孔，真荒谬绝伦之谈。设若我们另有一个强邻，为我们提倡迷信推行毒品，难道我们政府也必须照样炮制，以博愚民之同情，以取黑籍之赞助！行一事要靠自己的见识，决不靠模仿别人的，祀孔不祀孔，另是一回事，学人家却是最无聊的。三十年中，中国因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乃

有辛亥革命之成功；受社会主义的动荡，乃有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建业，这一条路并未尝走错，且是历来环境所促成惟一可做之路。今日之贫弱，乃是自己在自己路上不振作之故。若不努力前征，反而徘徊歧路，事情必至更糟而后已。若看到东邻之一时富强，转而有心的或无形的回想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段文章上去，也是一种浅见。

历史形势之进展，本无所谓是非，只有可能与不可能之问题，适宜与不适宜之问题。中国与日本虽同居东亚，历史上的地位完全不同，这是世人共知的。到百年前，欧美人叩关时，两国虽也同一文化系中，即日本在中国之文化系中，两国的组织却完全不一样。日本当时可以“倒藩尊王”，中国当时却坐着一个“客帝”。日本始自封建状态中演化出来，易于组织，中国早以两千年之帝制而成“官国”；日本凭借其岛国之稳固，中国未尝忘其为文化之天朝，因此之故，其不能对欧洲文化同时作同样之反应，本是当然的。即使做同样的反应也决不能出同样的效果，又是必然的。清末，中国盛行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谈。以“客帝”之故，此体不能自固；以科举之积习，此用不能自用，结果是：“以中华之无质，饰西土之虚文。”（用我一位朋友的话）无论中学西学，都变成科举八股。思想之透辟者，见到中国之体非再造不可，不然，不能用西学之用，乃有累次的政治革命，一步跟一步的思想改革。这诚然是增加一时的纠纷，或者坐失赶先的地步，然而算起长久账来，只有如此才可以接受世界的共有人文，才可以洗刷清古世中世的劣迹，建造一个泱泱大国风，与全世界为徒。况且今天我们吃亏，还不是因为邻人能学来西洋文明之用，即工业与战术，故我们招架不着。若果邻人没有这些，纵有接触，还不是重演一回万历故事？“东亚文化大本”是不足以打倒我们的。如果东亚无文化则已，要有，也就是我们的，在这些地方，要分辨何者相干，何者不相干，何者必不能，何者为应然。

若以一时的兴旺为合于大道，也是一种成败论人的误谬。所谓“东亚”者，常有顿起之雄风，每为观国者发见其民族的优点。秦之起，蒙古之起，风头比今天所见者更大。孙卿子观风于秦，称其国而誉其政，以其百姓为古之民，无朋党比周，私而忘公之习。《黑鞑事略》之序蒙古，称其各种良朴之俗强国之政。六国人看秦，宋人看蒙古，强弱异形之处本来显然。经几阵上上下下，长存者还是我们这庞大的民族。在这一点上我们固不能从耶稣经上所说“只有弱者才能承有这个世界”，却也不能作一定义，以为惟有一时最强者能存在。因为天然淘汰之结果，只是适者生存，适者固多不是弱者，亦并不必是强者。古往今来，大抵能宽容多弹性者长存。兴之暴者，每每昙花一现。而再以西洋近事说，普鲁士统一北德意志诸邦之后，其突然之形势，国民勤勇之表现，科学之进步，真比现在崛起者还了不得，只缘他要“超于一切”，而不乐与世界上人共作天民，使他的大帝国不在了。凡是一种力以小谋大，想入非非之民族，未有不遭堕落者。

我说这些话，不是主张我们要照旧混沌着过日子，我们本是应该知道别人的长处，并学人的长处的，我是主张，别人的一朝之功，不足以摇动我们四十年革命的自信心，不足以担保将来之永远成功，尤不足以使我们心悦诚服而投降。

（原载1935年8月11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
1935年8月19日《国闻周报》十二卷卅二期）

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

意大利之殖民地掠夺计划引起国际联盟之大不安，本在人人意料之中，不过英国这样的支持《国联盟约》，为天下先，不能不说出于世界上多数人意料之外——包括墨索里尼在内。英国向以“不为天下先”为其国际政策，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挺身出马。世界上大事，常常不免为他这样老练态度所误。即如上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真到德军压比境前，他没有说过何等硬话。后来之论历史者，如英国自由党工党中若干学人，每以此归咎当时首相爱斯葵次，外长葛雷爵士。以为他们早些强硬表明态度，或者吓德国回去，大战可不在那事件上打起来。然而这次英国人的态度却是毫无犹豫毫无含蓄的表示出来，自大僧正至数百万工人，一致表示其良心不忍坐视强国凌灭弱国，而出于决计拥护《国联盟约》，不得已时援引制裁条文之主张。这岂不是“天下大变”吗？无怪墨索里尼不解，凡留心近年国联事件者，或者很多觉得英国此次拥护国联之出力，远在当东北事件及德国重整军备事件中所出力之上。今天报上登载伦敦的一个官样解释，谓在东北事件中如实行盟约，非有俄美在国联不可。不过，我们听说斯蒂生本有提议，是英国拒绝的，当时西门外长一切不振作的话，是天下共见的。又如今夏德国之单方面的撕毁《凡尔赛条约》之一章，法国大哗，英国不特没有积极的表示，反与德国订一个《海军协定》，墨索里尼本已够瞧的了，但还比希特勒高明得多，若非上文所说这些事件解放其忌惮，鼓励其勇气，他也未必爬到这

个绝顶之上，“骑虎难下”。所以如果竟为西伯里亚冒险，成就其小拿破仑之命运，未必不是大家捉弄成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也”。

因为这样，世界上众多的人和墨索里尼都疑心不列颠帝国别有私利在心中，不过借《国联盟约》的口号作招牌，于是意大利无数次的声明尊重英国利益。我们诚然知道，英国在亚比西尼亚有极重要的关切，在红海航路有决不舍去的志愿，在非洲整个是第一个霸权。但英国有维持其自身目前利益，不必费这样大的事，便又得到瓜分亚比西尼亚，得到查那湖便好了，何苦挺身出马，冒不可測之险——宁愿见欧洲以及世界大战呢？亚国与红海诚然是英国关心的，这样关心足以刺动英国民众的心理，足使英国当局不如西门在远东问题中之酣睡，本是自然的，但这些并不足为英国此次大振作的全部理由，或第一理由。

若知道英国的外交政策是改变了，则当知英国此次之势力拥护《国联盟约》并非欺人之谈。关于英国近年调理其外交政策之情形与此趋向之意义，可看蒋廷黻先生的《矛盾的欧洲》（见《独立评论》），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文字，在此时全国人都该看的。无东北事件，德国岂敢退盟；无东北事件及德国退盟，墨氏岂敢如此放肆？所以四国中军缩会之寿终正寝，国际形势之由坏到更坏，皆发端于东北事变，尤造根于东北事变之不能制裁。如当年的英国人已如今日之聪明，知道防患不可疏于事前；如当时的外长有艾顿贺尔二氏之远见，知道对国联立场之不许犹疑，一步放任后来之不可收拾，欧洲大势远东大势断不至坏到今天。记得西门不断的发其阴虚阳萎之“君子语言”后，忽一天艾顿在日内瓦作一演说，声明英国对伪国之立场。世上大起惊异，当时中国人犹不知艾顿为何如人也。问及蓝博森公使，始知其为少年英俊，具有事务的经历，久与蓝氏同僚。此后几年中，艾顿大显才抱，声誉飞腾。内阁改组，彼不任外长，国内外颇多惜之者。艾氏之顿起，正与英国多注意国联为一事，经验是能使英国聪明

的，这正是英国人的最大力量。英国人在现在是深切的知道，如现在再放国联决口一次，国联是不能维持了，大战中遗留的惟一值得维持的物事扫地以尽了，以后的国际情势便当全入一个极混乱极黑暗的局面了。

认明这一段过去事实的意义，今日国联虽遭空前之难端，却不能不同意于胡适之先生所称“国联的抬头”。在国联的抬头中，我们不能不一喜一惧。

所喜者有深浅二事。从浅的说起，国联既维持其《盟约》于非洲事件上，逻辑上无不维持其《盟约》在亚洲事件上之理。既维持其《盟约》于现争事件上，逻辑上无不维持其盟约于并未结束及快要来的事件上之理。诚然，一事有一事的特殊环境，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国联的《盟约》大抖一阵威风，其打穿的老虎再蒙以虎皮，总是于不无小补的。此情此景，国喻，不待多说。再说深的一面。中国人是一个趋时髦无定见的民族，各种国社主义是些抹杀近代文明还原到中世纪的主义。以中华之无质，摹东西之真野，于是几年中，中国若干利禄之徒及无意识的青年，也标榜一种法西斯蒂，这如肺痨病的人要打拳，目不识丁的小子要解决相对论一般！今日国联抬头，无论将来是不是世界大战，墨公因骑虎难下，他的“拿破仑运命”大约是决得的了。无论亚比西尼亚那一个“文明古国”要不要亡国，最先进的法西斯蒂是要惹起世界的反抗，必然塌台的了。最先进的塌台，继起者精神上不免短气，天之西角有缺，天之东角势将波及。果真今年倒一个，明年倒一个，后年倒一群，岂非世界之转机，人类之幸福？我不是一个乐观的自由论者，也不是一个自信而高兴的维多利亚朝人，因欧战后之世事变迁，我们还能相信当年的自由主义不加修改吗？但无论如何，倒车是不可开的，充分发挥性恶决不能达到性善的目的。列国如有其国社主义必有一场大战，人人舍其文化的陶冶必致人类的灭绝，至少也是强梁者之自行淘汰。果真世界近年的恶气，随国联抬头而一转，岂非大幸，我国的青年也将受

其时髦，或可借此澄清若干不洁之空气。

不过天下事决不如此简单，“兵，凶器；战，危事也”。一发难制，料不到的方向多着呢。果真兵连祸结，投机者得机，乘时者用时。以我们的情形，诚担不起两三个月的欧洲战事，遑论更长？想到这里，更不能不长想。此次国联重事之展开，对世界，对我们，最有益的，是制裁到了使用尚未使用的阶段，彼骑虎勇士蒙着虎的眼睛下来，或者初施制裁，局面便急转直下，重归安定。这不是做好梦，英法如果真的十分合作，这样局面不无希望。果迁延下去，谁也不了，而中国殆尤为甚。

中国一步一步的自误到现在，实在无路可走了，“无路便是路”，西洋有这一句成语。果真非死不可，自然要死得痛快些，荣誉些。我想国人必深在盼望，积年的累次误国者，不在最后大大的再误一下。

我想，我们对于此事应取下列的态度：

一　我们的同情都在亚比西尼亚方面，我们的称赞及帮助都归于积极支持《盟约》的英国人及其合作者。

二　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只尊信此事之口号，不必“心理分析”英国人之下意识，不当无知的诅咒国联，不可因东北事件待遇不同对此事灰心。

三　国联如表决制裁时，我们要投赞成制裁的票，决议之后，我们要诚意执行。

四　为执行国联决议，或为此事引起之新局面，我们有请世界“并案办理”之权。

（原载1935年10月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5年10月14日《国闻周报》十二卷四十期）

国联与中国

两星期前，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写了一篇《一喜一惧的国际形势》，在末尾一段中，申述我们中国在这一次国联趋于制裁意大利中应取之态度。到现在，过了两个星期，英法间的合作形势张弛不定，日内瓦的喜惧不一，所以国联到底走上实施制裁的路，或是以法国为梯子而意大利作一个所谓荣誉的下台，在中国的报纸还看不出头绪来。然而有几件事是很清楚的。

（一）英国既断然的站在国联的立点上，欧洲各小国除与意有特殊关系者以外（如阿尔巴尼亚，差不多是意大利的一个保护国），势必一致的如水之就下，拥护英国的立场。在这样形势之下，法国无论对意德接近如何顾虑，在大势上总要拖得走一条路去。

（二）意国自始声明尊重英国在红海及阿比西尼亚之利益，英国自始声明英国所争乃国联之机构与效用，不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以后局势无论如何演进，意国如不对国联立场尊重些，这事是下不了台的。所以国联必为此事“抬头”。

（三）英国这一次所以能领导国联会员国，所以能取得法国之赞助，由于她的表示态度断然决然，由于她准备着在必要时干一下，这是国联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局。以前大家想以道德的力量拥护国联，自应付“九一八”事变失效后，经好几年的光阴，有世间智慧的国家，知道非以实力拥护国联，国联是混不下去了。这个原则一旦树立，在后来国际形势上当然有重大影响的。

我以为，无论中国目下如何苦痛，无论“国联的抬头”如何“远水不济近渴”，我们的上下，总该深切注意国联形势之演转，而考虑自己的立场。

第一，我们对国联，切不可认他为发泄自己虚荣心的场所。诚然，在国联发泄虚荣心是些中等国及小国的习惯，一国应享的地位而不去争，也是外交官不尽责任。然若以为我们对国联只有虚荣心最关重要，我们与国联间的大事只在争得理事一席，却是荒谬绝伦的思想了。在我们对国联发脾气之前，我们要问，我们配比土耳其不配？配比阿比西尼亚不配？自己有国家而不能尽其对国家之职，自己有土地而不能尽其守卫之职，诚不堪为列国矜式！假如国联的理事国都如中国，国联立时完结！五年中，国际形势之推移，或者使公道的世人觉得，中国是国联的一个大担负！像意大利及其在同一道路上先进的国家，固足以危害国联，像中国这样的原形状态，亦足以危害国联。如果我们反躬自问一下，应该不重视理事一席。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一下，无论在如何情形之下，我们只应当在国联的原则上应接国联。能这样做，才能取得别人的尊敬；能这样做，才能为我们取得将来可能的帮忙。这次颜大使为争理事席不得而去，所发表的谈话，有“不再回日内瓦”之说，诚觉遗憾！几年中因中国受侵略事，颜大使在国联为中国奋斗，功在国家，不便以小事责之。然此等事亦并不小，将来关系甚大，诚盼君子之过能如日月之食！至于此时在国内诅咒国联，蔑视国联以及愤慨国联者，无论是办报的或政府中人，皆拾人之唾余，充分表显其绝对无知识而已。

第二，中国必须以国联的立场为立场，以应接国联。所谓国联的立场者只一句话，即“集体安全”。惟其是“集体安全”，所以不分远近，都有连锁关系。我们之视阿比西尼亚，不该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今天报上登载，我们政府决定，在实施制裁时，我们应该要顾及自国的特殊环境。我以为这话是有流弊的。凡是政府，在谋国时自当以自国的利益为其前提，而想到特殊环境，

这话是不消说的。不过，眼光要大些，认识要清些，何者为特殊环境，应该以实力及诚意克服之，不应该用以限制我们对国联应尽的义务。就中国此时的处境说，积极的履行对国联的责任，自有困难，然若求在将来或能为我们换得利益，此时不可不自己克服困难。若过分的顾到“特殊环境”，以致影响到履行国联决议时，在将来必成为我们最大的失策。试问制裁一事，本不容易，在实行上，谁不牺牲？奥国尚不能借口于特殊环境，而反对制裁，我们尚有何种“特殊环境”使我们削减国联决议？我以为在此事上，我们断乎不可畏惧，必须完全立在国联的立点上。国联决议，要各会员国拒入侵略国的货，我们应当立即不入侵略国的货。国联决议，要各会员国与侵略国断绝一切经济关系，我们应当立即执行，且不使侵略国的船入港。国联决议，要各会员国驱逐侵略国的一切人，我们应当立即驱逐，不论这人与中国有何关系。若在这样事情上都不卖气力，还想国联尊重我们吗？还想国联帮助我们吗？若说，中国年来政治上与意国有友情，且意相年来对中国时有仗义之言，不可不顾。则须知上一句话全然不必顾及，《春秋》所谓“大夫之交不越境”者，今日提倡尊孔之人，宁可不知而又不实行之！至于墨氏论远东之语，虽与其非洲政策背道而驰，我们也不须分析其心理，然以此等事与我们对国联的责任比，真鸿毛之与泰山，诚然不当在计虑之中。总而言之，我们要牺牲自己的“特殊环境”以履行对国联决议的责任，而不应该“注重”自己的“特殊环境”，以减少我们对国联的履行。

第三，若求以国联为机构，把我们放在“集体安全”中，既在常时不可不积极的尽我们的责任，如上文所说，尤应知道我们必须先作牺牲者才能盼望《盟约》之保障发生效力。远看比利时，近看阿比西尼亚，世上没有请人代劳的事，至于请人帮忙，要看自己的努力与一时的环境了。我以为中国这些年来，外交上之失败，每吃了内争时所养成的习惯的亏，我们这些年的内争，实在是一塌糊涂无是无非的。在这环境中，养成了些土产“政治

家"，这些"政治家"眼光不出几尺，又不好在常时做长工夫，只凭一时的变化方向为手法，且好以个人的爱憎为爱憎。这实在不是领导国家向正路的办法。譬如怨着说"国联瞧不起我们"，这话根本无意识！用这样四川军阀间相对的心理以临国际组合，是断乎不对的。我们现在不要管国联如何待我们，只要问我们如何待国联。不要问国联能不能在将来帮我们，只要求我们能为自己的生存先天下而吃苦。语短意长，读者幸体察之。

（原载1935年10月27日《独立评论》第一七四号）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这一句话怎么讲呢？原来二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说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据有高下不齐之文化。经过殷周两代的严格政治之约束，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之发展，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了。又凭政治的力量，“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自从秦汉之盛时算起，到现在二千多年，虽有时候因为外夷之侵入，南北分裂，也有时因为奸雄之割据，列国并立，然而这都是人力强的事实，都是违背物理的事实。一旦有适当的领袖，立时合为一家。北起朔漠，南至琼崖、交趾，西起流沙，东至鸡林、玄菟，这是天然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田园。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即如汉武帝，正在打击匈奴用气力的时候，便用一个匈奴俘虏做顾命大臣；在昭帝时，金日磾竟和霍光同辅朝政。到了现在，我们对前朝之旗籍毫无歧视，汉满之旧恨，随清朝之亡而消灭。这是何等超越平凡的胸襟！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

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于外族，或裂于

自身。在这时候，人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统。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一统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复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会上之捣乱分子，视之为败类，名之曰寇贼，有力则正之以典刑，无力则加之以消极的抵抗。

中国经辛亥年的革命，由帝制进为共和，一统的江山俨然不改。只可惜政治上不得领袖，被袁世凯遗留下些冤孽恶魔。北廷则打进打出速度赛过五季，四方则率土分崩，复杂超于十国。中山先生执大义以励国民，国民赴之，如水之就下。民国十五六年以来，以北方军阀之恶贯满盈，全国居然统一，平情而论，统一后之施政，何曾全是朝气，统一后之两次大战，尤其斫丧国家之元气。中年失望，自甘于颓废；青年失望，极端的左倾。即以我个人论，也是失望已极之人，逃身于不关世务之学，以求不闻不见者。然而在如此情势之下，仍然统一，在如此施政之下，全国之善良国民，仍然拥护中央政府者，岂不因为中华民族本是一体，前者以临时的阻力，偶呈极不自然的分裂现象，一朝水到渠成，谁能御之？所以这些年以来，我们老百姓的第一愿望是统一，第一要求是统一，最大的恐惧是不统一，最大的怨恨是对于破坏统一者。

这个心理有最近的两个事实明白表示出来，段芝泉先生本是北洋耆旧，论其个人，刚性高节，本可佩服，论其政治的贡献，则师心自用，纵容群下，《春秋》责备贤者，正不必为之讳。然自其避地南归之后，无论何种政治思想者，除共产党外，无不钦佩他，他居然是无疑的民国之元功，社会之三老。所有安福政绩，在国民心中一齐消账。至其最近“股东不同意”（见《益世报》）之表示，尤为社会上称道不已。又如阎百川先生，虽在北方有最老之资格，其人之勤俭朴诚，爱惜地方，尤为国人所称道，然其见识与办法，亦有多人不以为然，且有嘲笑之者，自从他毅然决然飞到南京去，全国人都另眼相看，以为此老毕竟高人

一筹，不待耕者有其田，他老先生已经有了全国人的心田！这种国民心理的转移，不是明白表示国人渴望国家不分裂吗？

然而这些天里，平津一带“空穴来风”，有所谓自治运动。若说这是民意，民在那里？若说这是社会上的事件，请问谁是出名领导的人？若问国人的心，他们只是希望统一，以便安居乐业。雇来的苦力不足为民众，租界上住着昔曾大量剥削人民后经天然淘汰之官僚军阀，不配算领袖，满街洒的黄纸条，都是匿名帖子！天下那里有不具名的政治运动？黑市上那里有正人？孔子有一句现成话，“将谁欺，欺天乎？”

所谓要求自治，虽然闻其声（黑路上的怪声）不见其人，而发挥其良心之主张，在平津者有教育界（宣言见上星期日《大公报》），其他各界虽未宣言，居心无二。这个宣言，初签名者数十人，到了第二天，几有千人，这才是民意的负责表示。宣言中指明这是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阴谋，这才是有识人民的明确认识！

我终不相信此间事情就此恶化下去了，因为此间地方最高当局宋商二公之人格与历史是国民信赖不疑的，就宋主任说，他是西北军中最忠实的将军，从冯焕章先生经过无数艰苦，不曾弃他，这地方最足以表显其忠心的气节。忠于主帅者，自易忠于国家，何况他的捍卫国家的勋绩，虽在妇人孺子，至今称道。就商主席说，他早年便是志士，后来在北方军阀罪恶贯盈的时代，他最先在绥远举义。至其卫国之功，正与宋公伯仲。所以我深信他们决无忽然改换其自身历史，堕于大海中之理，所以在此汹汹之局，我们穷学究尚在此地安心默祝国家多福！

不过，伪造民意，扰乱人心的各种阴谋，也是可虑的。负责当局，应以国家民族的立场，把背叛国家的败类，从严防范，尽法惩治！

（原载 1935 年 12 月 15 日《独立评论》第一八一号）

北方人民与国难

我是在学术教育界服务的。我是生长在黄河北岸，道地的北方人。在教育界服务的人，除去地方教育总是本地人居多数外，在大都会的高等教育及学术机关中，确是南方人居绝大多数的，我以一个北方人在这一个职业的社会中服务，实不曾感觉到受南方人的压迫。恰恰相反，我有好些最好的朋友是南方人。不错，我也常听到南方朋友笑话北方人，同时我尤其常听到北方人骂南方人，我自己尤其是一个好骂南方人的。其实这都是玩笑话。我常常引用蒲松龄“吴下只余半通，宜乎不足为害”的话，南方的朋友不以为忤。

我这样的经验是例外的呢，或是常规？是限于教育界的呢，或是不限？

我想，我这经验至少在教育界是普遍的，我从没听过说大学请教员要以地方为一种标准（或者邹鲁的中山大学除外）。教育界以外，自然比较落后，但严峻的省界偏见是很少有的。同一地方的人认识较熟，容易谈得通畅，容易拉拢交情，自然容易相交援引，但这只是一种地方观念，而非南方观念，这两件事是切不可混为一谈的。

在北洋军阀及东北军阀统治北京政府时代，似乎北方人的政治力量甚大。有所谓直系，所谓鲁系（分属直皖两系），所谓皖系（其中多数人的气味近于北方人）。自从民国十七年一度统一之后，中央政府在南京中央官吏的数目南方人比以前为多。于是

有些头脑简单或失了职业的北方人，大大抱怨起来，以为北方人受了南方人的压倒。

在分解这个情绪之前，我们要先声明，有两种人没有发言权：第一是剥削人民的军阀，第二是助军阀剥削，得分赃实惠的官僚政客。

我们北方人自己要想想，当北洋军人，无论是那一派把持政权的时候，我们北方人有什么贡献于国家人民？不消说，第一大贡献是内战，第二大贡献是搜括，第三大贡献是无耻的举动。把国家弄得七分八裂，然后国民党乘势而起。党军成功之易，与其谓为党军之优越，毋宁谓为对方之腐败。该请我们北方人平心想想，这样的历史值得留恋吗？他省的人物我不必说，我单说我们敝省山东。请问我们山东所出的“军事人物”：张宗昌、褚玉璞、张怀芝、王占元、孙传芳，那一位给我们省赚到面子？诚然这里边分量也不全一样，孙传芳还有他的长处，张宗昌真做到魔王下凡的程度，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山东人只有听到他们名字便惭愧。吴佩孚将军自然比这些人截然不同。若以人格及才气论，他自是希有的豪杰，然而以他的知识用他的方法，贡献给国家者是什么？说到这里，不必多说了，我们北方人除非为极不正当的私心所动，决不会恋恋于北洋时代的权势，尤不应该恋恋于北洋时代的涂炭生灵！

况且北洋时代的恶剧，并不是北方人独唱，大多数是南方人主谋，北方人尸其恶名而已，在北洋军阀时代，一切政客与官僚绝大多数是南方人，政局是他们操纵的，内战是他们煽动的，我们北方人到了今天，又何必独自包揽这个千秋万世之恶名！举例说：旧交通系多是广东人，新交通系多是苏浙人，安福系虽以安福胡同得名，巧得很，实在也是安徽福建人的合股公司。此外如政学系，根据地本在南方，如研究系，也是南方沿海各省的集团。诚然，北方也有些官僚政客，但这些大多是军阀的亲戚故旧，作用等于厮养，至于拨弄是非，鼓动政潮，北方人真不在

行，只好让南方人办了。然则到了今天，往日受人利用的北方人，又何苦分人之谤？

若说国民政府忽略了北方人，看轻了北方人，用南方人统制北方人，可真是神经过敏之谈了。请看事实。已陷四省不论，就塞北之察绥宁三省，黄河流域之鲁冀豫晋陕甘青七省说，为省政府主席者，有河南陕西两省是南方人，同时长江流域之安徽省，又以河南人为之主席。至于北方军队在中央军集团之下分驻长江流域者甚多，无所谓谁统制谁。以中央之官吏论，河北陕西两省人是很多的。若说多给北方人官做，多给北方军人以地盘，不算恭维北方人，尤其不算是看重北方土地人民，这话诚然不错。但我们要想，今日政府的施政，诚然不曾解放了北方人民的疾苦，挽救了北方地域的危难，然而对南方又何曾好些？安徽之频换主席，广东之横征暴敛，北方人还未受到。这是政府好不好的总问题，并不是政府偏重南方的问题，我们毫无证据政府曾经在何项大政上偏袒过南方。恰恰相反，南京有些领袖，时时觉得北方应该格外重视，如戴季陶院长即其一人。他的政论，我向不敢恭维，但他有一句话，我非常觉得有见地。他说，北方人若不起来担负政治上文化上之责任，中国无弘大之前途，政府若不能把北方人的同情唤起，政府终归失败。这不是戴先生一人的见解，见解确能代表南京的清流。什么边疆教育咧，发展西北咧，把好些个中央的文武学校建设或分置在北方咧，这两年来反对北平的各大学南迁咧（此项议论我听到很多），都是由这一个“重视北方”的心理中发出，诚然，这些举动收效多少，很难说，前三项尤其有大海中扔钱之势，然而这是见解之不济，不是居心之不良。他们好心好意，看见了错题目，找到了错人，诚然可错，但终不能抹杀他们的居心。北方人应该指示他们的更好的路，不当以为他们是陌上的人。

说到政府好不好，也是一句比较的话。比起我们的理想来，比起我们所见进步的近代文物昌明国家来，我们的政府很不好；

若是比起北洋时代的北京政府来，至少高明十倍！在那时候，政府的号令不出北京城，现在可以到云南。那时候预算案在报销之后起争执，现在有预算法规，并能实行。那时候政府所恃的逃军，现在中央有好些师颇近代化的劲旅。那时候政府只是古代式的衙门，现在的政府很办了些建设的工作。总而言之，那时候率土分崩，现在立着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且看那时候的中交停止兑现，是怎样一回事，现在的法币政策，又是怎么一回事，便可比政府力量之高下，及其近代见识了。

我说这些话，不是为政府辩护。若拿西欧各国的政府和我们的政府比，我们的政府真算不行透了，所以我们本当责备政府积极改善。然而若与北京政府比，真是进步得远了，一切称赞都是归于现在政府的。所以一切被淘汰的军阀官僚，现在对人民哪里还有发言权？

近年有两件事，颇使人怀疑政府不重视北方者，分述如下：

第一是今年初夏的河北事件，仓惶中无所不应，大有不爱此河北省一片土之势。这件事本是不能辩护的。但我们要想那时，南京的执政者以病的身体，惭的心理，误信些什么通的说话，以致乱了步法，政府正在“七擒孟获”的地方作所谓“安内”的工作，也并未发“割陇”的命令。诚然，这事弄到误了国家大事。若说他居心是轻视此一片土，决非平情之论，或者办交涉者如此料理，也有些苟且保全地方之意。我们诚当责备他以后再不可以如此，却不可因此与他决裂。

第二是所谓古物南迁，大有“不爱江山爱古物”之慨，这一件事因为我在教育界，听到的较清楚。当时及后来此类事之动议者，是主管的人，并不是政府。政府在后来是同意了。但在他同意之前，他得到了负责人的恳切建议。以当时的情景论，他若不搬，国人的责备必更大。况且古物搬与不搬，和疆土之守与不守，并不是一回事。在 1914 年欧战开始德军快到巴黎城下时，法国的政府南迁了，法国人并不以此为法国政府不作守土计划的

证据。古物不是炮台，并无国防价值，其保管者计划安全（空中的及陆地的），正是尽职的举动。难道我们可以说前年春天飞机队在北平城上表演时，纷纷南走的各人家，都是不爱国的吗？他们比起因土豪的地位作自治的想头者，心地清白得多呢！

归结此篇敬请我们北方中国人认清下列几点：

一、我们的处境已是站在全国家全民族最前线上的奋斗者，我们的中心要长存，我们的志气要永在。

二、我们只有在整个的国家民族中才能谋生存，我们一分裂便是俎上的鱼肉！

三、这时候，在此间空气中掩护着攻击政府，至少也是没出息。责备政府的话要到南京去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四、这时候，这环境，说话不留意，极易为人利用，所以要小心，要顾大体。应知“自治”之说，现在做来，徒得“外治”之结果，此皆天下共知。难道亡国是“自决”的归宿？别有用心者，不足与谈。看不清楚者，要想一想。

北方虽然比南方受外族统制的时间更长些，但北方人并不是不争气的。亡国时之斗争，兴国前之革命，我们都积极参加的！明末，南都派了两位入燕使臣，正使左懋第，北人，终完大节，副使陈弘范，南人，反而做了汉奸！这类的事应是我们北方人牢牢记着的荣誉！我们爱国的志气应该比南人更抖起来！

（原载 1935 年 12 月 15 日《独立评论》第一八一号）

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

现在流行关于行政之理论有两件呼叫得最响最高的，一件是所谓中央与地方之分权，一件是所谓行政效率。我以为这两件都不是什么有逻辑性的问题，在分解之后，或者问题先已不能存在，遑论他的答案？

现在的中国和帝政专制时代的中国一样是没有地方的。因为地方官吏都是任命于中央，即是在理论上，解免系于中央，这些地方官是对中央负责，不是对地方负责的。中国并没有民选的市长，如法德；没有民选的省长，如美国；没有民选的县参事会，如英国。所以在中国（至少在理论上）中央与“地方”之争仍是一家之事，并不真是中央与地方之争。譬如大唐天子调度不了他的河北山东节度使，只好对他们加官进禄，这却算不得分权于地方。如这样的事，本是所谓“割据”。这名词虽不好听只是事实可惜如此，也只是依事实定方案了。对付这样事实的方案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从最文的说起，先把中央的机能造得完善了，不怕他不来朝奉土。用句古典，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再就最粗的说，便是用兵力来纠正。用句古典，所谓“一条棍棒等身齐，打得来四百坐军州都姓赵”。在这两极端中间，自然还有无数的法子，而其适用与否则在乎当前之形势。不过，实际问题既是如此，而避此则谈中央与地方分权，似乎未必能弭此日之内祸罢？

说到增加行政效率，似乎也有把这口号看得过重的地方。行

政的手续要快，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如现在的若干行政机关及法院之耽搁事件，真是荒谬到极度的。但整顿这些事自有对症的药，如裁汰无用的人，减少无用的转折，变更党政双管的制度，督责官厅及人员之负责等等，不必因此并近代官署制之雏形而亦废止之，转向当年之幕府制复古去。现在地方制度中有两个大改革的趋势。一、所谓省府合署办公。二、县政府中废局设科。省府合署办公究竟有什么好处，我至今莫能知晓，其有害处则是想得到的。既合署了，则厅中有事要先商之于省府秘书厅，省府秘书长对于省长是亲近的，省长是容易听他的话的，因此各厅本有奉承省政府秘书厅意见的趋势，如再合署而各厅不能直发公文了，则秘书厅之指挥各厅长更要加甚。于是各厅皆不成其为厅，皆成省府之科。有一次我以此一意询于一位亮节刚正的市长石衡青先生，他说："岂但如此而已，合署之后，各厅（或局）不能直发公文，厅长（或局长）还要仰承省署（或市署）科长的鼻息，自身只是一个科员，那够得上科长？"我对于他这话和对于他的对日意见一般的佩服！从此处看，可知此等改革，是极其根本的改革。不敢用当今的比喻，姑用明朝的比喻。好像把六部的权都集合在一个承宣太监身上一样。如此严重的改革，若徒因"行政效率"而起，真是小题大做了。不记得清末的事么？有的地方督抚同城，以致巡抚一无实权，当时主张行新政者，以此为诟病，于是废除之。又不记得官文、胡林翼的事吗？胡林翼是个极有才干的人，官文是个愚而好自用的人，只因官为总督，胡为巡抚，胡不得不用三分之二的精神去对付官文，三分之一乃是对付太平天国。现在开倒车者，似乎把这一类的经验都忘了，或者不知道。

至于废政府之各局，而县长可以自行派科长，也嫌有些笼统。夫县政府中之不该设财政公安两局，而此两局之长尤其不应由省政府直派，在中国这样简陋的地方情形之下，这是当然的。至于教育，本当是全省齐一的，而其行政性质又与普通民政不

同，这一局是不便裁的。县长若是熟习民政的，则在教育上其势不能内行。县长所派的教育科长，平均来决不如教育厅所派的教育局长，因为县长之选此等人当然远不如教育厅长在行。一切局之废止，势使县长有包办之权，县长固不是可以垂拱而治的，然也不是可以包办而治的。

我以为目前地方政治之不济，与其归罪于制度，毋宁归罪于人选。省主席县长之人选若得当，在更好的制度下固然更好，在目前的制度下也还有很多事可做。若不得当，如一省之长永是由不能干城国家之武人充任，县长多是由护兵马弁无赖腐官为之，在现在的制度下固然好不了，在加权的制度下更容易把事弄坏，择人难而改制易，或者这就是现在不谈用人而注意在改制的原因罢？

老生不免常谈，话从远处说起。汉朝承袭秦朝的一个整整齐齐的行政系统，在地方制度上是很能划一的（此指郡县一部分说）。以郡统县，以中央统郡，虽设州刺史，以行监察权，州刺史却并不是个大官，不是郡守的上司。在天下乱时，邻郡兼并，不特州刺史大了，并且嫌刺史之名称不尊，于是设立了州牧。中央失权，州牧自辟掾属。这自辟掾属一件事本是要不得的，然以行政失了轨道既久，这样的风气，也就历魏晋而相沿成常规了。中央政府便加这样的地方官一个冠冕的名号，叫做“开府”。这不是在中央“开府作牧”的开府，而是在地方开府专征的开府。从此留下一个恶劣的封建式的幕府，制到了清末的督抚。不徒枉革了几场命，现在连知县也快要“开府”了。

“徒法不足以为政”，还是慎改制度，严求人选，何如？

（未刊稿，原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暂系于此）

1936 年

公务员的苛捐杂税

"惠而不知为政"的一个教训，是一切执行政务和作政务设计的人应该刻刻记住的！

给公务员一些苛捐杂税，总不能说是"惠"罢。然而据我所知，近来在食禄阶级中嚷成一片的强迫建设捐，最初发起者本是一番好意，要别人去尽发起者自以为当尽的义务，庶几可以生活简单而效能格外大，庶几可以减少人人自己的"孽"（按，此指sin不是罪过），不幸一到官僚手中，便觉这是一笔财源了，于是乎大有从自动的捐输，变为法定的征税之势。照常理说，凡所谓捐，总该是自动的，强征曰捐，不是法治国的习惯。偏是我们贵国的习惯，捐不由自捐，捐哉捐哉！

一月中，我到南京走了一趟，遇见的朋友无不叫苦。我这些朋友不消说都是公务员，也都是用其专门技能赚饭吃的诚实人。他们说：若认为这是在国难中，应该大家吃一样的饭，这是很好了，若以为国家薪俸的标准不妥，公然的改革好了。只是这般的把已许人之薪水而又收回，上个月捐东，下个月助西，使人家不知他的进款准数，不是"枉民"吗？

我觉得这番意思很有道理，我姑申说这番意思。

我想请教一个宪法学家，我们政府的存在，基于何种法权呢？若说是由于继承，则我们本是革命的政府。若说由于征服，则政府又焉得以爱国责人民？那么，还是免不了那不时髦的老话，我们政府之存在由于公众之认可。此虽不以代议的制度表现

之，而北伐时代各地之望风归附，殊少神武可矜，虽是以道德的表现此意。既然如此，则政府之与人民，不论何一类人民，行动上应以“公约”为标准。此以国家之制定薪俸额，虽是颁布命令，实等于签定契约。契约付给公务员者，若不经对方之同意而剥夺之，则英美法治的国家必认为是“大路上行劫”。标榜法治，标榜近代化的政府，在这一点上要想想看。

现在公务员的薪俸标准，诚然不大妥当。最高级者，正俸八百，已不比欧洲国家少，而最低级仅数元，相悬太远。按之国民经济情形，重新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是该当的。任意兴捐却是不该当的！国家本有改革命令的自由，却没有强迫剥夺公务员法定利益的自由。

我曾经问过一位当局，这样的建设捐能省几何，他说：一年约三百五十万。为这三百五十万费如许多的事，冒如许多的不韪，是值不得的。用这三百五十万建设，是建设不出何等事业的。在政治的作用上，是有害无益的。且看这样建设捐一经实行，受影响者是何人。据报纸的报告，已决定的办法如下：一、百元以内者不捐；二、百元以上者用累进率；三、累进率甚大。例如薪额五百元者，应捐一百二十，加以原有之二十五元党员所得税，共捐一百四十五元，薪水便是三百五十五元。照这办法实施，小薪水者可免，犹算差强人意，而大薪水如八百元者，捐上二百元，犹无大碍，其有公费者，尤不受影响。所苦者只是专员技正，或上至司长下至科长一格的薪水，而大学教授恰在其内。这一阶段，在容纳专门技术人才的政府中，是极重要的，在近代式的政府中，是处理事务及发展专门事业或推行专门教育所必须依赖的。剥夺者偏是这一辈人，而大老官们无恙，岂可谓平？最近报上登载实业部吴鼎昌部长提议专门技术人员之待遇，应酌量变通一般公务员薪俸标准之限制，不受铨叙资格之限制，以便专门人才初任时即可给以适合其能力之报酬。我想，一个近代式的衙门，若想办理得名副其实，能举行近代式的政务，应该大多数

是专门人才，甚少数是一般官吏（写字匠一类除外），上文所说专员技正或上至司长下至科长包括大学教授一个阶段恰是，至少当是，所谓专门技术人才。此一提案颇有其不可抹杀的理由，若一看铨叙规程，尤当痛觉若干现行规定之无理，而痛觉此举之必要。然而这个提案，在行使上似乎是与另一位部长所提议的建设捐是背道而驰的。从此可知我们的政府还谈不到一贯的政策。

这样办法的建设捐，施行后在公务员身上得何等效果呢？我想，必然的有下列结果。第一是怠工，至少也要减少工作的效能。政府权贵应该知道，诚实勤恳工作的人，必须安顿在较安定的生活上，不看重他的薪俸的公务员，每是不安分的公务员。不看重薪俸的公务员中，虽然也有中国式的理学家，中古式的圣人，古典式的斯多伊克，但这样人至少要在千人万人中得一人。不安分的公务员，对于这样"摸口袋"办法，或不过付之一笑，然而安分的公务员却不免疾首蹙额。因为中国社会，中国家庭，本与西洋不同，一人所入，多人共之。既宣布其薪额，自照此薪额作打算，既非因罪罚薪，又非不材失业，无端的每月作一紧缩计划，心中自然不平。每次领薪时，便是一回恼怒。"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言其劳也。"我人自外，室人交遍谪我"，言其苦也。正心诚意之命未行，离心离德之患先见。更有甚于此者，服务心不坚者，因此必别求救济，即无异为取巧兼差增一绝大策动力。公务员不当向国家取巧，所以凡公务员皆应用百分气力从其职守。国家不当视其公务员如草芥，所以政府不当在公务员的薪水上，打经常法律以外的算盘。有句俗话："又要马跑，又要马不吃草"，是不可能的。马不好，换它；马不跑，打它跑，扣草却也是不当的。所以算起总账来，这样子捐，还是政府吃亏。

这一个问题，不该轻轻放过者，除上文所说"遵守契约"一个近代主义外，尤有一个要义。近代政治机构之运用，大多靠专门技术人员之为国家服务者。以德国为例，自帝政至今，由假立宪经共和到真专制，沧桑之变无数，然而其国家政务依叙进行不

断者，因为内阁虽变，官厅不变，政策虽变，事务不变。在常变的政府中，有一不变的政府，即“秘务参议”（高级公务员常得之官衔）集团是也。此一现象，在德国固甚明显，在英法亦何尝不然。诚以必须如此近代式的处理专门政务，才可以办到。在中国有心人正当养成这一类的机构，使之精而益精，何苦为此建设捐，使之愈不上轨道？

至于与公务员待遇有关的财政整理政策，我也想到几件。

一、阔官们的分外待遇，真正太不成话了。所谓公费，少者二三百，多者二三千，都是变相的薪水（至少大部分），这是公认不讳的。兼职不兼薪，却可兼公费。若说一部分的长官，应有公费，其数目亦应大减，最好是实报实销。至于长官以外的公费，现在有的部署下及司长，是大可一笔勾销的。尤有所谓特别费者，尤是不可知之谜。如前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之此项费用，每月八万，在去夏“冠盖往来”中成为平津一般谈资者，即其一例。其实此类多矣。此等费用向不报销，于是人言啧啧。我想不到这类费用为何不可报销？如求关防严密，尽有关防严密之法。例如组织一特殊机构，审查此项报销，附于监察院，或中政会，责以严守秘密有何不可？外国政府惯用秘密会，也是有报告的。至于大官及次大官的个人享受上，若扫荡一下，也大有可观。如所谓官舍及官舍中之“勤务”（有时包括厨夫，或言并有女仆），及官舍中一切杂费与用具。薪水既高，公费又大，何须更添这些腐败事迹？如把这些事件彻底清理一下，一年增加收入，岂止三百五十万而已！

二、重订公务员薪俸标准，使其上下相差不如今之大，以长官之阔绰，分润下层之书记办事员。果然我们政府取一个社会主义的立场，大可把二百元以上的薪水一齐勾销。这是正正堂堂的办法，绝不同于建设捐一类近于欺骗的把戏，公正人应该不怨的。如嫌这法子过于积极，则将薪俸数目缩于五百元至五十元之间，未尝是办不到的方法。

三、推行普遍的所得税，而取消所谓党员所得捐。所得税本是一个文明的税则，可以调剂贫富，早该实行了。而党员所得捐，本是北伐时代助党务工作及军务之捐输。今日党费出自国库，大可不必继续揩油了！

其实说来，裁些无用或不工作或重复的衙门，裁些无用的官，比这些建设捐把戏要急得多。国家财政纵不能因开刀而裕如，国家体面政治效率要增高得多了。

（原载1936年2月9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

国联之沦落和复兴

到今天，国联真算它有生以来最倒霉的日子了。一次一次的失败，现在竟弄到毫无荣誉可言。世界上最可敬佩的阿比西尼亚人在那里极勇敢着作最后的奋斗，国联看着它，一阵一阵展期开会！在去年初冬国联开始抖抖精神，向暴力抵抗的时候，即是制裁意大利，一般爱国联者大为高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现在呢？自然都有些垂头丧气，觉得阿比西尼亚人的苦痛在精神上我们要分担一下。不过仔细想想看，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也许国联的转运靠这次极度的失败，国联的复兴靠这次的沉沦。

现在世界上有三个多民族的集团，除去挟带殖民地所成之复合体不算。这三个是：国际联盟，苏维埃共和国合邦，不列颠帝国。这三个组织诚不伦不类，然而有一点是同式的，即一组织之中包含若干单民族的政治组织。这类复合组织中最有权能的自然是苏联，苏联中若干“共和国”虽名为国，实尚不如不列颠帝国中之自主领土，所以这些“国”在形式上是邦国，在实质上是地方政府，而它们的超政府的政府，在施行大政及对外上，俨然是一个单体政府。其次是不列颠帝国。不列颠帝国中各部之享有地主领土之地位者（Dominion Status），爱尔兰自由邦固不必说，即如南非集合、加拿大自治领、澳大利亚共和国，都渐渐养成了一种民族的意识，法律与事实上他只是不列颠帝国的与国而不是属地。最松的当然是国联，这个集合不特超政府的政府谈不到，便是同盟的组织也还去得远呢。

照国联的《盟约》，这组合当然有同盟的效用，因为患难时经济的和军事的团结互助是明白规定的。然而事实上在去年以前并不曾实行过这事，虽有些个不小的成功，却也很虚荣的表演。去年冬初一表演制裁，乃不能再接再厉，到现在竟为独夫所困！

推求接连沦落的原因，大别可以分作导引的、潜运的两项。潜运的暂不去说它。

所谓导引的原因大致不外主持国联者之无远识，无决断，而其自国的利益又互相冲突，以致坐误时机，举棋不定，坐看日本沦落东北，做成一个悬案而无动作。于是德国学日本，意大利又学日本和德国，以致演成此时不可收拾之局面。假如在沈阳事变时抖起精神来一做，西门外长不糊里糊涂给斯蒂生一盆冷水，国联之离开轨道决不如此日之远，那时候德国意大利并不曾违背国联自由行动呢！这是无远识。当断不断，坐看时势之自由旋转，这是无决断。然而年来酿成这一个最严重最末段的危局，总是英法对欧洲政策不同所致。不然，意大利不会生心，德意志不会肆志，所以英国的责任是比任何一国都大的，不论他拥护国联的热忱如何。

从普法战争结束时算起，六十多年，法国人一直生存在畏惧德国的心绪中。这个畏惧是极真实极有根据的，处同样局面之下不惶虑者，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人。以德意志民族之实力与自负、思想与训练，法国的危险感觉是很自然很应该的。在三国协约成立时，英法在欧洲大陆政策上携手，于是而有大战，于是而有大战的成功。欧战以后，英法之渐离，始于 1922 年法比占据罗尔煤区时，以后英法两国对德虽多多少少还可携手，而自英国保守党实际秉政后，亲德的趋势愈演愈显，成就了希特勒有不当有的成功。这样子以来，不能不引起法国的大恐慌，不能不促迫法国联俄亲意。所以希特来沙会议中英国代表之可疑态度，英德《海军协定》上英国之难于自解，都是使阿比西尼亚受苦，墨索里尼得意的真因。

英国在大陆上用这样一个政策之原因到底在哪里呢？这是很费人摸索的问题。英国果真愿意德国在大陆上闹吗？不是。英国果真愿意德国把法国压倒吗？不是。据我推想，英国人所以有此态度，不出四点。第一是英国人的见识。英国人以为缓和德国只有给他些好处。压住他是不得了局的。这一层我们也当同情。却应该真正看清事实。第二是英国人的欲望。英国人所愿者固是欧洲的和平，然而他所甚不愿者，是欧洲在一国独霸之下。德国独霸，他固然岌岌不可终日，法国独霸，他也不很能自安。这一层确是英国的私心，我们却也当承认他有些理由。第三是英国人的逻辑。英国人以为天下人都是“经济的理性动物”，德国人若得到相当的满意，是应该适可而止的。这一层他真把德国尤其是希特勒的德国，看浅了。然而德国人确把英国人这样的心理看穿了。第四是英国人的恐惧。大战后的欧洲已经是漫无条理，再一次战争后的欧洲更无法收拾了，英国怕见这个，所以由恐惧而迁就，由迁就而退缩，须知天下事最难改的是自己的逻辑，最不容易摆脱的是自己的人生观。英国人推己度人，德国人识便于己，于是英国人不由得违背着自己的意志堕落在德国人的术中。不必英国与德国有默契，不必英国引诱德国，不必英国对德国有暗示，只要德国人看穿英国在对德国的立场上是不与法国同的，英国是不会拿出本钱来抵抗德国的（在目下欧局之下）。德国便可算好步骤，一步一步的撕条约，一步一步的整军制兵了。

几个月前，英国对意大利是有决心了，然而这个决心又为他这几个月以来在欧洲的敷衍态度所搁浅。对法国呢？什么受攻时互助呀，互相担保呀，三国参谋部职员会议呀，既不是抖起精神来做，做得又不着实地，无怪乎法国之不能放下心去，跟随他对意大利的立点。对德国呢？洛迦诺签字国之决议说是提议，以致于借款德国之风说，似乎德国最新的撕约举动毫不激起英国的反动。这样的双方敷衍，英法决难得到安心的合作，其效果只是为墨索里尼希特勒造机会而已。

这样子能支持长久下去吗？不能。英国说："英国是积极拥护国联的，然若《国联盟约》不能维持集体安全（即公然承认对意制裁失败），英国当退出国联。"这是对法国的恫吓。法国说："若《国联盟约》在欧洲不能实行，在非洲更少意义。"这是对英国的恫吓。弄不好，这恫吓所指的局面，要到着实现的地步，这地步去现在也很近了。所以放任到不能放任的阶段，十字口路上必须下决心时，英法终要决定他的前程，永久含糊下去是不可能的了。

假如法国决定了宁给国联安葬不肯牺牲意大利，国联自然寿终。假如英国决定了宁牺牲法国的合作不肯违绝德国，国联自然也寿终。这都是不成问题的。法国的决定要系于英国的决定，所以英国所负的责任更大。据现在形势看来，这样决定出现之可能性颇不如其相反决定出现之可能性之大。这话怎样讲呢？

法国虽有《法俄协定》，然若不得英国之赞助，终难得到安全。时间越久这局面越显然。只有英法之协合可以制德之外衡。英国若不得法国之赞助，只好坐看意大利在地中海上红海上耀武，英国在地形上是制不着意大利，而意大利却可扰动北非西欧之英国属地及势力范围。如此说来，只要彼此一迁就，纵令是暂时的，都可以彼此达到目的，若是彼此不迁就，则各人对他自己的目的只好束手。

我在此希望英国人立时改换他对德的态度吗？不是，因为这是办不到的。然而英国如为环境所迫，不能不与法国进一步合作，即军事上的保守同盟，英法自然可以站在一条线上，自然无所用其再来敷衍德国。这样不必须如《法俄协定》的色彩，当年的英法协商局面已成了。在这新局面之下，英国对德总可以维持相当友谊的态度，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对德国的态度还是和法国对德国的态度不同的。我现在不敢说英国定要如此走，但如此走的机会不是没有而且颇多，环境所迫或者这是"不得已"的一条路程。诚然，今日德国之迫害英国，远不如大战之前，而德国人

鉴于上次大战的教训，当然要竭力破坏此趋势（或者这是德国人经上次大战所领受的惟一的教训）。不过，英国若是感觉他在别一方向所受的危险更大，他算起总账来，恐怕终究是不得已与法国彻底合作。

果然英法合作，国联的根基便要立时转危为安了，在英法的合作之下，如当年的两国协商，国联得到柱石，得到领导，尽管日德意不在内，尽管他们来捣乱，国联是无所惧的。

如此的国联，大似当年的协约，虽然也是集体安全，却范围小得多了，因而组织可以精干化，不似既往之国联庞大无当。在这样的国联之下，可以成立一个民主主义国家的同盟，以防备法西斯蒂，因为法西斯蒂主义与集体安全绝不相容的，各国的法西斯蒂互不相容，又整个的与集体安全不相容。

国联的生存，同一切集体组织一样，要有一个共信，他的兴奋要有一个共敌。若不然者，只是一个庞大躯壳。也许这次的沉沦，正开将来的复兴，变态的复兴。缩小了才可以能干化，组织强固了才可以应付风涛。这个缩小应是地域的。因为在现在的国际关系上，欧洲不能成为一个脱离他洲的单位。这个趋向不能不实现，要看英法的决定，尤其是英国要负最大的责任了。

（原载1936年5月3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
1936年5月10日《独立评论》第二〇〇号）

国联组织与世界和平

现在真是国联最不能抬头的时候了！日本，德意志，意大利相继着屈服他。现在他坐看着阿比西尼亚人在那里作最后的挣扎，竟毫无动作！以后的国联要怎样呢？就此变作一个辩论会呢？就此爽性结束了呢？或者不得已而改组，改组后可以照新的原则大振作一番呢？

谁也不能做断然的预言，然改组后有力的走一条新的道路，却也不是不可能的。

若问现在何以失败，不可不先知当年何以生成。国联是大战的产物，大战的产物，也只有这一样是值得留恋值得拥护的。这事最初本是威尔逊总统的提议，基于一种建设世界和平之伟大的理想，建设一种“超国家”的势力，建设一种列国相与之合理的习惯。威尔逊总统最初所欲望的，比现在的国联还彻底得多，只因和英法等国的妥协，弄成了《凡尔赛条约》中的一章，本有些不伦不类了。再加上自决的民族无一定的界说，于是殖民地照旧是殖民地，又承认一切现状，即承认维护最近胜利者之法益，即等于抑压最近失败者使其不能自脱于束缚，于是国联偶为一般真正热心的理想家所菲薄。记得 1932 年（?）英国著名之自由思想拥护者摩利教授及蒂更斯先生在一次国联敷衍了结一件事之后，大发其脾气，即是一例。不过平心想想：天下事的进步，一步登天的可谓绝无仅有，战后有此国联，一反集团勾结而为合体考量，一反秘密外交而为圆桌会议，公然否认侵略之为国策与已成

之势力范围，无论实效如何，总不能不说是百余年中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之最伟大结晶品。所以十年间之国际协调，国联之效用居多。此一组织如果失败而不可挽回，大祸要立即暴发了。

现在国联这般没落的样子，或者可以找出三个最大的原因。

第一是这几年来自由民主主义之衰落。国联不是一个超政府的政府，更不是一个超国家的国家，而是一个自由的组合。这样自由的组合如何运用，自然要靠他的组成分子之见解如何，欲望如何。国联的生成靠大战完结后自由民主主义之澎湃，故与国联主义背道而驰之思想虽潜伏而不登台。及法西斯蒂主义成为旧大陆之传染病以后，若干国民的训练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只有强力，没有公道。国联之若干组成分子既这样的变其体态，乃至变其性灵，国联自然有倾覆之患。承天铜柱忽折其一方，自然是极危险的。在这反动的世界上，进步的国联自然要显得不合时宜些。

第二是这几年中世界经济情形之紊乱。自由主义本与一种的经济理论及经济信仰相依相用，而近数年中之经济恐慌，使得若干不失民主政体，不弃自由常轨的国家，内顾不暇，无力骋心于世界大局，于是狡谲者乘机进取。若干国家心中诚不以此等事此等人为然，然而内部舆论集观听于经济之复兴，便也管不得许多了。世上无经济协调，即无政治协调，无政治协调，则国联甚难办事了。

第三是英法的领袖资格运用得太拙劣了。凡一个组合，在运用上必得适宜的领袖，然后可以发挥效能，社会中如此，国际间亦复如此。国联的中间当然是英法，就实力说，这话是毫无问题的。再就国体说，此时民主自由主义的大国，旧大陆上也只剩英法，其他大国在此时所负的“国是”上本与国联精神不相容。不幸得很，这几年中英法真正太缺少政治领袖了，内政上还好些，外交上每是些鬼混的庸才，无深识，无远见，为舆论所谴责而不能领导舆论，为国民所失望而不能为国民以兴奋。自“九一八”

事变起，英法所表示之认识力何如，天下人都领教过了。记得欧战之下段及大战后，英法皆有其霸才，应运而成就。如英之“威尔斯神祝”路易佐治，法之“老虎”克雷蒙梭，无论他们的行事世界上如何批评，他们都是能领导国民，在国际上施大动力的。现在呢？西门拉法尔比起来何如？英法既无真正的领袖，国联不过如一句格言所说，“穷则变，变则通”，国联到现在水尽山穷，能不能一变而强呢？这个“历史的辩证”，在此点上本不能期其必然，却也不能说他必不然，照此时的环境看，这个趋势颇为可然。

现在世界上列国大致可以分做四类，一类是社会主义的集合体，这是苏联。一类是美洲列邦，这里头自然以合众国为中坚。一类便是国联，这是大战的遗迹，其中有力者未脱民主政治，未大反自由思想，这自然以英法为中坚。还有一类是法西斯蒂国家，这自然是东亚、中欧、南欧的各一强国。这四类代表一个不同的思想。以前的国联，本想无所不包，以至无所成就。现在的趋势，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者亲近国联，美洲国家远国联，法西斯蒂国家打击国联。在此一局面之下，设若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合作，如其可能，便取美洲之赞助，以抵抗他们的公敌，或者是一条光明的出路，近代文明可以不就此沉沦，中世纪之恶化可以不就此实现。这样小的办法，自然要把国联缩小，同时可以把国联的效用激增。果真英法两国能得适宜的领袖，能在对德对意两点上互相迁就，这样的国联，在内有共信，向外有共献，当可兴奋了。

所以英国不必管德国重返国联否，法国不必管意国要不要脱离国联，只要他们能一心合作，领率其来，国联便可得到再造，敷衍局面是干不下去的了。

最近报载日内瓦消息，在那里大家也感觉到国联不免改组了。那里的主张是取消制裁的条文，这是要把国联变成辩论会，如英首相爱斯葵次当年把上议院变作辩论会一样，这是给国联送

终的。又一种主张以为要强化制裁的条文，这却是其有见识的，如此则不能不缩小国联，也惟有如此可以强化国联。纵使国联渐渐像当年的协约国集合，也比保守一个无用的强大躯壳好。假如事实上已证明无所不包的集体安全论维护不了集体安全，还是改变一种组织维护他去罢！

（原载1936年5月15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北局危言

最近几天北平又是谣言的世界。这次大家对于谣言不如以前之惊惶者，因为听也听惯了，见也见惯了，不是觉得这次谣言不格外可怕。至于这次谣言之缘起，在外表有迹可求者，始于宋韩二氏之所谓“马电”。马电中呼吁和平本是公论，也是国人所渴望者，只是对中央与西南未免有点同样看待的嫌疑，而文中有“不得不先泣涕陈词”云云，先字大惹人注意。接着是天津《益世报》廿五日的一段新闻，说：

万一马电之呼吁无效，内战终不能免时，为应付内外双方起见，将由宋韩两氏首倡，并联合华北各省区共同组织一华北保安机关，实行严守中立，保境安民。

我们相信这消息的内容决不会实现，我们以宋韩二氏之深明大义，艰苦撑持，所以才敢这样信。然而时局既已到了这样的悲惨关头，北方又已到了这样的危殆局面，终不免还有几句话向冀鲁当政诸公呼吁一回，同时也请住在这个危境中的人们想一下。

第一，我们要知道，所谓西南两机关全是不法的组织，全是私人把持地盘的借口，在这时局下有这样组织，是为国家添无穷不幸的，为外国增无穷方便的。这样组织，所表现者是国家之分裂，所运用者是大局之不安，所增加者是民族之危机。这样组织，一之为甚，岂可以再？有者当改，何况新添？且就冀北岭南之形势论，在两广以地势上之不接近敌人，如此“窃号自娱”，尚可敷衍一时。在冀北则不啻前敌，一旦自断其后路，就执政者个人之利害言，诚亦不堪设想，何况国家？

第二，就国家民族言，若此时渤海诸省有不奉中央委令之新组织发生，实是一个空前的浩劫，势将一发不可收拾。盖假如这样一办，国人看起来是去年冬天所谓“自治运动”之复起，是前敌对本干的分裂，是人心之大打击，是国体的大迫害。非敌人的外国看起来，是中国政体之大崩溃，是中国大局之总瓦解，是外人势力侵入之大决口，是中国人不成人形的确证据。敌人看起来，可就真正高兴极了，可以畅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地名了！可以纵心压迫了，因为当政者已没有了后路了。这真是求之不得，梦想而得的了。

第三，就此时渤海诸省执政者自身的利害言，此时只有依赖中央才可以自存，若形成一种近似独立的形态，必在不久的将来中全盘棋子输到敌人手里去。这道理是非常明显的，以国家的力量对付此日之危局犹虞不济，何况一隅？以整个的组织策应此地之困难犹觉不可，何况一方？且此时冀兖当局犹可推大事到中央身上，彼时又有何说？所以这道理本是很明白的，中央一断，外邻便紧，既失后联，即陷前敌。无论在何种考量之中，何种口号之下，凡有特殊组织起来，在意义上无殊于“冀东”之傀儡，在结果上尤必迅速的演成同彼一致的状态。这是毫无可疑的，这是很明显的。

第四，此时此地有一种不负责任的邪说流传，说是最好骑墙于南京东京之间，庶几乎可以自存。这真是发昏的话，做梦的话！我知道此间的忠义军人必痛恨这样话，我尤知道深明大义如韩宋诸氏者一闻这话必斥邪说。然对一般无知者犹不可不破此说之虚妄。执此说者固不为国家及大局设想，一以个人利害耸动听闻。然试问在此等局面之下，虽欲骑墙，如何骑得下去？以此时欧洲的局面论，小国尚不能自存，必附大国以存，何况一国之一地方？果真骑墙，连一个月也骑不下去，便要向外倒下去，或一跌致命了！骑墙即等于独立，独立等于自亡。

一人或一团体之现在立场，可就其历史推断之。现在我们对

北方危局犹有庆幸者，即因冀鲁二省之当局过去之历史使人安心之故。一则长城战中之英雄，国人共戴，一则对外不屈之大将，举世共闻。然而所最可虑者，此间地方宵小太多，失意政客军人太多，自负聪明的妄人太多，汉奸太多！他们浸润之诉是极可怕的，他们卖弄聪明的策略是极危险的。再加上号称抗敌实际通敌的西南汉奸们派人到此招摇，于是社会上群疑并起。深愿渤海诸省的当局彻底看穿这些败类的居心叵测，彻底明白他们的设计自陷，将他们屏斥得远远的，或把他们正刑定罪。这是安定北局之一要着。

在这时候，个人恩怨是谈不到的，政治的细目是不暇论的。我个人也是深虑中国政治之无出路的。尤其痛恨浮薄少年模仿意德之邪说。然而权衡轻重，绾北局之安危者应该知道，与其亡国于异类，毋宁亡政于独裁，与其作弘光朝的左良玉，毋宁作大宋朝的吴越钱氏，与其作宋亡国时徘徊旁观的淮上诸将，毋宁作晋南渡时奉持正号的西凉世家。这道理本明显，何况趋势也并不尽如此不幸。殷汝耕本无兵柄，一身投降，不过为黄郛之羞，这也是“锦上添花”，不足为黄氏增色。至于军人，亡国后之末路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军队是有力量的，不能苟全，军人是有地位的，不能幸免。鲁肃对孙权的话说得透彻：“子布等（文人）犹可不失为下州从事，如将军（武人）者，将安所归乎？”①

归结说来，就国家民族的立场论，就北方的安危论，就北方执政者之自身利害论，此时只有奉持中央，才有办法，新组织无论在何种彩色中，何种程度上，都是绝不可有的。对于西南自当愿其和平，若真不免一战，此间应以中央之立场为立场，决不可

---

① 编者按：此处引《资治通鉴》语有误。《通鉴》卷五十六云：“今肃（鲁肃）迎操（曹操）……犹不失下曹从事……将军（指孙权）迎操，欲安所归乎？”子布乃孙权手下大臣张昭的字，他在赤壁之战中是主降派，鲁肃是主战派。

听西南之敌方军事教练顾问之包销人之鼓簧！这样子才可以维持国家，维持地方，维持军誉，维持本人。这样态度，我相信宋韩二氏定可办到的。

（原载1936年7月5日《独立评论》第二〇八号）

欧洲两集团对峙之再起

在本年三四月间，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栏中写了一篇推测欧洲列国间在最近的将来要如何划分集团的文字，同时又续写了一篇登在《联盟同志会月刊》第一期上。这两篇文字都写在亚比西尼亚瓦解之前夕，所推测甚近将来欧洲列国之纵横形势，以为不免走到一九一四大战前之分野，即由德意妥协而成战前三国同盟之复兴，法俄英互助而成大战前三国协约之再起者，似乎这几个月的事实正是向如此方向进行。前者所预测的，证明还不算是幻想了。照这方面演进的国际形势，目下只差英国态度决定的一步，若英国终于和法比团结，可就再像大战前的分野也没有了。

在去推测英国要不要走这一步以前，且先把造成目前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般的原因，大略的叙说一下。

不消说，造成目前旧事循环之最基础的原因是大战后之和约，这和约表面上载有好些像是比以前进步的空气，——国联之组织即其最要者——然而实际上仍是胜者宰割败者，虽不比以前的和约更属变本加厉，如德国所宣传，但也不比以前的更人道些。于是乎败者不得不日思报复，胜者不得不特加防备。这样形势本是与国联组织集体安全等背道而驰的，然而都载在《凡尔赛条约》中。《对土和约》终以土耳其大振作一下子而相当的修改了，这更鼓励德奥匈改约的欲望。在德奥的左倾党抓政时期中，法国毫不假借，这更助长右派的势力。然则今日法国所感受之危

局，一部分还不是他自己造成的？第二项的基础原因是大战后大陆各国之内政向左右两极端反覆倾变。自从俄国在战期中两度革命，奠定了劳农政权，接着便是匈牙利之共产革命，已经攫政的局势，就此安定下去了。再次则为意大利之革命工人一度攫得工厂管理权，俨然“赤化”，墨索里尼就此应运而生了。又其次则为希腊西班牙之效法意大利，终不成功，于是永在不安定的状态中。最后的一着是德国，十八年前，德国还是左派势力弥漫着，只因共产党方张的形势太使中产阶级恐惧，而德意志社会民主党颇染腐化，又无领袖，于是左倾政党便成了希特勒的前驱了。只有国力稳固，中产阶级未崩溃之英法，能维持其旧有体态。第三项原因是战后各国经济状态之改变形成了政治思想之改变，过于放任的经济政策既不能维持国命，于是经济统治要求出政治统治，或者由政治统治贯彻出经济统治。虽在美国，此情形此趋向犹且不免，何况欧洲大陆的国家？然而国家愈走上统治的一条路，对外的壁垒愈森严，对外的壁垒愈森严，集团的组合越不可缓。

以上是潜因。至于最近的明显的导因，自然一由于德之对法与俄，一由于意之对英。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在原则上虽是国际的，在实行上却未必能。法西斯蒂在原则上虽是绝对以自己为单位的，却也可以因对付共同的敌人及利用“物以类聚”的情感在一时间中苟合。德意两国竟能一旦释其数年中因对奥关系而生之仇憾，求得一个妥协的公式，于以成立三国联盟之复兴，不正是这个道理吗？法俄因对国社党的德国不安，而成立了《法俄协定》，因《法俄协定》而德国乃迁就以求与国，意大利因仇恨英国，不满法国，乃亦迁就以求与国。看来意大利已有宁牺牲法国也愿求好于德国之决心，这不是因为他相信英法早晚要走上一路去吗？英国怕得罪了德国，于是对莱茵问题无实质的保障，结果并未使德国满意，转以此使法国失望。法国怕得罪了意国，于是对亚比西尼亚失正义的立场，结果并未使意国满意，转以使英国

失望！假若他们在一年前彼此迁就一下，亚比西尼亚问题与莱茵问题决不至如今日之糟，然而今日悔之何益？这些考量，我在上次所写两文中已经详说过，不必再说了。

到了今天，英国以外各国的态度都是明显的，一切推移，全系于英国如何决定其态度，所以我们现在的猜想可以集中在英国身上。从远大的步骤看来，英国早晚要走上当年英法协商的路去，纵非所愿，也是不得不然。然而就目前的局势论，这个趋向是不能走直线的，还要经好些步骤，或不免有些波折的。望远镜中的现象告诉我们，这趋向有其必然性，显微镜中的现象却告诉我们，这事体还在左右摇动中。我们所以如此看英国者，因为英国有他的在内在外的复杂情形，这事说来如下：

就在内的方面说，第一，英国人的性情，因而他的国策，本不欢喜联盟，除非在最不得已时。很质直的联法抗德一策，自非多数所乐闻。即如温斯敦、邱吉尔，向为主张此事之俊才，始终不得一般信仰。邱吉尔之不得志，固有其他原因，然而他的纵横论也是使人觉得他危险之一因。第二，工党及其他偏左及中道的人，久以“集体安全”为口号，集团对峙的形势正是破坏集体安全。所以不特工党及其他在野党对英法切实保障合作一事（即形成集团对峙之最要关键）不肯或者不便公然赞成，即政府亦有其大困难。因为用维持集体安全口号以处理亚比西尼亚问题者，本是政府党在大选中揭明的立场，亦即是政府党得胜的主因之一。诚然，未尝不可造出一个公式来把英法比之实际同盟容纳在国联结构之下，然而这要等时候，费心思，待环境。第三，英国人最不喜欢虚声标榜的，在他的实力未充以前，他决不肯明白表示态度，现在英国正在充实实力之工作中，并未到既已充实之境。第四，英国最欢喜的是大陆上势力平均，许多使他不了的事，正因他这个心理促成。例如德意之经他扶起。然而一民族之生性难改，所以除非大陆上的国际分野使他大为不了，他总是要“不太偏”的。

就在外的方面说，可以说英国的将来趋势正取决于德国之态度。英国最喜欢的是一个颇强而相当安分的德国。然而天下事哪有这样遂人愿的？强而安分者真太少了。英国人心为天下人都应该有的计算，凡事做来不够本钱的不必做，所以觉得纳粹的德国也可以有他的要求的止境，也可以与之得到一个妥协，至少英国现在的希望如此，或者可说至少英国现在未断的希望是如此。试看英国对德提出的问题表，诚然问题甚多而尖刻，然而归纳起来，只是去问德国最大的要求如何。这要求是否可以妥协？如此订约后是否不如以前的撕约？于是德国延搁这事的回答，因为他知道，他回答的轻重与虚实之不同，是可以影响英国以后所走路径的。果真纳粹的德国能够做到适可而止，美国对法比保障（即是联盟）决不会特别做得积极。果真纳粹的德国能不在中欧组织一个同盟性的大集团，特别是与意大利合作者，英国也不至于断然的加入其反一面的集团。换句话说，果真德国聪明些，英国是可以被他相当操纵的。

如此说来，英国之积极的走上与法国联盟如大战前形势之一条路，还不能一蹴而就，还要有所待。在内待舆论之如此变化，实力之准备充实。在外待中欧集团组合之强固化，德与意更明显表示其不安分。在这等待的过程中，英国总不会明白的赌其立场。

然而就大体看来，英国早晚免不了走法比联盟的一条路。这固不可谓是他甘心情愿的，然而这确是他所“不得已”的。欧洲大陆上的情形早晚要使得他不得已的站在一边，欲徘徊却徘徊不下。请看墨索里尼之趾高气扬，俨然有取英国海上霸权而代之之要求。其手段是先把地中海变作罗马湖，而以改换西班牙政府为其着手处。再看德意志，还不是一有机会便闹一下子？谁能信他的要求有止境？谁能信他不在东欧起衅？问题表一个问题非得到一时的妥协，还不是“一卷纸”而已？德意之无厌，必促成英法之同盟，虽这趋势不会走直线，然而从远处看来是无可疑的。不

见英俄竟能在韃靼尼尔海峡问题上得到妥协吗？他们在三四年前还几乎绝交呢。这个妥协竟指示三国协商之大门开启了！

如此集团的对峙是不是集体安全的一个大打击？不消说，很明显的是如此。然而再想一下，今日之中欧集团雏形，其中主要分子全是破坏集体安全之大将，则维护集体安全者，应该联合力量以制裁这个崩溃的形势。所以这个反中欧的集团正可容纳于国联组织与精神之下，正可成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合作的团体。也许近年来，所见之国际暴行，文明的沦落，能靠这团体约束制止一下。这应该是我们不相信暴力主义的人所深信的。

（原载1936年8月23日《独立评论》第二一五号）

1937 年

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意见

一、原则，态度，办法。

谨案：比京会议系诸友邦用大力谋得实现者，吾国理当希望其成功，襄助其成功。此会议成功之可能固远不如其失败之可能为大，然必吾国尽力图助其成事，方可于失败后不负责任，而留为下一步中，国际助我之张本。

此时英美已询我国之具体办法，我国若只谈原则而不提具体办法，将致友邦之束手，似非得计。即有办法而不足使人信我国已勉为其难者，亦非得计。必此时勉为其难，然后成功有一线之望，失败后可希冀列国更挚助我。

二、给予我国代表团以较大之自由。

按我国代表团三人，办此等事较有历练，首席顾君又为谨细用心之人，如能付以较大之活动自由，当不致误事。且此会进行，必较国联开会为速，国内之外交机构或欠迅敏，若责代表团以每事请训，恐误事机，如英外相伊登并不能常在比京，故会开数日中关系重大，应付我国代表团以较大自由也。

三、具体事项之退步，在不得已时可以较大，但须为条件的，即谓“会中能办到如何地步，则吾国可更勉强作某某让步”是也。此项假定条件之退步，举例如下：

1. 如列国能作华北领土行政完整之保障，则吾国可于同地经济开发上及资料供给上作较大之让步。

2. 如不于无形中使租界扩大，且办法足以防止日军在上海

登陆，则中国可于“上海中立区”、非武装区（在不丧失中国行政等警权范围内）一说上作让步。

3. 如停止走私，则关税可用自主声明之手续酌量变更，但须以不妨碍国内实业及各国利益为条件。

4. 如日本停止其侵华宣传，则中国自然无所谓排日之运动。

5. 如列强能给中国以此后不再受日本侵略之有效的保障，则中国亦可于此时勉谈“满洲”问题。

四、基本调整及维持正常关系之机构。

此次会中，吾国必要求得到长期之安定，（此固绝不易办到，然不可不如此要求。）达此目的必须：①以后中日间争端须用外交解决，不得诉之武力。②不能解决时，由仲裁调解之机构为之，此机构即祈求由此会组成。

吾国之一切让步，皆以换取此事为目的，否则短期和平，无补于太平洋上之大局。

五、所谓“防共”。

此事关系内政，且既与苏联签不侵犯条约，不可反转。故今后所可办到者：①作一宣言说明内政事项不由外国干预，然中国亦必永循三民主义之路，不加入其他任何主义集团。②在日本放弃侵略时可与日本订不侵犯条约，然不能作对俄任何形式之联盟。

六、“太平洋永久和平”之高调。

中国应于会中说明（或明说，或暗说，相机为之），颇勉强牺牲一部分利益，以谋太平洋上永久和平，即谓在中日关系粗得头绪后，由太平洋各国商议共订不侵犯条约。此实既空且高之调，然此调最易得英国各自治领之欢心，亦甚合美国一部分舆论，吾国应申言愿为此作一少牺牲，有此一着，自增加人之同情，则于此会失败后，当大有作用也。

以上奉所知者，其所不知，不敢多说，非谓此为全案设计也。无论外交如何转移，不能影响军事之努力，让步既极而仍无

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收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7月编印发行）

1938 年

请政府加重救济难民之工作案[①]

谨案：各地难民之救济事项，就大体论之，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均曾为相当之努力，而作战军队随时协助之效力亦大。然详考其实际，核厘其办法，妥善速进者固有之，迁延怠忽者，尤为不少。须知此事是政府最大责任之一，不可以慈善事业为懈。兹分项言之：在此战局迅速变化之中，救济一事应与军事同样迅速，不可拖延，一也。不可徒设庞大机关，而难民得到实际救济时不知在于何日，二也。将沦为战区之地，应预为未来之难民布置，不可坐视于前，徒张皇于事后，三也。救济之款项太嫌其少，而为救济所费之薪水办公费转觉其多，四也。救济之技术不可不加以考量，俾收实效。例如将西南稻区中难民迁往甘青山地之一说，即为事实上所不可能，不可率尔为之，五也。基此考虑，谨提出下列决议案：

本会认为：中央及地方当局对救济难民一事，虽亦努力犹觉未足，应请政府注意下列各项，于可能范围内实行之：

（一）将救济难民之款项扩充之，除已发之款项及公债外，其为难民直接受惠之全数，不得少于全国公务员所得全数之半数。若一时不易筹得此项巨款，便应依递增制扣减公务员之薪俸，停发特别办公费，专用汽

① 编者按：此案具名为“傅参政员斯年等提”。

车，官舍费用，及类此之特别费等。尤应责成豪富官吏献其私产之一部，以供此事及战费之用。

（二）办理救济事项，应力求其迅速，不得拖延。

（三）不得为此多设鲜所事事之官吏，其为此服务之职员仅得领生活费。

（四）办理此事可委托中外慈善团体成绩卓著，信用昭彰者分任其劳。其办法自应预经主管者核定。

（五）充分利用以工代赈之法。

（六）所有为此吞款者均予枪决，疏忽者从严治罪。

（七）救济之技术事项，特别关于难民之谋生途径者，应由专家及后方各省热心而有能力之人士共同详加考虑，分担工作、以免浪费，而增加难民之痛苦。

（八）将沦为战区之地，应由主管者预为布置，如何输送难民，不得坐待。

（收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纪录》第 204～206 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1938 年 9 月编印）

波兰外交方向之直角转变

今天早晨拿起报来一看，波兰对苏联的关系居然做了一个“向后转”的转变，恐怕读者初看来都要惊奇，然而请细细的想一下，这并不是不可以预料到的事。这件事的意义甚不小，由慕尼黑四强协定后所成之欧洲新局势，使得东边半个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次等国家，大不安枕，于是乎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乃至巴尔干的土希保三国的外交一齐活跃，初不易测其方向，今知其方向之一是如此了。去讨论这件事的国际意义之前，我们先要认清波兰。

一、波兰在欧洲算是一大国，他的陆军力量虽远在德法之下，但比起意大利来恐怕差得不算大，比起英国来则超过。他的经济力量虽不甚好，不比捷克之为一个纯粹近代化的国家，但也有相当的基础，在若干次要的工业项目上，还在日本之上（参看阿特里女士：《日本的泥足》）。至于农业，因其未脱封建势力，力量比较可以集中。自皮尔苏斯基建国以来，一心一意要变成一个大陆军国，以贯彻其“独立自主”之外交立场，这事他居然办到了。就是空军，也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分子。

二、他的地形介于两大之间，非常危险，两大合谋，可以瓜分了他。所以国民性中有个恐惧病，无论什么都联想到波兰问题，十年前久为西欧安乐的国家所笑。他在当年曾为三个大邻国合谋瓜分过，这自然忘不了——不像我们。所以波兰决不以德苏亲交为妥当。不过，若是德苏两国太不要好了，乃至于打起来，他也不得了，因为他的地形，天然的是这两国的战场，无论谁打

谁，总要先打他。即令他投机投对了，投在战胜者一面，则战胜者在事前固必然“假道于虞以伐虢”，等到战胜回来，还必然顺手牵羊的灭虞。请看在这样地形之上，哪能不格外紧张，格外感觉灵敏，因为他不是我们这样的“乐天安命”呵。况且他又缺少稳当的海口，现在固然有“波兰走廊”并且有但泽供他使用，但这些在过去全靠德国的软弱，现在全靠德国的“友谊”。“友谊”在国际道德上是太靠不住了，一旦德国翻脸，连米美尔也没有他的分儿，难道他还敢想占列宁格拉吗？

三、欧战后的新国，在起初都有点左倾的趋势，后来则多半变作右倾。波兰也是一个右倾的，不过他右倾的根基比较稳固。工业欠发达，故工人少，农业很充实，故农民多，而农业组织又是一个半封建式的，一切伯爵男爵有钱有势。兼以他和俄国之历史的仇恨，又加以在新建国时因侵略乌克兰而受苏联之大打击，当时若非法国救他，恐怕波兰的历史要与佐治亚差不多了。所以在内政在外交上都有一个对苏联远离的大因素。

有这些事实，所以形成了波兰在大战后外交方向之屡变。先是，在亡国时，波兰革命党本是亲德奥的。因为当时瓜分波兰的虽然是三个，而俄国的分儿独多，所以他们为复兴祖国不能不利用德俄的矛盾，而左袒于害小的方面。拿中国作比例，试问旧大陆的强国，那一个不曾给我们亏吃过，只缘这些亏有大有小，有缓有急，有可恕有不可恕，所以我们现在只认定有一个敌人，就是倭贼了。言归正传，在当时皮尔苏斯基本在德奥方面打仗，统率着“波兰义军”，希望德奥打胜后波兰可以“独立”，谁知帝俄瓦解，德国全把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占了后，立志要把这些地方造成些殖民地。那时候，波兰革命党差不多途穷了，幸而德奥瓦解比意想所料者为速，法国立刻认了这个干儿子，多给他些德国人的地方，又替他打走苏军。所以波兰的西疆是法国人送的礼，波兰的东疆是法国人夺来的货。从此十多年中，他是完全和法国要好，法国帮他练兵，振兴工业，改革币

制。他在外交上,也完全仰法国的鼻息。这是波兰重建国后外交方向第一段。这时候,他耀武扬威,很做了些欺负德国人的事。

希特勒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敢作敢为，能屈能伸。他一上台，便重认了“与法国无国界问题”之原则，并且比他的十年中前任首相还能屈，又声明与波兰也无边界纠纷。这个举动，在当时颇为德国舆论所不满。但是这个举动，颇可得到波兰的安心。于是德波新交从此日形接近，法国不免大起恐慌，便更一批一批的送波兰军火及钱财。这一时期中，波兰徘徊于法德之间，这是波兰的外交方向第二段。

最近两年多以来，波德亲交日益加甚，虽法波仍保持其表面的友谊，而波兰的亲德是太强了。去年“七七”事件后，国联讨论中倭事，波兰居然弃权，发言时竟作了倭贼的口舌，当时颇不少人惊异，怀想到波兰加入德日反共协定之可能。此后波兰对中国处处捣蛋，并且作成一个准备脱离了国联的姿势。不与波兰相干的事尚且如此，则波兰之倾向可知，所以世人心中多已把波兰放在德意日集团中了。这是波兰外交方向的第三段。

由恃法侮德变为徘徊法德，又变为密德远法，这便是波兰外交的“曲线美”。你若问他何以毫无国际信义，他一定说这是他立国之国道如此。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略的：一、波兰垂涎乌克兰一带，德国也垂涎，但是波兰无独立战俄之可能，德国又不接境。在此一点上，德国必曾许过波兰好些好处，但借晋假道伐虢的方式，我们是很不容易为他们分赃家想到有何稳当的妙法。二、德波间的纠纷，虽以希特勒之能屈能伸，一时若无有了，事实上终是潜伏着的，因为东德国人之看不起波兰人，本与犹太差不多。而德波间之国界又是那样不自然的。

请看，自9月间捷克问题紧张后波兰的态度，初是不要参加战争的，忽而改为对捷压迫。这事中间隐示两个心理：一、不想德苏在他境内打起，这叫做“怕祸”；二、想分得捷克一大块，

超于语言界别之外，这叫做“想讨便宜”。然而一旦捷克向德国投降，德国也就居然代法国而为捷克之保护人，于是而波兰的外交动向急遽动转，这是什么道理呢？先是波匈联合向罗马尼亚商量要瓜分捷克东境（旧俄属地），罗马尼亚反对。忽然波兰与罗马尼亚有组织东欧集团说，以便介于苏德之间隔绝战争。忽然德国代捷克保存东部领土，而其外长又为此事飞到罗马去看墨氏，恍惚迷离，又是什么缘故呢？这里边反映着全个欧洲的新局势，测定了德国东进之决心，这诚是国际政治上的头等问题了。

先看看德国坐大之新局面如何使得全欧国家尤其是东欧小国着急。在9月底几乎开战时，张伯伦辈除去怕战心理及保守观念姑且不论外，还有一个大矛盾。若是目前打呢？则自己一方之军力尚未充实，殊少把握。若是等将来呢？则德国势必坐大，后来更难制。张伯伦辈既走了第二条路，自然不得不承认德国坐大之既成事实。德国之坐大实在大得多了，捷克是工业化的近代国家，全国壮丁皆是训练好的，其人口虽经割地犹且千万。他又有与克虏伯并驾的斯哥达兵工厂，除克虏伯外，比世界任何兵工场都大。这是帝奥的遗物，法国的新植，不是捷克小国所能自建的。他在地形上，又是向乌克兰的一条要路，德国若能利用，足以威胁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所以下次德法如果不免于一战，德国是不会腹背受敌了。英法对此新形势之反应便是：一、加紧两国间军事外交的联结。二、用更快速度作广泛的扩军。东欧各次等国及小国的反应便是：各国一齐在纵横捭阖之中，表面上看来惝恍迷离，骨子里是在那里作很重要的酝酿，第一次的揭幕便是波兰的背面转。

不错，波兰的外交是曲线的，也是好闹脾气的，但这次的转不是曲线而是直角了，而且脾气也不是闹得如此大如此危险的。在英法——至少是英法现在的当局——正谋与德国妥协的时候，他忽然来这一下子，总算胆大，但我们若看到德国之所以要“保护”捷克之故，则波兰之恐惧，可以测知。德国之“保护”捷

克，当然不是为捷克，而是为他自己，这不待说。波匈是旧友，捷克是新欢，决无助捷制波匈之理。然而他之所以必“保存”捷克的东部，全是为自己东向侵略着想，波匈虽与德交好，究竟不像捷克之已成附庸，且波兰永远标榜“独立自主”因而常常变转的，匈牙利对国内之国社党至今不放松，且背后又有意大利，故德国在东进时，波匈纵与他要好，终不如捷克之易于使唤。所以德国既有意于东，自不能不把住着捷克的东境即小俄罗斯一部，以酝酿他心中的“乌克兰问题”。若因此而促成了德对苏的侵略战争，波兰势必受殃，无论取大战时比利时或希腊或土耳其的任何一种方式。纵令他对付得好，战时苟且混过，则结果时无论哪一方胜利，他都是不了。苏联胜，则他所最怕的威胁到了；德国胜，必占乌克兰，则波兰全国成了“波兰走廊”，德国势力会四面把他包起来了，因为海的一角也是德国势力。到那时候，不愁“波兰走廊”不生问题。所以波兰不能不认德国的东进虽不是对他，而他在结局上必受一个莫大的威胁。然则对于德国“东进”的开幕剧即“保护”捷克一幕，不能不急谋抵制。他这一个举动，当然不是故作姿态以向德国敲诈，因为敲诈行于君子，不行于敲诈老手。兼以德国在慕尼黑之成功后，气高万丈，波兰若不先有决心岂敢随便儿戏？我们的消息虽太不灵通了，但就这一回中，也颇可以测断出德国东进之谋之急切，所以波兰着急剧变了。这一举对于德国自然不能说是“锦上添花”，而是“巴掌一个”，这是不消说的。

这一举在东欧各小国中发生如何影响，我们虽不能料定，然其必有重大的影响是不消说的。此一举动至少可以动荡罗马尼亚与匈牙利、南斯拉夫三国，因为此一举动表现德苏两国势力在东欧之消长。不过这些小国中间的关系太复杂了，而且又多是惯于胡闹的，罗匈之国界民族问题，尤其不易了结；我们还无向前推测的资料。

这一举动中间是不是含有苏联外交的成功？我想，这是有

的，但是外交须有事实作根据，波兰一旦放弃其若干年来积极反苏的趋势，在波兰必有认为应该如此之处。此一应该之处即是：波兰认为德国在最近的将来中是一个更大的威胁，而苏联在目前不是他的威胁。

在东欧洲中，阴谋与侦探的两个中心点，尤其是对苏联，一是波京华沙，一是李加。在华沙反苏的空气一向是很浓的，当年之亲德，只是疏法不是亲苏，至于亲苏，在波兰建国二十余年的历史中还不曾有过一天。今于亲德数年作了无穷的肉麻无聊事以后，忽然一转，必于德国之威胁，苏联之力量，有一个重新的估价。以波兰之熟知苏德事，决不会不曾考量，无所知而负气为此。

这一件事，对中国有何影响呢？我想，这一举对我们不能说有何种不利。第一，在国联中少了一个向我们捣乱的急先锋，少了一个承认伪国的候补者。第二，德日意反共协定，以及在不久将来之军事协定中，少了一个最有力量的候补人。若说有何大好处，也嫌太早，因为这也不是真能迅速安定欧洲之因素。

从此波兰对德是疏远了——无论他如何解说。几年中，希特勒之坐大，波兰帮他不少，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现在他或者已经觉悟了他的威胁一部分是他自己造出来的罢？波兰自然还想和墨索里尼拉交情，但是有何成就，也不得而知。

我们可以知道，《慕尼黑协定》后之方向，也是不安定的。又可以知道，一两个月前对《慕尼黑协定》乐观者，未免也有些不成熟罢。

读者觉得我这一篇文字中，只有事件之分析，而无“国际正义”之引用，这诚然。但是，最近几年中，国际正义何在？主张是一事，正义又是一事，强国可以有主张，弱国不可不认清事实。至于这些年的国际事实，其原理只是一句话，“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至于其眼光，只是“目前阶段”了。

（原载1938年11月29日《中央日报》）

1939 年

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

在11月初我们即在报纸上和报纸以外听到些英美对日将取“经济报复”的说话。这一件事，酝酿了两个多月，还不见分晓，有些人未免感觉失望。但是我们要知道，国际间形势的演进，总是迟缓迂曲的多，何况这样大事。这两个月中的形势演变，处处指示我们，这事的酝酿正在积极进行中，或者在最近有一种方式可以实现，实现之期间，大约是在美国国会讨论完内政之后。

英美两国之对中国问题，有个根本相反的所在。美国政府对中国之态度，是绝对可靠的，但美国政府领导美国舆论之力量，甚不如英国政府领导英国舆论之力量，而美国舆论，尚须多少操纵的工夫，方可给政府于发动后一个后盾。英国则不然：他的舆论，自中日战争开始时即趋于激昂，美国政府却多方抑制他，尤其在抵制日货一点上如此，偏偏英国政府领导舆论的力量又是很大的。这样“一上一下”的形势，自前年日寇开始攻侵以来，无形中给日寇一个大帮助。但是，形势演到目前这个阶段，这个“一上一下”的状态颇有改变，在最近的将来更有大变之可能了。

先谈美国政府做的工夫。两年中束缚美国政府行动者，无过于其国内之孤立派，这一派不以党派为限，而有其普遍的力量，尤其在他们国内所谓自由主义者，所谓基督教会中，有甚大之势力。本来罗斯福总统所执行的（或者可说希望实行的）外交政策，固是民主党的正式外交政策，也是共和党的正式外交政策，但每党之中都有些个孤立派，于是外交政策之分野，并非党的分

野了。前国务卿司汀生常说，罗斯福总统是懂得外交的，偏不敢有所作为，他不懂得内政，偏要多所施作。在巴纳事件中，他和竞选总统的共和党领袖蓝顿写信给他，赞成他的外交举动。这都可以证明孤立不孤立无关于政党。前者在此京会议后，和在巴纳事件中，美国政府颇思进一步制裁日本（并不是打仗），却都被他们的孤立派在箭在弦上时打消了。美国政府鉴于此而失败，不得不慎重，故用工夫先自转移舆论起，即先自减少孤立派的势力起。似乎他们希望在去年夏天便可以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这事虽未如其预料之速，大体的趋势都是如此的。不幸有所谓慕尼黑四强协定，给美国孤立派一个绝大的鼓励，使得罗斯福一时闭口无言。却也幸而又有德国排犹的新事件，其荒谬绝伦之处，使得美国犹太人，有自尊心的人，略有人道观念的人，大动情感，尤是使得所谓基督教孤立派以及在理论中分世界国家为“有”、“无”两格，无形为德意两国辩护的急进孤立派，难乎为情。美国当局似乎是充分的利用这个机会，以图推进其外交政策。既表示其为舆论所领导，又想更进一步的领导舆论。同时日本小鬼虽不曾又公然的向美国闯祸，如巴纳事件，然而“关闭门户”，抹杀九国公约，并公然的暗示其不承认（在答覆美照会末节中），实在给美国政府一个易于运用的机会。此次美国对付德国反犹太的态度之严厉，固不是专为东亚形势而然，却是很有帮助于其东亚政策之积极化。照平常的道理说，在美国舆论这样涌起反对德国反犹之下，应该暂时把中国问题忘些，然而同时两件事俱在报纸上表显其重要。看来美国政府是想把两件事（对日对德）作为一事而一举应付下来，其方法都是取经济方面的。

12月份的美亚（Amerasia）中有里夫（Earl Leaf）氏一文，统计美国舆论对日本否认门户开放之反应。其中要点云：

……一星期中，各地各报著社论论此事（日本否认门户开放）者至少有七百家。分析这七百个社论，可以看出在这一回日美关系紧张时，美国人的情感如何。

……对日宣战？不是。这固然不在话下。但还有中间的办法用起来可以使日本觉悟。美国的记者，不是正在要求这些办法，便是认为此等办法为日本毁约，“关门”，摧残美国商务之行为之不可免的结果。……

假如国民的公意可用全国的报纸作代表，在外交事件上，如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已经得到美国人民的“强固的一致的赞助”，这赞助是赞助他们的停止在经济上赞助侵略者，并帮助为侵略而受害者之政策，这不仅是对受害者之同情，尤其是为开明的自利心。……

七百社论中，只有十个，反对政府在经济上有所举动。……七百之中只有十个！

试看美国政府的办法，对日本一个公文又一个公文，指示其抹杀门户开放政策。在这一点上或者有人觉得美中不足，他何不将领土完整一齐放入，因为这两事正是《九国公约》的两个要点。但是为导引美国舆论赞助政府起见，他这样措辞是更妥当的。这些步骤，显然都是为着有所动作。照美国的法律，大总统本有对妨害美国商务的国家停止其最惠待遇之权（在实行上即是增加日本货进口的税率），然而国务院似乎不想小试，不试则已，要试则稳当的广泛的试。在国会开幕之日，参院经部分改选众院经全部改选，民主党之多数减少时，罗斯福竟这样的勇敢演说，指斥侵略国，其语气之重远超过以前的，想必是已经把舆论准备好了，否则鉴于比京会议巴纳事件之覆辙，何至作出如此勇敢迈进的态度而无所准备？过去一年中，罗氏在内政上威望稍减，然在外交上则威望日隆。看来行动是不至着空了。

英国情形却另是一样。历来的美国政府是最不可靠的，他是永远在迁就他所认为事实道利害中。日本之蛮横，德国之霸道，意大利之凶狠，都是他为“均势”辅植起来的，现在都去咬他。自前年日贼侵占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他对日本是步步妥协的，事实上即等于步步鼓励。直到11月初，张伯伦首相在国会发表其

荒谬的说明，（他说中日战争结束后，日本无钱了，所以中国的建设仍须英国帮忙!）惹起遍天下的责难，尤其是在美国，英国政府似乎才转方向。本来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很靠不住的，幸而有一大便利于我国之处即日本态度太猖獗了，太不为他留地步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其中的一个含义即是把英国势力自华北华中乃至华南一齐赶出去。果真日本独占了东亚，不特香港难保，半个大不列颠帝国是在威胁中的。以英国政府之顾虑实际利害，对此等必来而显著的事实，自然是透彻明白的。加以德意之进步，日益骄横，张伯伦政策之以加速度趋于失败，英国政府更不能不顾虑到美国的同情。本来张伯伦在9月末之两度飞往德国，终于成立了所谓《慕尼黑协定》者，其政策固在妥协，却也不止是无条件的妥协，而是一面妥协一面整饬军备。一面向德意让步，一面不肯失去美国的同情。上两事可以说是相辅的，但所成就者是拖延而不是解决，下两事是相反的。张伯伦的目的，似乎不仅是拖延而是想能解决。从前一义说，他算办到了，果真拖延至今。但是拖延些时候终于不免时，则发动时间是否比不拖延更为有利，那可就难说了。从后一义说，他的失败是十分明白了，他的退让政策只可以引起更多的欧洲问题，决不听解决任何的欧洲问题，意大利对法之无理要求，尤其可以看出这事是越闹越糟的。于是英政府不能不转向美国拉拢。有两件事是大可注意的。其一是艾登之访美，艾登本是一个不赞成政府现行政策的政府党，照常理论，他访美似乎无多意义，但他之访美，却是英国内阁通过的，并且报告给国会过，这就大可注意了。其二罗斯福在国会演说后，张伯伦竟正式的发表声明予以热烈的赞许。这个演说，是抨击独裁国的，而张伯伦之声明竟发表在赴意叩头之前三日！这里边的微妙，颇可看出些了。张伯伦虽仍然仍旧妥协，并更积极的叩头，但是下一步的事，他并不是不准备着。英国人好对中国人说“凡美国人所能办得到的，我们都能办到”。其实这是空头人情，为大英帝国整个的利益着想，在远东不能不拉拢

美国“偕行”，即其整个的外交政策，也不能不迁就美国些，尤其在妥协趋于失败之后。

在下列的几个情形促动之下，英国政府不能不对日趋于积极，一是日本之公然声明要独吞东亚，二是日德意之联系必将加强以资敲诈，三是英国之不得不拉拢美国。在这整个的趋势演进中，英国之又忽然对日妥协，可能性极少了。

报载今天（10日）张伯伦赴意，此行之结果，可以预想到，表面上必是热热闹闹，公报上必“开诚相谈，成就不少”，事实上必于大事件上一无结果，因为墨索里尼的要价，张伯伦应承不下。所以张伯伦之个别妥协策，必将没落，而罗斯福之整个防备策，必将抬头。在这个趋势中，英国对日态度自然要转于积极。

英美合作本有许多困难，英国不放心美国，觉得他言大而空，不着实际。美国更不放心英国，以为英国是老猾，专为自己的利益，用人做猫脚爪。一个怕对方是空炮，一个怕对方半途自行妥协，使得伙伴出相。所以英美合作，固然需要国民心理的根据，而方式上亦须讲求的，此点在美国尤重要，因为政府的举动必须使得人民相信，他不是上了英国的当。这个方式，似乎一年中已经试验成功了，即所谓“平行动作”也。

根据以上的考量，我认为英美对日之经济报复将在一两个月后成为事实，即美国国会把内政军备讨论完了以后。

连带着还有两个问题：一、这个报复是否可以扩为战争？二、这个手段是否有效？现在分别把他的答案写下：

第一，这一报复决不至扩为战争。我们要知道，英美必是先断定日本决不敢扩大战局方才肯采用这个手段的。自卢沟桥事件以来，日本人学当年意大利受制裁时的样子说，“要干预便是战争”。这调固然可以吓人，但是，张鼓峰事件及此次对苏联渔业交涉，切实证明了日本决定无扩大战争之诚意。苏联看穿了，乃更强硬，英美看穿了，经济报复说乃抬头。

第二，这个手段虽轻，然在日本的今日，却很容易收大效。

此在战争开始时，或者效力太轻，在今天，日本是已经打了十八个月的了。日本的经济力量是脆弱的，在打了十八个月以后，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到差不多了的今日，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些外汇。如英美给予这样一个打击，他的购买战争及工业品原料是无所出的，在战时发生此情况是不能支持的。

（原载 1939 年 1 月 15 日《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三期）

政治之机构化

在欧洲，近代政治之进展程序中，有一个出力不出名的大工作，是无穷的无名英雄以无穷的努力才把十九世纪晚年的成绩奋斗出来的。这个大工作叫做政治之机构化。历史上很少记载这些英雄的事业，并且很少记载这些事绩的演进，因为这些事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列国政治运用之效能，正多由于这一点上之进步，这是潜心看近代史的人都该知道的。

原来欧洲也不曾有机构化的政治，虽说有些自中古传来的遗物和遗训，支配着行政，所谓"有机构的政治"是不发达的，所以政治不外乎宫廷之谋计与斗争，行政外不乎人事之消长与变动。所以列国之间"兴也勃焉，衰也忽焉"，这都是因为个人的分素太重了。在中世纪和近世纪的初年有些地方，其地方自治颇能机构化，其政府却不能，这样的欧洲国家在后来也都趋于衰败了。只有英法两国能于较早的时期中把政治机构化，这个事业随着这两个国家的开拓而开拓，随着这两个国家的进步而进步。其中英国尤能在此一道上擅长，法国却以政治常常剧变差居后列，在十九世纪约六十七十八十诸年间，英国政治和一般行政之机构化在世界上居第一位，其能发挥其巨大国力，这当然是主因之一。政治之机构化即等于我们国中的一句常言"上轨道"，设若这轨道不是过于不合理的，上了轨道自然可以发挥政治的大力量，不上轨道自然是乱轰轰相消相灭，决不能发挥政治的力量。

有时可凭大人物之努力，不曾机构化的政治也未尝不可照耀一时，如中央亚细亚时常掘起的豪杰，如铁木真一流的人物，但，这终不是国家百年有道之长基。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中，本来也有两派的争论：一派主张人治，以为“有治人无治法”；一派主张法治，以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这一套争论，直到黄梨洲手里还辩论不休。凭借近代的经验看去，两种说法，实在“相反而相成”。历史上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在创造或改革的时代，似乎人的分素格外显得重要，在守成的时代似乎法的分素有莫大之力量。其实这个印象，不尽可靠。在创造或改革时，虽靠大人格为推动力，而其推动之成绩必须能够安定下来，方才可以算做真实的贡献，否则“人在政举，人去政息”，纵使可以在历史上留一奇迹，终不能开拓三百年的泰运。想把成绩安定下来，保持到后来，必须把政治机构化，因为人是无常的，机构是有常的。开创的时代固然要“法”，守成的时代却也要人。若使守成的时代只注意法之保持而不问人之能不能，自然不久便腐败下去，到了腐败，所谓法者自然也坠地了。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洋洋大观的世界中，大可笑古人何以只能看到一面。其实法治人治是一事不是两事：有治法然后有治人，惟治人方能用治法。

以上所说，虽不免如辕固生所谓“寻常家人言”，却实实在在是政治中的一个要义，发挥起来，固可守成一部大书，缩约起来，也不过是两句话——治人治法，相互为用，缺一不可；求政治上轨道，非机构化不可。

近几年中，中国政治的进展，其神速为明初以来数百年中所未有。其所以有此成绩者，固然由于人力之发挥并不由于法治之运用，但若为中国常久着想是不是如此便足，我辈心中不能不有所顾虑。我并不是说不重视人的因素，我们知道拨乱反正当然要靠人的因素。但就历史上看去，创业是一阶段，定功又是一阶

段，前者靠人力，后者恃机构。制度是国家的根本，中央亚西亚旅风式的起落，在政治中是不可为训的。

从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以来，十年以上了，似乎尚未能把政治机构化。其所以如此，自然有其不可免的原由，内部纠纷，至于战争，外来压迫，不得喘息，都是使建国工作受影响的。但这些事实固然是不可抹略的事实，凭此事实固然可以恕谅至今政治之还不曾机构化，然而政治之还不曾机构化却也是一件不可抹略的事实，为建国起见不能不加以注意，且谋改正。

所谓政治之机构化，换句话说，即是“政治之非个人化”。在这一个要求中，并不是忽略个人的因素尤其在拨乱反正的时候，这个人因素是绝不可以忽略的。但若是政治完全靠个人因素，这政治決不是近代政治，凭这政治以成立国家，不能稳固的。

政治之非个人化，可以从多方面去看。自封疆大吏之僚幕制进步为官属制，是“非个人化”之一例。以考试为用人之标准而实行“文官制”（Civil service）也是“非个人化”之一例。但政治之非个人化不止于此。举凡各机关之能发挥其职权，国家制度之受尊重，法令之能切实奉行，下级在职者之能施展其才能，皆靠政治之能摆脱不需要的个人影响。拿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同一机关，如果他的长官在错综的人事上有好地位，事情便好办，否则不易办事，到处遭人的忽略，或至藐视。这是把个人的重要性放在国家的政务之先了。又如，办事好讲交情，甲与乙要好则相助，不要好则相梗。举例，假设和财务当局要好，领经费时便可省去很多麻烦之类，这是把个人的关系放在国家的责任之先了，尤其不可为训。又如同为国人，同样服务，某也某也自居为某人的人，亦被指为某人的人，某进则一大批人弹冠相庆，某退则树倒猢狲散，这样不由主义与职任而由个人关系的结合，自亲戚至于徒党，也是不使政治上轨道的一个大原因。中国若要现代化，非扫除这些毛病不可。

有一个什么会，最近塌台了，负责清理积案者，发现了原主办人的便条子好几寸厚。会中虽有一理事会而永久不曾开过，有预算，也不曾照预算规定的项目实行。这个现象在中国目下各机关中似乎相当流行，这是应该彻底矫正的。有些教育界出身的人也有时犯这样毛病，真可叹惜了。一部或其他一机关的长官，无论如何智慧过人，赤心为公，如不靠组织使同僚发挥其才力，但靠自己，是不易成大功的，独断尚是一个办法，独办却不成一个办法啊！

想把中国政治机构化，须有五年的大努力，上下一致的决心，并且要牺牲某项某项的小方便。在抗战中有些事固然行不通，然也有些事未尝不可作。以下举出几事，有的目下可以加以注意，有的在战事胜利结束后不可不加以根本的改良。

一、欲求政治之能机构化，不可不先把机构单简化。政治之能机构化，是要先养成这样一种普及的习惯，方才可以推行下去的，机构如果太复杂了，一般人不易养成遵守他的习惯。目下我们政府的整个组织实在过分复杂些，求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固不可得，求其互相调节，亦不可能。且以其复杂之故，自然容易引起人之逾越，因而“复杂”成了“机构化”的障碍。

二、法令必须自上遵守，不能因人事上有何一种方便一时间加以忽略。如果感觉某一法令有何不好之处，自当计较他的如何更改，但在未更改前是不该拿他来迁就人事的。

三、制度及法令不可常在改动中，若常在改动中则永久不能建设政治中的秩序。至于关系国家根本及人民行事者，尤其不可常改。政治中必有了秩序，政务方才容易推行，常改动的状态中是不能出产秩序的。

三、国家治，必须“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然后国家可以治。所以“尚贤”应当是民国立政的根本，“亲亲”却是“民国思想”之仇敌，所以有一切任贤避亲的法制与习惯是当从速建立或养成的。

四、各级官员的职权必须划分，下级的人不可侵上级的权，上级的人尤不可侵下级的权。因为下侵上权，已经可以招致政务之紊乱了，而上级的人代下级办事，更容易使其僚属全部木偶化。一个机关里的事务每每是很多的，必须一切职员均能发挥其智力。然后可以办得好，其中指臂之间自然要有条理，主管者自然要有决断，但下级人之创见不可抹杀，下级人之智力不可不使其发挥。若不然者，久而久之，一切僚属都成木偶人或应生虫，这个机关便僵化了。

（原载1939年1月29日《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五期）

在参政会提案

谨案：近十年来，中国政治进步之速，超迈历史上任何时期，今日在此艰难抗战中，虽政制之修明尚未臻于至善，而建国之本根亦颇立其轮廓。此诚由于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昭示国人，故国人识得正途。蒋委员长以勇毅仁厚策励群伦，故群伦于焉奋发也。日寇识此，乃不遑待，乘我方兴，肆纵暴虐。政治之进展虽速，而外来之祸害亦亟，则与其自信于无缺，毋宁详检其或有所不足，为有补于抗战建国也。夫在治平之世，忧国者犹日安不忘危，遑论今日之国都再迁，强寇深入者乎？

虽然同人等不敢释其忧虑者，固不在大政之方针，亦不在官僚奉行之效力，而在一二在高位者之人选。何以言之？数年来施政应敌之大计，政府领袖屡以昭示国人，国人无异词也。在日寇侵略卢沟桥时，蒋委员长曾于牯岭以“应战不求战”之大义明告我辈，我辈由服膺而信赖，由信赖而无异议。自抗战以来已历廿月，累次蒋委员长昭示之大义，既得全国人士之热诚拥护，亦经参政会郑重决议宣示其拥护，故曰我等忧虑不在大计也。今日国人上下一心，虽智能长短有所不齐，然多数军民无不尽其最大之努力，其人事之不济者又每经蒋委员长力予矫正，四方翕服，故曰我等忧虑不在群僚服务之效能也。然而大计之行，必待执行之大员，庶政之修必有表率之人物。若今之行政院孔院长论其地位，虽不如责任内阁之首相，亦等于美国之国务卿，其才能信仰是否足以奉行蒋委员长昭示之国策？其人物是否足以表率群僚，

清慎恭俭？其威望是否是以砥砺国民为之兴奋，其信誉是否足以昭信友邦，增加助力，同人等既不能无所疑、即不能不深致其隐忧也。

夫涉及人事者，同人等愿求慎重，故两度开会哽而不言，然今日之局，兴亡所系，此任所关，涉及国本，内驱于良心，外关之清议，故今直抒其隐忧，以成国民政府之注意。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第十六条："凡与抗战建国有关之事项，均得提出为议案，但其内容不得抵触三民主义。"同人等既深感此事有关抗战建国之前途，故不得不为此建议，且拥护政府，其情出于至诚者，其希望政府之止于至善，亦应至甚，若对政府漠然，方可于此等大事无所关心。我等深信抗战建国必完成于今日政府之手，故今日政府之地位必当极其巩固，今日政府之威信必当为全国士民所热烈膺服，故大事似此足以减少人民对于政府之信赖者，不能不引为隐忧，此固忠于国家诚于政府者，所应有之态度也。

谨将所闻所见一般人士对孔院长不能释其忧者，约为四端述之。

一、大凡执行之人，应分政策之决定者同其意放心态，然后可以胜任愉快。今国家之大计，我等固闻而服膺，如孔院长之言行，是否与此一致，则凡留心此事者皆不能无疑。即就上届会中末次会彼之演说论之，其对抗战建国之信念如何已明显矣。

二、当此建国期中，居行政院长之任者，应以才能忠尽表率群僚，不当以豪侈肆慢，昭示众人。今日奢华之风，实以财政界居首，在香港者，尤为中外所指目。孔院长自兼无数公私职务，较之元丞相伯颜官衔二百六十四家者，似有过之。一人之精力有限，势不得不假手亲牵之左右。则夫因自己忽略而从胜，因手不借柄而纠纷，亦事理所必然。此非建国对应树立之政治风气也。

三、孔院长之在高位，久为全国上下所侧目，自东至西，自南而北，各级士民，无不以为言者，其影响青年心理者为尤大，此中是非曲折，固难悉论。然即此"国人皆不贤"之一事实言

之，已足以减损政府之威信，非所利于抗战前途也。

四、友邦人士，尤其是英美人士，对我国抗战之努力，固不胜其钦佩，然对我国之政事财务仍不释其怀疑，议论所集，亦皆集于孔院长一身。今日我国正需要友邦之多助与速助，此一事实未可忽也。

基此考虑，拟提请政府慎重注意此事，则抗战建国之前途幸甚。

（未刊稿，写于1939年2月，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拟请政府制定《公务员回避法》案[①]

(1939年2月20日)

查公务员因籍贯而回避，因亲族而回避，在明清两代，本有定法，行之数百年，国家实受其利，个人稍约其私，其在欧美，虽以社会情状不同，回避之办法固颇异于中国前代，而其有回避之严明法规，或公认之社会习惯，则一也。民国以来，吾国之旧制无形废除，泰西之良规未予采纳。驯至一县之署，庶务会计每是县长之内亲，一局之内，心腹左右必置局长之血属，此政事上一大退步也。此风至民国十二三年之北京政府而造其极，后来国民革命军力量达到之处渐行改善。近年之会计员制度，尤于改革此习多所贡献。然千里之程，今犹未达有半也。流寓西州，所见者尤使人不能释然。夫国家之治，在乎"贤者在位，贤者在职"，若以乡谊宗戚代贤能，其不易为治可知矣。民国之本在乎众人机会平等，若以乡谊宗戚，故受公家不同之待遇，则近于封建社会矣。据此理由，拟请政府制定《公务员回避法》，并注意下列各点：

一、关于籍贯者。查籍贯之回避，前代旧制，今日多不适用，盖籍贯多因交通进步而不固定，省界观念亦较前为减，若限定本省人不为本省官，亦未见其利。然援引同乡过滥之事，今犹未免。即如数年前在南京之某部，刊其职员录，一切无异于常

---

① 编者按：此文原题中有"关于内政。参政员傅斯年、胡元倓、马君武等提"。

式，独不注籍贯，则以该部职员，或皆是一省之人也。拟请于此项法规中，明定每一不关地方之机关，用任何一省人不得超过全数百分之几（例如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一省之机关用其省内任何一县人不得超过全数百分之几（例如不得超过百分之十），庶几滥引同乡之习，得其矫正，而北方各省，尤其是西北各省，亦可杀其不平之鸣焉！

二、关于宗族者。古者聚族而居，故宗族之规避甚严，今日家庭趋于单简，此项回避，亦可减少。然夫妇，父子，兄弟之应相避，今犹古也。今日中国若干良好公私大学中，尚不许夫妇共职，而最新之国家如美国，犹禁兄弟共服务于一机关。诚以此项事情若不规避，则赏罚均无以取信于人，又助长谄谀逢迎之风，其结果必至公私不分也。夫以俾斯麦之相业，内外翕服，独以用年过中年之子为秘书招朝野讥议，至今为白圭之玷，然，其子实不过左右侍从，无丝毫权能□。罗斯福以数年之力，训练其在社会上早负名誉之子为秘书，亦不过左右侍从，无任何判事之权，然而美国哗然，至今犹在讽刺中。然则此时我国正在创立建国之政风者，尤应不苟矣。拟请明定夫妇父子兄弟在同一机关中或在直属之机关中，遇有主司隶属之关系时必须回避，于仅为同僚者，亦应限制。

三、关于戚属者。此类回避，应比往制加强，盖卅年中社会变迁，已使戚属重过宗族矣。在北京政府时世人谓庶务会计为“妻舅老表官”，彼时贤者有所不免。今虽稍变，犹未根绝。此之应规避，无异上项所述之家人父子。此皆为害之最要点，与其谓为观瞻，毋宁谓为事实。盖在此情形下，二人亲戚之居上者，虽贤亦难于赏罚严明，其居下者，虽谨慎亦难于不侵职耳。此类之限制，应与第二项同其严格。

至于回避之范围，及其实行之步骤，在立法者当必推求其详，不具述。凡此陈意，固本诸“天下为公”之达道，亦求合于人情世变之适应，平凡而易行者也。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八九两案合并审查，第八案第一项交立法院参考，第二项与第九案第二第三两项合并。关于事务官之回避办法应予规定，交立法院酌议具复。

（收入《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纪录》第64—65页，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39年4月）

附录：拟请政府制定《公务员回避法》案（稿）①

查公务员因籍贯而回避，因亲族而回避，在明清两代，本有定法，行之数百年，国家实受其利，个人稍约其私。其在欧美，虽以社会情状不同，回避之办法固颇异于中国前代，而其有回避之严明法规，或公认之习惯，则一也。民国以来，吾国之旧制无形废除，泰西之良规未予采纳。驯至一县之署，庶务会计必是县长之内亲；一局之内，心腹左右必是局长之血属，此政事上一大之退化也。此风至民国十二三年之北宋政府而造其极。后来□□革命军力量达到之处，渐形改善、近年之会计员制度，尤于改革此习多所贡献，然千里之程今尤未达其半也。流寓西州，所见尤使人不能释然。夫国家之治在乎"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若以乡谊宗戚代贤能，其不易而治可知矣。民国之本，在乎众人机会平等，若以乡谊宗戚，故受公家不同之待遇，则近于封建而达于共和矣。据此理由，拟请政府制定《公务员回避法》，并注意下列各点：

一、关于籍贯者　查籍贯之回避，前代旧制，今日多不适

① 编者按：此为傅斯年所拟提案稿本，与正式提案在文字上小有出入，故附录于后，以备参考。

用。盖交通大变，籍贯多不固定，省界观念亦较前为减，若限定本省人不为本省官，亦未见其利。然援引同乡过滥之事今犹不免，即如数年若在南宋之某部，刊其职员录，一切与常式无异，独不注籍贯，则以该部职员，几皆是沿海某省之人也。拟请于此项法规中明定每一不关地方之机关，用任何一省人不得超过全数百分之几（例如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其一省之机关用其省内任何一县人不得超过全数百分之几（例如不得超过百分之十），庶几滥引同乡之习，得其矫正，而北方各省，尤其是西北各省，亦可减少其不平之心焉。

二、关于宗族者　古者聚族而居，故宗族之规避甚严，今日家庭趋于单简，此项回避，亦可减少。然夫妇父子兄弟之应相避，今犹古也。今日中国若干良好公私大学中，尚不许夫妇共职，而最新之国家，如美国，犹禁兄弟共服务于一机关。诚以此项事情，若不回避，则赏罚均无以取信于人，又助长谄谀之风，其结果必至公私不分无疑也。夫以俾斯麦之相业，内外翕服，独以用子为次官，招朝野人讥议，至今为白圭之玷，然其子实不过左右侍从，无丝毫权任也。罗斯福训练其在社会上久负名誉之子数年，然后用之为秘书，亦不过左右侍从，无任何判事之权，然而美国漠然，至今尤在讽刺中。然则此时我国正在创立建国之政风者，尤应不苟矣。拟请明定夫妇父子兄弟在同一机关中，或在直属之机关中，必须回避。

三、关于亲戚者　此类回避，应比往制加强，盖卅年中社会之变化，已使亲戚重过宗族也。在北京政府时，其人讥谓庶务会计两职为“妻舅老表”官，彼时贤者有所不免。今虽稍变，尤未根绝，此之应回避，无异上项所述之家人父子。此习为害之最要点，与其谓为观瞻，毋宁谓为事实，盖在此情形下，在上则虽贤者难于赏罚严明，在下则虽慎者难于不越职分耳。

至于回避之范围及其实行之步骤，在立法者当能推断其详不具述。凡此陈义，固本诸“天下为公”之达道亦求于人情世变之

适应，陈义平凡而重要，自之无甚高论也。若并此亦不能实行，诚不知困难安在？是否有当，敬乞公决。

（未刊稿，原件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关于财政的提问

参政员钱端升、周览、陈博生、张忠绂、傅斯年等五人询问：

请问财政部长，伪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之伪币，据调查所得，已有若干？此项伪币流于华北五省(冀察晋绥鲁)者，及江浙二省者各约若干？我方能否用外交或其他方法使在沦陷区内(尤其平津上海)外国银行商得各该行总行之同意，拒绝以伪币为交易之媒介(如售卖外汇及存款等等关于此点英外次14日答 Sir Patrick Hanuon 之询问已有何研究及对案)？

财政部孔兼部长答复：

查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钞，据调查报告，截至现在止约为九千余万元，多数流通于华北五省，江浙两地尚少侵入。虽伪组织希图以种种方法贬抑法币，推行伪钞，但以人民信仰法币，故伪钞价值始终在法币以下。作伪钞发行之初，本部即已咨请外交部照会各国使馆，通告侨商，对于伪钞不得收受行使。近又咨请外交部照会英大使馆，依照施行法币时英皇所颁布之命令，禁止侨商一律不收受行使伪钞，所有售卖外汇存款，自均包括在内。同时并向美法各国同样照会，故最近英大使法代办先后赴津，与各该国侨商交换意见，两使俱有租界，决不放弃法币必须维持之表示，英使且再通告侨商，不得接受伪钞。至英外次答复 Sir Patrick Hanuon 询问与英皇命令不符，似有错误，如果确实，政府当续提抗议，予以纠正。

（收入《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纪录》第114页，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39年4月）

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关于内政的提问

参政员黄建中、钟荣光、冷遹、沈钧儒、傅斯年等五人询问：

关于难民移垦一事，内政部经济部及赈济委员会，均有报告，似不尽一致，例如福建省据内政部报告，崇安等十六县容纳难民二万五千人，据经济部报告崇安等三县已移民三千人，据赈委会报告崇安等十县可容垦民八万人，已移难民三千八百人，此类数字何故互有出入，平日事权是否统一？敬请答复。

行政院孔院长答复：

内政部报告系依据闽省政府二十七年十二月间拟送计划，崇安等二十六县荒地容纳难民二万五千人系属准备移往人数，又经济部报告系根据二十七年七月间，闽省政府代电所报，崇安等三县计已移难民三千人，赈济委员会报告系依据二十七年十月间派员查勘报告，崇安等十县尽量可容难民八万人，现已移难民三千八百人。以上三机关报告互异，实缘数字性质不同，以及县份之多寡，时间先后，亦各有差别，实际则并无抵触，再依据国民政府公布之《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第一条之规定，“难民移垦事宜，由经济部会同内政部财政部振济委员会管理统筹，并督促各省政府办理之”，中央各垦务主管机关，对于各省垦务进行，随时开会商办，密切联络，故事权尚属统一。

（收入《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纪录》第 113～114 页，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39 年 4 月）

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关于经济的提问

参政员傅斯年、张申府、褚辅成、张君劢、许孝炎等五人询问：

目下在川滇两省所见，关切民生之重要物品，有不合理的增价，此一情形，固由运输、存储量、法币黑市等原因，然大体由于奸商操纵，则可断言。所有平衡物价之办法，尤其是关于（一）米（二）面粉（三）盐（四）棉四项是否已在推行中？对其收效是否有把握；敬希见告。再此四项关系民生大计，如不调理，有驱民为盗之危险，请政府注意。

经济部翁部长答复：

关于平衡物价一事，本部业经订定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呈经行政院会议通过。此项办法要点为（一）由地方政府会同关系机关及工商团体组设平价委员会办理当地评定物价事宜。（二）应行评定价格之物品，以民生日用必需品为准。（三）规定评价标准，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兼顾为原则。（四）取缔商人囤积居奇，对于违反平价处分及意图投机操纵者，由地方政府向法院检举，依照《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惩治（办法另附）。该办法施行后，对于物价之平稳，及后方社会之安定，可期收相当之效果。至于原询问案所举米，面粉，盐，棉各项。除盐食一项，系属财政部主管，关于陕西及川滇西北各区盐产之增加，及

以川浙粤盐济湘，粤闽盐济桂，川粤滇盐济黔，川甘盐济陕，潞盐甘盐济豫，川盐济鄂，浙粤盐济赣，浙盐济皖，暨抢运战区存盐等事项，均已由财政部统筹办理。（一）关于米谷一项，除贵阳、桂林等处，最近因特殊原因，米价骤形高涨，已由当地主管机关设法平抑外，本年各地收成颇佳，在百物昂贵声中，米价反有降落之趋势。为防止谷贱伤农起见，农本局已从事定价收购，以资维持市价（二十七年一月份起渝市米价表另附）。（二）关于棉花及棉纱布：棉花因需用迫切，市价曾一度高涨，当经农本局积极购运供给，并规定产区标准价格，目前已见平稳。棉纱布因生产锐减，价亦高涨。经农本局实施调整直接供给用户并整批运市应销后，涨风稍挫，市势亦平（花纱布匹供需数量表另附）。就目前情形而论，川、滇棉花供给，似可不生问题。纱布来源，则仍需设法使其充裕。（三）关于面粉一项，各战区内面粉厂生产多告停顿，供需虽不平衡，而市况尚无剧变。迭经本部督促川省原有面粉厂及由战区迁来各厂设法尽量增加生产以资供应。滇省小麦产量甚多，品质亦佳，已派员前往调查，并协助厂商，在滇设立面粉厂，综上所述，评定物价，已定有具体办法，自当随时注意，切实执行。至各项重要产品之供需调整，亦经次第推行，当定能适应战时民生日用之亟切需要。

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

第一条　非常时期各地日用必需品评定价格及取缔投机操纵，除法令别有规定外，悉依本办法之规定。

第二条　地方主管官署，应会同当地有关机关商会或经营日用必需品之同业公会，设立平价委员会，办理当地日用必需品平价事宜。前项地方主持

官署，在隶属行政院之市为社会局，在县为县政府，在市为市政府。

第三条 平价委员会之委员，由前条之机关团体派员充任之，以地方主管官署所派委员为主任委员。

商会或同业公会推派之委员，不得超过委员总数之半数。

第四条 《平价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其办事细则，由地方主管官署订定呈报上级官署转报经济部备核。

第五条 应行评定价格之日用必需品，由地方主管官署，按照当地实际情形，随时指定之。

地方主管官署指定前项日用必需品应先行呈请上级官署核准，并转报经济部备核。

第六条 平价委员会评定日用必需品之价格，应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兼顾为原则；并以左列各款为平价之标准：

一、凡物品之生产及运销成本，未受战时影响或影响甚微者，以战前三年或一年之平均价格为标准。

二、凡物品之生产及运销成本受战时影响者，以其在战后之成本再加相当之利润为标准。

三、凡物品之成本不易计算者，以其经营所需之资本总额，再加相当之利润为标准。

前项第二款第三款之利润，由平价委员会酌拟，呈请地方主管官署核定之；并呈报上级官署转报经济部备核。

第七条 平价委员会对于业经指定之日用必需品，应依前条规定之标准，先行拟具调查步骤及平价方法，呈请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办理之。

第八条 平价委员会评定日用必需品之价格，应呈由地方主管官署公布，地方主管官署认为不适当时，得令其重行调查评定。

第九条 平价委员会得呈请地方主管官署，命令当地生产或销售日用必需品之工厂商号，将生产成本购进售出价格及存货数量随时报告。

第十条 平价委员会应就市场供需情形，随时注意日用必需品价格变动原因；必要时得呈请地方主管官署，自办运销或委托其他机关办理。

地方主管官署，依前项规定，自办运销或委托其他机关办理时，应先行拟具办法，呈请上级官署核准，并转报经济部备案。如有此项办法时，上级官署应切实监督，以免流弊。

第十一条 平价委员会对于工厂商号或私人囤积大量日用必需品，得呈请地方主管官署，依评定之价格，强制其出售。

第十二条 平价委员会应按月将办理情形及市场供需状况，呈由地方主管官署，逐级转报经济部备核，所定办法，经济部得核定或修改之。

第十三条 违反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为意图投机操纵，依《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向法院检举之。

一、生产或销售日用必需品之工厂商号，同业间互为买卖之数量，不得超过实存现货之数量。

二、生产或销售日用必需品之工厂商号，不得依标准物买卖日用必需品及以差金计算盈亏。

三、日用必需品在市场上之期货，非经营

该项日用必需品之同业不得互为买卖。

第十四条 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为违反平价之处分。依《非常特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向法院检举之。

一、不依第九条呈报或呈报不实者。

二、不依平价委员会评定之价格出售日用必需品者。

三、囤积或藏匿大量日用必需品而违反第十一条规定所发之命令者。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日施行。

重庆市熟米价格及来源简表

(单位市石) (二十七年一月至二十八年二月止)

年月日单价					来源及数量
27	1	1	11	50	
27	1	15	11	50	
27		1	12	00	
27	2	15	12	86	
27	3	1	11	80	
27	3	15	12	00	
27	4	1	11	50	
27	4	15	11	00	
27	5	1	11	00	綦江 13.045，合计 4 160、长寿 1 870、涪陵 1.730，江津 1 630；南溪 1.470；
27	5	15	11	00	江安 1 310，永川 1 010，泸县 940，忠县 430，白沙朱沱 2.180，山米 1.600，其他 1.965；
27	6	1	11	00	綦江 14 870，合江 6 420 白沙朱沱 5 820，永川 3 830江津 2 685 泸 1 788 南溪 330 江安 210
27	6	15	12	00	宜宾 120 涪陵 1 650，长寿 890，忠县 360，山米 18 000其他 340，合计 57 350 石

续表

年月日单价					来　源　及　数　量
27	7	1	1	20	长江上游（綦江合江江津泸县南溪永川宜宾江安）合计 32 950
27	7	15	10	40	长江下游（涪陵长寿忠县）1 850 嘉陵江（广安）190 山米 18 600 合计 59 920
27	8	1	10	60	长江上游计 36 590 长江下游 41 600 嘉陵江 3 110 山米 18 600
27	8	15	9	00	合计 62 460 石
27	9	1	9	00	长江上游计 38 140 长江下游计 770 嘉陵江 20 480 山米 18 000
27	9	15	8	90	合计 77 390 石
27	10	1	8	50	长江上游计 32 760 长江下游——嘉陵江 42 705，山米 18 600
27	10	15	8	40	合计 94 650 石
27	11	1	8	70	长江上游计 21 010，长江下游 410，嘉陵江 49 430 山米 18 600
27	11	15	8	70	合计 88 850 石
27	12	1	9	00	长江上游 23 600 嘉陵江 48 650，山米 18 600
7	12	15	8	80	合计 89 050 石
28	1	1	8	40	
28	1	15	8	80	
28	2	1	9	50	
28	2	15	9	80	

附注：以上数字系根据□市粮业公会统计记录二十七年五月份以前无熟米等级系河下上下等熟米价格。

加花纱布匹供需数量表（二十七年七月至二十八年六月）

甲，川滇黔桂等省自给不足需要进口数额估计

棉花　150 000 市担

棉纱　200 000 件

布　　800 000 匹

乙，农本局福生庄拟购储数量

棉花 500 000 市担（内运川 250 000 市担）

棉纱 40 000 件

布 200 000 匹

丙，估计已进口及将进口数量

棉花 150 000 市担

棉纱 120 000 件

布 500 000 匹

丁，估计待进口数量

纱 80 000 件

布 300 000 匹

（收入《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纪录》第 114～117 页，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39 年 4 月）

地利与胜利

从倭贼在卢沟桥寻衅起，到现在二十二个月的中间，我们根据经验，可以判定倭贼作战的总策略是这样的：用他认为最相应的代价，换取我们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在一处呈胶滞状态时，另从侧面袭攻，或在距争夺处甚远之另一区域进攻，使得我们感觉着调动上之困难。倭贼用这个方法侵略我们，自始至今没有例外。细细想来，他只能用这个方法，更无其他方法可用，因为，若是他想找一个地方和我们决战，是做不到的，若在交通于他不利的地方，和我们消耗，他必然更认为吃亏，所以他只有取这样一个策略。去年春天，我在汉口听到一位为我们效力的外国军事家说，“日本的战略，是欧战前德国陆军学校教科书上的办法”，这话形容倭贼的似有变化而实无变化处，再好不过了。倭贼之终必归于全败，也就要在这个战略上决定了。在德国，乃至在全部欧洲，除苏联外，所发达的这样战略，都是为国家较小，交通发达，工业繁盛，易于速战速决的地方而适用的。倭贼用这法子而不能决，更谈不到速决，则其失败的运命，便算注定了。

看清楚倭贼的不变动的战略是如此，则我们可以定出一个最少消费、最有便利的策略，在各地相互照顾着使用，使得倭贼这样的战略不发生效力，而早归于失败。我们这个策略的原则便是：充分利用我们现在所据地形上的优点，迅速补救我们地形上的弱点，使得我们的“腹里”成不可攻之地位；而运用我们在东南和西北的两臂，使他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据，不发生任何

效力。

这一个原则的具体实施项目，不是在这一篇短文中所能说完的，现在姑举其中的三个重要纲领。

第一，我们要充分发挥江南山地中地形的便利，使得倭贼沿江的深入失其重要。自抗战以来，最能利用地形上的便利者，可以拿山西的战事经过做例子。我们在山西，失去了正太同蒲两路的时期颇早，但我们的主帅决定，国军并不自山西退出，而且更派生力军时常加入，使得倭贼在此地，如同陷在大泽中。一年以来，倭贼之不能南向渡河以窥郑洛，西向渡河以扰秦夏者，以此为主要原因；倭贼人力物力在此一带消耗之大，亦以此为原因。以山西喻江南，现在倭贼虽在长江游弋，近来又得到南昌，但是如想在江南更有进展，可就做不到了。浙江全省，除了浙西三府杭嘉湖以外，都是山地，而桐庐以西，富阳以南的地势，尤使得敌人不敢在浙江进展，皖南大部分是山地，恰似江西之西北部山地，俨然等于山西的吕梁中条，草木之掩护，水流之交错，更使其胜过山西，这一地带的据守，关系江南的战局甚大。所以我们的军民能合作在这些江南山地中利用地形以抗敌，一如山西的局面，不特南昌之失可以补偿，更使敌人无在江南发展之可能。看来地形最便利于日本者，是海岸，其次是长江，铁道已不甚便当，公路更差，所以他无论在哪一省，都不能离公路甚远的县镇活动。然则江南山地之扼守，是使他沿浙赣、南浔、粤汉北段，各种图谋诚费力而真无效用的。即令他能在江上伸一臂到鄂西，我们却也在陆地上，尤其是山地里，伸一臂到浙东，他还不是江上逍遥而已！这些江南山地，在今后的战局中，关系更大，我们的主帅和将士，必能发挥他的最大效用。所以南昌之失，事实上不算很重要。

第二，因为倭贼的战略，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大致可以料定，他在每下一步的攻击地是何处，而预谋对付。从他在大亚湾登陆算起，他之敢于在广东登陆，是他料定英国当时的心理，不

是他愿在华南出大本钱。接着犯海南岛，也是同样的把戏。接着修水一带，也是要占交通形胜，而不肯出大价，不过事实上他出的钱比他预料的高多了。自今而后他的方向，我揣断如下：就华中华南论，他决不会在北海登陆侵略广西，纵使在那一带的海岸上强力占个据点，其情形不过与占厦门一样，其作用无非空军海军在海南岛之对岸有个照应；他决无深入广西的志愿，因为广西的地形，既使他深入不利，而广西的民众组织为各省冠，尤使他深入即等于寻死。至于由广西境向百色攻以胁滇省之一说尤其是绝对不可能，这层优虑，在后方的人，大可不想。为这层忧虑太近于幻想了。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尽人力，坐着恃天险的。地形之便利，必须以人力运用，否则虽以三峡之险，如不拒守，历史上也曾有人一步一步进来。然则他之不敢自海上犯广西仍是怕我们在广西的布置，加以当地的地形，遂成不可犯之势。其实他在北海一带占个据点一件事，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他的海军炮火究不能达到海岸内五十里以外，他在海岸上不过得到沙鸥，一离开沙鸥的领域，便是他遭打的地方了，他决不肯出大代价的。然则倭国贼军下一季向他国民报销的是什么？我想来，仍是鄂中鄂西及洞庭湖西岸一带。我们知道，自平汉粤汉两路失其联络以后，我们的南北交通，在川省以外者，靠一线复杂曲折的公路，自洛阳至湘黔一带。他必图谋切断这一条联络，他可以趁洞庭湖水涨向西岸城市开炮，更要趁江水尚未大涨，在荆地水区活动。但这一层我们早料到了，当局早把精兵良将放在这些地方，来则送死而已。环顾长江以南全部形势，倭贼更无便宜可赚，南浔路上，算他最后的一个便宜了。常有人顾虑到的，由南昌到株洲，由岳阳到长沙，倭贼是决不得通的，大致他也不会在这些道路上尝试。

第三，我们用作抗战复兴的根据的川滇黔桂四省，固有其地形地利上之绝大优点，亦有其缺点，发挥其优点，补救其缺点，是现在当务之急，亦是后方军民应日夜不息，合作进行之事。川

省之东面、东南、北面，都有大山，层层叠叠的峙立。北面则汉中之北山形更佳，所以这几省的地域，可以说是不可侵犯的区域。但是，最好的形势是外面有崇山叠关不可侵犯，内面却要交通便利，我们的条件，合于上项而不合于下一项，目下由滇至川，及由川至陇，交通上之不便，大大的要补救。我不是说，我们对这一事上努力少，开辟这些山路实在千难万难，目下的成绩，已大有可观，但为将来长期抗战之便利，待办的事仍然很多。我们希望，滇川两省间的交通，至少要有两线，愈偏西愈好，既省运费，又少空袭之损失。目下叙昆间之公路，听说快要通车，这是云南人民对国家的又一个大贡献，我们希望这条路可以合于甲种路标准。此外，由滇省至西昌的公路，能早成就更好。至于大理以北直赴西康，也应该有一条公路。打开地图看，这一处的地形，自然甚不便于修路，但当年忽必烈由此路来率大军数十万，灭大理，灭缅甸，虽说蒙古兵以骑兵为主体，这一条路终非不可通的，不过沿途人烟稀少，征工太不容易了。由四川北出的公路，似乎也是太少，目下的局面，似乎过于集中南郑。而不经南郑，循嘉陵江上流至天水的一条路，也许在军事运输上同叙昆公路有同等的重要。总而言之，川滇间应有两条公路，愈西愈好。川陕川陇间也应有不同的公路，愈西愈好。“腹里”的交通网组织成功，然后外环的险要，得以利用。果然到了后来，日本人“狗急跳墙”，不避牺牲的集中攻打我们区域，我们在“腹里”调兵仍是很方便的，倭贼真要技穷了。以上是举例说地形，以下再举例说物利。川滇黔桂四省中，两富而两穷，幸而有一大好处，就民食平均来说，米大体可以自给。如不能自给，则是管理上的问题了。四省之中，只有贵州米不够吃，这是有法子调剂的。我们前方的战士，不少是吃小麦的，所以小麦的生产应速求其增加并当抑其高价。这个“腹里”，食虽大体无问题，衣上却须当局操心一下，如何屯积棉布，增加麻布，增种棉花，都是应该立刻努力进行的事。其次是药品，这也要大量屯积的（阔

人的补药，以及一切介于有用无用之间的“注册药”，自然除外)。以上的一切要紧事，我在川省所见，似乎筹办的还不够快，而一切浪费如重庆及其他市上一望而见的汽油浪费，各种日用洋货的浪费，还不见厉行取缔，这是可惜的。尤其重要的是，在抗战期间，决不可任大多民众感觉到必要物价沸腾之苦痛。诚然，我们不是一个自给的国家，但是，四省中过半是出超的省分，粮食的产量又不少，使人民生活，尤其是劳苦大众，相当的安定，不是办不到的。举欧战作例，欧洲各国，皆不自给，英法虽有海上交通之便，却也大受德国潜艇之袭击，至于德奥，简直是捱饿。但是，他们在战争中涨价极微，尤其是食物。这都由于处理得严，处理得快，管理得密，管理得强。总而言之，在战争期间，国民经济应该自给自足，生活指数应该相当安定，这样才可以精神奋发，才可以努力奋战。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以上所说，仅仅是举例，因为遍论在本文中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些例子的原则本是很明显的。这原则便是“必求尽其人力以运用地利，胜利之左券在此”。

（收入《傅斯年全集》第5册第217～22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9月初版）

抗战两年之回顾

自倭贼在两年前的7月7日，无端袭击我们的宛平县城（旧名卢沟桥），到了现在，恰满两年。这两年中，我们的同胞虽然饱受艰苦，大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充分表现其伟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在这个表现中，看定了最后的胜利，光明的前途；以后的中国历史，要比四千年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光荣伟大。所以这次的大艰难，已是缔造将来的大光荣的基石。

综合这两年中的事迹，可以看出几个重要的现象，现在分别来说：

第一，愈战愈疲的倭国，愈战愈强的我国。这虽是一句恒言，但也是铁一般的事实。本来中倭两国的力量大相悬殊，这也就是倭贼敢于屡次下手侵略我们的理由，但是倭贼却未料到我们在南京陷落后不瓦解，我们在武汉广州陷落后不颓丧。在对我们无利的地形上和他摩擦了两年，而现在战事转到与我们有地利的地形上了。我们之所以越战越强，其原因不一，今举其主要者：第一，我们有全国一致非常信赖的领袖，而倭国没有。在我国，是上下一心的，人人感觉到亡国之惨；在倭国，老成人为国耽忧，少壮军人为国惹祸，实业家不得已而听从军人，却满怀着忧虑，一般民众，能听宣传，虽能甘从，却也莫名其妙，所以没有人能决定国策，没有人能统率全局。一个驻意一个驻德的大使，竟能迫击内阁，使其改换严重决议。如此看来，倭国真不是一个现代有组织的国家，而我国的组织，经此抗战却远比他现代化

了。第二，这个战争，在我们是自己救命的奋斗，在他们是侵略战。因为是救命，自然发动出所有的力量；既是侵略，虽然倭贼素受侵略主义的教育，素有侵略的经验，究竟侵略与救命在一般人心坎上是不同的。第三，倭贼的头目，每次告诉他的国民的，没有一次实现，他们总是说，某处某处可以不劳而获，某点某点可以少出代价，所以《动员法》不待全部实行，在目下状态中，当可兼与苏联英国起衅等等。然而这两年中的历史是何如？他出的人力物力的代价是怎样？他现在是不是能真与苏联英国开衅？他的头目，由此知道前言不符后语了，他的国民当也感觉万分无聊了。在我们，我们的领袖说：南京陷落无关大局，陷落后抗战精神及力量应当更强。事实正是如此。我们的领袖说：武汉广州之陷落无关大局，自此以后便转为优势，便要有大胜利。事实更是如此，乃有鄂北晋西晋南之大胜利。所以可以说，倭酋的宣言，无一确切实现，我们的昭示，无一成为虚语；在这情形进展中，自然他们越弄越疲困，我们越来越自信。第四，江海的沿线，平地的地形，是与我们不利的，所以以前固守，付出的代价多；自南昌陷落之后，此一局面告终，以后都是山地战，离开铁路，或且离开公路，我们发挥这个地形的便利，以后的斗争，决不需前者这样之代价了。况且我们在这两年中，一面抗战，一面练兵，目下尚有数十万的精兵未用，而且同时在更大的规模中继续训练着。所以西方半壁，固如金汤，倭贼不再来送死，则鄂北晋南已开定例了。第五，我们的经济组织及工业化，原来固远不如日本，但这个斗争入于现阶段中一个有利的形势，所以我们能穷打，能苦打；日本则差得多，工业对于国力，是一个大贡献，却也是一个大担负。在此一点上，日本的忧虑，比我们要多得多。

第二，我们的军事力量，实有惊人的伟大。日本的新军力，有数十年的历史，当然是很有他的优点的，所以若以军队之近代化而论，我们的军力自然不及他。但是，我们这几年中，在蒋委

员长领导之下，军力的进展，实在神速，尤其难得的，是一面战争一面增加军力。这个进步，以速度论，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若舍去近代化而论，现在中国的军力，是比得上几个历史上的时代。这不特是我们的敌人未曾料到，即我们自己，事前的估量也未必如是之高。这个历史的考绩，是表示我们民族的伟大力最明显不过的。我们要记着，现在我们的军事力量，比前年上海战争时，增加了几多倍了。至于在近代化上缺陷颇可以“攻守异体”，“哀兵者胜”抵偿。故在军事上，我们绝用不着忧虑。

第三，新教育之表现其力量。这里所谓新教育，专自清季以来之新制而言，尤其着重在五四以来之开明运动，近几年中之民族主义教育。在今天，回想我们在小学时代——前清光绪末年——真正是两个世界了。现在的青年，以考上空军学校炮兵学校为荣，尤其是在好家庭中之青年，有此志愿；至于一般“老百姓”爱国心之发动，更可以看出时代的转变。诚然，受新教育者尚有不少的人去做汉奸，可见在教育上还要努力。但是，以百分比例算去，可见目下的局面出在二十年前，或十年前，汉奸要多好些倍。一切北洋军阀，无聊政客，今日知自爱者极多，足证时代之进步——所可耻者，还出来一个汪精卫。

第四，政治上也有好的开端。战事可以作为改良政治的准备，但政治不能在战时大量改革，这本是一个不可移的原则。所以，我们如果希望一下子到了儒家梦想的“唐虞三代”便也是做梦了。不过，这两年中，政治在精神上已有了大进步，国家意志成立，共信心成立，因共信而互信，遂有真正统一。在这里新国家之基石就奠定。夫共信不立，则互信不成，互信不成，则统一不固。战前之统一运动，成就的颇偏于表面；自抗战以来，乃有心理上统一，即是真正之统一。所以抗战是建国的训练，抗战是建国的基础。

综观两年中的趋势，我们是一天一天的上升，日本是一天一天的下降。自今而后，就国内论，地利人和更好过以前；就国际

形势论，慕尼黑的恶迹，已将结束，欧局将有大变动，而影响及于远东，倭贼将随其贼伙而没落。所以大光明的前途，正在不远。然而天下事总在人为，成功总在努力。现在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一切力量到最大限度，人尽其力而不偷闲，物尽其用而不浪费，人得其才而尽厥职，政治昭明而感大众，这是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必能办到的。

（原载 1939 年 7 月 9 日重庆《今日评论》第二卷第三期）

1940 年

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

汪精卫的卖国行动，到了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而登峰造极，自从前年12月底，汪贼发表了所谓艳电之后，其行动之荒谬，一步赛过一步，全世无不称奇，国人无不觉得可耻。然而总有很多人，以为其中总有几分上当，虽以深恶痛绝他这为人的人，也还在报上预料他要在几个月内死到倭奴手里，盖以为弄来弄去弄到山尽水穷，总还要和日本人扯皮起来，而遭了倭奴的暗算。谁知道虽是深知他痛恶他的人，也料不到他竟能迎合追赶日本人的志愿到这步田地，"虽是日本人，时而觉到汪之允许迁就之容易，大吃一惊"（报载高陶所说）。然则凡以为汪贼之动机，尚有半分上当者，都是错看了他，高抬了他，他是一个彻底的汉奸，甘心的卖国者，只有一个不可一天不做大官的欲望，而不惜断送他的四万万同种人，和他同种人的历史与子孙，以达到他这欲望。

所以汪贼的行动，只有用"罪犯心理"分析他，才能了解。我不是这一行的专家，姑且把我所知道的几点写下来，供心理学家检讨。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我在广州两三年，颇听说他的家世，尤其是母系的情形，他不是嫡出，而家庭中不是极端的守旧，严父之后，又有严兄。最初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造成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他要作"人上

人"的欲望，而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也许就是这样环境造成的罢。那时候，广东闹得如火如荼，血流满街，一多半是由于他，我也在其中几乎送了性命。后来"宁汉分裂"一幕，他又是主角。当时我听到一位党国前辈老先生说他过去的行动，而归结着说，"精卫在政治上必做不出好事来，因为他从来说话不算话"，像有主义，又实无主义。同时我又听一位党国老先生说："精卫全无新知识，只学南宋人作诗词，这就是没出息。"当时我游西湖去，他的一个亲戚向我说："你们觉得汪有聪明吗？他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学法文一个字也学不进，活似老牛一样。"这些话，我虽觉得很有意思，然以当时并不识汪，不知其深刻到何程度，只见得一出一出翻云覆雨的戏，觉得其人可怕，其事可痛罢了！

二十六年夏在庐山聚会，汪作谈话会的主席，其言语举动甚不自然，回到南京，几个朋友闲谈，说这真有些不像政治家的样子。但同时还都有点可惜他，说唐有壬那个小子所造成的"心理疙瘩"，至今还存在。沪战将开，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作主席，我也在里边，每周至少开会一次，有时两次，在这会中，自然常听到汪的妙论，于是使我想到在"北伐"、"宁汉"时代所听到两位老先生对他的批评，觉得深切不过。当时我的印象如下：第一，他决不知政治，一谈政治，有时好听，却全无实质，只可骗初听高论之无辜者，决不能耸动听过两三次以上的人，而且遇事都是滑调，浮着而不进去。第二，他标榜的口号，无一不和他的性格矛盾，譬如他高谈民治而绝无容量，标榜理智而最好动感情，反对复古而自己是一个不良传统的文人，常看到他做着主席发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气之原因，那么只是些心中的"疙瘩"（Mental Complexes）在那里时时发动罢了。第三，他对于外国事情，莫名其妙之程度，诚可骇人。他每读文电，遇到外国人之名字，连法国人的名字在内，一齐念不出来，总使这会的秘书长代读。然则欧美国家之存在，在他心中，也比在同治年间军机大臣的心中，差不了许多。

这些观察，只可以证明他在政治上之决无希望，尚不足以证明他之必做汉奸，所以他今日之必作汉奸，尚须进一步求之。有人说：他的婆娘所谓"陈璧君者，太糟糕了"，这话颇有些不错。她也是专心要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不过，这话虽可说是一个原因，却不能说是主要原因。此等大事，既受妻之影响，自须由其自己负责任。譬如武则天，后来做的事，当然要由唐高宗负其责任。谁要唐高宗宠她信她，何况汪贼之作汉奸是他自己现在做的事。

然则以上所说各项，只是助因，其主因决不在此。主因何在？在他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发而为偏要作"人上人"的要求。上文说过，庶孽子弟，有时有他的特别心理组合，我这话并不是说庶孽子多如此。自古以来，庶孽子中，甚有清明高朗之人，可追延陵季子遗世克让之风者。只要母教好些、家庭的环境正常些。不过，以我所闻，汪贼之早年环境，决难说是正常，于是"人上人"之要求，成于个人的心中，害了国家的大事。夫"不度德不量力"而求作"人上人"之要求，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

至于汪贼在政治上偏要做"人上人"，应该完全是他家庭环境所造成，而决不是政治活动所造成。何以呢？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他便狂妄的以第二任总理自命，他夫妻两个，从中国到南洋，招摇来招摇去。中山先生当年绝不曾器重他到这样，只是他自己自命如此，是他自己的心理自命他如此。中山先生当年用他，大有分寸，总未交他政治的总则，施设的任务，用他之处，说来好听些，是"书记翩翩"，因为他的文章确是漂亮，说来不好听些，便只是使他"吊丧问疾"。因为他那一副对人似乎恳切的面孔，只好如此用，不料他竟妄自想象，以为"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乎非做中国主人翁不可。当年与胡展堂先生之龃龉，何尝不由他之妄自尊大，由此心理，兴风作浪，十年前已

经不恤生民涂炭，今天更不恤民族沦灭。大凡领袖之欲，压人之愿，本为人类所共有，然而用如此不顾一切狠毒到尽头之手段行之，则除具有罪犯心理、凶险疙瘩者，焉能做到这步田地。不晓得他小时在家如何为人看不起，到老时在国如此陷害人。

当年契丹有一个大可汗，把渤海国灭了，封他的儿子做东丹王，王渤海故地，却把小子立为太子。这东丹王便大怒，当他父亲死了，由辽东渡海逃到登莱，降了中国，并且做了一首诗，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汪贼今日之投日本，正是这个投外国的心理，不过，东丹王毕竟是契丹的长子。在封建时代，他这心理还有点根据，在汪精卫之以中国主人翁自命，却全是自己狂妄梦想，毫无根据，那么东丹主的死鬼若有知觉，还要羞见这个后来人。

在妒妇狠毒要做"人上人"之心理上，汪贼倭寇大有相同处，或者这也就是汪贼倭寇可以"合作"之"精神条件"吧。原来日本小鬼也是最富于"卑贱疙瘩"的（Inferiority Complex），看到自己那副猢狲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我想，设若倭奴再长三寸，这疙瘩也许好些，便可少害人些。可惜不然，小鬼之要做"人上人"自古如此，当初识中国文化的时候，认做徐福的后代，误以为徐福是避秦的高人。稍知中国事，又妄称太伯之后，大有与中华世家争正统之姿势。到了唐朝知道中国多了，又造了一段故事，说是在隋炀帝的时候，他的倭王向中国致书，称"日出处天皇致书日没处皇帝"（按，此事虽为欧阳修所采，决非实事，盖如此之文书，隋之边吏难以接受，且天皇之称呼，在唐高宗、武后前，倭奴向何处学来）。在这些时候，一面羡慕中国，先受封，且请乐浪郡守为他判断内部斗争，后又用中国年号（按日本古寺，颇有用唐代年号的遗物），却又一面自大，大得要说是天神下降。直到明朝，他那若有若无的"天皇"，虽然还在那里下一诏，称天下四海，他那实际执政的足利氏，便历世向中国求封为日本国王，即如丰臣秀吉，以欲借伐朝鲜而问鼎中

原，为日本后世人所敬仰，却也受了中国之封（按，此事日本人不承认，然若未受封，万历之诰命何从留下而宝藏之），这样矛盾心理，譬如以庶孽要为长宗，进退失据，自然全是“卑贱疙瘩”所表现。这样心理，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一面模仿西洋人，一面要说东亚本位，凭他这样心理发挥起来，好比妒妇之灭人之门，绝嫡之子，一旦得志，是决不使中国民族存在的，岂只国家而已。

日本人二千年中之历史，从部落到帝国，所表显的心理有两面：一面是要学人，一面是要上过人，一面自觉不如人，一面偏爱凭凌人，由他发挥这个性儿，只能有己无人。试看他灭韩的步骤，先上来说是助他解放，后来便是政治经济独霸，俄日战后，还说是保护国，不久便兼并了他，在当年不是高谈日韩亲善，如这些年之高谈“日支亲善”一样吗？他起初不是谈尊重韩国主权，如现在与汪协定前文的滥调一样吗？他不是对朝鲜人说日韩同种吗？

日本鬼子的性情，完全的得步进步，他今天订的条件，若是明天可以进一步，便毫不含糊的废弃；他今夜说的话，若是回家一想，还可进一步，明早起来，便立刻不认账。几年前在北平听到现在的一位封疆大吏说，日本人的性情有三点：一多疑，二小气，三性急。这样性情，哪有中间妥协的可能，即以他最近的侵略而论，在“九一八”时，他只说要求条约的权利，照他解释条约的权利，转眼便树立傀儡伪国了。彼时还说，要求不过长城，不过一年，便闹所谓“华北问题”了。“华北问题”他自己还未下妥定义，于是广泛含糊的三原则来了。在上海战事初起时，尤宣言世界曰“不侵华南”，次年便先以厦门作试探，继之以广东登陆了。目下他在中国还是进退两难的时候，已经在与汪贼之协定中布置妥了侵略苏联，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根据了。这样的国家，若不在国外遭受败衄，其侵略必无止境，而且快得很，这完全是小人得志，狠妇称心的把戏，对这种人只有

"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凡是甲乙两国订个中途妥协的条约，必须有两个条件，至少有其中之一：第一，定约的对方要守信义；第二，弱者之一方虽稍弱，总亦要有力量维持这条约，换句话说，如对面破坏了，此方还能抵抗，不这样，决不能维持。试看汪贼所定约之对方，是那样得步进步的，是那样说话不算话的。再看汪贼的本身，有一个姓周的色鬼，姓丁的屠户，虽高宗武亦逃之大吉，有这样的力量，还能对日本说"以此为限"。其实这话仍是泛论，《日汪协定》，已经卖了中国整个的平面，并且卖了上苍天下黄泉之立体，无所不包，即无所谓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思想，无不订明使我永为奴隶。这又是何等条约，比之当年日本与韩国所订的条约，犹有君子小人之分了。然而汪贼的狗党，还在那里骗人，说："委曲求全。"试看这些文件，委曲真到了一万分了，求全却在那里？若必说求全，乃是倭贼求得中国之全体，而非国人求得一息之余生。若是国人中还有觉得他这个代订的卖身契，而可一想希图苟存者，直是晋惠帝之劝人凶年食肉糜，白痴而已！

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卖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绝灭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罪犯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若是世界上还应该有人类的话，便当快快把这些人类毒素扫荡去。

（原载1940年2月25日《今日评论》第三卷第八期）

请严禁邪教，以免动摇抗战心理案[1]

谨案：中国历代之大乱每起于邪教，而邪教之深入官吏阶级尤易引起内部之崩乱。在此抗战期中必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心理，然后可以历艰难而不动摇。

蒋委员长有鉴于此，以“精神动员”昭示国人，诚当前之急务，正本之良图。乃有愚陋官长，罔知此义，求田问卜，于今为盛。前本会在汉口时，即□有无数邪教传单，妄测战争之局面，教人“避灾”之符咒，公然悬之黄鹤楼上。本会钱参政员公来等亦曾揭发之矣。今在行都，此风尤炽，零星之迷信固多，而有组织之邪教曰道院饰名曰红卍字会者，流行尤盛。竟有若干大吏，不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而向其奉崇之“老祖”询问避灾求免之道。此其摇动抗战意志者大矣。

查民国初年以袁世凯在北廷登庸腐败分子之故，若干邪教或近于邪教如同善社、悟善社、道德学社、救世新教、盛德坛、灵学会等，曾风行一时，皆多少含有帝制复辟思想。此后各组织渐趋没落，而源自山东之道院乃统一一切邪教而为之长。北伐既定，国民政府以其行为反动，并为残余军阀及官僚托庇之所，曾将此道院下令禁止，并封闭其济南总所。此辈人乃以红卍字会为名，延长其道院之生命，十年之间，势力更盛。查此红卍字会固曾作不少之慈善事业，如施粮掩埋等消极工作，然其背后之道

---

① 编者注：此案署名“傅斯年等提”。

院，则荒谬绝伦之至，与中国思想大相背谬。近日在行都所行者即其一贯之办法，以老祖为祖师，日日向之叩头请训，扶乩训示多与抗战思想有碍。如曰“灾难将了世界大同”，如曰“修道可邀老祖保佑飞机不炸”，如曰“兵不临身”等等，就其积极影响言之，直是破坏抗战心理。就其消极影响言之，至少亦使人懈怠不尽其职责。每日聚官僚商人拜于其坛，并各自拜于其家，而此老祖能诗、能画、能写外国字母（据所见皆不通），近日更有某署长领现在重庆之某外国大使来看，乩中送彼一画，腾为此间外交团之大笑柄。然此犹其表面形迹而已。

（收入《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纪录》第81～82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1940年8月）

为鲁省去岁迭遭水旱、风雹、蝗蝻之害，灾情惨重，民不聊生，拟请政府迅拨巨款从事赈济案[1]

查鲁省各地，去岁春末秋初，均遭酷旱。入夏以后，河伯肆虐，运河、卫河、大清河等，先后决口。馆陶、临清、武城、夏津、东平、恩县、丘县等处，适当其冲，悉成泽国。鲁北之黄河故道，亦复汛滥为灾，两岸庄村，淹没将近二百。未几飓风狂袭，海啸突起，沿海各县，如滨县、蒲台、利津、沾化、无棣、寿光、广饶、蓬莱、黄县、牟平、福山、文登、海阳、胶县、诸城、日照等属，滨海地区，悉被怒涛席卷，庐舍荡然，木草几尽。此外如昌乐、安丘、莒县、诸城、日照等地，复降冰雹，大者如盅，小亦如卵，三百余村，人畜伤亡，不可数计，木为之秃，草禾皆尽。洎届秋末，淫雨连绵，平地水深尺许，海阳一带，田禾沦没，被灾尤重。鲁北小清河沿岸各县，蝗蝻遍生，食禾殆罄。全省灾区之广，灾情之重，实属空前。综计灾民，约达一百三十余万，老弱妇孺，奄奄待尽，少壮转徙，无以为生，敌人乘机诱骗，招赴东北。据确实调查，仅胶济铁路益都车站一处，每日登车赴青岛转轮出口之壮丁即达千余，坐□资敌，诚堪痛心。客岁冬季，虽经华北水灾急赈会拨款三十七万五千元从事赈济，但按灾民人数平均分配每人所得仅二角有奇，杯水车薪，无补于事。况浩劫之余，食粮短缺，粗恶面粉每斤价至三角五

---

① 编者注：此案署名为“参政员傅斯年、杨振声、范予遂、张竹溪、王近信等提”。

分，赈款之惠，难图再饱。现值麦秋未届，青黄不接之际，若不急施拯救，诚恐全活无几。拟请政府迅拨巨款，普遍赈济，用示中央对于孑遗灾黎民不忘爱护之德意，俾免迫赴东北为敌利用。按每人二元计算，即需二百六十万元之数，此系最低数目，实已难再减少。且为争取时间，尤应及早办理。

决议：

一、原案末段“尤应及早办理”下，加“倘能由军事机关派妥员携巨款，前往募收精壮，补充前方，尤有利于抗战前途”数句。

二、本案通过，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收入《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纪录》第 90 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1940 年 8 月印行）

1943 年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所谓"同治中兴"后的一部论时政的书，我现在只是借用它这个名字，内容毫不相干。

清朝晚年可称为盛世吗？这在今天看来真是笑话了，要是盛世，何必去革命？这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老调了。不过，为那个时候想想，也未尝没有一个可为盛世的机会：论地方，则二十年的大乱削平，封疆大吏，如曾、左、李者，皆近代之豪俊，他们都把握着积极接受西洋应用科学之要点。论中央，则恭王奕䜣之明识大体，用尽方法节制叶赫那拉氏之胡为，枢臣文祥之忠勤练达，在当时已知上下一心为立国之本，而遗折谓上议院即古所谓谋及卿士，下议院即古所谓谋及庶人，更见其识见之远。论建设，则新海军先日本而成，江南制造之弘规，福州船厂之经营，以及北洋之新政，皆先日本而创始。论事业，则西北戡定，海上无波。论政风，则陋规虽仍旧，大贪污并无所闻。上文所举诸人，仅李氏颇为子孙计，其实尚不如后来的京堂时代的盛宣怀。若其他诸人，则子孙但能作田舍郎吃一碗饭而已。而文祥之廉俭尤有可称道者。他在总理衙门多年，这个衙门在当时乃兼办外交与新政之设计者。一个公使驻北京多年，临行，文祥饯他，他说："我在贵国供职多年，深佩中堂之人物，很想往贵府拜辞一回。"文祥回答："实不相瞒，我总算是国之大臣了（按，当时恭王在政治上居第一位，他即居第二位，即代恭王办政事者），而敝寓寒陋实不堪招待外宾。"这个公使肃然起敬，回国后把这事

写在回忆录上。由此看来，贾充、杨素之一门极奢，未必即为晋、隋收到“怀庶民，来远人之效”；而亡清的最后一个满洲政治家，在中国史上也值得一笔。论史事是要公平的，闲话少说，言归正传，那“盛世”毕竟盛不起来，其根本的理由是满族实在办不下去了。醒觉的汉人，决无再受特殊阶级统治之理。

今日乃真是盛世，这迥与传统文人所说不同，我们不可因两千年的文化滥用这个名词而不用，因为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名词。而且古时所谓盛世者，到了下列所说，乃为极致，这就是民康物阜，海宴河清，弧矢东来（这就是库页岛的石器渔户来进贡），麒麟西至（这就是阿拉伯贡吉拉弗），越裳南归（这就是我们提携中南半岛的文化），玁狁于襄（这就是去了北方的威胁）。然而照盛极必衰的道理，一旦国家承平如此，必含着衰落的因素，例如大唐天宝时代，便是如此。所以历史上的盛世，每为盛之末，今日之盛乃为盛之始。抗战之实力，先世所稀，不平等之条约一朝而废。惟其为盛之始，故真是盛世，亦惟其为真盛世，乃真需要危言，更惟其为真盛世，乃可受危言。孔子曰：“邦有道，危言。”韩昌黎曰：“惟善人惟能受尽言，况盛世乎哉!”

“破题”先说了许多，岂不费辞？其故实由于我要说明盛世不可无危言也。至于本旨，实说不胜说，岂止如何者一，如何者二，如何者六而已？今姑以日内所常见于心上者，择要写下来：

其一曰：今日乃真卧薪尝胆剑及屦及之时，而决非事既定功已成之日也。同盟国未来之必然胜利亦即中国未来之必然胜利这是绝无可疑的。我们必在几年内打回到老家，并且看见日本没落到明治维新以前的地步，而受到他应受的一切惩罚。又看见我们的国运远过汉唐明之盛世，而对世界将来之维新的大同的文化上有绝重大之贡献。这都是无问题的。不过，实现的时间有早晚，实现的程度有深浅，这却全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早一年，好一年；深一层，好一层，这关系今后五百年的命脉。我尝想，我们

这次抗战，好比唐僧取经，最后胜利是早经决定了的，一如唐僧取经之前，观音菩萨早在如来佛面前说好了的。但是，为功行之圆满，不得不经八十一难，因为不如此不能证真果，在将来即不能佛法常光。所以我们过了一难又一难。到了今天，长夜漫漫已算过去了，“东方明矣”，佛国在望，然而还有好些难，如火焰山、无底洞等等，仍待我们去拼命，若不拼命而坐待的呵，决无到达佛国之理。诚然，我们的领袖秉周公敬德之心，行诸葛武侯尽瘁之事，宵旰勤劳，乾惕震厉，而为其精诚所感以夙夜从公者，固可各处见到。但是整个的看来，我们今天努力是不是已经到了十成呢？这应该是一切人，尤其是一切在重要的地位者，各个反省一下的。目前的局面，原自显然：有百万的倭寇在我们国土之上，占据着我们的菁华，我们必须把他都赶出去。这件事固然需要盟国的帮助，就海军论，这是盟友的责任，英美，尤其是美国，必须彻底解决日本的海军；就空战论，这也大部分需要西半球盟友的帮忙；即陆军一项配备也有待于盟友之处，这都不消说。然而陆地上的厮打死打，可全是我们的事。这一条上，别人帮不上我们的忙，我们也决不期待别人帮忙。我相信，在日本海军彻底打败之后，盟军能在中国地带得到空军优势之时，日本的军心是会动摇的，人心是要不稳的。但是，这次交战国家的经验，皆远超过上次大战的交战国，胜利之希望既绝之后，其支持之能力是大的，而且以食粮缺乏使日本溃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更需准备反攻，提早反攻，长久反攻。这固有关于盟国之接济，也在乎我们的布置，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如何用尽力量而不浪费力量。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口号，这口号便是：一切为反攻。既然一切为反攻，则凡与反攻无直接关系者理应从缓办理，而为反攻所需要者，不论事实如何困难，如有缺陷，皆当整顿，不论环境如何难办，如当改正，即须改正。一壮丁必得一壮丁之用，一加仑油必得一加仑油之用，一斤血汗必得一斤血汗之用。从背面说，其与反攻无直接关系者，纵有关于十年大计，百年树

人，也不妨从缓。因为失地早收复一年，即等于十年建设之效力。瞻念沦陷区之痛苦，顿想到陆放翁有诗为证：

三万里河东入海，八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其二曰：一代之政风，每造于开国之时，而今日正开国之时造政风之日也。今后百年之气运即决于此时。故今日政风之厚薄，实为百年治乱之所系。就中国近代史论，纯由满洲人办事的一段，不值得说了，只从曾、胡时代说起。曾国藩、罗泽南之办湘军，虽说乡人部曲之观念极重，而且不敢"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究竟把握着儒家传统的要点，"言忠信，行笃敬"，诚而勿欺，慎终于始，所以农夫可以作勇卒，秀才童生可以为大将，此中道理，并无如何开新局面之处，因为曾之为人，本亦是皇甫嵩之伯仲，然而规模典型既在正轨之中，一时天辰颇似有一种清明之气。一到曾之继承人李鸿章手中，风气顿变。李于曾氏，亦曾用心效法，究以天性及少小环境之差别，大不相同了。李为一代之霸才，他的做法却也大杂霸气。我们可以说，曾氏正而不谲，李氏谲而不正。一谲之后，自有如袁世凯者出焉。自曾氏在乡办团算起，到袁世凯余孽消灭为止，约八十年，即自李氏创办淮勇算，也要七十年，然而李鸿章谲而不正之影响，直到北伐统一才算大体结束。由此可见风气造成影响之远，风气转变之亦易亦难。新中国本为国父中山先生所创造，而蒋委员长之创新军，纯为主义之发挥，其弘规亦非罗泽南辈所能想见。两公之创造新局面，民物为之一新，追想清末以及北洋军伐时代之日月，恍如隔着几百年，这诚然是中国史上之一奇迹。然而古人有句话"满招损，谦受益"，我们今日政界的风气是否皆可满意，这是要检讨，要改革，要以理想之局面遗留后人的，今日政界的风气，我一时以为大可以注意者有两件事：第一，如何发动人民的力量。这事可以苏联近事为比拟，纳粹攻苏开始时，许多人认为苏联必早败，因为正在清党清军之后，斯氏政权是要遭严重试验的，然而

事实证明绝不如此。这因为斯氏政权虽未给人民以自由，却曾给人民以平等，在封建势力部族杂压之下之人民得到平等，其忠勇是无量的。我这里并不是说苏联可完全为我们取法，但我们却不可不注意苏联是能发动人民力量的。我作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的官，尤其是大官，可以一律“改善”其生活如平民。他们固已有许多如此了，但愿其全数如此。再进一步，“耕者有其田”，何不早些日子施行？今日政府之力量已甚强，根基已甚固，尽不必太多顾虑。如果官不成为阶级，则中国三千年之弊病一扫而空矣。现在官也要抽壮丁了，大是好消息，但愿一切高官之子弟，男则皆从军上前线，女则皆作军人医院之看护，此风推而广之，此意扩而充之，以至于官吏中无富人，有势者不役人，我们的子孙要几百年享受不尽了。第二件事是如何发动在官者尽职奉公之心。诚然，今日奉公尽职之公教人员实不为少，中央如此，地方亦然。然而这个比例，似乎尚未达到理想之大多数，似乎有时与地位之高低，成反比例。做一录事则尽力抄写，做一科员则日夜办稿，此犹可合于孔子之道，曰会计当而已矣。一为司处之长，则有环境焉，有上司焉，有外面之人须考虑其“敌乎友乎”焉。至于长官，则“人事”之困难更多矣。当年胡林翼在湖北与太平军练兵厮打，有个文官是他顶头上司，他已经善于应付了，而犹不时自怨自叹的说：“七分精神对付官制军，三分精神对付长毛。”今日之司处之长，以及更上层之官，究竟用几分精神来办事，几分精神来对付环境？假如用一番宋儒克己自省的工夫，或且偶有人要觉得胡林翼的比例，还不算太坏罢？或者可美罢？其实此等风气之充实也不算难事，只要有几个，或者十几个“其直如矢”之人，“惟仲山甫，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只是就事办事，不顾环境，不畏上下，社会上之风俗可以立刻醇厚些。这尤在乎在上位者之提倡了。这中间自然也不免要有无故牺牲了自己的，然而当此盛世之始，总要成功的。更有进者，欲人尽职，则必先许人以尽言，假之以礼，而不责其言过，然后一机关之中，

首长之与属从，可上下相通，如“鱼之得水”，不仅为主僚关系而已。试看历史上的大朝代，每一个大朝代之安定，总在一个偏于宽放的皇帝手中，例如汉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明之孝宗，其时发言盈廷，好的坏的都有，有些话，我至今读史尚觉不耐，而当时的皇帝耐之。偏偏这四个皇帝的时代，是四朝中人才最盛的时代，为百年开太平，岂不可怪？昧昧我思之，此中大有道理在。常有人谓，此时人才多，彼时人才少，此皆半是半非不是不非之论。人得际会，得其施展，则为人才，所以邓禹当年所望不过文学，马武所望不过督邮。不得其机会不得其施展，则谁知其为人才？设若诸葛亮遇到明思宗，至多也不过几十个宰执中之一人，或至于断头而后已。然则人才之出，在柔性的时代容易，在刚性的时代艰难，只闻“鱼之得水”为佳话，不闻木之得火为美谈。以上所述四帝，盖以柔弱胜刚强为制造人才之道也。然则今日一部之首，一局之长，似皆可体会以上四帝培养人才之道。大凡中国历史上之治世，每每杂用儒术黄老名法，无儒术无所立心，无黄老无所为纲，无名法无所为用，然则以儒术之忠节为心，以黄老之运用为体，名法之事委之于人，“但持大体而已”，乃最便于培养人才之道也。此义又有书为证，《康诰》曰：

> 惟厥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畏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按，其中有一二字，以金文习语改传本之失。）

此事为文王之事，此言为周公之言，所谓“不敢侮鳏寡”，按之《诗经》，乃当时习语，即一视同仁之谓，无关深义。若所谓庸庸祗祗，畏天之威，显民之生，其言何其恻隐而柔胜，不意其出于定功之嗣主，用以述其前王之创业者也。

以上所写姑止于此，若尽性写来，“日上数十简”，可为一个不尽的故事。写后自看一遍，顿觉其中但有敝同乡辕固生所称《老子》的话，“此寻常家人言耳”。并无“危言”，只见“迂论”。

欲改文题，已来不及，不过，《诗》之教有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是耶，非耶，或者不相干耶？

（原载1943年5月2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鲁省灾情惨重拟请中央加拨巨款迅放急赈并实施根本救济办法以拯灾黎而固国本案理由[1]

数年以来，鲁省各县分别遭受水旱风雹蝗蝻之天灾，及敌匪焚杀劫掠之人祸，农作歉收，食粮缺乏，一般室如悬磬之民众，尚须出其仅有之少数杂粮以供军食，罄其残余之资产以供输纳，虽日赖草根树皮及红薯蔓叶等以充腹，其负担仍有增无已；因之弃产夜徙逃往关外者不知凡几，其无力逃徙者，则相率坐以待毙，地亩荒废，耕种无人，惨苦情形，实难尽述。本年春间，虽蒙中央拨发赈款三百万元，暂资救济，惟灾情普遍，灾民众多，一经分配，所得无几。况敌伪在鲁方尽力压低法币之价值，每伪币一元相当于法币六七元至九十元不等，缺乏之食粮既不得不购诸敌人侵占之地区，法币与伪币之比率如是，三百万元之购买力究竟有限，不难计算，故杯水车薪，依然于事无补。且仅凭计口于赈之消极办法，亦难收根本救济之效。拟请中央迅采标本兼治之策，借以拯救灾黎，争取民心，并巩固邦本。

办法：

一、请中央加拨巨款，迅速运鲁，施放急赈。

二、由中央赈济机关派员入鲁，协助发放，并与地方政府及地方赈济机关商筹迅速有效之放赈方法，特别注重我军政力量不能控制之地区，务使灾民切实受惠，不致徒劳无补。

三、尽量减轻民众负担。

---

① 编者注：该案署名“傅参政员斯年等拟”。

四、将地方部队重新改编，统筹给养，严禁自行取之于民。

五、加强农贷机构，增加农贷款额。

决议：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办理。

（收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纪录》第178页，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43年8月）

战后建都问题

我一向总觉着我们的都城之在南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迁都是大事，南京又有它的长处，况且它有国民党建国的象征意义——总理陵园在那里，然而近来《大公报》上常有讨论建都地点的文章。而且胡秋原先生之建都长春说，似诡而正，使我心中发出了平日潜伏着的若干思想。现在拉杂写下，就正于留心此问题的人。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心中先要摒除两个不自觉的错误，第一个是“发怀古之幽情”。我们这个历史长的民族，有这个“幽情”是很自然的，然而为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国家起见，这幽情有时是很危险的，文化如此，建都亦然。历史上伟大时代，都有他那一个时代的问题，时代变了，问题也变了。即如汉高祖之忽然放弃洛阳而向长安，是应付当时内外问题的一个大手段，决非有所爱于终南渭水之风水。何为当时的内问题？当时的情形，居关东有不易控制关西的危险，居关西而去函关大梁间布置着兵站与大库（即敖仓），修好了道路，却可以控制关东。何为当时的外问题？当时的匈奴可以随时到渭水北岸，其建牙之所，虽正对大同，然河套陕北在地形上最便于胡骑侵入。当时定都长安的故事，大致是如下面所说的。陈涉起兵后，项羽败章邯后，关东的革命军都羡慕秦土那块肥地方，与其说是羡慕秦土肥沃，毋宁说是羡慕秦土聚积了无量的掠夺品，所谓子女玉帛者。所以义帝才有“先人关者王之”之约。项羽看不到秦土的重要，分给

三个不能自保的降将，白白的为刘邦之资。刘邦也是一个“富贵归故乡”的人物，所以才有可笑的《大风歌》，不过在建都大事上，确能以理智克服情感，先择好了洛阳，当时的一个大商业城，正是天下之中心。娄敬忽然提醒了长安之重要，他心中活动了。一问张良，张良虽为韩世家，却大赞成长安之说，刘邦仿佛如梦初醒，立刻驾着车奔赴灰烬的咸阳城。欢喜的结果，把姓娄的改作姓刘（可笑），封他作奉春君。这事张良不先说。大约项羽一死，张良的魂魄便随赤松子去了！这一幕戏，从美术上说，不少俗气，从国策上说，极关重要。从此奠定了汉家的天下。如此说来彼一时代对此一时代，彼时代之内外问题对此时代之内外问题，今日若重演“举中国袭之长安”那一幕戏，自然应该以长春或沈阳为都，至少是北平，胡秋原先生真是绝顶聪明人，真是读史得门者。那些主张迁西安者，大多以历史为根据，殊不知当年都西北之根据，即今日都东北之根据也。

第二个要摒除的错误，是全国中心说。假如建国必在中心，苏联应迁乌拉山东，美国应迁芝加哥，这绝不是必要的。诚然以今天空战之发达，都城太近边境，自有大不便处，然必在中心也无必要。决定建都适宜的因素，另有所在。

讨论这问题，我们先要认清几件事实。

第一，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而必须在最近迅速走上工业化之路，若是，则建都最适宜的地方，应当是可为最大工业区域的中心。否则工业化的重心不在国都之四周，便可另成一个经济重心，这个经济重心便可变成一个政治重心。以二十余年前的情形论，北平管不到上海，即以国民政府建置在南京论，上海自有影响南京处。这些年，国家进步多了。金陵控制北方，远不如从前之难。然而一旦东三省北七省工业化起来，农牧改进起来，经济的重心自然在北不在南。还有一事，劳工是今后的一个大问题，劳工的力量必随工业化而进展，于是工业化的区域，自然要产出它的政治力量来，这个趋势在实行民生主义时更要表现

出来的。

第二，中国在文教上确是一个融合统一的民族，然而南北各地之地域性也不算不发达。所谓“省界”一种感觉，仍是多数人下意识中一个原动力。北方诸省，人心中有一个“北人”的自觉，是明显的事实。我自己是一个北方人，以读书服务的环境无多地域性，所以朋友以南人为多。但仍常听到北方朋友或相识对于“北人落伍”之嗟叹，此为非其罪而落伍也。即我自己，除去对于自己的家乡时常恋念外，一切地域感觉算是洗刷得够清楚的了，然而每次蒋梦麟先生开玩笑，说一故事，“你那个卖螃蟹的同乡说你是南方人”，心中总多多少少发点气，每试每中。新教育之发达，在南方比在北方先，与外国接触也如此，加以明清两代长江流域经济与人文都比黄河流域发达，遂形成了今天北人稍稍落后的事实。这个事实，反而助长北人之地域感觉。如此说来，若把政府放在南方，北人的地域性可以发展下去，若把政府放在北方，南人的地域性不会发展下去，因为今后几十年中任何政府，总不免南人占绝大多数。在南则北人或以为“他是他”，在北则南人总以为“他是我”。南北尚如此，何况关内与关外？清朝末年，东三省对内的向心力很强，然自民国初年张氏步公孙氏之后尘，东北同胞之地域自觉，恐怕因政治影响，未必即走衰落的一条路罢。

第三，在空战发达之前，兴国的都城，每每接近边境，只有苟安的国家才把都城放在中心点，前一项的例子，有汉唐之都长安，明成祖之都北平，后一项之例子，有东汉北宋之都汴洛。空军发达，这个例子是稍稍改变了，都城不可太接近边境，然而仍旧需要控制着形胜之地。“都城应建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处”，这是我们必须守着的格言。试看今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处在何一方，这可不问而知。在防海吗？诚然，日本问题不彻底解决，我们的国防最要紧的是海防，但是如果日本问题不彻底解决，而建国的工作亦无从说起，何况建都？所以一切讨论，皆以

日本消灭其大海军大陆军为前提，否则一切不必说了。日本既无大海军，则试问海波自哪一阵风吹来？美国？上帝不许我们想到美国是我们假想的敌人，而不是我们永久的朋友！英国？英国是聪明人，今后决不再作领土冒险了。其实过去一百年之中英纠纷，都是经济发展"与人比赛"两个观念为动力，英国从未曾在远东发展过领土欲。那么，一百年的"海祸"，将以鸦片始，以"抗战"终。即此一点，已足证明由南京迁武汉一说之无意义了。然而在陆地上，这问题决不如此简单，张开欧亚地图一看，为之骇然！我们若以苏联为假想敌，可谓至愚。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不与邻邦起任何纠纷的。但是，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罢。再就日本说，这次必须解决他的大海军大陆军，固为一切之前提，然而灭亡了他也是做不到，不该做的。他既不灭亡而保持其本土，则以小鬼的脾气论，二三十年后必又来生衅，到那时候，仍旧以朝鲜为跳板，仍以延吉清津一道为侵华最方便之路。所以都城在北方，仍是防倭之要着，在南方则时移世异矣。

如此说来，中华民国首都之应在北平，似乎没多问题罢？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下文简称北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

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请看下列几种物品：煤、铁、棉、麦、大豆、盐、羊毛，在这十省之出产量及可能出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几？若说都集中在这十省，也不

为过。西北煤油之希望甚大，西南各杂矿也是国防所必需的，然而比起北十省来，不免以四肢之比本干了。中国地大而物不尽博，煤在北方充足，铁则不足，虽不足，尤比南省多得多。盐之一项，长芦出场费比自流井便宜几十倍，所以西南的盐矿，只能以特殊原因保持着，若用自由贸易法，决难得存在。若论农业，则东南西南山区中费力多而成功少，所用方法，与其说是农业，毋宁说是园艺。北十省中，农业百分之八十可以机械化。从飞机上看江浙农田，真是锦绣山河，若待北十省建设起来，江浙必为穷省，因为丝业已无多年之寿命，种稻又以天气之故，其成本决比不过安南暹罗轻。

中国之资源既集中在北十省，而这北十省又常在危险中，我们便该建都在他的中心点去——北平。

此外还有几点长处，建都北平然后有之：

一、天气。中国的都城至少须达一千万人，这一千万人，若因天气有三个月不能工作，则无形减少工作效能四分之一，死亡提早尚不在内。南京武汉两地，尤其是武汉，夏天太热，无形中减少工作效能一月至两月不等。冬天虽比北方暖，然而煤贵，无普遍温室之习惯，于是走路提着热水袋，在家戴着手套，无形中减少工作效能不少。北平的冬天是最可爱的，煤既便宜到极度，无论贫贱，家家烧煤，所以在屋子里如过春日，在屋子外便可活泼了。北平的夏天有时也热，但晚上总睡得着觉。若厌北平热，则一过古北口，不久便是木兰，即所谓热河行宫者，火车当日可以来回，汽车也可以昨往今返。在木兰为政府夏日办公处，比牯岭之于南京方便何止一百倍？这样，无形中工作效能大大增加了，即是人命延长了，精神不浪费了。

二、现成都市。战后建设万事待办，请问我们的资本何自来？借债是有限的，自力更生要吃大苦的。试看苏联之建设，老百姓在生活上曾出了多么高的代价，或者在最初饿死了多少？我们的物质凭借，远不如苏联，加以此次战事残破范围之大，我们

战后当集中力量在生产上，断不当以建都城为第一义。“大兴土木”，在历史上本是亡国条件之一，这原则今天仍然有效。北平是个现成的都会，其可容人口之数比南京为多。当作都城目下即可应用，其必要之新建设，可在旧城以外，待第三第四次五年计划再办好了。也许日本人撤退时大毁而去，但修补旧城城市总比造新城市容易。

三、有“海口”。这话初看似乎怪了，北平连河都没有，何以说有海口？我们不要忘，运河在当年本是由杭州直通北京城门下的。所谓二闸，我幼年还常去玩耍。永定河白河问题，是容易早解决的。天津之淤塞，实在人事上太不讲了，原不是难办的。把这一区河渠调整好，修一条宽渠，小轮船可以到北京。若在冬天，秦皇岛距北平不算太远，那是一个不冻港。这话是说，北平接近海运，这也是建都的一要点。

四、练兵方便。这却是极重要的一点。今后工业化和建军，未来是一件事。以中国社会之形态论，以近代化军队之须集中训练论，当年俾士麦面告李鸿章的那个办法，就是集中在首都附近练兵，而各地道路修好，仍然是适用的。若以北平四圈各一千五百里为练兵集中之地，各种地形，几乎应有尽有。平地广原不必说，山则真正的大山，可以演习隘口争夺战，可在大山里面建飞机场，因为大山与平地多是直接相连的。戈壁上演习坦克，沙漠中演习进军，渡永定河之争夺战，湖沼战斗（胜芳一带湖沼甚多），雪中战斗，夏秋大雨中战斗，皆可曲尽其妙。只缺少热带森林战之演习场，与中国南方小丘陵区域之地形而已。至于南京武汉，只有稻田与小山两种地形，大规模的飞机场已不易寻，若凿山的飞机场更为难能。我现在遥想未来的强大中国，其“邦畿千里”之中，大工厂、集体农场、练兵场、飞机场，错综着成一幅锦绣图案，这样近代文化的伟大的美丽世界，比起那故宫建筑、江南风景，后者算得什么呢？

有人问我，北平作都城，与建海军之影响如何？我想这是没

有什么关系的。近代的国家，不是上古与中世的城国（City-states），不需以海军基地为建都之条件。说到这里我们要想想我们将来的海军是怎样的形态。我想，我们永不以侵略为主义，永不争霸大洋，大海军是不必要的，只是一个轻型护卫舰队，已经够我们今后一二十年担负的了。这舰队中，要有两个大巡洋舰，专为每年访问华侨与友邦之用。其主力应为潜水舰、驱逐舰、轻快巡洋舰，至于主力舰与航空母舰，我们根本不需要。沿海应该建设些海军要塞，而旅大与卫海建设好了，渤海便是一个中国湖。再加以朝鲜必然永远是我们的盟邦，渤海中也有二三不冻港，北平之"海上安全"，比南京好多了。

北平作都城，只有一个大毛病，就是离内外蒙古交界处，比较还是太近些。这个地方，我指锡林卓布盟与车臣汗交界处——一片大戈壁——而言。我们不要在"实际问题"中幻想我们的边疆还在外蒙古之北的买卖城呵！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的今后外交，应该以"协和四邻"为主义，而且我们既这样住在强邻之旁，不更可清醒些么？

再说对于其他建都说之意见。

武汉，我以为最无建都价值的是武汉，持此说者，每以天下之中为言，而建都在天下之中者，总是心中包含着一个对四面八方国内国外都害怕的心理，这先要不得。且看造天下之中一说之老祖宗如何说的，他说，"有德易以昌，无德易以亡"。我们只看到东汉北宋都洛阳汴京（即所谓天下之中者），易以亡，未看到他如何易以昌。至于汉唐之都秦，明之改都燕，在当时都是建都边塞。还有一件事，很可以形容边塞建都之意义。明成祖改都北平后，在仁、宣、英三朝，时有改回南京的意思，所以南北各部的印，时有改换，忽而此间加"行在"，忽而彼处加"南京"。但是，这个"复元主义"，到瓦拉之寇，英宗被虏，便无人提了，北京虽然围得那样危险，而当时及后来的朝廷，也就从此知道北京必为京都了。独怪黄黎洲，他是明朝人，应知本朝事，何以重

责明成祖之迁都北平，到英宗时已经半壁江山了，何待努儿哈赤起来？复以，武汉并非天下之中心，于是持武汉说者，又有人口集中说，殊不知天下最无法搬动的是地形和资源，最容易搬动的是人。

西安，西安是个将来可以发展的都市，天的赋予也很雄丽。不过，按以近代大国国都的条件，还缺少很多。第一，吃水先有问题，渭河在冬天，吸涸了他，也未必够一个千万人的大都市之用。至于凿井之法，本不是大都市所能用，况且在西安必须凿得极深，即等于用时耗费电力很多。第二，燃料无法解决，米麦尚可运来，若一千万人的一切燃料都须自远方来，其生活程度必然在全国经济中成一毒素了。至于建筑资料，也只能靠陇海一条铁路运，这也是不了之局。其实今日"开发西北"之说，毋宁改为"救苏西北"，除矿业外，所有农牧的改进，其最大前提是使得山可生树，地可长草，其办法则是调理水道，减低冲刷。这样开发之效要在数十年之后了。唐代泾渭垦地亩数已远比汉代为少，到今天，自西安一渡渭桥，便有沙漠之感。所有汉朝陵墓旧地，在当年都是复道叠阁，在今天我有一次去看，时值 5 月之末，草还未绿呢。李元鼎先生对我说，他小时，九十两银子可以买一所像样四合房之木料，到今天，这样木料直无从买去。若一切依仗陇海路，则我们须知铁路运输比起海道运输来真不知贵多少倍。民国十五年，我有二三十只书箱自柏林运上海，由柏林至汉堡的铁路运费，远比由汉堡至上海的船运费为高，当时虽德国的铁路有赔款负担，然而德国船走苏彝士河也有特别担负。所以我们的都城若离水路到达的港口很远，国民经济是大受损失的。今日国都之要求，何止汉唐时代之几十倍？然而今日之西北，又止当汉唐时代几分之一了。

长春沈阳。这说本是北平说之偏锋文字，我既主张北平，可以不论。

南京，其实南京也有不少的好处，它有北平没有的条件，其

地位仅次于北平。国都应该自南京迁北平与否，完全看我们今后立国的决心如何。若照东汉安乐主义的办法，便在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汉开国的魄力，把都城放在边塞上，还是到北平去。不过，不求安乐者，子孙有时可以得到安乐；求安乐者，每不得安乐。个人国家皆是如此的。南京的长处我不多说，因为这篇文本为北平说张本，而且说得已经太多了。

写完，友人看了问我，“你想，讨论这问题有用吗？难道你觉得这问题值得最先讨论吗？你不是说，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吗？”我只笑而不言。而我这位朋友问得不放松，我说，“你把这篇题目改作‘如梦令’好了”。

(原载1943年11月29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1944 年

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在近一百年中，中国造成的伟大的失败固有好几件，而伟大的成就也有好几件，这伟大的成就之一，便是中国由一个古老式的国体，变其形态，加入了近代列邦之兄弟圈中。

这个改变的过程，自然都是过去的事，但其中的意义在现在还有启示性的，所以不妨简略说一下。中国历代的国体，只有罗马帝国大体上可以比拟，这就是说，他不承认甚且不知道有和他平等的国家之存在。罗马帝国固与当时的北方民族信使往还，但他只知道这些民族是些夷狄，他的使者塔西土斯写了一部他的《索虏传》（*Tacitus de Germanes*），他与东方波斯国的萨山涅王朝常在构兵中，这是东方文化很高的国家，但他也决不承认波斯是他的平等国。所以罗马帝国便是古代欧洲的“天朝”，他平衡四周一切的民族，全以他自己的标准为断，所谓“外国”，只是蛮夷的代名词，而非不管他的事之谓。同样道理，历代的中国，除去宋辽一段似乎有点平等国交以外，也是不承认且不了解世上可以列国分立，平等交往的。汉晋隋唐这样，近代的明清也不是例外。积累二千年之习惯，陶冶在普天率土，中国四夷之观念之中，更以过去的成功坚实其自信心，所以自明末远西人始到中国以来，求通商者总说他是入贡，派信使者总说他是来朝，这并不是当时人矫情造作，当时人的心中确如此想，且不能相信更有其他的观念可以存在。且看乾隆时期英国派遣玛加纳伯爵奉使来华，乾隆给英王的回信（两通上谕）所说的话，如“咨尔英王，

海外输诚，重译向化……”一类的话，若译成白话的英文，便等于说“你这个野蛮的国度呵……你不安于你的僻陋的状态呵……羡慕天朝的文化呵”。这在今天读来，不免觉得这位弘历可汗真正糊涂，但在当时人却绝不能觉出他有万分之一的胡闹来。我记得 1922 年我在伦敦有一天听哲学家罗素演讲“中国问题”，他就把这诏书的直译读来，惹得会场笑死。他接着说：“若是觉得这话可笑，便不了解中国对外关系之历史的背景；若了解中国，便应不觉得这话可笑。因为中国正如罗马帝国不知世上有他的平等者，这是在当时环境中所必然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数十年间，与外国人的纠纷，常常由“天朝体制”而起。我看李鸿章在辛丑议和中的电奏，若干关涉主权的大事，在西安的流亡政府并不关心，只是严电李氏力争外使初觐坐黄轿一事，从此可知天朝的宝座，不肯轻易拆除，天朝人物的立场，不是轻易改变的。

但是，这立场，这宝座，终于几度在战舰火器之下拆除了。辛丑以后，办洋务者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住大埠者养成一种新的心理。这个顺应次殖民地地位之心理，赤裸裸的说出，便是洋奴。

天朝的心理是自大，也是所谓优越感（Superiority Complex），洋奴的心理是自卑（Inferiority Complex）。也是所谓劣贱感，这两种心理，都是不能与他国共处而能处得自然的。

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洋奴心理阶段应该告一结束，而抗战数年，不平等条约取消，这两种心理似乎全成过去。但是，我们不可大意，这两种心理因有他们长期的传统，并未在人人心中除尽。必须除尽，我们国家方才舒舒服服的繁荣在近代列国的兄弟圈中。读者以为我这是过虑吗？我想未必吧？我看见期刊中常常有妄自尊大的怪文，也每每听到变相“刚巴多”的怪论，这都是阻碍我们取一种自然态度的。

中国既已加入了近代列国的兄弟圈，自无取乎往者的两项态度。今后的外交态度，既非自恃，亦非倚赖，而应该是万邦协

和。这一个名词在中国固是一个成语，在拉丁文亦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成语，即 Commitasinter alias。所可惜者，朋友告我，倭奴也用这个名词，用得他全是倭奴的曲解，犹之乎他说“王道”全是“霸道”一样。我初闻此说，今晚又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名词来，所以仍用这个名词作标题，只是界说明白，协和是自由意志的协和，非所谓“罗马和平”也。

协和主义之外交，本身是个明显的原则，不待具体的界说他，若必须举例说他的要点，我一时想有下列三点可说：一、协和主义之外交，是不树立任何敌人的，必不得已而有敌人，这敌人必须是世界之公敌，而非一己之私敌。所以相沿的纠纷，能解决者，总是尽早解决，必不得已，利害相衡，宁可忍痛。所谓悬案，只有国力至强者，方可负担得多多个。国力在培植中者，万不可多有，以免小患变成大害。此外与人相处，最要是“诚”、“恕”二字。诚者，心口如一之谓；恕者，能为对方设身处地想之谓。日本人之失败，即失败于自其“开国”以来不取此二字。

二、以上的一义，仍是偏于消极防患的方面，积极方面，我们必须有极其可与深切合作的与国，否则虽少敌人，亦少与国，仍不免为孤立主义。此孤立主义，在将来之世界中无一国担负得起的，连同美国在内。我所谓极其可与深切合作之与国者，即谓在平时可与之取同一之步调，以维持世界和平，万不得已而有正义之抗战，可恃为盟邦，彼力与我力，可应一切变局也。

三、协和的外交，不仅是一个政府对一个政府的事，而是一个全国民对一个全国民的事，所以除非有关国体的事，只有“吾从众”是善策。文化的合作，是国民外交之基础，文化既合作，自不免相互的影响，且正需要此影响。若于此中有所别择，必先于此道细心体会，否则但看到一面别择等于杜塞，杜塞之结果必是疏交。即以中美过去关系论，美国固自海约翰起，树立其对华亲交政策，且自鸦片战争以来，即与英法异其步调，思与中国交好。正如曾国藩奏折上说“米夷资性淳厚，对天朝时思效顺，并

英佛等夷构结似并不深。"——这调子在今天看来真可笑，然确是一件重要的史实。即美国从未参加对华之屈服争夺战也。——然而这二十余年中，中美亲交之基础，并不在商务上、权益上，而在文化上。文化制造一种情感，是比国策纯洁的，且有时比国策还有效，因为国策有时摇摆，感情是不然的。

综括以上几项的意思，则我们今后至少三十年中的外交——建设国力中的外交——应该是"联美、善英、和俄，而与其他国家友谊相处"是也。所谓联美者，有经济上的联系，有文化上的联系，这皆极其重要，而最前要决定的是"世界政策"的联系。这就是说，美国对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大小问题，我们要参与其决定，而积极的，有效的，加以赞助，助其实现。中美两国人不仅在战争中要做同志，即战后亦当建设长久高度的亲交。有这样的亲交，而中国的国力在滋长中，则太平洋真为太平之洋。就是说半边天下太平了。说到英国，我们先要知道英国不是一个很讲感情的国族，而是一个重理智的国族。惟其如此，故与英国做朋友的本钱不多是外交上的机智，而多是内政上的修饬。官府之效能甚大，经济之进步甚速，文化之开展可佩，社会道德之增进可睹，这样，就是你无意与英国做好友，英国会找上你的门来的。本来这个道理对一切国家皆适用，而对英国尤其适用者，因为对英国更无第二条基本方法也。苏联的外交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者，大凡现实主义者，必作惊人之举，凡曾一度作惊人之举者，必在未来屡作惊人之举。而与现实主义者相处，强则只有也用现实主义，弱则只有充分认识现实，而现实的解决一切。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今后五十年中，第一个心思是培植国力，第二个心思还是培植国力。在培植国力中，我们要避免一切可能的纠纷，并解决一切不安的因素，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害小而忽之。试看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在建国之始，哪一个不是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的。一位朋友听我说到此地，来问我，"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姑且取老子的柔道，一旦国力建设起来，再发扬

蹈厉——一下子?”我回答说，你这话全是战国阴谋之说，我们今天要协和，以建立国力，将来仍要协和，以持盈保大，否则今日之柔，以为他日之刚，便是不诚，不诚是必自食其果的。如日本之为方法改良的义和团也是。朋友又说，你这一些话都是平淡无奇的常谈。我回答说，这话太恭维了。要道理都是老生常谈，如辕固生之说《老子》为“寻常家人言”。

不过我要声明一句，协和的外交，不可解作无所事事坐而待之的外交，相反的，应该是极其积极极其活跃的外交。我又要附带一句，外交之基础全在内政，不过也有内政甚修饬，而以外交方针之错误招致大祸的，如上次欧洲之德国是也。但却没有离开内政而能运用外交的。

（原载 1944 年 4 月 2 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五四"二十五年

今年的5月4日，是"五四"的第二十五年纪念。"五四"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在这样变动剧烈的世界中，一世纪的四分之一，可以有无穷的大变化发生。即在中国，这变动也是空前的。所以若有人在今天依旧全称的、无择的讴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演进国家演进的愚蠢，其情可怜。然而若果"五四"的若干含义，在今日仍有教训性而并未现实，或者大势正与之相反演进，自然不必即是国家之福，其事可虑。

"五四"在当时本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运动，自然也不是一个全无计划的运动，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自然也不是一个自身矛盾的运动。这个情形明显的表现于其整个运动的成就上，所以消极方面的成就比积极方面的多。这正是许多人贬责"五四"运动的根据。我以为"五四"纵有许多弱点，许多未成熟处，但这个消极的贡献，却是极可宝贵的，也还是今天甚可警醒的。

何以呢？中国的存在有几千年，自有其长处，即是说，有使他寿命如此长久的缘故。但是，这个几千年的存在，论对外呢，究竟光荣的年代不及屈辱的年代多；论内政呢，内政的真正清明，直如四川冬天之见太阳，"生民多艰"，古今一致。所以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亦为必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试问

明哲保身的哲学、"红老哲学"(《红楼梦》、《老子》,世故之极之哲学)、虚文哲学、样子主义、面子主义、八股主义、官僚主义、封闭五官主义,这样一切一切的哲学和主义,哪一件不是建设近代国家的障碍物?在洗刷这些哲学和主义,自须对于传统的物事重新估价一番。这正如尼采所说,"重估一切的价值"。自然,发动这个重新估价,自有感情的策动,而感情策动之下,必有过分的批评;但激流之下,纵有旋涡,也是逻辑上必然的,从长看来,仍是大道运行的必经阶段。今人颇有以为"五四"当年的这样重新估价有伤民族的自信心;不错,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须树立的,但是,与其自信过去,而造些未曾有的历史奇迹,以掩护着夸大狂,何如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的作我们建国的努力?这就是说,与其寄托自信心于新石器时代或"北京人"时代,何如寄自信心于今后的一百年?把一个老大病国变成一个近代的国家,有基玛尔的土耳其是好例。土耳其原有回教的加利弗(Califate),这是土耳其几百年霸权的遗物,在上次大战中还有甚大的号召力,使土耳其虽败不亡,然而基玛尔胜利的进入君士坦丁后,毅然决然的废止这个制度,这因为这个制度之于土耳其,对外虽有号召的大力,在内却是彻底革新的阻碍,基玛尔务实不务名,所以在土耳其境内废止了他。又如中东近东人民习用的红帽子,到屋子里也不脱的,他也为文化大同起见废除了他。至于文字的改革、习俗的改革,处处表现出他要彻底近代化土耳其的精神,他为什么不爱惜这些"国粹"呢?正因为这些"国粹"是土耳其走向近代化的障碍物。

我何以说"五四"的若干含义在今天仍有教训性呢?大凡时代的进展,总不免一正一反,一往一复。最近十五年,东西的若干强国——今日全是我们的敌人——各自闹其特殊的国粹运动,我们也有我们的国粹运动,我们的国粹运动自与他们的不同,这因为我们的"国粹"与他们的"国粹"不同。我们的国粹运动所以生于近来是很可了解的,在颇小限度内,有他的用处,然若无

节制的发挥起来，只是妨碍我们国家民族的近代化，其流弊无穷。随便举青年一事作例说罢，不是大家都说今日的青年总是犯了消沉、逐利、走险三条路吗？要想纠正这些，决不是用老药方所能济事的，无论这药方是汉学的威仪齐庄，或是宋学的明心见性，这个都打不动他的心坎，你说你的，他做他的，要想打动他的心坎，只有以行动启发其爱国心，启发其祈求社会公道心，为这些事，舍生取义是容易的事。总而言之，建设近代国家无取乎中世纪主义。日本在维新之初，除去积极的走向近代化以外，又弄一套“祭政一致”，“国体明征”的神秘法门，日本之强，是他近代化之效，而把日本造成一个神道狂，因而把日本卷入这个自杀的战争中，便是这神秘法门的效用。难道这是可以效法的吗？所以中世纪主义也许可为某甲某乙以忽不勒汗的过程成其为呼图克图，而于全国家，全民族，是全无意义的。

“五四”的积极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在这口号中，检讨二十五年的成绩，真正可叹得很。“民主”在今天，已是世界大势所必趋，这篇短文中无法畅谈，只谈谈“科学”。注意科学不是“五四”的新发明，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很多立志就学远在“五四”以前的。不过，科学成了青年的一般口号，自“五四”始，这口号很发生了他的作用，集体的自觉总比个人的嗜好力量大。所以若干研究组织之成立，若干青年科学家之成就，不能不说受这个口号的刺激。在抗战的前夕，若干自然科学在中国已经站稳了脚，例如地质、物理、生理、生物化学，而人文社会科学之客观研究，也有很速的进展。若不是倭鬼来扰，则以抗战前五年的速度论，中国今天可以有几个科学中心，可以有几种科学很像个样子了。即是说，科学的一般基础算有了。恰恰暴雨狂风正来在开花的前一夕。受战事的打击，到了今天，工作室中徒有四壁，而人亦奄奄一息，这全是应该的，无可免的，无可怨的。一旦复原，要加倍努力赶上去。不过，今天的中国科学确有一个极大的危险，这就是，用与科学极其相反的精神以为提倡科学之动

力是也。今日提倡科学之口号高唱人云，而为自然科学的建设不知在哪里，其结果只是些杂志宣传，而这些杂志中的文字，每每充满反科学性。大致说来，有狭隘的功利主义，这是使自然科学不能发达的，然若自然科学不能发达，应用科学又焉得立其根本？又有狂言之徒，一往夸大，他却不知科学的第一义是不扯谎的。全部科学史告诉我们，若没有所谓学院自由（Academic Freedom），科学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全部科学史告诉我们，近代科学是从教条、学院哲学（Scholasticism）、推测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社会成见中解放出来的，不是反过来向这些东西倒上去的。全部科学史又告诉我们，大科学家自然也有好人，有坏人，原来好坏本自难分，有好近名的，有好小利的，原来这也情有可原，但决没有乱说谎话的。作夸大狂的，强不知以为知的。大科学家自有一种共同性，这可在盖理律、牛顿、达尔文、巴斯德诸人传记中寻得之，这些人与徇禄的经生绝无任何质量的相同处，所以今日提倡科学的方法极简单，建设几个真正可以作工作的所在，就是说，有适宜设备的所在，而容纳真正可以作科学工作的若干人于其中就够了。此外，便只是科学家自己的事了。此外，更无任何妙法。工作的环境可以培植科学家，宣传与运动是制造不出科学家来的。

我要提出一个“五四”的旧口号，这个口号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读者以为我这话迂阔么？只有这才是科学的清净法门！

（原载1944年5月4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我替倭奴占了一卦

上月我在重庆，倭奴正在进行河南战事，自鸣得意的很。我便替他占了一卦，那卦词正是李义山的一首绝句，词曰：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就是说，一个人到天晚的时候，要办的事一事无成，心中大是狼狈，于是乎赶车子到古原上散散心中的闷气；在古原上，斜阳正在山头，这光景也颇可留恋的，只是黑暗便在半小时中到来，虽在恋恋不舍这些原上的景物，毕竟这运命是落日的运命是注定了。

解曰：“向晚”是倭奴的气力已到最后一着，“意不适”是明知失败之象，所“驱”的“车”便是那些自鸣得意的蹩脚坦克和装甲车，长沙既是古战场，洛阳更是“古原”之至，“夕阳无限好”是形容倭奴的回光返照。判曰：夕阳之下即是黄昏，黄昏之后立即天黑，这事进行的速度，犹如骏马奔驰。所以此卦为下下，其象为迅速覆亡。

这一段虽是笑话，但事理正是如此。在倭奴攻占洛阳、长沙之后，我们心中自然有偌大的不舒服，不过倭奴的心中，其不舒服更不知几百倍于我们，因为倭奴是在万分无奈中进行这个战事的。这个战事进行到这个阶段，仍不能解其无奈的万分之一。这道理待我分别来说。

第一，倭奴之进行中国战事，是其极无办法，自认已无上策中策之证明。去年我听到一位“文章战略家”说，日本人这两年

何以不对我们进攻，真是瞧我们不起吗？我当时插了一句话说，日本人必有狠攻我们的一天，这一天必在他已经自觉全无办法之后，这话竟算说中了。原来日本人是个天赋薄弱的国家，所以必须利用他的薄弱的天赋企图取得胜利，凡与决定的胜利不相干的事，是不容许他多费本钱。“九一八”以来十三年的战争，我们应该承认日本小鬼不是不聪明，不是肯放过时机的，只是手中所能运用的不过如许，所以简之又简，稳守稳打，只如教科书式。他岂不肯改变一下作风，以求决定性的胜利，无奈他并无改变教科书式的本钱，如德国当年之闪电战，美国今日之海军新战术，是他担负不起的，是他培养不足的。唯其如此，所以决不肯牺牲兵力在枝节的方面上。他知道，要实现他的“大东亚”之梦，上策是打败美国，中策是不为美国打败，下策即是对付中国。他战中国而败，其失败固不必说，即战中国而胜，仍与他的问题毫不相干。或有人说，对中国用陆军，对美国用海军，是不相重复的。其实，对美国固须海军，亦须陆军，美国的海军新战略，真如成吉思汗之运用草原上铁骑流动战术，有空前的革命性。日本既不能有可与美国颉颃的海军，便须每一个岛由陆军守着，虽仍无济于事，终是不得不尔。况且苏日的关系，正如曹子建的《洛神赋》所言，“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凡稍能运用常识判断的，必知苏日之间决无真正可恃的妥协；而且德国战败之日，必即是日本的“大东亚”北门紧张之时，所以日本必须留其大部陆军准备这一着。还有一层，德国可以利用征服地的技工，日本却无此幸运。有这三点，足证日本在中国消耗陆军，只是无聊，只是已失长策之无目的战。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这妄想，虽全是妄想，但仍确切是它的妄想，此理待第四节说。

第二，倭奴在大陆上的攻势，大体上只能发展到今天的地

步，要想深入中国西部或真正威胁了川滇黔，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的地形，大致来说，平汉粤汉线以西，远比以东易守。西部各省丛山叠嶂，机械化部队无所用之，而我们习用劣式武器的部队在这地方最易发挥效力。自古以来，这些地方的陷落，只是无人守，如有人守的话，到处皆是一夫可以当关，丸泥可封函谷的地形。这是第一点。就近代战术言，大凡孤军深入，必须攻者有空军优势，至少是守者没有空军优势。但在中国的西部，空军优势已在我们及我们的盟军手里。所以倭奴若求线的直入，无异送死，若求面的扩大，又为层山叠嶂的地形所决不容许。这是第二点。欧洲战局明春可了（此说见别一文），所以倭奴至迟必须在今冬准备着应付明年四方八面的换防，包括北面在内。那么，他在中国的冒险行动，时间上只有今年了。即以今年论，一到10月，长江水落，其水上交通线更易受炸，四川雾起，他对四川更无用空军之可能。而以四川为根据地的空军，却并不受气候限制。这是第三点。所以我说，他在中国发挥战斗力，也就以此时为最高点了。那么，占据了洛阳、长沙，又岂是完成他的下策的手段，这真可谓“无策”而已。

第三，再过几个月，我们反攻的局势便可开始，这决不是洛阳、长沙的陷落所能阻挠的。我们不要单向东看，增加了失地；我们还要向西看，滇缅路即将再通。如不是为缅甸雨季阻隔着，今天滇缅路已经可通了。今虽为雨季阻隔着，10月里雨季即完，雨季一完，此路不久即通。缅甸的地形，既不靠军队之多多益善，更不靠日本人所标榜的“玉碎”，以中国部队之英勇善战，加以美国的新武器，及用此新武器之新战略，更加以盟方空军之绝对优势，日本鬼是挡不住的。以既有空运之增加，加上滇缅路之重开，则反攻日本之中国西部根据地，顿时化为神奇。这些道理，倭奴也知道，而无可奈何，我们则不便多说，半年之后，辉煌的战果在我们。

第四，倭奴今年来扰的用意，只是想巩固其已得之地位，以

为相机求和之本钱。倭奴德虏最初联合作战时，确是有全盘计划的，即倭奴之不战苏联，也必为德虏所谅解。因为德虏当时自以为足敌苏联，所需于日本者，只是牵制英美。这自然在日本说来“正中下怀”，日本不肯与苏联死拼，而所最想要的是南洋。所以松冈洋右的协和苏联滑稽剧，虽不满百日即为世人所笑，然而他是必得到德酋默许的。那么，日本一在太平洋作战，即偷袭珍珠港，攻取新加坡，这虽是日本的战略，却也与德虏的战略配合。后来打下缅甸，便按兵不动，专在消化其新吞的大块物。这看来像是自作打算，他还情有可原，因为下一步必须先储备好实力。这是东西二贼“合作”的第一阶段。可是自从在艾尔阿拉敏德义军战败之后，尤其在史达林格勒德军战败之后，日本对德虏胜利一信念迅速消失，于是一切办法都是自己打算了。到这阶段倭奴的打算是，德虏纵不能胜，也还可以支持，他自己便在太平洋上与美国相持，而使美国疲劳。这是二贼“合作”的第二阶段。自从美国使用了革命的海军战术，使得倭奴手足失措，全盘皆翻。倭奴初以为美国反攻是一岛一岛打过来的，殊不知美国早已放弃此战术，而把太平洋当做成吉思汗的欧亚草原，运行越过堡塞的万里长驱战。倭奴初以为美国人平日那样讲究舒服，必然不肯牺牲大量人命，殊不知美国人是今日世界上惟一初经成熟的少年大国，固不钦佩倭奴何以那样欢喜自杀，却也绝不爱惜牺牲几百万人，以雪国耻，以谋西边长期的安全。倭奴初以为美国海军接近倭奴所有陆上空军基地时，便是倭奴的机会，这样的小便宜倭奴确也赚过一两个，殊不知这一年半以来，美国的海空军实力业已饱满，传统的海军战术业已摒弃。日本虽有陆上的根据地，美国更有海上浮漂的“赛陆上基地”，这样浮漂的基地，兼有陆海空军基地的效用，他有广大“飞机场”，有医院，有陆军营房，有干船坞可以修理主力舰。无论倭奴的根据地在哪里，美国海军可推进一个优越的基地到那近旁去，一若中国古代战术中之“云梯”，足以发挥“粪门”的作用。所以拉布尔不下，便可以占领

马绍尔群岛；土鲁克、波那普不下，便可以袭击帛、琉岛；西加罗林未占稳，便可以在马里亚纳群岛之塞班登陆。反正中太平洋的海岛是多的，倭奴以甲乙丙为根据地，美国即用其强大的两栖（或者可说海陆空三体）武力，由浮动基地推到近旁去，即在其近旁建设成子丑寅根据地。美国的海军雄厚，可以联络其根据地，倭奴则不能，所以中太平洋的日本势力早被美国海军“五体分尸”了。现在战事正在塞班岛，等着邻近岛屿（即马里亚纳群岛）更多被占领之后，将有更惊人的进展。到那一幕，是西向攻菲律宾呢，或是北向攻小笠原？我看北向的可能更多。塞班去东京已比成都离东京为近，何况更到小笠原？这简直可以说已经打进日本大门了。在菲律宾与马里亚纳间，倭海军还要逃走，这海军用它作甚？倭奴对这局势竟这样毫无办法，因为它在传统教科书的海军战术上，已感船只空军力之缺乏，更没有对付这样革命战术和压倒力量之能力了。明明太平洋上一筹莫展，所以才来“驱车登古原”，这是二贼“合作”的——实在是全不合作的——第三阶段。

那么，倭奴到底想做什么？我看，倭奴还并未发狂，只是心中七上八下打吊桶。大凡自觉无有办法的人，总容易妄想一个一厢情愿的“办法”，无论这“办法”如何不合实际。倭贼明知德虏必败，且同我们知道德虏之败必不晚于明春，或者便在今冬，所以他最大的希望是如何得到一个于他较为有利的下台，所以才来“驱车登古原”，巩固其大陆上的地位，满想西面可以减去致命的攻击。难道说，他专等着欧战结束，全世界用全力来打他么？他必然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先多占些本钱，并仍在妄想着美国不肯多牺牲人力，以为乞和之用。所以我看，在倭奴这样进攻我们中，正充分证实其末路之悲哀，无策之拖延，明知惹下了滔天大祸，不得不作此最后妄想。日本鬼是颇能慎重的，他在日俄战中，战无不胜，犹偷偷的哀恳别人说和，何况在今天的局面？不过，他这妄想全是毫无用处，中国与其他与他交战的大

国，以及与他尚未交战的大国，无一不是抱定决心彻底解决他的，因为他若不是无条件投降，邻近他的国家无一可以恢复和平生活的。看破他这心理，只觉其可笑。至于有人说他要搬家到中国来，真是情理所无，即说他是要利用平汉粤汉路，以联络南洋的陆上交通，也是缓不济急的事，不足以描写其内心窘迫之实情。

原来这次战争中，美国的关键在“制造”，日本的关键在地形。日本初以为可用地形消磨了美国的制造，他殊不料美国的制造在今天竟瓦解了日本的地形。不止于此，中国西部的地形，反来冲消了倭奴兵器的优势。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倭奴以为最后来攻中国是他的“胜利牌”吗？那简直是一张无人理会的降表的预告。

不过在这时候，我们要加多少倍的努力，不使有任何的力量不用上，以来迅速完全结果了他，并免得意外的枝节，那又是不待说的。这话自不以军事为限。

（原载 1944 年 7 月 9 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第二战场”的前瞻

近代战术，大体可说是拿破仑、沙恩霍斯特、克劳塞维次建设起来的，以“国民战”代替了“偏兵战”，以动员供给为要点，以散布惶恐为策略，以速战速决为企图。发展这个战术的地理背景，正是西欧中欧的国度，人烟稠密，实业发达，文化最高，交通便利。不消说，这就是法德陆军的传统。上次大战初期德国充分显示了这个战术的精彩，只缘马恩一战而败，成为持久战、消耗战，便夜长梦多了。这次大战中希特勒的进攻西欧，仍是这个战略。虽然在技术上作了许多的革命事。这战略一旦转移到攻俄罗斯，局面全变了，因为东欧不是西欧。然而希特勒仍旧以为近代的交通工具，空军坦克的威力，可以变东欧为西欧，殊不料在查理士第十二、拿破仑第一之后，又做一次更伟大的失败。

现在第二战场开辟了，恰是利用传统战术的好地方，这不消说是给德虏一个大便利，第二战场所欲进行决战的地方，恰是德国陆大教科书中的练习题。这也正是第二战场迟迟开辟的原因。但是，英美的海空军优势，兼以德虏这次仍旧受他历来最恐惧而也最免不了的“两面战场”之拘束，盟方陆海空军三方面之高度配合，造成了革命的新战术，就是在西欧登陆。以后的进展必然节节胜利，而且每段胜利必付重大代价的。其所以必然节节胜利者，以实力优越之故，最大的难题就是登陆，而登陆业已试验的成功；其所以必付重大代价者，以在这些地方打仗，在德虏是拿手好戏。

预测第二战场的进展，大致可分四段：(一) 登陆，(二) 扩充混合为大战线，(三) 决战，(四) 德虏无条件投降，下文分层说去。

先说登陆。在这次诺曼底登陆之先，我和几个朋友辩论，我说非在英国南部海岸对面的地方不可，却不能在海峡最窄处。这话，大致被我猜中了。这道理可以这样说：开辟第二战场的基地是英格兰东部南部，一切计算应从这个地点算起。登陆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船，又非有空军伞兵不可。空军与船都要选一个近的目标，这样可以缩短飞行航行的路程，则船与飞机可以重复着穿梭着用去。其所以不能在海岸最窄处者，因为那个地方姑不论是否山岩，却是全部海面都在德方大炮射程中，无偷渡贴近之可能，这一带，即加雷一都佛，在将来容可登岸，那须是战争地面已经很扩大的时候，后面已受威胁，决不是初期登陆所应有。至于惟诺曼底而登陆的地方在哪里呢？我的推想如下：第一，挪威决不是登陆的地方。因为挪威不是决战的地方，盟方占据了挪威，虽于输苏航路有贡献，然今日供给苏联海陆两道均畅通，挪威的关系非头等重要，而且挪威海岸是以出名的"崖湾"(Fjord) 构成，可以上陆的地方多在山曲中，兼以苏格兰海岸去挪威海岸甚远，所以在挪威登陆既不需要，又不可能。第二，荷兰也不是登陆的地方。因为荷兰的南部中部海岸，其近海陆地都是海面下的高度，登陆便遭灭顶的水淹。北部海岸及接连德国海岸的一带，直到丹麦，外有伏列士群岛（西部东部中部三群岛，Friesische Inseln），岛形如带，包着海面，岛内全是浅滩，登陆船可以用，护航的军舰却不能接近，其实这些地方，在不久的将来多可如荷兰之茹德海一样变成陆地的。这些地方的若干点，也许在法比一带进行大决战及大决战胜利之后有登陆的事实以为牵制之用，因为这个地带——由丹麦南部至荷兰北部——最近德虏的心脏，但决不是早期登陆所可尝试的。第三，比利时的海岸，也有大部分不可登陆。比利时的地形分为三区，东为山区，中为

平原区，西欧大战每决于此，西为低地区，即所谓佛兰得者(Flanders)，又有很多地方可以水淹，只有在奥斯登（Oscende）以南有些地方稍可免此。第四，法国西部海岸除不列坦尼半岛外(即卢阿河 Loire 以北的地方）也少登陆的便利，因为这一带在地形上虽是很可以登陆的，却离英国过远，将来战事假如发展到法国南部，此处也许有海军炮击小规模登陆之事，但这个可能性须在德国空军等于毁灭的时候，或者德虏已经丧失法国北部的时候，现在无此可能。如此说来，第二战场之扩充，应该是自奥斯登至不列坦尼南端之洛林或圣那最尔（St. Nazaire）线了，此中尚须除去若干可为水淹的地点，例如加莱的左近，西欧洲水利发达，到处筑堰，也就容易在战时放水。更须除去加雷、都佛线，此线防守太固，海面太窄。这个登陆可能长线，全是英国南海岸整个的对面，自泰晤士河口沿全部南海岸至布瑞斯涛尔湾（Bristol）沿岸，都是海军与商航的根据地。这一带，德虏的远程炮既接近不着，制海权又全在盟军手中，即德国的潜水艇也无甚作用。登陆以半岛及突出地为相宜者，因为这样地形可以发挥海军的大作用，应付一边上陆的德虏部队，易受后面的攻击。这一带的半岛中，其较小的诺曼底半岛，上端名瑟堡半岛，最大的是不列坦尼半岛，此半岛中有法国的五个州。甚小的是哈佛突出地，最小的是加雷布隆间，也是一个突出地。现在既以瑟堡半岛为登陆的中心，以后便当在两翼地带继续登陆了。陆地战事之旁行发展，也可以促成登陆的发展。

再论大战线之造成。我们切不可以为在小小的一地带登陆便可长驱而入巴黎，这样“流寇战”在近代战术上是不可能的。也不可以为占据了一段小小海岸便以为第二战场可以如此建立。第二战场是个大战场，须容纳一百至二百个师——这数目当然是由德虏防军的数目而定的。登陆战术实际上可以如此说：（一）稳定中点；（二）发展两翼；（三）两翼之外继续登陆，以图包抄敌人后路，于是两翼成为中点，另有两翼；（四）如此重复不已，

即继续扩大不已。这个公式也只是陆地战术之变化型。现在既已在瑟堡半岛稳定着中心了，左翼即是哈佛区，此区本也是初步登陆之地，后遭失败，似乎还要继续在此登陆，右翼便是不列坦尼半岛之寇杜诺（Cotes-du-Nord）芬尼斯特（Finistre）两州。左翼有接近巴黎之优势，右翼有半岛的便利；以后登陆及陆上的发展当在这两翼了。如此自塞恩河（Seine）口至卢阿河口大部海岸线占有之时，陆军也必深入内地了，下塞恩州之海岸（Seineinférieur，即哈佛以东的海岸地）当以陆地包抄而得之。有这样的一个海岸根据，然后几十师可得发挥作战力。这时的目标，便是直下巴黎，巴黎是法国北部交通的中心点，非得巴黎不能北向以而求决战。其实此次之历史上未有的扩大登陆战术，全靠空军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线，若做不到，便无登陆之可能，若全破坏了，登陆便极容易，事实恰在两者之间。大概铁路交通破坏得很厉害，公路交通则极难破坏，这在德国汽车工厂受炸，汽油缺乏的时候，自然使它加倍困难。得到巴黎便可利用法国北部的公路网，却不是利用那个铁路网，因为车头车皮在德虏败退时必毁坏无余，登陆军又不能多带这些物事来。说到这里我们心中或者要问，盟军要不要在法国南部登陆？我想，这是南战场的问题，与意大利境的战场联为一气的。法国南部海岸除马赛土伦是军港，无法登陆外，法南海岸在马赛以东者，颇多便于登陆的地方，科西嘉岛在盟军手里，以为登陆的根据地固然可以，只是离可以登陆的海岸太远，况且法国南部山地太多，要想发展为一大战场，是很不容易的事。不过，若是用它来牵制一部分德国兵力，却也有用处，这用处究竟不是急切的。

照这一段话的道理，在进行决战之先，必须解放法国，这因为战略上有此必要，不是政略上有此闲工夫，凡以为登陆之后不大扩充地盘便可进行决战者，诚皮相之言也。

现在说决战。到了完成上一阶段时，就是巴黎打下，法国大部分解放时，当年的马其诺防线便成德国的防线了，这防线对于

德国之无用，当与它对与法国之无用同，因为在现代战术中，没有防线是最稳固的，况且这防线只在法国东边，北边没有，而进行决战正在北边。由法国直攻德国，只有萨尔桥（Saarbruecken）一条路，这也是小丘陵地带，前途不便得很。所以进行决战还只是那个古原古道古战场就是法国北端、比国中部，由巴黎至阿根（Aachen，法名 Aix-la-chapelle）的一条路。到了这里，一个小难题来了，这些地方，可以水淹的不少。这些地形，自然双方的参谋部研究得极熟了，不足为大障碍，若为此小小有所牺牲，或者是不免的。这个决战必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决战，所以后方必须建立得广大稳固，必不是在意大利境的打法。

决战既定，德虏必在迅速败退中，一如 1918 年 8 月兴登堡攻势失败后的景象。到这时，在德国西部海岸登陆的事，方才或者可以有用，等到盟军到了莱茵河，或者占领了鲁尔区，德国便瓦解了，这是德国的第一资源区，用不着打到柏林的。德国若失去了鲁尔的煤，阿尔萨斯洛林的钢，德国便完了。

附带说一说其他战场。意大利战场如何推行，究竟德虏是图固守意北平原郎巴地（Lombardia）南边的山区（自西北向东南的一个山脉），或者守波河（Po），或者一切不守，决以阿尔卑斯山脚作天然防线，现在还难断定。我看，他有守山区的可能性，若山区不守，便该直跑到阿尔卑斯山脚下，波河是很难用为防御线，如若干报纸所说的。这样的全盘放弃，德虏有他的好处，就是腾出兵力，为第二战场之用。在盟军也有便利，就是炸德国南部奥国巴尔干亦更便了。果真如此，对于盟军在法国南部发展也很有利，意法交界虽也是阿尔卑斯山，然若无重兵固守，还是可通的。

东战场的决战地应该在明斯克华沙一路上，这是自古以来的东征决战地，全是平原。其南是大湿地区，绝不利于用兵，再南又是一条高地，由基也夫（基辅）通罗夫，只是这条平原比较窄些，可作一翼之用，而非展开主力的地方，更南又是山地，无从

施展了。

以上所说，都是教科书式的看法，实际的进展是无人可以步步预料的。这道理可以这样说，地形决定了原则，力量的对猜造成了技巧，战略的对猜形成了一个战场形态发展的次序。不过，这次大战总是力量的决斗，重要的地方，彼此都看重，所以我颇自信这番猜谜大致不差。

至于第二战场进展的速度，我的看法如此：扩充阵地要三四个月，这必须在10月末海岸雾季到来之先。建立成大阵地，即解放法国，要在秋冬。决战要在冬季或明春。总之，明年夏天欧洲战事可以结束，若是东西战场之一有了决战，其地即不待决战，若是德国内部有了变化，也不待决战，所以进展还可以很快，这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本文既以讨论地形为限，不再解说了。

第二战场开辟了，五六月我在重庆时，看见报上偶有论这一带地形的文章，似乎颇不扼要。所以回家后用两夜之力写此一文。第二战场一带，正是二十年前我在欧洲时旧游之地，今为之神往，欲罢不能。书生谈兵本是千古的笑话，明知故犯，借博朋友们一笑而已。

（原载1944年7月12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的口头询问

（1944年9月7日）

①官吏不能做买卖，曾有法律规定，就是官吏不能直接经营商业，因为官吏经营商业可以利用政治特殊权力作到普通商人不能作到的事。譬如放一个空气可以操纵同时对于国家银行来往方便，现在对于贪污，报上可以公布，但办小的不能办大的。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又“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现在举一件实事，就是孔兼部长办有祥记公司，虽然这个公司成立已经很久，但近又继续成立广茂新商号，此由孔家经营之。

各项商业其总办事处设在林森路裕华银行三楼上，经理及其家中人外勤即中央银行事务处副处长梁子英。我们知道，官吏做买卖不免利用政治力量。现在可否请政府查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及一切有无囤积居奇情事、违反国家总动员会议法令情事，并请政府查裕华银行同国家银行往来帐目。清查的结果，报告本会驻渝委员会，同时请驻渝委员会注意这件事件。高级官吏凭借他的特殊力并与国家银行特殊〔近〕金融这件事情如不整理，而惩治零零碎碎的贪污事件，有什么用处。

②中央银行可以说是一个谜，因为许多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里面山西同乡很多。只要是人才，当然也很好，恐不尽然，中央银行人事处长副处长是山西人，总务处副处长梁子英亦山西人；再中央银行中单独设有医务处，这个处长也是山西人；又如营业处长郐景昆即十年前买卖军火要回扣，美国国会曾加调查，

一场风波者，以其为孔夫人之义子，今在中央银行为营业处长。总之，中央银行的情形，请政府查明报告本会驻渝委员会。这个银行究竟是国家一个机关，抑是私人的结合。是国家的组织，何必一定用山西人。我们希望中央银行国家化，机关化，还有关于帐目也要查明。

③黄金问题。我们知道去年黄金发售、裕华银行买大批黄金。他卖出来金价高，买进金价低，这是重庆社会上都知道的。上两个星期，黄金停止出售，而黑市高出一万。又美国借给我们的黄金，据孔副院长报告，这个黄金用飞机运到后作调剂金融之用，请财政部报告美国的黄金运到的多少？要卖的多少？以及每周出卖的情形与以后还卖不卖，运不运？请财政部报告。我们觉得，对于美借给的黄金应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不能枝枝节节为私人发财之用。

④黄金储蓄券。去年大家知道，市场上固然有这个东西，据孔副院长说，过去很少买。可是有人过去曾买过却没有买到，而且中央信托局，中央各银行各职员分到孔副院长最近出国之前，以大批储蓄券分送给，在一重要会议之后开秘密会，当场送给大家，人家不受，孔就云："我暂为你们留着，兑换了再给你们。"这券如是国家的不能分送，个人的不必开会，这种情形是否有对国家大员行贿之嫌，我刚才的询问对本会负责，对会外亦负法律责任。

答复：

(1) 官吏不得经营确为法律所严禁，但系指直接经营而言。据闻祥记公司裕华银行之组织远在民初孔兼部长从政以前，当时原为提倡实业起见。此外如中华书局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及其他工厂，孔兼部长且均为有力主动人之一，至广茂新为孔氏祖遗事业，更有百年以上之历史，凡此商业无论其为旧式合伙、新式公司，似不能因股东有人服官而停业。在股东方面，本不能因个

人服官而自行取消一切股权。祥记公司、广茂新有无囤积居奇情事，主管机关尽可就近调查，至裕华银行经查，未曾买卖黄金。惟问国家银行购买黄金，若询有持□裕华银行本票之事，据云多系晋□省商人汇款来渝，派人购买者，因购买黄金所需法币，动辄巨万，故持□该行本票以图简便其汇款来源，尽可就账查知。

（2）用人惟贤，内举不避亲。机关似不能为籍贯所限，中央银行重要职员之任免须经理事会通过，一般职员之任免亦须经由人事审核委员会通过。

（3）黄金运进虽量卖出多少，以后卖不卖，除口头答复外，并已于答复奚参议员玉书询问案内答复。

（4）美金储蓄券初发行时多方劝募，购者甚少，嗣因涨价，又争先恐后，此系社会人心关系。一则发财念切，一则可以觇其希望胜利之信心，买不到者或因步入后尘，买得多者当系捷足先登。至分送美金储蓄券一□，并无此事。

（收入《财政部对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询问案答复书》，南京二档：一四五—571）

关于财政问题在国民参政会的质询[1]

查中国实业、四明两银行，原为商业银行，在二十三四年时因营业亏累行将倒闭，彼时财政部恐影响市面金融，出资接办，改为官商合股，并由财政部派傅汝霖、吴启鼎分任董事长。傅、吴两人均为孔部长亲信，闻最近孔部长出国之前循该两人之请，将两行仍变为商业银行所有，财政部资金用各项不值钱之公债抵偿此种损失。国库背公济私之办法，殊不合理。本席请问财政部据何项法律如此办理。再查中国、交通两行亦有商股，董事是否能许可中、交两行商股援例呈请将该两行亦改为纯商业银行，请答复。

答复：

中国实业、中国通商、四明等三行，自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施行法币以后，各该行应缴交发行钞券之准备金欠缴数目甚巨，计中国、实业欠缴准备金为国币肆千柒百零贰万肆千壹佰叁拾柒元零玖分，中国通商银行为国币贰千肆佰叁拾柒万伍千陆佰壹拾玖元陆角玖分。四明银行为国币，壹千陆百捌拾伍万壹千捌百陆拾贰元伍角。迭经本部严令催缴，均以无力措缴延未办理。上年底据该三行会衔呈请将官股退让扩充商股以期增厚实

---

① 编者注：此文署名“参政员钱公来、徐炳昶、萧一山、许德珩、傅斯年等五人询问”。

力，俾便清理欠缴发行准备等情，当由部批饬，先将欠缴准备如数清缴，再为核办，去后旋据各该行按照欠缴准备数目分于本年八月底及十月底以现款清，分别开具期票交中央银行核收并将本部原加入官股一次以现款缴还前来本部以前，此加入官股原为维持市面救济全融。兹巨，施行法币弃已多年，即中央银行统一发行亦已二年，而各该行欠缴准备尚未清釐，为结束历年悬案，暨便利各该行筹措起见，当予照准此中国，实业等三行退还官股，清缴准备之经过也。至中国、交通两行官股商股之规定，系载明于各该行条例，且各负有特种任务与各该行纯为商业银行性质不同，如果中、交两行之商股股东有此请求，本部当请示核办。

（原件存于南京二档，全宗号一四五，案卷号571，此提案具体日期不详，暂系于此）

现实政治

现实政治是政治的方法论，不能说不牵涉到主义，但与主义不是一件事。任何主义都有他的现实政治。社会主义必有他的现实方法，否则将为幻想主义者。民主主义必有他的现实方法，否则必为无能的乱民主。诸如此类，这些现实方法是对于一切政治共同的。若只有现实而无主义，必成所谓机会主义，但若只谈主义而绝不把握着现实，必不能走上胜利之路。我所谓现实政治者，只是如此一套，其中绝不含有马加维利主义，或德国人所谓的“现实政治”。

我所谓现实政治可分三段说：一、认识现实；二、把握现实；三、操纵现实。现在分别说去。

所谓认识现实，必须具有下列要义：

（一）客观主义而非主观主义。客观者，以事实为根据，主观者，以假想为根据。假想的结果，也许可成一家之言（设如有才学，而其职业是文艺），但决不能把事情办好。

（二）智慧主义而非直觉主义。工程师造桥，是智慧的产物。蜜蜂造蜜，是直觉的产物。蜜诚然甚好，然而永远是那一样，何如桥之千变万化因地制宜呢？何况老鸦吃死肉，而自以为美，也是直觉呢。

（三）多元主义而非一元主义。天下事总不能从一面看，从一面看是主观，是疏略，以至是错误。综合各面的观察，方可得到一个轮廓。我们固不当被头绪的繁多压倒在地下，也不当因头

绪的繁多而只取其一线，以为天下之奥妙尽在乎是，总是把头绪理出来方好。若固执一元，以为天下事都是如此如此，最好的说法，也只是一个先天推断的固执论者（Doctrinaire)。学院中不少此等典型，广场上更多此等口号，但处理起事务来决不是如此简单的。

（四）实验室主义而非寺院主义。实验室的精神，是以科学纪律造成心中之疑点，而以实验方法证明或否定之。寺院主义是以起信为前提，起信以后，看到的一切事物，无非是大法之显扬了。实验室主义是充分利用五官，更把脑筋逻辑化，寺院主义则是封闭五官，横切脑筋，岂止"思而不学则殆"而已。

总括来说，那种主观主义、直觉主义、一元主义、寺院主义的人们，若是有学问呢，有风格呢，有天才呢，仍不失为历史上的艺术作品，在中世纪也许被教会列入圣人堂。在现在呢，办一事坏一事。今日之欲创造哲学者何其多？欲骋才情者何其多？欲天下事皆如己愿者何其多？自喜自信他的见解超越中外者何其多？因而不务本业者何其多？总而言之，把事实一切扔开，完全自我发挥者何其多？

要矫正这个风气，只有用客观主义、智慧主义、多元主义、实验室主义。这不是容易办到的，也许客观的事实看来很不好受，因为正和愿望相反；也许运用智慧太费气力，这里边要压制感情，压制愿望，压制冲动，乃至大大牺牲；也许实验室主义他根本无此耐性尝试，以为这些真是多事，更或误把经历当做实验了。但是，自我克服主观，无论如何烦恼，是认识现实之本。

所谓把握现实者，可以这样说：现实之于你我，不是风景可以留恋的，不是史迹可以凭吊的，你，我，人人，都在里边。在这巨流之中，要远远的看到他，要捉到他，要如何翻在他上面，而不为他压倒。那么如何可以把握住他呢？我想，下列几项是不可忽的：

（一）集体视听。一人之视听有限，众人之视听无量，但若

这个集体只以孟子所谓“左右”为限，或以有求有赖于我者为限，是很容易上当的。若寄耳目于大众，乃可视听于千里之外。

（二）集体思想。西洋哲学中有一个名词是“辩证法”，这个名词颇有人以为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可分的，那是错误了。这个名词古得很，是二千五百年前希腊思想家所造的名词，其原文即是“对辩”，二人正反相辩，理解便如此推衍，玄学家推而广之，遂用以名大道之运行。一个人心中运思的方法，是正反相较，果能若干人有组织的运用正反相较，无论其形式为英国的辩论会，或俄国的小组讨论，只要有真正发挥反面意思的自由，以及假设反面意见的自由，虽中才也可得到高等的智慧。

（三）不失时机。古人说：“难得而易失者时也。”大凡一件事，若先时机而办，固可以坏事；若后时机而办，更无济于事。如何办得恰如时机，必须有先见，有远见，有决断，能立断。果真办得太迟，有些事可以毫无用处，有些事需要事倍功半，更有些事别生枝节。

（四）不省气力。“割鸡用牛刀”，固嫌不经济，割牛若用鸡刀，不知一割需要几年？“杯水车薪”一个比喻，差可以形容无效的改革。吃药要吃得够分量，方有效；办事要办得够分量，方有用。

既已充分了解现实，加紧把握现实，然后运用现实，以完成自己之政略，此之谓操纵现实。认识现实与把握现实，仿佛仍是现实为主，我为客，我是彻底了解现实的客人；操纵现实，则是我为主，现实为客，现实是我彻底的工具。操纵现实的要义，也可举四个例子：

（一）主动的而非被动的。被动者当然谈不到操纵，长久被动，苦矣苦矣。被动者必无先见，要主动必先有先见。

（二）发挥的而非防范的。天下之事，防不胜防。防之固者，无过马其诺防线，其效用何如？大凡一个政权，在其初建立时，防范有其用处，长久之后，力量全在发挥的政治功能中得来。防

范是无益乃至有害的。

（三）大韬略而非小术数。小术数者，正如曾子固所说："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四）进取而非保守。这个世界谈不到宁静，任何一事，不进取者保守不到些许。

再说一下现实政治之敌。他的敌可有下列四项：

（一）感情主义。看现在世界上的大人物，成功的，哪个不是克服感情的，那些是凭感情而行的？他们的成功，都可证明他们的理智是如何不受感情支配的。

（二）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界说，可以这样：①传事而非办事。所谓传事者，一件事由甲传到乙，乙又传到丙，传之不已，愈传愈无。②办公事而非办实事。我们是世界上的第一文字国，一切事都在纸上。③最大量的懒惰。反正事情坏了，国家亡了，与他无干。

（三）面子主义。面子主义有积极、消极两面，积极的面子主义是务名不务实，我们今后再务不得名了。消极的面子主义是蒙实害，避显辱，那真得不偿失了。

（四）鸵鸟主义。非洲的鸵鸟，在不可拒的敌人迫近时，便把头埋在沙子里，以不见为不有。这自然也是一种安慰，可惜为时太短！人之大患，无过于不见其所不愿见，不听其所不愿听，不信其所不愿信。

夜深意倦，写此"四四一十六"条，直不成文理，而千岁之忧历历现于心上。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是个文字国，近代化差得太远，到处看见脱离现实的景象，到处见到脱离现实的有力人物，到处看到八股文字、中世纪主义。有一天走上现实之路罢！这是我日夜祷告的。

目前内政的最大现实，是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这样，政治的大发电机开动了。外交的最大现实，是强化一切大国的友谊，必须有可恃的朋友，必须无假想的敌人，必须友

邦的力量我们可拿来用，这样，然后我们中国可以有个建国的机会，可以有二十年的光阴给我们培植实力。这话容我后来再说。

（原载 1944 年 11 月 19 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1945 年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罗斯福总统突然谢世，引起全世上爱自由的人民的悲痛，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政见，不分主义，普遍的衷心痛悼。这固然由于世界缩小了，可以发生国际仰瞻的人物，也正因为罗斯福之伟大风格，有超越于不同的种族、阶级、政见、主义者。我们痛定思念，他这一生对美国，对远东，对世界，对人类前途的贡献，皆曾划一时代。他就任美国大总统时，正值空前的商业不景气，他推行“新政”——其中实在含有温和而有效的社会主义成分——安定了民生，更继续不断的创造些有利大众的制法，同时先天下人看到世界大祸之将临，搏斗孤立派，推行“大海军”，终于领导世界走到今天进步的战胜逆行的形势。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他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理智与情感调和，现实政治与崇高理想兼备，我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是怎样？他虽然在世界运行的最紧要关键中忽然谢世，他已经成就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格之一，他这一生必是后来史家一个大题目。现在若问，在他的伟大贡献中最伟大的是什么？各人的重点不同，答案必不一致，我的答案是，他给自由主义一个新动向，新生命，并且以事实指证明白，这个改造的、积极的新自由主义有领导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资格。

这话待我从远处说起。自由主义是美国独立，法兰西革命的产品，领导这两大事件的思想，在十八世纪中不止一家，前此的宗教革命也是一个远源，但最有效力的激动者还要算卢骚的政治

哲学、教育哲学。诚然，我们现在检讨卢骚的思想，可以证明他的政治哲学并无历史的根据。他的教育哲学并无心理的根据。但，哲学的时代正确性，是要看他能不能与时代的现实配合发生作用，不像几何物理一样，超于时间的。卢骚的哲学恰恰激动了新兴第三阶级，即所谓市民阶级的心坎，于是对封建宗教的势力之统治者发生革命，以自由为号召，以解放为归宿。法兰西革命虽震荡了全欧洲，却并未曾安定下去，终被个人主义者之拿破仑挟着走了岔路，在革命中也并未曾演化出一个切实具体的教条和方案来，虽有“平等、自由、友爱”的原则，这仍是空洞洞的。再看美国，政治虽然安定，自由虽然确立，若以现在的眼光看去，他那宝贵的《人权宣言》十条，仍多偏于政治的消极方面。十九世纪自由人道主义在英国之演进虽无赫赫的段落，却有不少零星而合于实际的进步。整个看来，在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后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却因与资本主义配合而变质了！自由主义因反抗封建而产生，资本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发展，这两件事原来毫不相干，前者是不愿受役于人，后者是因机器而役人，心情上更全是相反的。1848 年的欧洲革命，确是法兰西革命的尾声，这中间何尝有资本主义？那些初在英国及他地推广工业革命，夺民田，役幼童，乃至跑到海外冒险去的“工业诸侯”，虽然建设了他的“财产自由”以外，又何尝有人道性的自由主义在呢？历史上常常有两件事原不相干，因同时发生而纠缠不清的，这就是一个例。诚然，这中间也不无联系之处，因为这两件事都是凭借十七八世纪第三阶级之渐渐生长而出来的，但是在心术上，在政治意义上，终于是两件不相干的事。从十九世纪之初，纯正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偏于人道主义者，几乎全被赶入好事者的沙龙，作家的论撰，学校的课堂里去了。在一般的社会上，力量实在不大，白瞪着眼看着资本主义挟走的自由主义在社会上大发达，一切为着资本主义的利益！资本主义这样的利用自由主义，诚然得了很大的便宜，击破封建势力，建设“财产自由”。可惜的是，

法兰西革命的人道主义色彩完全遮盖了。不过，沙龙、课堂与著作，也还不是不生产的田园，于是纯正自由主义也还有在理论上发达的趋势。不特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演化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即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如边沁、穆勒父子等，也认明机会均等在自由主义中之重要，所以忽略经济方面之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说，不是真有见解的自由主义者，不是人道传统的自由主义者。

自从“第四阶级”出头，资本阶级及其挟带的变态自由主义，成了目下受击之对象，于是很有转而结合旧势力恶势力者。又自上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公正的和平，及其经济影响，引起欧洲的各种反动力量，对于亚洲之不变的殖民地概念，培养了日本的实力，于是两大战之间成了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之没落期，其结果便是这次的世界大战。在此次世界大战之前夕，许多人怀疑自由主义之实用性，加以一切的攻击——“无能”、“虚伪”、“作恶”、“坏事”等等。

不过，在这四面受敌状况中的自由主义者，也有一部分人不甘居败北而检讨现实，回想百余年的进展，以为自由主义确有若干修正之必要，而不应该根本加以推翻。这一类的修正派大约限于文人及教授，他们的原则大致可分为两项：

一、继续法兰西革命的传统，即人道的自由主义，而解脱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相衍的帝国主义之不解缘，乃至反对资本主义。

二、取用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本不与法兰西革命时代的自由主义违反的——而不取一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阶级斗争哲学。

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然若一面恢复原来的人道主义，一方又接受阶级斗争之理论，仍是把政治动力放在人之相恨上，仍是与人道主义相反的。人类的文明，总应该有继续性，有继续性然后便于发扬光大。试看欧洲的文明，在古代

本以地中海为中心，北岸之欧洲，南岸之非洲，有同等重要，只缘非洲经过多次的彻底推翻，成了今天的落伍；北岸的欧洲文化，层层的建设上去，遂有近代文明的光辉。今天求人类的进步，总不该先推翻一切，从“青铜时代”重新做起，希特勒便是一个这样打算自原人从新做起者。所以新自由主义者应该不违反人道主义之传统，而考核现实，修正道路的错误。

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这次战前虽不乏其人，终无多大政治力量，总被右派呼为幻想者，被左翼呼为“乌托邦”！总为世人所忽略！

谁知罗斯福总统，不凭借学究的理论，不从事教条的排演，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故，竟把一种的新自由主义，在新大陆表证其成功，并指示此一主义可以领导世界和平，人类进步。

何以称他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呢？美国的政治传统，本是自由主义，不待说，但传统的自由主义到今天太多保守性，例如“财产自由”，竟是其他一切自由的障碍。罗斯福总统在第一第二两任总统时推行的一切社会立法，即所谓“新政”者，虽不揭社会主义之名，也并不是强烈性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运用常识适合国情的对资本主义现状之严重修正案，其中实在包含着不少温和的社会主义成分。这无怪乎保守的最高法院宣布他的最大制法为“不合宪法”，此中所谓“不合宪法”，即不合“财产自由”之意。更无怪乎“大买卖人”始终反对他。不过民众是支持他的，时代是支持他的，所以他四任当选。1932 年，他第一次竞选总统，发表了一个《新民约》演说，他说：

> 人人皆有生存之权利，同时也应有安居乐业之权利。他也许因为懒惰和罪恶，放弃这天赋之权，可是他有自新的机会去行使他的。……老、弱、孩童，当受人爱护，不得加以摧残。我们一定要限制投机家、操纵者，甚至于金融家的活动。……总之，我们必须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原译）

这个名号，这个立点，完全说明他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而他在第一第二任之立法与建设（如 TVA，田纳西建设工程），完全证明他这主义是成功者。

到他第三任时，他看到世界大战之不可免，进步分子必与退步分子搏斗，于是把备战作为他的最大新政，有这最大新政，其他社会立法转可缓办了（战时是最易于推行社会政策的时候，在英美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尚如此，只有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他看到世界上不能一国独自繁荣，又看到新自由主义之不能孤立，所以自第二任起，便运用国际的形势，反抗恶势力，发挥新力量。在 1941 年 1 月 6 日，他向国会宣布其未来世界观念，即是那个驰名的“四大自由”论，他说：

……在我们祈求的未来日子，我们望见一个建设在四种基本人类自由的世界。

第一是，言论及表示的自由——世界的一切地方。

第二是，每人各如其式崇拜其上帝之自由——世界的一切地方。

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把这话说到世界上，就等于说，每个民族间，为他的人民获得一个健康的太平生活，需要相互的经济了解——世界的一切地方。

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把这话说到世界上，就等于说，全世界的解除武装，到一种程度，使每一国均无力对其邻人施行侵略——世界的任何地方。这不是一个千年的远景，这是可以在我们这一世造成的世界之基础。这个世界，恰是与独裁者所欲造成的暴力的新秩序完全相反的。（新译）

后两项之称作自由，本是英文里舞弄字面，在中文里原是多事，即此可知他的自由论含有一半是新成分，以此新成分补充旧有者，而自由主义之整个立场为之改变，消极的变为积极的，面

子的变为充实的，散漫的变为计划的，国际竞争的变为国际合作的。原来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实有助长帝国主义之咎，他的第三原则——免于匮乏——不特净化原来者，且正反其道而行之。他这两项新原则，实在得自上次大战后之教训，也正是他的“新政”之扩大，因为用心取术全是一贯的，我们不妨称他这四原则为“世界的新政”！只可惜这“世界的新政”方开始奋斗时，即旧金山将开会时，他便去世了。

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而促成这两事者是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问平等，不管自由，那种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来，而且没有自由的生活是值不得生活的，因为没有自由便没有进步了，所以自由与平等不可偏废，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利用物质的进步（即科学与经济）和精神的进步（即人之相爱心而非相恨心），以促成人类之自由平等，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使命。

（原载 1945 年 4 月 29 日重庆《大公报》）

评英国大选

这次英国大选的结果，不但出于保守党意料之外，便是工党也未想到胜利如此完全。自从邱吉尔首相宣布改选，我和若干朋友谈，包括我自己在内，多以为邱吉尔氏可以胜利，不过席次要大减，或者减到不能维持明显的绝对多数的状况。这个理由如下：若在平时，工党得绝对多数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战争还未结束，两党政纲之外，还有邱氏的一代威望，是大有助于保守党的。后来看见若干英国报，颇觉最初预料未尽可靠，似乎两者之命运系于天平之上，谁胜谁败未可知，但席次未必差别太多。今之结果乃如此，可见战争之未结束，邱氏之威望都不足挽回保守党之颓势。英国人民之决心倾向温和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可疑了。这在整个世界政治上是很有他的重要性的。

现在先应说明英国选举制度的一点，和宪法的一点。照席次论，保守党对工党大致是一对二；照选票论，二千五百万选票中相差大约二百多万，即九对十一之比。英美选举法，都是用区域竞选制的，所以能将胜利的党，在席次数目上多多放大。德国当年威玛共和国宪法便与此不同，全国投党票而不投人票，无个人在区域竞选之制，所以胜利之党，仍不能在国会中显得优越的胜利，于是永远是混合内阁，左右两翼政纲相差甚远，行政总是一个模糊的妥协，内阁总是常在改换，这不能不说是威玛共和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英美的制度，能将胜利的党放大其胜利，于是执政者可以有权行事。又有一点，在英国当年两党竞选时，国

会席次的多数,即是全国选票的多数,所以结果是很明显的。在竞选者不止两党时,问题就来了,在国会席次得到比较多数的党,不必在全国选票中得到过半数,即在席次上得到绝对多数(过半数)的党,也不一定在全国选票中得到过半数。得到选票过半数的,号称有委任权,得不到的则无有,在行使政权上应该有所不同的。前者可以自由发表其政纲,后者须得更多的迁就舆论。即如第一第二两次的工党内阁,都是没有得到选票的绝对多数的。这一个宪法观点,也和英国其他的宪法观点一样,是不成文法。这次工党内阁,据报载不完全的消息,已经得到总选票之半数,所以必是一个有权的内阁,和前两次的工党内阁大不同了。

有人说，保守党及工党在外交的政策上无不同，这话半对半不对。表面上，两党在组织混合内阁时，外交政策是一致的，这一次竞选，也不以外交政策为决斗题目，这由于英国政治水准甚高，政党的“党德”甚高之故。求其实际，两者之外交政策，虽在大原则上不悖谬，例如国际和平与合作等。然在兴趣上也大有不同之处，即如对苏联态度，邱氏也是主张合作的，但其中不无防御性，工党便要诚挚得多。又如英美关系，邱氏有时不免用其才气挟着朋友走，今天杜阿两位“以德胜”的先生的合作，必有不同的作风。又如中英关系，这些年来，在盟邦友好的大轮廓中，也不是没有小龃龉，这些小龃龉，以后可以希望大减，若干未决问题，当比较容易解决，或者包括邱氏认为不能成为问题之问题在内，战后之合作，应当更容易。不过我们须得记着两件事：一、英国政治，不取“分赃主义”，即是政府改变，不改变事务官，与我们接头的人及其说法，不会有剧烈的改变。二、在这次世界大战前，同情中国者多是自由及左倾分子，在近几年，保守党的分子，对我们也多切实要好之人，但我恐怕仍以开明进步分子居主要，他们钦佩中国抗战之英勇，却也未必满意中国之政治现状。英国人是老练的，所以不如美国人批评之多，然若希望我们在国际合作上更顺适的话，我们的行政效能必须大有进

步，我们的高官必须更使人可敬，我们的整个政治必须向开明向进步上走。

以上是论工党胜利后之英国外交趋势，一句话说，四强合作的局面，可以有进展。

无疑的，这次决战的主题是内政。在保守党方面，仍抄上次大战后路易乔治混合政府的老调，例如盖住房、防失业、发展贸易等等，再加上普遍保险等等社会安定的政策，然而也说明了，战后国家管制经济的必逐渐松弛。一句话概括之，即是在经济自由之原则下使用社会福利政策，又可谓之“经济复员”。这个，英国多数选民不同意，以其不充足，以其含糊。在工党方面，却拿出了一个明晰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方案，这方案比罗故总统的新政更多好几倍的含了社会主义，例如矿产国有、钢铁国有、内地交通国有、土地国管、银行国管、物资继续实行管制分配制等等，毫不含糊的是一个温和社会主义制度。工党的社会主义，是不革命性的，因为工党是个宪政党，不是革命党，而且其本身最大力量出自工团（Trade Unions），在各种社会主义中最富保守性，这是使英国工党永不会与英国共产党合作的，虽然后者屡次要求入党。但在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国有国营经济政纲，而以大多数当选，不能不算世界上头等的大事！这中间，可以象征英国人之有朝气，老大帝国人民之有觉悟。上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最希望的是战后恢复战前的一切，所以路易乔治——奥斯丁、张伯伦之联合政府应运而生。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人却不如此想了，这次选举的结果，证明英国多数人民要求战时各种经济政策与国家管制之继续，不特继续，且要在战后扩而大之，成为一个含有不少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爱好一切自由的英国人，包括经济自由在内，难道真正要修正他对于自由的基本观念吗？不然，不然，他们的政治清明，社会守法，他们相信自由与国家管制可以并行的，这在战时已经试验得成功，他们相信在平时必然可以，因为这次工党组阁，人才有了，与麦唐纳第

一次组阁大不同了。这个试验，在欧洲西北部的小国颇有成功，因为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与英工党立点有甚多相似处，然在一等大国去实行，这要算第一次了，所以这个选举是有世界意义的。

介于内政外交之间的，是“帝国政策”。我想，这次选举也要有大影响，例如印度问题，保守党虽然也要解决，工党必然更积极；又如“帝国优先”（Imperial Preference），实际是在世界上立一个不合作的经济集团，在工党手中，也不会发展，所以工党的贸易政策必能和美国的民主党政策合作。

这一件大事，对于我们可以作为一剂“清凉散”，服之可使“神明开朗”。就理论言，国父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在是温和的，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中英国情不同，他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业，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虽不同，而其为温和社会主义的方案则同。中国的国民党与英国的工党，尤其是工党的开明左翼分子，在理论上很有共同点，在历史上也不像有与保守党的龃龉，国界不同，而政见相同之政府容易合作，这是一个鲜有例外的原则。但一切要以行动为准，无法以理论为准。假如政府今后实行前月国民党六全大会之政纲政策，——我想，没有客观的理由使他不实行——这次英国选举的结果，实在也给中国一个鼓励，看看世界大势，不是如此走吗？然而如果“之不能行”，其后患不堪言状，所谓“挂羊头卖狗肉”，固然不是办法，然而挂黄牛肉卖清茶又岂能发市呢？

末了说说邱吉尔先生。邱公之一生，以才气名，以善斗名，上次大战，他虽然立了特殊的功勋，而其前前后后之行事，虽然豪迈有为，有时也弄得一团糟，终究不为英国大众所喜，即在保守党中也很孤立。这次大战，确为世界人类立了大功，不仅救了英国而已。罗故总统与邱老先生，为人类的前途“挽狂澜于既倒”，《大公报》社论说他抗德联苏的各种英勇与毅力。此外尚有极其值得称许之一事，即邱公把英国武力重新整饬起来一件伟绩也。邱先生当政之宿将，多以家世与资历当位，甚不了解近代战

术，很出了些岔子，即如威尔斯亲王号之沉没，其一例也。邱公好斗好战，其天才使他彻底了解近代战术，并多创造性，在近代战略史上是有头等位置的。他当政之前，认识陆海空军的将领多是和他同样属于英国统治阶级数百家的，某也贤，某也不称，他心中早有数，到他当政，迅速的调整，战略上，战备上，战资上，一切近代化，于是卒成大功。在一切特殊力能之上，他是一个不出世的大军人。不过，他在军略上的天才，并不能运用到政治上，他的政府，除艾登外相以“翩翩浊世佳公子”负盛名外，不大见特殊人物，仿佛一颗大星的周围，每每不见明星，究竟是这颗大星亮了呢，或者大星之外不容次大星的存在？英国的军事与外交在他手中大进步了，而保守党的政见却并未曾追上时代，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他极富于文学与艺术的兴趣，他的政治态度最为浪漫，说话则常常说出极文明的野蛮话，也常为此发生不必发生的纠纷。英国人在欧洲民族中，比较的最少英雄崇拜心理，这次邱相之落选，与当年兴登堡元帅之被选为威玛共和国大总统，反映英德两国人民政治意识之不同，一个极成熟，一个不成熟。若说英国选民不投他的票的人是厌恶他，可就错了，他将永为英人所崇爱，因为救英国于亡灭之中。不过崇爱他，和用他作公仆，在英国人心中不是一件事啊。

朋友见访，看我写此文，问我为何写到这种新闻学专题上去。我说，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其希望英美能作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所以我才对此大选发生兴趣。至于邱吉尔先生之去职实不胜其感念，也因为我是一个极不讲究英雄崇拜的民族中（中国）稍有英雄崇拜意识的，这或者由于我之反儒学而受些西洋思想影响罢！

（原载 1945 年 7 月 30 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黄　祸

这些天来，街谈巷议，从集会的场所到公共汽车上，都在那里谈黄金献金案。这事，也使得我吃了一惊，当政府在报上宣布黄金献金办法的早晨，我醒得颇晚，醒后，看见报纸已在床头上，拿来一看，原来有这一回事！我想，我是在做梦罢？然而四顾斗室，一切清清白白，绝不是梦中景色！一直奇怪到十一点钟，才算罢休。若问我何以这样奇怪呢？实不相瞒，我虽觉得宋子文院长和他的前任孔祥熙氏，在能力、见解、作风上，虽然应当有很大的不同，但在黄金灿烂的资本主义思想原则上，未必二致。前者财政当局这些年的一贯政策是不使"有钱者出钱"，而使"有钱者出洋"，"无钱者出钱"，换句话说，就是不动"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阶级的利益。然而抗战是必须动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的！看看英美两国，战时是如何抽所得税、利得税，以及推销债券！资本主义的国家尚如此，何况我们定在宪章上是"三民主义的国家"？英美所得税既然普遍，而累进得更凶，这样才真是全民作战，"有钱者出钱"。参政会中有好些人，颇主张动摇既得利益阶级，而宋院长这次的报告，丝毫没有同意我们这办法的象征；相反的，他对于美国存款三万万元的故事，颇有解辩。所以我连做梦也想不到，在他手中，会办出黄金献金这件大事来。有人说，是他的主义，有人说，不是；其事甚秘，不必做考据工夫。总而言之，政府既然办这件事，即是极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是自从抗战以来政府第一次损伤到既得利益阶级的事。不

损伤到既得利益阶级，战费是无从筹措的，人心是不能平的。

说到这件事的办法，我以为它是“大醇而小疵”。先说小疵，第一，二两起码献金，未免太低些，似乎应自四两左右起。第二，不用累进的办法，而大户小户一致，大小户一致，便不算太公平了。第三，不于此施用战时利得税的办法，而强名之曰献金，中国人之客气办法，适足为累。但是，这些小疵是不能掩大醇的，而且是可想的。多少年来，一种风气，都是以国家为剥削之对象，每办一事，总是出些怪主意，办事者因利乘便，先捞一票子，习为故事，并不以为不是，所以我想这次法办黄金泄露消息案，那些被判刑的，心中在叫冤，他们似乎想着，“这样的事，我们一向如此，没有听到长官说不是呀，怎样今天忽然说我犯罪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办理这件事，颇不易考虑周详，更不能集思广益，所以潦草的定出这个办法来，其可恕者以此。

再说大醇，第一，民生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在民生主义中，没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因而“契约”、“信用”等等名词都非绝对性。换言之，“契约”、“信用”，发现了重大毛病，私而害公，政府应该有权修正。第二，假定今年春天初改官价为三万五千时买了二两，费去七万，今天官价二两是三十四万，不上半年，足足五倍，以前买的，定价更低，不消说了。这样情形、不抽税还有公道吗？抽税不合于军事第一的原则吗？第三，我们是在抗战的时候，争取民族今后的自由与独立。在英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战时尚且积极抽所得税、利得税、累进的方式真正吓死我们的资本家。以英国论，每年进款千镑以上的人，自己所收到的太少了。以美国论，一个朋友对我说，截至现在，政府在国会通过的拨款单，其利息即须全国国民总收入百分之二十。所以这次英美的战费，已经把他们玄孙的劳力钱都用了。看看我们，以“法币膨胀”政策之不良，已把小资产阶级的下中层扫荡净尽了，而各种的怪资，异常发达，恰予一切方便，遂成今日社会上之大不平，乃至影响国家之安定。探本追源由于

既得利益之畸形发达。我所谓既得利益，即是前几个月《大公报》所载昆明五教授的那篇文章的意思。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大商必受庇荫于大官。前者发展为官僚资本，后者便是发国难财的。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这些既得利益阶级，是不能动他分毫的，这次一动，便大叫，不是显著的证据吗？这真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又可说是"不拔一毛而亡国，不恤也"！说到这里，我心中无名业火高千丈。言归正传，政府这次黄金献金办法，从小处说，是合乎战时利得税的原则的；从大处说，是开始进攻既得利益的初步。我对于政府近年之施政，什九失望，独这一次还感觉兴奋。然而既得利益阶级的"舆论"，以及争取既得利益阶级的同情的"舆论"，又如此！责备国民党不实行三民主义，是对的，国民党的贤者应该反省；然而国民党的行此一办法，确为多少年来接近民生主义的第一着，如何又说不是？做政论的人，要顾到前后的一致的。

有人说那些买黄金的人不都是大户，小户中包括些勤劳公务员、老太婆的棺材本、子女的学费。我想，这话是真的。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一下我们公教人员的待遇和生活程度，便可知道那些能买二两黄金的公务员，那些能存棺材本的老太婆，那些能为了子女积点学费的人们，仍旧是幸运的。譬如以我而论，我领的是中上阶公教人员的待遇，若在平时，也满写意哉。在今天，因只领一份待遇（法律只许一份），实无任何方法可以买半两黄金。我也有老母，四年前去世了，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朋友有劝我开吊者，我实在办不到。我也有一小儿，还未入中学，明年有没有钱入中学，到时再说。若说先囤积学费呵，才是做梦呢！四年前，忽然须搬家，那可糟极了，哪能动得。于是改了两句现成的诗形容之，"生意犹如秋后叶，只堪霜露不堪风"。所以拿我做比例，那些勤劳的、不犯法的、不侵公家的、不兼商的公教人

员，而可以买二两黄金者，总不出下列几种：

一、无家，二、夫妻做事，三、兼差。这究竟是少数，而如我者是多数，竟不如我者更是多数。譬如在十八层地狱的人，仰望在十层者，高不可攀，如登仙然。然则他们那些只能买一两的人，我还羡慕他，捐上八钱，我也同情他，究竟不伤筋骨，不算太不平呵！向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战士看，我们的一切火气可消了。这些黄金献金的纠纷，还成问题吗？若向既得利益阶级看，简直应该用原子弹去炸他，因为他们是全民族敌人，不下于日本鬼子呵！

有人说，这个办法可以招致金融界之空前紊乱，这话可以下列某报之记载为代表。他说："据本市金融界权威人士谈：政府应发之出售黄金期货存单，共计三百万两，献金一百二十万两，以十七万元牌价计算，共需要头寸一千九百亿元，渝市约占半数，应献金九百亿元。且目前渝市银钱业周转金仅为一百亿元，尚有八百亿元，应如何筹措，渡过难关，后果颇令人烦闷，可能引起金融市场之苦恼。"其实这话只说了半边。原定的办法是这样："存户购户捐献黄金，于兑取黄金时一次缴献（原额）百分之四十，而取得原额百分之六十之黄金，作为结束，但依存户购户之得按兑取时之法价，以法币折合，四成献金，而取得原额全数黄金。"如果只用后一法或可以如这个报上所说，今既有前列一法，如何不择前列一法？如择前列一法，全不需要头寸。然则头寸之需要，说来说去，仍是舍不得那四成金子、那个劳什子（贾宝玉的话），那个阿堵物（何曾的话），那个原始人类的迷信品！

照黄金献金办法，买金子的人真正吃亏了吗？即就今年开春由二万涨至三万五闹出走漏消息一个大案子的时候算起，买金子的人利益还是很大的。以前官价更低，不消说了。当时买二两金子是七万元，到今天，二两的法价是三十四万，除去献金百分之四十为十四万外，所余六成尚值二十万。假如当时有最荒谬的比

期率，四五个月，也不过加倍罢了。七万之倍为十四万，今乃有二十万，几乎是七万的三倍！所以献金之后，仍比存比期高得不止一倍，这不能算不是一个合算的生意，比囤米好得多了！何况比期先是一件要不得的东西？若果一点税不抽，竟以七万经四五个月得三十万，更不成事体，更刺激社会心理之不安，今天这样说不是的，当时或若要那样说不是了。

有人说，这事要出乱子。这我可不敢保。因为这些黄金神圣论者，颇代表着榨取阶级之一部分，他们要捣乱是有乱可捣的。果真捣乱，只有绳之以法。只要能把献金的钱或金子都用在军费上，——这是必须办到的——政府不应有所畏惧。

听说，黄金献金者并不踊跃，这是当然，却也有妙法对付，政府不妨再定一法，凡大户十天，小户一月，不来献金取金者，便没收其全数。看他来不来！果政府再定此类之法，又何妨把累进方法加入，再剥他一大块呢？

不过，我并不以政府这个办法为满足，必须由此“扩而充之”。照这个献金的原则稍须推广一下，下列各事应当立即实行：

一、美金储蓄券，美金公债，原来弄得乱糟糟的，应一齐折半再延期十年支付。其已付出者，也要尽力查明下落，而收回之。

二、重庆市与昆明市的土地（两个拨动物价的中心），立即收归国有，给以长期债券，并绝对不许土豪封建发国难财的染指。

三、大官及前任大官之有钱者，不分中央与地方，须大量献金。

四、存美私人外汇三亿余元，尽速设法征用。

要打仗，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侵犯既得利益。

铲除既得利益阶级，中华民国万岁！

（原载 1945 年 8 月 9 日重庆《大公报》）

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

谨案。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而一有事实暴露，即为触犯刑章。如黄金案主角之郭景昆，已在法院取保矣，而国库局私自朋分成都未售美金公债一案，至今尚未送法院。由此例之，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至于中央信托局，亦每以触犯刑章闻。如前者之林士良案，今者黄金案中钟锷、黄华以下皆涉及。此等机关如不彻查严办，必不足以肃国家之政纪。谨拟办法如下：

一、彻查。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本会公推之代表（必为参政员）彻查其积年之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之嫌疑者，分别轻重，一律移送法院或文官惩戒委员会。此项彻查人员，得接受人员呈诉之项目。

二、改组。今之中央银行，俨然对国家而独立，实属不成事体，应使其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以便利政务。中央信托局应予取消，移交其业务于战时生产局。惟取消以前之账目，仍须彻查。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

决议：本案修正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修正之点：案由“肃官常”改为“维法纪”，办法一“或文官惩戒委员会”删，办法二改为“今之中央银

行，俨然独立，实属不成事体，应使其改隶财政部，以便利政务，中央信托局应澈底整顿，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主持人……应负连带责任，一齐撤职，其有涉……”。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纪录》第183～184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46年1月）

谈北大不聘伪教职员

［本报讯］北京大学正在积极筹备迁移复校，据该校代理校长傅斯年氏昨对记者谈：北大将来复校时，决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职员。傅氏谓：伪校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属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现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闻伪北大参加补习学生共四千余人。

（原载 1945 年 11 月 28 日《大公报》）

附录：容庚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

按此系私函而笔者愿为公开发表。其中虽多个人之语，但与目前收复区之教育问题不无关系，容君系考古学者，其文也雅驯可诵：爰不辞为之刊出。编者志

孟真足下：

卢沟桥事变正当庚南归过汉之时。在粤逗留四月、北平已陷，南京岌岌。庚以燕大职责，乃复北归，黾勉四年，成《重订

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数书。教育部授以二等奖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聘为通信研究员，不虞之誉诚非所堪，差幸不见弃于国。太平洋事变，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余曰："吾辈希望之日至矣。"庚亦自念吾国百年积弱，庶几奋发为雄乎！燕大复校于成都，同人多西去，八姝媛亦从之而西。而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绌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强，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黄〔皇〕撤退；亦未与人民以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以施教于燕大者施教于北大，于其暇日，复成《卜辞研究》、《倪瓒书之著录及其伪作》数种。三十二年，日寇欲沿平汉线作文化史迹调查，自定县起至开封，以梅原末治为团长，行程 10 月 1 日至 31 日。庚以一纸书尼之，事遂中止。忍死俟时，自谓于国无负。日本投降，司徒先生被释，庚往慰问，握手言欢，复述先生之语曰："吾辈希望之日至矣"，亦足见欢欣鼓舞之心情。俄而教育部拟定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公布："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须经登记甄审合格后始得予以分发。"信如斯言，则教部根本不承认敌伪专科以上学校之存在。同人闻之，咸惊愕失色。北平为北大、师大、艺专三校之五千同学，在未甄审合格分发以前，将安所归。未尝不深感政府诸公对于沦陷区教育之隔膜，而举措之失当也。当北大等校之迁于西南，而伪政府之重立三校也，课程依旧，优先聘任留平之旧教职员。除增日籍教授每院数人，及增加日文每周数小时外，实无若何之变更。不知所谓奴化教育者，将何所指。日寇之所望于学校者，欲使学生时间一半读书，一半为之工作。则

教职员生活所需，皆可配给。遭同人一致之拒绝。吾辈多专心教书，而兼政府职务者甚少。《剧秦美新》之文，固优为之！然而借以媚日取荣者亦甚少。日寇之不得逞志于教育界，自沦陷以迄于今。教员之苦，至近两年而极。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购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故破衣恶食，斥卖书籍家具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讲师，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时于道路而授课二小时者。其所得远不如卖烟拉车之辈为优。坚〔艰〕苦卓绝，极人世悲惨之境，果为何乎？固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汉奸乎，汉忠乎，事实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愿受政府之检举裁判而无所逃避。在日寇则视吾辈为反动，在政府之视吾辈为汉奸，啼笑皆非，所谓真理，固如乎。天乎，尚何言哉！

公之被命代理长校，全校方翘首跂足，望公之来如望岁焉，于今两月矣。诚不测公所以姗姗来迟之故。意者以汉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灭于无形乎。公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尝不冀公能变化气质，为“豁达大度，善于将将”之汉高祖。故敢为公借前箸筹之。北平警官学校，未闻以伪逆见斥，而施之于三校者，无他，饭碗问题也，接收诚易事，政府当不吝此数月之经费。明年合流，在昆明之北大迁回北平，则教员之聘任，尚志尚功，有难言者。即以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而言，在真校则有唐兰，在伪校则有庚。以言尚志，庚自不比相从患难之唐兰。以言尚功，则经验之富，著述之勇，苟有量才之玉尺，正不知孰为短长。一校既不能兼容而并包，何去可取，殊难斟酌。余谓此无虑之见也。国家需才正殷，吾辈无所能人，乃宜以伪废。有所能人，虽伪当废于本校，不当废于他校，宁与人争鸡虫得失者。即遭禁锢，庚独不能为“买卖破铜烂铁”之杭大宗耶。真校教员，优先录用可也，何害。至于学生，如欲甄审，在校举行，不必解散，使之坐废时日。三民主义，英文等科目，此学生愿学而不可得者，宁有异言。公如以为可者，

请即日来平接收。安堵如故，全校孰不讴歌公之盛德。昔蔡邕以附董卓被收付廷尉。马日磾驰往谓王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使吾党蒙其讪议。”邕遂死狱中。今之清议，得无类是。吾辈遭遇，有似伯喈，政府窜逐，无所怨尤。然三千学生亦国之俊秀，弃置可惜，一旦解散，悔欲止而不及矣。天下汹汹不安，是非难定。公等所以为伪为逆者，安知不复有伪公逆公者乎？公等正宜为政府宣布德意，与民更始，毋逞一时之偏见，而虑不先图也。书不尽意，惟为国自重，不宣。

客庚白。

（原载1945年11月7日北平《正报》）

关于“一二·一”惨案的谈话

傅常委归来后，罢委会交际股即派代表二人前往晋谒。傅常委说：“我是2日下午在重庆听到同学被屠杀的事情时，晓得非回来不可了。4日在机场等了一上午，到昆明已是下午四点，没有赶到教授会议。今日上午拜访了卢主席，下午去看关麟征，我对他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了。’关麟征说：‘那何必，我跟你还是朋友。’我说：‘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关麟征说：‘你怎么说是我杀了同学呢？’我跟他争辩了一大顿。”当代表问到傅常委怎样进行处理这件事时，傅常委说：“我尽我所有力量，依照教授会议所决定的去作，请你们转告同学们，请他们信任我和先生们，假如我有一点不站在同学的立场上作，我就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代表出来的时候问：“傅常委是不是要等这事情完全解决了才走呢？”傅常委说：“当然。”

（原载1945年12月7日罢委会通讯，又收入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第4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

对《世界日报》记者谈：不用伪北大人员，要替青年找第一流教授

（本报重庆特约航讯）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怒。除在上月30日，我也将他赌咒发誓不肯录用伪北大教职员的谈话，专电报告外。今天，我于前两日参加教育部朱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一早冒着迷濛的细雨，再去访问他。对这位患着血压过高而有爱国狂热的傅先生，我想更详尽地听听他的意见。在傅先生的寓所里，开门见山。

四点声明

他开门见山地向我提出四点重要声明：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荪，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在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手不停挥地记到这里，我才松出一口气来，请教傅先生对“伪”的解释。

正是非，辨忠奸

傅先生喷吐了两口土制雪茄，这才肯定的说：

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且不能做到这一步，那真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

不用伪校教员，学生绝对有利

提到青年，傅先生慨然地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其实在校学生当以求学问为第一，教授的好坏与学生有直接关系。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

“打死我也要说”

接着，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先生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同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别一类是钱稻孙型，那才是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荪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倒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曾多方企图阻挠，也是尽人皆知的事。“那末，拿这些文化汉奸该怎么办呢？”傅先生哈哈一

笑，用朗爽的山东口音问我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是傅先生一贯的主张，临出大门他还补说一句，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1945年12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

1946年

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

傅斯年 任鸿隽 陈衡哲 王云五 楼光来
宗白华 范存忠 储安平 吴世昌 林 超
苏继庼 钱清廉 吴任之 吴恩裕 陈铭德
罗承烈 赵超权 钱歌川 任美锷 张贵友

1946 年 2 月 11 日，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三地同时公布了上年同日在雅尔达会议中由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三人拟定的秘密协定，其中包括承认外蒙的独立、中苏共管中东南满两路、租借大连旅顺两港，以为苏联在德刚投降三个月后对日宣战的代价。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抗战的时间最久，所受的损失最重，不意美苏英三国竟订立这样的秘密协定，侵犯他们盟邦中国的领土主权，破坏了自华盛顿《九国公约》以讫开罗会议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庄严诺言。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

雅尔达会议的召开，正在中国中原湘桂各次战役失利之后，原子弹尚未成功以前，罗斯福在两面作战的形势下，急于要求苏联对日宣战，其处境心情，我们容能了解；但不顾道义，违背本心，同意苏联的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其事绝不可恕。罗斯福及其领导的美国，在中国人民心灵上原占有极其友好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已因雅尔达秘密协定大受打击。我们绝不能因为罗斯福在这次整个的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以及其他过去对于中国

的同情及援助，就原宥他这次的过失和责任。

自“九一八”以来，英国对于中国的抵抗日本，从来缺乏公平而有效的援助，甚至于一度封锁中国的惟一国际交通，以求对日的妥协。这种态度，久已有失公道。邱吉尔在雅尔达会议以前，曾特意夸大美国对华的援助，他蔑视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贡献及其他应占有的地位，在雅尔达会议上，他显然背负了为英国盟邦的中国，这完全是一种不荣誉的行为。

苏联在雅尔达会议的要求，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国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对《大西洋宪章》以来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所标揭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之权利，又何以自解？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这种行为，难免造成今后世界战祸的因素。为中国，为世界，我们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抗议。我们认为这个雅尔达秘密协定，是这次战争中最失道义最不荣誉的一个文件。它打消了联合国家参加反侵略战争的神圣性。苏美英三国应根据《开罗宣言》及莫斯科《四国宣言》的精神，勇敢而坦白地承认三国对于中国所犯的过失。苏联尤应自动放弃其帝俄时代的政策，以维护其素所主张的国际正义。中国政府应将这一问题及最近东北各种震惊人心的发展全部公开，要求联合国调查，用以断绝任何可能类似的秘密外交，并以避免东北重为世界大战的因素。关于目前的局势，中国政府除在苏联同样履行其条约义务的条件下履行其所签订的《中苏条约》中所应履行的义务外，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我们希望全国上下，不分党派，一致团结，监督政府，督促政府努力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其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原载1946年2月24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

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

中国的东北（“满洲”），诚然是近代战史中最炫耀的因素。为它，起了日俄战争，而日俄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为它，起了“九一八”沈阳事变，而沈阳事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逻辑的开始。虽然“九一八”到波德开战有好几年，而世界不安，公法破坏，走向大战之路，实自“九一八”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的“安定”远比今天好，而北大营的炮火，竟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之小康局面震破。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方才结束，东北又闹起来了，亚洲的火药库又冒烟了，真比第一次大战后的景象还不如。今天的联合国远不如国联初立时的景象，正是一个证据。恰如张伯伦要避免战争反而培植出战争一样，罗斯福先生要迅速结束第二次大战，反而种下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定种子，这就是《雅尔达协定》。除非世人充分了解这个重大意义而竭力避免，未来的历史，要证明这事的。

仿佛老天专和世界人，尤其是中国人开玩笑，把东亚的资源，集中在东北（“满洲”），以便“蚊蜗斗争”。中国号称地大物博，这真是夸大狂，地大须连外蒙新疆西藏算进，物博则全不是那一回事，只有东北是物博的。把中国划分几个经济区，可以这样说：第一区东北，重工业的资源占全国（新疆除外）百分之七十（约数），纤维工业几乎包办，化学工业占第一位。第二区华北，包括冀、鲁、豫、晋、察、绥，重工业资源占百分之二十，农业第一位，但也有不及东北处。第三区西南，包括川、滇、黔、湘、

桂、粤，重工业资源占百分之七八，稀金属较富。第四区华中，还有甚少的重工业资源。第五区东南，只是有泥田，即是非人工不办的农业。此区在当年号称富甲天下，等中国工业化起来、科学化起来，是必然落后不堪的。第六区西北（新疆除外），妄人谈开发，知者谈复苏，因为地形须先改正，然后草可生，水可用。新疆矿产未可量，其他无办法，另成一单位。东北在整个中国中如此，再分析他的内容：东北的煤矿，质量超过全世界任何地方，不比山西红煤只是烧洋炉子用的。东北的铁矿中国第一，东亚第一。东北有矿金，中国他处只有沙金（因为唐努乌梁海，不是中国了），又有银、水银、铜、铅、铁等金属，一切质量并可观。又有若干稀金属，包括电铀在内（无人注意），他在金属方面的贫乏，只是铝而已，这也不是没有，只是质量欠佳。总合他的矿产说，只缺少石油，然而煤那样多，为国防用的人造石油，也是有办法的。中国广大可用的森林，只有东北有，因为西康、青海的木材是无法运出的，所以他在纤维工业上，在中国应居独占的地位。至于农业，他因为大半是平原之故，最易利用科学方法，又因为雨量丰富，他的畜牧也是无限的，决非西北垂死的状态可比，农业是化学工业之本，所以除非硫酸亚一类向天空取资源的工业，化学工业也应该在中国占第一位。尤有一件妙处，东北水电的地位极高，这在黄河各省是不可能的，因为黄河区雨量不均。扬子江虽有发展所谓T·V·A之可能，然用钱浩大。最省钱，最易收效的，是东北的水电建设。水力发达，电力便宜，一切工业成本小了。还有大豆，东北独占，这物事在将来有无穷的用处。原来头等国家要有头等国的资源，中国的资源，自比意大利好些，但比苏、美、大英帝国，差得太远嘛。有东北，尚可使我们比于中欧全体。有东北，中国好比印度。无东北，中国只是意大利。读者或者不信我这话吗？请你问问了解中国资源的人，万勿轻听那些高谈开发西北以为“收之桑榆”的愚人！

再就东北的面积说，热河除外，共有一百二十万有余平方公

里（据民国二十七年日人实测伪满疆域数，灭热河，加“关东州”）。以他的极南端旅顺嘴到极北端的漠河，空中距离等于北平至厦门！从他的极东端混同江合流处到极西端贝尔池区边境的空中距离，等于上海到重庆！中国地图中，被外蒙新疆西藏占得太多了，每每忽略东北之广大。如不信，请拿尺子在地图上量一下，如此广大的区域，其中竟无废土，其中却有无限的平原，所以是中国人口的调剂所。现在在东北只有四千万人，而其他地区乃是四亿，所以移民的前途也未可量。

没有了东北，中国永不能为名副其实的一等国，中国永不能发展重工业，中国永不能大量造纸和建立其他纤维工业，中国的化学工业永不能居世界前茅班次。岂特如此，没有了东北，中国的电力（煤与水电）没有太便宜的地方，即没有用工业在国际上取得地位的可能；中国必永为贫、病、愚之国。岂仅如此，没有了东北，中国迫切的人口问题没有解决，社会决不得真正安宁，即永不能走上积极建设之路。然则中国不惜为东北死几千万人，损失国民财富十分之九，不惜为东北赌国家之兴废，赌民族之存亡，岂仅是一个感情的行为，实在是绝对理智的行为。我们的历史使我们自知不是一个劣等民族，我们也不信世上有所谓劣等民族，我们决不为经济的政治的奴隶，所以才有革命，所以才有抗战。吃了这些苦，几几乎亡国灭种，岂不因为如其永不翻身，毋宁以死拚之，如其生为奴役之身，毋宁死作自由之鬼？假如我们今天忽然改变了态度，任其经济外倾化，以为未来世界大战的导因，政治特殊化，以为今后政治永远不得安宁的原素，我们何以对得起十四年抗日数千万死亡的军民！

谈民主者，不可不谈自由，谈自由者不可不注意积极方面，这就是罗斯福所谓不虞恐惧不虞困乏之自由。因为只有消极方面之自由，而无积极方面的，仍易为人操纵，仍或虚有其名，必有积极方面的自由，然后消极方面方得充分的保证。现在已因东北之国际纠纷而使中国人每人心中怀无穷的恐惧，若东北竟失掉

了，或者名存实亡，中国的国民经济永不得解决，中国必永为贫民窟，永为困乏、疾病、愚昧之国，然则纵有消极自由之法律规定，又岂真是自由的民族？这又是今日一切谈自由者所不可忽略的。

东北问题至于今日之糟，其远景始于咸丰年间东海滨、外兴安岭之割让帝俄，经甲午战、八国联军、日俄战，遂成国际冲突的演习场。日俄战后，曾经收复，当时的政府还算卖气力。后来演变出张作霖朝代，对外大致还不差，对内却是出了许多祸事，也因国际注视，才维持到"九一八"，前后约一世纪之四分一；在其间，山东及其他各省在移民上尽了最大努力，日寇造出了"九一八"，经六年而有"七七"，遂由局部抵抗进为全国抗战，全国人民为东北赌国家与民族之存亡。在开罗会议，本明定东北归还中国，乃竟不幸的有雅尔达的协定。《雅尔达协定》虽是本月才宣布的，然两路两港的问题早成公开的秘密。雅尔达会议不久，罗斯福总统以脑溢血逝世，当时即有传说，他是"气死的"。我也看见雅尔达会议影片，罗斯福总统走时的像貌，全然不是平常的样子，形容憔悴，面目枯槁，心中若有所思，真是悲惨的象征。然则因此会而种下祸根，或者罗斯福总统心中正如此盘旋罢！以后的《中苏协定》，当然由此而出，然《中苏协定》虽成，而雅尔达密约之宣布乃给人以莫大之刺激者，至少有三点：①当时听到不过是一种默契，或者至多是一种记录，乃竟是一个秘密协定，我不知道美国参议院照法律如何处置？此等在患难中处置盟友之恶例如何善后？②既曰"必须征得蒋主席之同意"，又曰"罗斯福总统采取措施，以获得蒋主席之同意"，显然同意与否，不得自由，是用压力的。③最不堪的是提到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帝俄之暴，帝清之愚，是中苏人民建立真正交情时所必须忘记的，中山先生与列宁先生正以如此而奠定中苏亲交之基础。不意当时放弃之原则，今天又为夺取之理由。

我在当时是赞成《中苏协定》的，今天仍如此，理由简截说

来如下：①中苏共同疆界之长，是中苏必须和好的因素。②中国需要二三十年和平建设，故对外不惜委屈求全。③承认外蒙，以保全东北及内蒙新疆。④牺牲东北一层皮，即两路两港的办法，以保全东北主权。当时有朋友问我："你以为这样条约可以保证我们吗?"我还说：我们不能因为一纸条约便不努力，但这个条约虽然不是保护国运"充足的"，然却是"必要的"。不过，在《中苏协定》中，我们已经尽了最大之让步了，已经出了最大可能的代价了，过此以往，实在不能再让步了。自旅大不许中国军队登陆以后，事实上证明，苏联的行为完全与协定之精神及文字相反，例如：①照会中，②苏联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协定，③附记录撤兵期等。这两三个月的现状，虽政府哑口不言，而据折回的人所说，正如报上所载莫德惠先生强调"治安问题"的话："农夫不能种田，工人不能做工，商人不能做生意，学生不能上课"。我再加上一句，妇女不能在长春街市上、长春铁路客车中，保全其贞节！诚然，我们的官员也有过失，他们不晓得吃了什么迷魂汤，不特自己不说，并且禁人向关内报告，而且妄造"接收相当顺利"的怪现象！有一位赴东北折回的朋友对我说："我们在那里（长春）看到国内报纸，说某处某处接收顺利，真是啼笑皆非。接收大约是如此的，我们说，我们要到某省市去接收，他们说，那个地方不大平静，我们先去照料，过了半月二十天回来，请就去。并且很关切的说，带着电台，带着密码。一到那里，应有尽有，连一封糊了口的信都不易带出，还说密码?"《大公报》以为接收了空衙门，这大约是长春罢，至于各省，简直是去坐软监！

在这样的"履行"《中苏协定》下，出了"达尔银行"，张嘉璈准其注册，于是大量向日人"收买"房屋地皮，在广义"战利品"之下，有了经济合作"非正式谈话"原案竟是无所不包，而着重在重工业与电力。其实这些谈话，并不关涉得与不得，反正政治既已特殊化，有何不得？问题是：国民政府既是列国公认

的政府，由他签字，说法多些，好比向一个破落户盗买其祖产，长房出名容易打官司些，尽管二房三房或许更是好朋友。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件是坚决反对东北特殊化，外倾化。现在所谓东北的“民主政权”、“民主联军”，来源是这样的：“九一八”后两三年，东北游击队失败，最后一股的李杜将军所统帅之抗日联军，在事败后退入苏境，有几千人一直留在苏境，受了充足的训练，这次跟着苏军进来。他们还家是应该的，而由他们组织的“地方武力”、“地方政权”，我实不能了解他是如何“民主”，如何能代表地方。他们十多年在国外，不与中国通消息，他们的国籍先须查考。南边则是由关内，或热河，或海道由烟台到大连进去的八路军与“新八路”，总而言之，都是在苏联占领下进去的。反正伪军已溃，溃兵是多的；工厂已停，失业的工人是多的；农民败家，壮丁是多的；而且日军伪军缴的械更是多的，所以可有“三十万”，以后要有多少便有多少。这中间也有上下床之别，李杜将军旧部更享受好的“协助”。假若承认了这样局势，这样局势出来的“地方政府”，谁来保证他的向心力？团结是向内的，不是向外的，统一不只是挂国旗的问题。

第二，与上一义同样重要的，我们要坚决反对东北经济特殊化、外倾化。东北经济建设，目的可以不同，即或为中国或为他国，方式也可不同，即或为和平，或为战争；为中国即为和平，为外国即为战争。中国今后只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也不要造大炮，也不要造坦克，更不要定个五年计划，比战前加五倍造军火。日本要把东北造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其结果“有志未逮而没”，其死法真如“吞了一个炸弹”。我们是没有利用东北为世界最大兵工厂之心，也无此力。若到别人手中，又如日本之法炮制，甚而加紧炮制，必至四邻不安，而我们先受其祸！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有利用东北资源以建设和平的新中国之必要；我们为维持世界和平，有避免利用中国任何土地以酝酿国际纠纷以至世界大战之义务。俾士麦的德国及奥匈的资源不及东北，而造成

了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德国的资源不及东北，而又造成了世界大战，所以东北的工业化必以中国为本位，和平为目的，才能造福人类。

第三，我们要坚决反对东北疆域分割化。所谓“东蒙人民共和国”以及类似之现象，我们要誓死反对。“东蒙人民共和国”之来源，决不如某报所引莫德惠先生的话，是由于争旗之存在而出，据莫先生对我说，全是另一回事。海拉尔的公民有的要求旗之存在，一切如“九一八以前”之现状，这是很合理的，而且可说偏于保守的（例如保存王公），乃此方案竟不能到达中央，真是怪事。至于所谓“东蒙人民共和国”，报界竟以苏联的一位上将布鲁耶蒙古（苏联自治邦之一）人乌它禅为主席。这算怎么一回事？我记得报上也曾吵闹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的总理与伊朗亚尔拜然“人民领袖”的国籍问题，我们绝不能容许我们疆土中有这样事出现，这样的“民主”真使人齿冷！难道也要与他“联合”“协商”吗？原来民主二字始见于《晋书》载记五胡十六国，刘曜、石勒皆称民主，以及以后的拓跋氏，我们决不容用字眼儿如此复古！至于国境内蒙民的问题，日前我一位朋友说过：要是东蒙之外是个大海，而独立如传统的解释，例如美国十三州之独立，我立刻赞成独立，岂特自治？如其不然，正所谓“邻之厚，君之薄也”，是为谁工作的。

现在再提出具体的方法：

一、东北的经济必须中国本位化、和平化、均沾化：（一）为中国全国之需要而建设东北工业，凡中国目前所不需要者，不须即办。（二）钢铁事业，管制其成品之用途，即只能用于制农具工具及建设材料上，大炮坦克之类，我们不用，即不为此目的生产钢、铁、铜及其他金属。（三）我们不作备战的五年计划，轻工业手工业应占重要地位。（四）黄金必须国有。（五）我们欢迎一切外国投资，纯粹商业经营，竭力避免独占性以免造成势力范围。（六）航空必须国营。（七）一切均须对世界公开。（八）

欢迎联合观察。

二、东北的政治必须统一化、无党化。派往东北的接收人员，我所知道，党性强的很少，饭桶却不少。然既有所谓党派争执，索性无党化，以避困难。（一）不承认苏军占领期间造成之一切政治机构。（二）东北人民皆能还老家，并确保其安全。（三）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以下同）均暂不得在东北公开或秘密活动，任何方面派往东北之人员须先停止党籍。（四）东北之统辖机构，须为民政的，而非军事的，国军受其节制。（五）苏联占领期间一切武力均须解除武装，另为安插职业。（六）每县治安恢复，即行普选。不承认操纵乌合之冒牌“民主”，尤其是自外国来而领导的。（七）为达到上列目的，国军须源源开入，同时提前实现新军之理想，使其免去一切党派性。（八）官僚资本不得侵入，商业官僚不得进去。（九）警察亦须无党派。总而言之，东北应该由国人尽全力经营，不容许就地表演政争，尤其是内外混乱的政争。

以上办法，很可以表示中国人和平和目的了，大家很可以放心了。中国并且可用事实保证，决不在任何地方作为反苏（或反美）的基地，这样，大家很可在《中苏协定》范围内培植交情了。若并此仍是不能，直是不能，直是逼人到墙角上，我只有引《左传》的一段来结束此文，这一段是郑国伺候晋国伺候不下，而发的愤懑与决心：

> 《书》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按：这是订《中苏协定》的心情。）又曰：“鹿死不择音。”（按，这是现在的心情。）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惟执事命之。

（原载1946年2月25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抵平筹备北大复校将来沪迎胡适

〔本报北平 5 日电〕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五日抵平，据云：北京大学已开始着手北运，本年 9 月底 竣，并拟在平招生，平市临大补习班学生，将予优先收容。北大秋后拟增设农医两院，工学院并将与清华大学合并，北大校长胡适即将由美返国，傅氏拟赴沪亲迎。

（原载 1946 年 5 月 7 日《申报》）

谈北大复校

〔大华社北平讯〕北大校长傅斯年氏此次来平，专为筹备该校复校事宜。据傅氏谈：该校已定10月1日在平开学，教授及学生即将分批北来，工学院与清华合并，由清华主持，余除医学院长外，各院长及教授均已聘定。战前学生一千二百人，今后当增三倍，故校舍问题必须早日解决。临大补习班定一人，月底结束。文学院学生北大可容二百五十名，清华可容八十名，南开可容七十名，理学院北大可容二百名，法学院北大可容三百名，南开及清华各可容二百名。本年不收转学生，希望能于暑期内办一英文补习班。至于学生运动，今日学生水准，不够为未来之建国人才，甚望能安心读书，专门作学问，学术绝对自由，惟不可作为政治斗争之工具。

（原载1946年5月21日《申报》）

1947年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滋泥"，这句俗话正是今天中国的现状。"滋泥"是劳苦大众，虾米是公教人员，小鱼是小生意人，大鱼便是大资本家。

但，大鱼也分好多类，有三尺长的大鱼，不堪鲨鱼一击；有鲨鱼，不堪长鲸一击。今天长鲸有两个，皆凭借政治成就；在生长中的还有几个，要看后来政治是不是落在他手。大有水中一切皆入鲸鱼腹中之势。

"官僚资本"一个名词是抗战时候的产物，还是我的朋友某教授造的，当时的中心对象是孔祥熙，现在大家注意宋子文多些了，但也决不当忘了孔祥熙。现在我解释这名词一下。

现在必须分辨三件东西：第一，国家资本。国家资本的发达是走上计划经济、民生主义、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所以如果办得好，我是百分的赞成。这些年国家资本相当发达，但内容和表面大不相同。从表面说，铁路除中长为俄有外，几全是国有(除去宋家与洋人要修的成渝铁路等)；航业则招商局，压倒一切民航；航空号称民营，实是国家资本；主要的银行全是政府的(四行二局)；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

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英国现在工党所行的社会主义政纲，好多我们已经实行了，例如铁路、银行、主要工业之国有，我们都做了，然而结果不特愈弄得去社会主义愈远，而且去任何有效政体、像样社会也愈远，其故皆在人事，不在国家资本之基础观念上。

第二，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在中国真发达极了，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经营的公务员，为数实在不少，这几乎包括中国的资本阶级及上等布尔乔亚。西洋的布尔乔亚总是投资在股票或债券上，中国工业不发达，已有者又破产，谁玩股票？债券是靠国家信用的，今天还说得上吗？中国过去官僚总是投资在田地，今天田地是个大累赘，谁肯？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第三，权门资本。权门资本本是官僚资本之一类，然而其大无比，便应该分别看了。这些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 Sound Business 的，极肤浅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其效能与注重工业远不如三菱三井，而其支配力过之。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以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袭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

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利则归已，害则归国者，例如某某几个私家银行，在战前不能支持了，由政府人官股维持，两三年前他准许这几家银行退还官股，以当时一元当战前一元！所有这些银行在收到官股后所获的利益都不算了，这简直是拿国家的利益直接的、毫无掩盖的送人；其实并不是送人，而是送己，因为其中某某几个银行他都有支配力。不幸事机不密，为若干参政员所知，于是参政会大闹几阵，“此说作罢”，但真正罢了未罢，以后谁来查过？扒手之说，决不冤他，即如中央银行国库局案，人证物证齐全，虽说政治上使其搁着，因为已经“退还”（试问小偷强盗退还赃物，是不是就算了事），法律上并未完结，因为原告并未撤消。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言归正传，我们能知道多少呢？尤其我这与经济无关之人。办这样事，哪有不严密的呢，然而八年参政会已经闹出那些事实来，铁幕也有漏缝之处，然而漏缝之处究竟所窥有限了。其实人既活着，既不留心，也不能无所见，请看扬子公司，进口那样好，他结外汇何以那么容易呢？资产遍中外，是他祖宗的钱吗？若说“久宦必富”（在天津因接收案被枪毙的故海军上校刘乃沂答辩的理由），我看，这些年来久宦，如何可以必富，尤其是满天的富，除非用某些某些办法。

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有时仿佛像是有政策的，战前也曾吸收过若干社会上认为可以有为之人。上海的“高等华人”战前有不少信服他。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国民党整天谈“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国营”……宋子文做了国民党的沙赫特，尽管他相信他的 Sound business，也应该稍许有个样儿，然而完全与这些口号相反的。

不谈国有国营则已，要谈则第一件要国有国营的便是公用事

业（Public utilities)，偏偏我们要“宋营”。现在全国电气事业，除冀北由资源委员会接收外，其余均非国营，而且走上了集中垄断的路。如戚墅堰电厂（垄断京沪之间)、首都电厂以及武汉之既济水电公司等，均为建设银公司所有之扬子电气公司经营。人人皆知建设银公司姓甚么。

煤矿在原则上亦应由国家经营，因为他是动力的来源。中国煤矿除胜利后在东北及热河接收者外，皆非国营，北方的多为北洋军阀官僚所营，本是国民党北伐时打倒的呼声之一。现在扬子江东区之惟一大煤矿，即淮南煤矿，也是建设银公司所营。最近江西之鄱乐煤矿，又为建银所买到。四川某煤矿，又以另法支配。现在北方局面未平定，一经定了，北洋军阀多已破落倒出去，由谁买，是可想的。

说到这些事，煤矿、电厂，本由张静江先生之建设委员会而来，当时是国营，因为建设委员会是等于政府一部的。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合法的。

再说到建银，由一个美国人来华造计，原为吸收外资的，尤其是美资的，美资并未吸收着，定了一个不利的成渝铁路借款。本来是官股，许私人人股。现在我不知道还有几分官？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以上的这些，政府若对得起人民，该去清算的。

难道宋子文不谈国营吗？他是谈的，现在有他的资源委员会。办资委会的人，确也认真办事，绝不能说贪污，然而赚钱的事业既已“另有办法”，看看他的事业单子罢！东北工业，在那样情势中！抚顺毁坏，北票不安。铜、铁、电气材料、机器，无一不是无办法，或非赔钱不可的。所以这些国营，这是“国赔”而已。资源委员会也得设法自食其力，于是经营到台湾糖（专利)、自行车、肥皂、蜡烛……资源二字定义如此！

宋也“为国家”营了一件“赚钱”的事，就是中纺公司。那

些反对他这事的，本也多是要白接收（“抗战工业或非工业家”），又讲流动金的，并不可取，然而他营的成绩如何？号称去年 1 月一百亿归政府，今年 1 月三百亿，算是赚钱了罢？然而想想，一百五十万纱锭，全无代价，一切生财，是接收的，美棉用官价结，数目那样大，消耗外汇那样多，如是报效政府仅仅此数，真是得不偿失，这叫赚钱吗？说是平抑纱价吗？又不然，纱布价在生活必需品指数上为先锋。他又说了，中纺只占百分四十，商家涨了，他无法控制，这真左右前后均不能自完其说了。年底分红那么大，是有益于国？假如当年把这一百五十万锭卖了，不白送人，法币回笼，要比黄金政策多得多，纱价还不是一样高，反正他自己说他不能控制。还有一妙，因为“人民”为此事吵死，他又说，将来发股票卖给人。假如分开卖，有人买的。现在合成一个托拉斯，他捷足先登控制着，谁来买他，买就是捐款给他，这不又是自欺欺人之谈么？

这样说下去，多着呢，今天止于此。现在说结论。

豪门资本这样发达，中国几无国家的形象。三菱三井把日本弄到这样子，太惨了（虽说是日军阀作祸首，然财阀如不发达，军阀无能为力）。他们还是几代（从江户时）辛苦建立的，不像我们的这样“直接”，天下人怨怒所集，如何下得去？今天欢迎孔宋当国者，只有一派人，即共产党和他的尾巴，因为二氏最可使中国紊乱的。我们不愿我们的国家成五胡十六国，成外蒙古，我们实在不能欢迎他。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垮，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在位者要负责任的。他的自由买卖，彻底失败了。顶好的说，你总不能用甲思想作反甲思想的事，何况他的思想是由于他的 vested interest？

这还不能算完。今天我们要觉得晋惠帝不愚，因为他听到公园里蛤蟆声，他问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我们必须清算十年的事物，那些是公而私的，那些是私而公的。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我在参政会如此说过。有些报纸说我说，二家财产够国人过一年美国人生活水准，那是他们说的，说过与不及一样坏。）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你们晓国家十五年，给一个喘息的机会罢。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致）通过。

有朋友问我，你说孔宋不好，张家璈何如？我说，何止张家璈，连那些“自由计划经济家”，无知低能的“民生主义哲学家”，等等都是愈弄愈糟的！我对于过去的万忍不住，对于将来，我并是“政治经济病菌学”专家。

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一卷七期八期）可与此文参看。[①]

（原载1947年1月3日《观察》第二卷第一期）

---

① 编者按：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两文，均为1947年1月3日《观察》第2卷第一期“观察文摘”一栏转载。

内蒙自治问题
——驳盟等于省旗等于县说

我写这篇文，以响应热察绥国大代表招待记者的报告。

蒙胞的问题，是中国当前一大问题，中华民国内最大多数人——汉人——有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提携少数民族的义务，不特平等而已。若忽略了这大问题，是很大的罪过。

不幸民国初年以来，内蒙官吏未曾于此一道上有所作为，总是认定了王公，以为最省事，幸而蒙汉人民之间，因经济的进展，有更深的结合，其间并无何等严重的纠纷，不过在汉人的立场言，总该积极改善蒙胞之一切，而不当专以开垦为事。北伐之后，虽曰统一，政府号令初未及于内蒙各省，接着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大大兴风作浪起来，德王一派野心家，以“走胡走越”的心理，在百灵庙滂江大显威风，前一时李守信一股，号称蒙军，其实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汉人，在张北一试，被宋哲元打回，后来德王一派去攻绥远，日军杂在其间，被傅作义将军打垮，又收复了百灵庙。事便如此多下去了，丝毫不是与蒙胞有利的，相反的，很是有害的。抗战军兴，北土沦陷，德王便以傀儡的排场组织了“蒙疆政府”（热河先已沦陷于“满洲国”）。现在国土重光，有些事很要做要彻底的做，然而“九一八”以后的那一段，是绝不可以供参考的，因为那是蒙古野心家的事，而不是蒙胞所需要的。

先说原则，假如内蒙之北是个大海，毫无国际因素，要独立便给他独立好了。然而地理不是如此的，人口不是如此的，国际

形势更不是如此的。现在国内的汉人在困苦中，国内的蒙胞也在困苦中，因为整个是国家的困苦，整个是弱者的困苦，在这样形势下，蒙汉分则兼受其害的，合则兼受其益。在走上宪政的中华民国范围内，自由是可争取的，这道理原不待多说，也不便多说，姑说我所拟的办法。

一、政治。彻上彻下由蒙胞参加，改组后的国府，已为“最高权力机关”，应于国民党或“社会贤达”名额中有蒙古重望之人；各省政府亦然。县政府蒙汉杂处者，兼用蒙汉，全是蒙胞者，以由蒙胞自理为原则。凡用人口比例者，蒙胞得特别提高，以保障少数。所有法律、警察之问题，均须对少数有所保障。

行政院设蒙务部或委员会，蒙胞共与其政。立法监察两院委员应有比一般人口比例为优之名额。

二、经济。蒙胞地方必须在全国的经济统系中，因为一个国内经济分割是了不得的。但一切保障蒙民生计及提高生活水准之可能设施，均须做到，汉蒙合作开发则可，汉人开发蒙民失业则不可。

三、教育文化。蒙民小学用蒙语，中学用蒙语，而应以国文为必修科，高等教育目下用蒙语实吃大亏，将来进步后应有蒙语之大学。文化决不取同化政策，相反的，须发展其特有文化，若以与汉人接触之多自然的成了双层文化，却是不可免的，无法加以禁止。如果禁止蒙胞汉化，那正是满清政策，蒙胞非常无益的。

四、其他一切之一切，不特必须平等，并且多数民族须提携少数。

以上范围内，何者应列入宪法，何者不适于宪法体裁而于后来施政时为之，我全无成见，只求达到绝对平等而且提携之地步，是应该接受的。

但是，如果无形之中种下了分裂的因素，却是万万不可以的。近来听到会中“盟等于省，旗等于县”之说法，今天与一位

蒙古代表朋友谈，照他意思，宣化府都列在内，似乎是恢复盟旗制以代省县制，我实不胜其忧虑。

“盟等于省，旗等于县”可以有三种做法：

一、盟与省、旗与县并存。一个地方两种制度，参杂紊乱全无界线，这成了更进一步的“巴基斯坦”，一切行政全要麻痹了，而且每日生纠纷，此法万不可行。

二、废省县为盟旗。这是倒退二百年的工作。所谓“内蒙”以人口论，汉人比蒙人多过不止十几倍，而且多数地区蒙人汉化程度甚大。将来省县均为自治单位，何必在长城北有此特殊办法。这样，要废兴安、辽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省，并改定吉林、嫩江、辽宁、宁夏各省，甚盼代表诸先生，在做此决定前想想它的后果。

三、划盟出省，划旗出县。这样弄得省不省，盟不盟，与第一办法同样不可能。举例言之，绥远一省之精华，在河套与绥中，此处汉民压倒多数，若以此为绥远省，而留下阴山沙漠（乌盟）鄂尔多斯沙漠（伊盟）为等于省之盟，经济上如何维持？旗更不必说了。

清朝蒙古地方制度，就形势上讲，可分为盟（Cighul-ghan）、旗（Hosighun）及佐领（Sumu 俗称苏木，乃音译）三级，其实盟是空的，佐领无权，最重要的，只是旗这个阶级。何以说盟是空的？盟是统制阶级参加的大会，几个扎萨克在“大庙”举行大会，就叫作伊克（大）昭（庙）盟，在锡林河举行大会，就叫作锡林郭勒盟，大会既不常召集，主席（盟长）也不是世袭的，号称选举，事实上理藩院要谁就是谁，所以说盟是空的，地位并不重要。

苏木译言箭，用箭字作政治制度名称，是阿尔泰语系民族早有的，不过现在蒙古苏木（佐领）制度，却不是原有的，是满廷硬派给他们的，把能出若干壮丁的人户，叫作一个佐领，所以佐领可以说是抽壮丁的单位，如今之保甲长。

现在该说旗的成立了。成吉思汗兴起时，蒙古是氏族制度，强大以后，用万户千户来统辖各地人民。及至元亡退回塞北，制度仍然未变，直到明末林丹汗致书清太祖，不是还用“四十万户”一个相沿的老调去骇他么？明代蒙古的千户消减，万户辖的土地人民叫作鄂托克（Otog），明朝前半叶，蒙古中心在漠北，鄂托克的名称也少见著录，及达延汗南移，满官嗔，哈剌嗔，永谢布之类的名称便渐渐多起来了。后来满清征服蒙古，满廷觉得蒙古原来的政治制度对他们很危险，遂用古今中外帝国主义者对付人的铁则——“众建诸侯而小其力”——去部勒蒙古人。比如最先投降的科尔沁原是一个鄂托克，满廷却替他们分家，逐渐分成几个小个别区，并用自己军队制度的名称，称这种小区为“旗”。从此原属同一个鄂托克的人民，经这样一分割，便只能在指定的小范围内活动，不能出来了。总之，盟旗制度并不是蒙古人原有的政治制度，乃是被满廷割裂的伤痕而已。

再说历史上内蒙古地域如何蒙汉杂居。东蒙一带东区南区极适于耕种，远自康熙年间蒙古王公苦其生活不足，招致汉民开垦，若佃户与地主之关系。清政府是专来分化蒙汉的，不以为然，历康雍乾三朝禁止汉农出关多次。但清朝虽未为蒙古办好事，却把长期的和平给了东蒙古。长期和平后人口蕃殖，衣食需要大增。王公更想发财，于是到了咸、同年间，禁令一弛，大量开垦了。这不特关外为然，口北更甚。因为清朝原想保持盛京大范围空虚着，对口北更不甚注意。所以承德设直隶州（远在清初）又改为府，多伦设厅，这正因汉人为开垦经商，来得太多之故。所以内蒙蒙汉大量杂居，至少有二百年的历史。其实还不止于此呢，蒙古人之粮食衣料，许多须取给于汉人，汉人之小量聚居边外，乃历代一般之事。原来长城只是国防工事，不是国界，而现在地图上的长城，是明朝下半叶的。明朝初年长城，是在河套之外，承德（大宁）之北的。宣化大同南之长城，更是嘉隆万时之内防线，必须恢复，多则二百多年，少则四五十年。人口之

分布，疆域之组织，是办不到的。

再自东向西一盟一盟的说，内蒙最东的是哲里木盟，这是"满洲平原"的本部。其范围之大比过两三个浙江省，这是东北移民的大本营。光绪年间，俄日战后收复东北，始设洮南府，又设很多县，现在的辽北省全部、嫩江省大部、吉林辽宁各一部，正在其中，哲盟全部久已设县了，大部只有汉人，其他蒙汉杂居，汉人占大多数，若干东北名都，如洮安、洮南、开通、通辽、郑家屯、新民、昌图、四平街以及长春，皆在其中。中长铁路丁字形之右部，几乎全是。

其西南为卓索图盟，即热河省之南部以及锦州。全部设县甚久，是清朝三百年陆续成就的。清初置锦州府，承德州，后来承德升府，又分朝阳为府，南区全是汉人，北区蒙汉杂居，汉人绝大多数，北票阜新等矿，皆在其中。

卓盟之北为昭乌达盟，即热河省之北半，全部设县，蒙汉杂居，仍是汉人比较多数。西部之围场，原是清帝猎区，同治后不出猎，便经垦殖。

迤西南为察哈尔部，此部制度与六盟不同，连扎萨克都没有，编入八旗，直统于察哈尔都统。其地为清室之牧场，设多伦、独石口、张家口三厅，属于直隶省，今所谓"张北六县"，五居其中，全部设县，全部杂居，汉人绝大多数。

迤北为锡林郭勒盟，设县最少，然而汉人因其地有渔盐之利，自清中叶也跑了去。此盟去长城最远，原为德王一派之根据地，沦陷期间，汉人可能减少，未详。

又西之北为乌兰察布盟，在河套之北，其河南为伊克昭盟，今属绥远，绥远原为归化城，土默特等地，早已分设萨拉齐、和林、武川、陶林等十二个厅，部落虽在，二百年来已成"内地"。河套开垦之历史甚久，清末贻谷，更大努力。此次抗战，傅作义将军以为据地，遮蔽日寇德王犯陕西甘肃宁夏之势，于此可见绥远设省之重要。绥远一省，汉民压倒多数。乌盟在百灵庙北者，

伊盟在沙漠地区者，汉人甚少，其地整个人口亦甚少。

今在宁夏省者，又有西蒙古：阿拉善（贺兰）额鲁特一旗，额济纳（居延）旧土尔扈特一旗，每部只一旗。其地虽当几个浙江省，其人口却远不如一个浙江小县。

至于青海之蒙部，原为和硕特部，而在准部战事后，加上好些人。其地为汉、汉回、蒙民、藏民、"夷人"错杂而居，新近又加上哈萨克，很难想到如何分治。

新疆已是那样子了，其中蒙部不必再说，东北尚有呼伦贝尔一大块土，即兴安省，清朝已设呼伦厅。远到兴安省仍是汉人多数。

再总括来说，哲里木盟本属于盛京将军，是外人所谓"满洲"的整个肚子，若挖出去，现在政府军在东北所占地方，除南端外，便光了。卓索图盟原为他设了锦州府（清初）、承德府、朝阳府，清朝早已把他划入直隶省范围（锦州除外）。昭乌达盟，清朝原为他设了赤峰直隶州，开鲁林西各县。察哈尔部早同"内地"，多伦三厅归直隶。清朝的区划，以上两盟一部皆归直隶，随便拿个旧地图看便知。锡林郭勒盟，去北平最远，清末置吏，而汉人去的也不少。归化城土默特及察哈尔西四旗，清朝为置十二厅，属山西，试看旧地图便知，河套的开垦最近，清末民初始大量开垦，然而已成西北屏障。

如上所说、再检讨"盟等于省，旗等于县"之说法。假如省盟在一地并行，比印度的巴基斯坦还不小，假如废省为盟，废县为旗，便一反二百年之自然趋势，立刻一阵混乱。假如盟与省分开，则哲卓昭三盟，察土两部，已无法分，因全部设县之故。锡盟尚可分三分之二不属于省，然其地国防上最重要。乌伊两盟亦还可分，然而若把河套各县挖归绥远，两盟如何在经济上能自治？若不把河套挖去，则河套各县势须废去。而复为乌拉特前旗，这样又行得通否？

根据以上之历史的地理的事实，请问如何"盟等于省，旗等

于县"？作为一句抽象的话，是好说的，一经真的办起来，一切事实问题都来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之所以不赞成“盟等于省，旗等于县”者，以事实上办不到，强去办，招致分裂也。所有不招致分裂，一切保障蒙胞利益，提携蒙胞进步之事，我都赞成的。

（原载1947年1月25日《观察》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国民政府自从广东打出来以后，曾办了二件大事，一、打倒军阀(这也是就大体说)；二、抗战胜利。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现在社会上若干人士，对于政府的忍耐，实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忍耐现状，而是由于看到远景，怕更大的混乱，再死上几千万人，彻底的毁产，交通断绝，农业解体，分崩离析，弄出一个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国家更不能有自由独立的希望。然而一般的人总是看现状不看远景的，看当前的政治，不看过去的功劳的，所以美英法政府，今天都不是他们抗战时代的组织。即是能看远景的少数人，久而久之，完全失望，彻底觉得在“魔鬼和大海之间”，也只有等死而已。《书》曰，“‘为政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1]

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

---

[1] 编者按：“《书》曰……”这是引自《礼记·大学》的话，原文如下：“《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康诰》乃《尚书》篇名。

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而希望政府不垮台，以免于更大的混乱者，也要坐以待毙，所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今天良善的人谁无“人间何世”之感？

宋子文第一次总持财政经济，本也看不出他有甚么政治家的风度，而为人所知的毛病实在不少。然而当时总还有人寄望于他。第一，他虽然也有钱的不得了，当时人的心中，还总以为他是用的政治地位，以“资本主义社会共同允许之方式”得来，仿佛像法国官僚，从穷小子到大富翁一样，还不会直接作了扒手，在他手中财政政策改变时，没有先加上一阵混乱，如孔祥熙在改法币时上海金融市场的怪象，弄得中外腾丑。第二，那时候国内企业在自然进步中，上海银行业在发展中，他越借钱（就是公债票等），银行越要借给他（这是资本主义走上坡路时必有之事），挟着政府力量扩大的凭借，一切满意称心。第三，那时候他虽然做到了财政经济的独裁者，如德国的沙赫特（这是说他的权力，不是说他的能耐），还并未作行政院长，“总率百揆”（孔祥熙作寿的话），他的深浅，世人未尽知。

接着，他走了，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兴”（这是一个什么人送孔的寿联），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清末奕劻有贪污之名，然比起孔来，真正“寒素”得很，袁世凯时代所用的财政人员，如周自齐、周学熙皆谨慎的官僚，并没有大富），上行下效，谁为祸首罪魁？于是宋氏名声顿起，“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试想当时宋未上台前两年中重庆的街谈巷议，真正有今昔之感。又看他初次出席参政会，会场中的人，挤得风雨不通，连窗子外门外都挤上千把人，都城人士的心理，对他是怎么样热望的？稍有常识，稍知检点，稍通人情，何至于弄到今天，弄到国人“欲得而食之不厌”，而国家受他这样的摧残，

不自爱的人，实在没有过于他的了。他在美国时，国人苦于孔祥熙，所以寄望于他，当时国内的一般人，总认为他对美国有办法，对经济有办法，而当时自美回来的人，颇说他在美国弄得一团糟，对经济不会有好办法，当时的人因为希望太渴了，还多不信，现在久已百分之万的证明了，还不止于此呢！

说他这几年走下坡路的行事（以前也未必走上坡路，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国家人民也随着他走下坡路的损失，真是写不尽，我也不屑写，只把他最荒谬之点分解一下：

一、看他的黄金政策。他上台最初一件事，是给以前买金子者一个六折，这中间，有小公务员，小资本家，也有大商人，官僚资本家。当时《大公报》还是有条件的赞成，我也一样，写了一文，载《大公报》，强调政府在战时可以征用私人的资本，但须用累进的办法，尤其是再想法子找大户。前者的原则是，国家为战争筹款，必须有钱者出钱；后者的原则是，担负不能在穷人身上。现在想起来，真正做到"君子可欺以其方"了。累进办法，在参政会并且屡次提出过，我们强调他更改，财政当局说，大户买时化小户，无法子分，争执不得结果。假如照那时他的说话，已买者尚可收回，未买者如何可以不加管制？近来，有一天抛五吨，经常是每天几千条或几百条，真正做到他的"自由贸易"的原则，然而试问，如果今日如此"自由"，当年何必"充公"？金价的波动，寻常百姓是吃不消的，虽然各处集到上海的游资许多不易查考，然而一买几千条的大户是谁？岂皆不能查出？报载最近风波之掀起是山西帮，传说是孔宋斗法，二公本无好感，何不可查查，自己的人是不是也在中间？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人，一家同姓，一派下属，一大组合（如美国报所说："Soong Combine""Kung Combine"）而无从下手？如其不然，中央银行卖金子的铁幕何不可以为立法院，监察院，参议会驻会委员会揭开？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金子国，取之不尽的？如其不然，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吸收游资？是不是能和整个经济政策配合？一旦

用得差不多了之后，何以善其后？如果今日之“自由”是，则前年之“充公”非。如果前年之“充公”是，则今日之“自由”非。所以纵然“不是”黑暗重重，也是无办法，无见识，无原则。子子孙孙要还的黄金债，他这样子玩，玩得领导物价，不特不足平抑物价，反而刺激物价，紊乱物价，至少说来，他是彻底失败了。

二、看他的工业政策。抗战胜利，他宣言曰，后方工业，无法保持，这是事实，但总要仔细检点一下，哪些确有设备，哪些只是玩枪花，分别情形，捡好的收买其设备，所以答其赞助抗战自沪迁川之热诚，这也不是太难的事，正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然而他一笔抹杀，不问青红皂白，于是共产党大得意，高喊民族资家本。所有收复区敌伪的工业，全部眼光看在变钱上，有利可图者收归“国有”，无利可图者“拍卖”，于是工厂一片停止声。去年一年，上海小工业，停顿者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今年上半年恐怕要全部解决，他为政府筹款，办中纺公司之类，只要办得好，是可以的，那些闹的，也是要分赃的，不出代价，又借流动金。然而一般工业在水准上者总须加以维持，不好，改良他，不能坐视其死，更不好，不管他，不能连好带坏一律不问，政府是有责任的。这是失业的问题，即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他毫无根本办法，听说新任经济部长，本有一个“收购成品”的计划，如生产局。他置之不理，仅仅贷小款，这是把钱投人大海的；比投大海还糟，他们拿去；好的屯积，坏的又是黄金美钞，捣政府的乱。省小钱于前，花大钱于后，忽开头于前，无所措手于后，治病的办法不做，添紊乱的办法做去。年前年后，一切一跃一倍，最近一跃几倍，还不是更要多发钞票？听说他在做了行政院长后，第一次出席院会，说：计划不必行者，即不付钱，减了还是费钱；计划可行者，不必减他钱。这是神智开朗的话，何以行起来并不如此？为少用法币，抓得紧，是对的，然而要有经济政策，使人不失业，无经济政策之财政政策，是玩不转的，发

大票子，专选年关，出口加补助，不看美英法律，前者毫无常识，后者毫无知识，再由他这样下去，三个月后，景象可想，也不忍想，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他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的，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

三、看他的对外信用。美国人有许多话也是乱说的，但严重的话，出于有地位之人，不能不弄个明白，为国家留体面，麦帅的经济顾问，说他如何如何，他愤然“更正”，那个人又说，宋如不承认，我举出事实来，所谓（Soong Combine）如何如何。他便不响了。又如美国纽约《下午报》，说他把联总送中国医院的调节温度器几架搬到自己家里，这几件东西究竟在哪里，他也不弄明白。诸如此类，我实在不忍多说下去。大凡一个上轨道的国家，原来经商的人一经从政，须摆脱商业，英国制度，不特阁员如此，即一个下院议员（上院是无作用的“辩论会”，故无此限）如其公司与政府签买卖合同，其议员资格自然无效。偏偏孔宋二公行为如此，公私难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而“以直道使人，虽劳不怨”。国家困难，上海经济难维持，假如自己有清风，仍旧可以有办法的，办人也可以取谅于人的，自己无 vested interest 可以制人的，如自己（包括其一群人）又是当局，又是“人民”，他人不得到意外便宜的，皆要反抗的。我向社会广泛提议，如立法院，如参政会，以及一切人民，都该彻底调查，上海及他地以及国外，所有豪门权族之“企业”是些什么内幕。他们的营业范围如何？他们的外汇得自何处。

四、看看他的办事。他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一个主管部的事，他办了，部长不知，看报方知之，真正偏劳得很，各部长建议，置之不理是最客气，碰钉子更寻常。这是他有兴趣的部。如无兴趣的部，则路人相待，反正要钱无钱，说话不理。他可以说，行政院不是由他组织的，这也是事实，然而如由他组织，不知是哪些小鬼呢。他平常办事，总是三几个秘

书，在上海，总是三几个亲信，还有他的三几个“智囊团”，行政大事尽于其中矣，国家命运如此决定矣。我看，他心中是把天下人分做两类，其一类为敌人，即现行的敌人和潜伏的敌人(Potential Enemies)，其一类为奴隶，中间并无其他；所以他管到哪个机关，哪个机关的长官便是他的奴隶，至于一切其他人，他都不愿见，见亦无可谈，开会不到，立法院参政会请他不来，至于人民请愿，更不待说，见人傲慢而无话，似乎奴隶之外全是他的敌人。这样行政，岂特民国“民主”不容有此，即帝国专制又何尝可以，只有中国是他的私产，他才可以如此做的。

五、当政的人，总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至于他的外国文化，尽管英国话流畅，交些个美国人（有美国人说，看他交接的是些什么美国人，便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决不登大雅之堂的。至于他的态度，举两件一轻一重的事为例：他大可不请客，既请客，偏无话可说，最客气的待遇，是向你面前夹菜，此之谓喂客，非请客也。胜利后第一次到北平，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的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因为当时接收笑话，尚未传遍，这事我只可说到此为止。在高位者，这些是要检点的。

说他不聪明罢，他洋话说得不错，还写一笔不坏的中国字(我只看到报载他的签名)，说他聪明罢，他做这些事；难道说神经有毛病吗？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各报载，今日之黄金潮是孔帮与他捣乱，他如退休在上海的“林泉”，焉知他的帮不与后任捣乱？后任未必行，即行，四行在

几种势力下如何办事，何况另有他法捣乱？所以孔帮宋帮走得远，也许还有办法，因为假如整顿财政经济，必须向这几个最大的“既得利益”进攻的，如其不然，不堪再摘，“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是最客气的办法，“摒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才是最小可能有效的办法。我虔诚希望有此事，不然，一切完了！共产党最欢喜孔宋当国，因为可以迅速的“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原载1947年2月15日《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七期）

宋子文的失败

上期的《世纪评论》，有我的一篇论宋子文的，和本期同日出版的《观察》周刊，又有一篇我叙述孔宋二家豪门资本的若干事实，在铁幕缝中透出来的事实。连同这一篇，共计三篇，盼望发生兴趣的读者，取来全看，因为大体上没有什么重复。

论宋子文必须论到孔祥熙，他俩虽然是对头，然而确是今天悲剧里的双扇活宝贝。以下所论，有好些是孔时开端，并且走了好远的。

孔宋失败的第一个原因，由于他的"清廉"程度，孔则细大不捐，直接间接；宋则我生你死，公私一齐揽乱来把持。前者贪欲过于支配欲，后者支配欲过于贪欲。虽然形状这样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点，从所以得地位算起，一，二，三……我今天只说一件，就是两个人绝对是以买卖为灵魂的，绝对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种形态的自由买卖，尤其显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买卖在公。抗战时期，孔当政，大家要管制经济，孔连说不行，不行，不行。要是管制，还有买卖吗？没有买卖，还有国家吗？诸如此类。等到蒋主席也要管制了，大家吵的凶了，他是官僚派，也说管制，但心里全不如此，面从背违，弄得一阵一阵紊乱。最后还说，你看，原来不该管制的。美国人借我们一批黄金，本是救济财政危机的，一到他手，便成他的续命汤。他拿来一文不值半文钱一卖。有钱者皆大欢喜，强心针成了刺激物价市场的扰乱品。黄金如此，外汇亦然。宋也是根本相信自由买卖的。相信国家的

钱不该给人的（这倒是对的，可惜不一般应用），自己有兴趣的事和人，却另当别论。他的自由买卖的原则，在理论和实际上是这样：（一）中国人谈不到管制，凡谈管制的都不是财政政策。（二）理想的财政经济，是 Sound business，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共和党的观念。（三）自由买卖在我是绝对的，我爱买你的什么，你便须卖什么，我爱卖国家的什么，我就卖什么。（四）财政政策必须基于经济政策之观念，他是没有的，而且他根本没有经济政策，只是对外买卖，我来控制一切外来物资和钱钞，无论是买的，借的，或捐的。在这样的理论和实际之下，今天的财政现象经济现象是必然的。平情说，自由经济，在中国不可能，因为并不是企业发达的国家。一切都管，在中国也不可能，因为中国并没有社会组织的经验。在战时，在今天，最好是干干净净的坚强不移的管制几项生活必需品，一面不取全盘自由，一面也不要样样管制，偏偏孔宋那样的“自由”，而一切管制论者，又妄向苏联的办法看齐，忘了国体社会全不同，适足以助宋之自信与藐视。新方案是要管制了，宋的“哲学”失败了。但是，你赶着驴儿去做水牛的事，行吗？

财政政策必须以经济政策为基础，没有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是无根的。无论宋与孔，有经济政策吗？接收日本工业，应付沦陷区工业，无论官营民营，总要不让他大家关门。因为他只想收入，不想经济，除把有利的拿去外（如中纺）便任其死灭，经济走了绝路，财政必然也走绝路的。当胜利后，后方工业家要求这个那个，大多也是想分赃的，又有些人要分敌伪工厂，也是为私的，宋子文不给他们，可以，但须拿出一个办法来。这办法并不难，就是不要折散日本人的生产系统，使各单位不存在，也不必组大托拉斯，如中纺。由政府收购其制造品，货有定价，样有标准。这当然选择若干主要的工业，不是一切都买，而且不行的厂也可天然淘汰。这样也许有贴补性质，但比起贷款来好得多，因为贷款不特不足以助工业的生存，反而助长囤积，助长黄金外汇

的投机，这次黄金潮，其中用来的资本，不少国家行局借出去的。收购成品自然赔钱，但工业家维持着，能吸收游资，不会一翻几倍，弄得连印钞票都不够本。总而言之，只要工业能吸收游资，多发钞票影响小的。如不吸收，乃至根本崩溃，游资必使物价一翻一翻的转去。1923 年沙赫特能把德国崩溃的经济转捩来，还不是在工业上着眼？他对于工业，漠不关心，真正到极点了，就是连印钞票的工业也不在乎，钞票要送美国印，因为要“好看”，其实土印钞票在今天价值上也够“好看”了，也许国货钞票贵，但总省了外汇，又省了运费保险。他对于正当用途的外汇是紧得可怕的，但是对于他发生兴趣的外汇，他又满不在乎。又如久大永利的工业，是些规矩人办的，是很替国家争面子的，因为他无利益，不予协助，反而摧残，这等于摧残国民经济。问题是这样，如果永利投到建设银公司的门下（宋家的托拉斯神经中枢），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对于经济的无知与私心，是使中国经济非总崩溃不可的。经济崩溃了，还有什么财政？

现在姑且舍经济而论财政。财政是要多收入。中纺公司的组织，原与国民党历来标榜的口号“轻工业民营”违背，他的说法，是增加政府收入。去年一年，他平均每月输政府一百亿，全年一千二百亿，今年列的数字是每月三百亿，全年三百六十亿。社会上估计，去年盈余是一万亿，我们姑且说，一万亿之 88% 虽不归国，也还归“民”，“藏富于民”，也还是好的。我们就听他这样说罢，“民”哪国哪，只要赚钱便好罢。然而仔细看看，何尝有赚钱这回事？第一，美棉以法价结外汇，在中纺，利益极大，在国家，担负好大外汇。第二，机器（一百五十万锭子）全无代价，房子生财全是拿来的。第三，补充机件，外汇取之裕如。这样算赚钱，以裕财政，欺人乎，欺天乎？政府为他的收入之益，远不如为他外汇担负之害。中纺成立“赚钱”后，大家继续吵，他于是将计就计，说两年后改归民营。两年的说法，算到今年底，即应实现，他的妙法来了，不是各厂合理的分开标售、

而是作为一个整单位出售，那么就是说，他的建银又来伸手抓住了。试问这样大组合，用人行政由于他，除非他自己或他一派，谁敢来投资？大凡托拉斯之组织，总是拿别人（小门小户）之钱，作他自己（豪门大户）之用的，只要能取得百分之五十股，便是绝对控制，事实上，有三分之一，也足控制了。分开来卖，（公正，不折扣）有人出钱，因为这是利之所在，可以收拢法币远在黄金之上（详下）。一百五十万锭的大组合，世界上还未有，合起来发股票，人存戒心，谁来捐款？这个股票说，和他要接收德商颜料商标，是他目前的两个大阴谋，仍是那些由经济委员会而中国银行而姓了宋的故技，（看《观察》所载一文）国人要事先严防，击碎他，更该是清算他的建银。

丝、毛、麻三种纺织工业，均为轻工业，照理也应归民营。胜利接收后的毛麻工业，均归中纺，而丝则单独成立中国蚕丝公司，仍是国营。所以未被人注意者，因为中蚕未如中纺之赚钱。

假如今天把中纺各单位合理的分开标售，不许人凭势力要求减价，自己也不染指颠倒其办法，则一百五十万锭可以收回法币之数，大有可观，这是吸收游资最省事的一法，这数比黄金好多了。假如我们估计黄金原来共有三百万两，现在还剩了一百五十万两，这总算对政府很恕道的估计了。又假如一两等于五十万，也是比今天挂牌高的兑率了。那么一百五十万两全卖了，也不过收回七千五百亿，能当预算几何？远不如严格的认真的分卖中纺。

现在说到最严重的关键了。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抗战期内，外汇为一与二十之比，行了好几年，直到胜利后，比起实际货币对外价值，相差极巨。战后初定为二二〇〇，复又改为三三五〇，也远不及实际价值。战时黄金售价仍仅万余元，后改为二万元，又改为三万五千元，战后乃至十万，二十多万，维持极长的时期，并且永远维持着比物价便宜很

多的水准。这样办法，孔行于前，宋继于后，二人虽不对，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这样办法之祸国，有直接间接两面。直接的说，这样低价的外汇，很少一般人所能买到，尤其是大量的，必须有力的始能购得，因为经过“审核”的。权贵势力愈大的，收购的愈多，这样便宜法，最便宜权贵。好多年来，因此不知道消耗了多少万万美金，纽约的中国贵妇随身手饰，有的为美国银行家羡慕。连带着，黄金又消耗到这个程度。这都是我们子子孙孙的债，这也是盟邦为我们打仗的借贷，我们在二公这样办法之下这样消耗了。还有间接而更不了的呢。美金战前一元等于法币三元三角许，后来美金也稍贬值，今天美国生活指数也上涨百分之二十三十不等。这样算来今天一块美金在中国的购买力，应当等于战前法币至少二元五角，实尚不止此。今天假定生活指数是万倍，其实何尝只此，美金一块的购买力，应当等于二万五千倍，即法币二万五千元。然而今天定为一万二，大家还说太高；这是太骤，不是太高，三万也不为高。美金如此，金价亦然，因为两者有连系。在这样外币贱，国币贵的情形下，入口极易，出口极难，一悬数倍，简直要断绝中国货的出口，大开外国货的入口，岂特入超而已，简直要一个是无限大，一个是零，这真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了，何年恢复，真不可知。谁开创这个局面？孔祥熙。谁继承这个遗志？宋子文。他俩这一着，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我盼望研究经济学的人，多检讨检讨这个问题。

再说工商贷款，工款可贷，商款原是不可贷的。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假如认真实行工贷，必须适应工业现状，设法一贯予以维持，严格是可以的，应该的，“十寒一曝”则一曝也是白费。政府的四行两局的工商贷款，几乎全为有力之人获得，这所谓有力之人，当然这派那系，大大小小，决不止孔宋二行，中国的恶势力多着呢，规矩的工商业还有几许？有也在被摧残中。照道理，贷款应给有希望、有成绩、有作用、

有信用、能自身规矩的工商业，尤其是能这样而环境上受窒息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举一个例。在今天各业萧条倒闭之中，只有纱厂无限幸运，年底职员分红以几百个月计，绝无贷款之理，然而某申纱厂最近竟获得政府二万亿之贷款。反之，不能维持的工业，政府绝少救济。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此虽不可一概论，绝大的成分如此。去年年终工商业贷款，几乎无人不知全供收买黄金之用。这也难怪，试想一工业或商业，全年都受荒谬的高利贷和荒谬的低汇价之压迫，生产机能已萎缩到几乎不可救药，年底忽然得款，过年涨价可必，如以投之于本业，绝无利可图，不买黄金干什么？这些现状当然不由孔宋二氏负全责，然而他们的责任是很大的。

说不完，写的已经太多了。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也有人说，今天的经济，由于共产党作乱。当然共产党是要把政府拖垮的，是要立即取而代之的，是不惜彻底破坏中国经济的。但，对共产党何必寄希望，难道要他帮助政府吗？问题在政府何以要自己捣自己的乱？孔宋的这些办法，达到毁产的目的，和共产党的拆路烧城，效果全无二致。唐朝的秕政，是和黄巢相辅而行的，明朝的秕政，是和张李相辅而行的。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产党莫大的本钱。还是先检讨一下自己罢！

（原载1947年2月22日《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八期）